



歷史與現

7

# 馬克思傳

柏林的這本《馬克思傳》是研究馬克思生平及其思想觀點的重要鉅著，為馬派大將考拉科斯基 (T. Kojakowski) 及科恩 (G. A. Cohen) 所推崇。作者說這是一本馬克思的「精神傳記」，特別把著述的重點擺在形成馬克思主義核心的那些思想和觀念。在馬氏一生所著不是像黑格爾那樣很有系統性的思想論述裡，經由柏林這本書的串連，對馬克思本人及其思想學說將可得到初步的全面性理解。

伊賽·柏林 / 原著  
趙干城·鮑世奮 / 譯  
丘爲君 / 校訂



# 馬克思傳



ISBN 957-13-0194-9



9 789571 301945

歷史與現場 ⑦

# 馬克思傳

原著／伊賽·柏林  
譯者／趙干城·鮑世奮  
校訂／丘爲君

ISBN 957-13-0194-9

歷史與現場 ⑦

## 馬克思傳

原著——伊賽·柏林

譯者——趙干城、鮑世奮

校訂——丘爲君

發行人——臧遠侯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10909和平西路三段20號4F

發行專線——(02)3066842

讀者服務專線——(02)3024094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01038540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校對——陳錦生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成宏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廿五日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新台幣二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二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 目錄

- 序 5
- 【第一章】導言 13
- 【第二章】童年和青少年 33
- 【第三章】精神哲學 45
- 【第四章】青年黑格爾派 69
- 【第五章】巴黎 87
- 【第六章】歷史唯物論 121
- 【第七章】一八四八年 155
- 【第八章】流亡倫敦：第一階段 173
- 【第九章】第一國際 207
- 【第十章】「紅色恐怖博士」 221
- 【第十一章】最後歲月 247
- 【附錄】參考閱讀書目 265
- 中英譯名對照 288

歷史與現場 ⑦

# 馬克思傳

原著／伊賽·柏林  
譯者／趙干城·鮑世奮  
校訂／丘爲君

ISBN 957-13-0194-9

# 目錄

- 序 5
- 【第一章】導言 13
- 【第二章】童年和青少年 33
- 【第三章】精神哲學 45
- 【第四章】青年黑格爾派 69
- 【第五章】巴黎 87
- 【第六章】歷史唯物論 121
- 【第七章】一八四八年 155
- 【第八章】流亡倫敦：第一階段 173
- 【第九章】第一國際 207
- 【第十章】「紅色恐怖博士」 221
- 【第十一章】最後歲月 247
- 【附錄】參考閱讀書目 265
- 中英譯名對照 288

歷史與現場 ⑦

## 馬克思傳

原著——伊賽·柏林

譯者——趙干城、鮑世奮

校訂——丘爲君

發行人——臧遠侯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10909和平西路二段20號4F

發行專線——(02)3066842

讀者服務專線——(02)33024094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01038540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校對——陳錦生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成宏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八月廿五日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新台幣二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二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

# 序

---



本書寫於將近四十年以前，原有篇幅是目前的兩倍多，但霍姆(Horn)大學圖書館的編輯們要求嚴格，說服我對本書作了刪削，砍去了大部份關於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問題的討論，其內容便主要集中在思想傳記上。自那時起，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性的社會變化，使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大大地擴展了。很多未發表過的馬克思著作問世，特別是出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這部《資本論》的草稿，它極大地影響了對他的思想所作的闡釋。此外，形勢本身不可避免地改變了考察他的研究的着眼點，即使是最不留情的馬克思批評者，也無法否認他的研究和我們時代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連。關於他的思想和先驅思想家們的關係，特別是和黑格爾(Hegel)思想的關係（根據對黑格爾本人學說所作的新闡釋，這已經大量出現了）：關於強調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義」(humanist)著作的價值和重要性，（這部份是由於這樣一種願望所激起的，即把馬克思從斯大林主義的(Stalin)，或者在某些方面，從普列漢諾夫的(Plekhanov)，考茨基的(Kautsky)，列寧的(Lenin)，甚至恩格斯的(Engels)闡釋和歪曲中拯救出來）：關於以巴[黎]為主的「修正主義」和「正統論」的：對《資本論》學說的解釋越來越大的差異；關於由新弗洛伊德論者發起的討論針對像異化這樣的主題——它產生的原因和對策——；或者，關於由衆多派別的新馬克思主義者發起的討論（以及蘇聯學者和他們的盟友對意識形態背離作出的尖銳反應）針對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學說；諸如此類的問題已經產生了一批注釋性和批判性著作，它們以其卷帙日益浩繁而使早先的討論相形見絀。在這些爭論中，有些完全就像他原來的青年黑格爾派產生的爭端，馬克思曾指控該派希圖利用已死亡了的黑格爾學說，並摻入自己的私貨；同時，這一思想觀念上的爭論也為掌握和理解馬克思自己的思想以及這些思想和我們時代的歷史之間的關係增添了大量內容。

激烈的論爭，特別是在近二十年來關於馬克思主要學說的意義和有效性的論爭，不可能使任何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無動於衷。因此，要是我今天來寫一本關於馬克思生平和思想的著作，就不可避免會寫出一本不同的書，其原因就在於我對他提出的那些主要概念的意義所獲得的認識，這些概念，諸如社會的科學，思想觀念對制度和生產力的關係，無產階級領袖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應取的正確戰畧，這些都經歷了某種變化。情況就是如此，即使我在今天也不應當聲稱已瞭解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全部領域。當我在本世紀三十年代為寫作此書作準備時，或許過深地受到恩格斯、普列漢諾夫，梅林(Mehring)的經典闡釋的影響，在這些闡釋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運動已經建立起來了；我亦或可能過深地受到卡爾(E. H. Carr)那本令人欽佩的批評性傳記（從未重印過）的影響。但是當我開始修改本書的內容時，我意識到我所從事的工作是寫一本新的、更全面的、雄心勃勃的著作，它或許遠遠超出該類著作的目的。因此，我以為在連續不斷的修訂過程中，最好把自己限制在：糾正事實和重點上所犯的錯誤、說明過於大膽的概括歸納、對草率處理的某幾處地方作進一步闡述，以及在闡釋方面作相對較小的改動。

馬克思並不是一個極其清晰的作者，他的目的也不是在這樣一種意識上構築一個單一的、無所不包的思想體系，即可以被看作像斯賓諾莎(Spinoza)、黑格爾或孔德(Comte)這樣的思想家希望建立的那種思想體系。有些人，像盧卡奇(Lukács)，堅定地認為馬克思但願（以他們看來且已達到了）在思維方法上、在達到真理的方式中，進行激烈的改造，而不是以一種學說代替另一種學說。持這種看法的人可以在馬克思本人說過的話中找到充足的證據。由於馬克思終其一生始終堅持認為一種信念的意義和現實性存在於表達這種信念的實踐中，因此，他對一系列中心問題的

看法，以及他的那些並非最少獨創性或最缺乏影響力的觀點，就不是全面系統地寫下來的，從而就必須在他著作的各處中探尋和推導，以及首要的，從他爲之辯護或他親自倡導的具體行動中去發現，這也許並不令人感到驚訝。

一種既是如此激進、又是如此直接和革命實踐相聯繫，乃至於確實和革命實踐具有同一性質的學說本應該導致各種不同的闡釋和戰畧，這是很自然的。他在世時這種情況就已經開始了，並引出他那著名的獨特的標誌，即他本人根本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早期論文被發表了，這些文章在語氣和重點上，以及從某種程度看，在題目上（有些人或許要說，在學說的主要方面），均不同於他的後期著作，這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產生了大量不同觀點；而且不僅僅在理論家中，它亦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內引起了激烈的衝突，並在一定的時候，引起我們時代裡國家政府間的激烈衝突，從而導致權力的重新組合，這已經改變了人類的歷史，並且極可能將繼續如此進行下去。然而，這一巨大的騷動，以及成爲這些爭端在理論上的表現的意識形態立場和學說超出了本書的論述範圍。我希望講述的僅僅是這位思想家和鬥士的生平和觀點，而在很多國家裡，馬克思主義政黨正是以這個人的名義創立的；我所致力於研究的思想觀念是作爲一種理論和一種實踐已經歷史性地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核心的那些思想觀念。他所倡導的運動和思想發生的變遷，宗派歧見和異端邪說，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的改變，這些變化已經把他的時代裡那些大膽且自相矛盾的概念轉變成可接受的真理，同時在他的共產主義思想形成以前的觀點和附論中，有些已經日益突出起來，激起了當代的論爭，所有這些，其絕大部份均不屬於本書研究的範圍，儘管這本傳記亦向這樣一些讀者指引了方向，他們希望繼續追索這一歷史，追索我們時代最

為動盪變化的運動。

特雷爾·卡弗先生(Terrell Carver)為本書所編的參考書目(免不了經過選擇)取自迄今可得到的有關英語著作,對此我感激不盡,因為他畧去了部份明顯已過時的書目,並增添了大量新書目。新增部份僅就其種類繁多而言,便已表明在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領域內知識和思想這兩者範圍均已大大擴展了,並且顯示了新穎的研究方式。

我也應向兩位朋友表示謝意:一位是列賽克·考拉科斯基教授(Lezek Kolakowski):他閱讀了本書並提出寶貴建議,令我獲益匪淺;另一位是科恩先生(G. A. Cohen),他那透徹的批評性評論和鼓勵正是我不可或缺的。我還應感謝我的朋友弗朗西斯·格雷厄姆——哈里遜先生(Francis Graham Harrison),他校訂了索引。此外在此一併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人士給予我的突出禮遇和耐心。

伊賽·柏林

一九七七年於牛津

---

## 第三版作者按

我抓住本書新版提供的機會，糾正在事實和判斷上所犯的錯誤，補上評論馬克思觀點方面的疏漏之處，有社會方面的，也有哲學方面的，特別是有關思想觀念的，這為他的第一代追隨者和批評者所忽視，僅僅在俄國革命以後纔突出起來。這些中最重要的是他的關於人的異化和自由之間的關係這一概念。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使這本傳記體現最新研究成果（儘管我不得不在使用英語的第二手著作上）。我理應感謝阿伯拉姆斯基先生（C. Abramsky）和鮑托摩先生（Bottomore），他們給予我寶貴的幫助和忠告；我亦應感謝漢普謝爾教授（S. N. Hampshire），他重讀了本書的前半部，為提高本書質量提出了許多建議。

伊賽·柏林

一九六三年於牛津



---

## 首版作者按

感謝我的朋友和同事們，他們好意地閱讀了本書手稿，並貢獻了令我受益匪淺的寶貴建議，我特別要感謝阿耶先生(A. J. Ayer)、伊恩·鮑溫先生(Ian Bowen)、契爾弗先生(G. Chilver)、漢姆謝爾先生(S. N. Hampshire)和拉契米維契太太(S. Rachmilewicz)，我還要向下列諸位深表謝意，他們是弗朗西斯·格雷厄姆——哈里遜先生(Francis Graham-Harrison)，他匯編了一本書索引；費希爾太太(H. Fisher)和大衛·斯蒂芬斯先生(David Stephens)，他們校對了本書；馬休先生(Methuen)，他允許我使用一百四十二至四十三（原文頁碼——譯注）頁所引的段落；以及更要感謝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院長和負責人，他們允許我在作為該院研究員時期，把一部份時間投入我的研究範圍之外的一個課題。

伊賽·柏林

# 第一章

---

## 導言

事物和行動是什麼樣就什麼樣，它們的結果也將是它們會有的結果，那麼我們為何還應該竭力去自欺欺人呢？

——巴特勒主教

(Bishop Butler)

---



十九世紀的思想家沒有一個人像卡爾·馬克思那樣對人類產生了如此直接、如此穩定、如此強有力的影響。他在世時和去世後，都在他的追隨者中佔據了精神和道義上的優勢地位，這種優勢地位的力量，即使在那個民主民族主義(Democratic nationalism)的黃金時代裡也是獨特的，而在這個時代中崛起了偉大的人民英雄和殉難者，充滿浪漫精神的、幾乎是傳奇般的人物，他們的身傳言教主宰着大眾的想像力，在歐洲創造了新的革命傳統。然而，馬克思在任何時候都無法在一般意義上被稱作一個大眾的形象，當然他也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大眾作家或演說家。他的寫作範圍廣泛，但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著作却並未被廣泛閱讀。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這些著作開始在大眾中傳播，其中有些著作以後又獲得了廣大的讀者群，但它們的聲譽與其說歸之於它們在思想上的權威性，不如說歸之於他因而被認定的那個運動之日益增長的美名和惡名。

馬克思完全缺乏一個偉大的人民領袖或煽動家的素質。他不是一個像俄國民主主義者赫爾岑(Herzen)那樣的天才宣傳家，也不擁有巴枯寧(Bakunin)那樣令人着迷的雄辯口才。他的大部份研究生活是在倫敦，在他的書桌旁，在不列顛博物館的閱覽室裡相當不引人注目地度過的。他幾乎不為一般民衆所瞭解，在他生命行將結束之際，他成爲一個強大的國際性運動所公認的令人仰慕的領袖，但在他的一生中，沒有任何東西或他的個性會激勵起想像力或喚起無限的獻身精神，喚起熱情的近乎宗教性的崇拜，而這些正是像科蘇特(Kossuth)、馬志尼(Mazzini)、甚至拉薩爾(Lassalle)這樣的人在他們晚年時被他們的追隨者所賦予他們的。

他既不在公衆中頻繁露面，其公衆形象也不是顯著的成功。在爲數不多的場合中，他主持宴會或會議，他的演說過於堆砌，常是結合着單調一律和唐突發作，這雖博得聽衆的肅然起敬，但

却不是激起群眾的熱情。就氣質而言，他是一個理論家，一個知識分子，本能地避免直接接觸人民大眾，而他的全部生活却致力於研究人民大眾的利益。對他的許多追隨者來說，他是以前一個固執己見、好說教的德國校長形象出現的，隨時準備無止境地重複他的論點，並且語調越來越尖銳，直到問題的實質在門生們的腦子裡生根為止。他大部份的經濟學說，是在對工人的演講中首先表達出來的：在這些情況下，他的講解以任何標準來衡量都是透徹簡潔的典範。但他的寫作卻是緩慢而痛苦的，正如有時候發生在敏捷而多產的思想家身上的那樣，寫作難以配合得上自己思想的速度，並且即刻又不耐煩地和一種新的學說交流，對每一種可能產生的異議都預加防範<sup>①</sup>。已出版的文本，在處理抽象問題時，其細節方面一再表現出不平衡和模糊不清，儘管主要的學說從來不會有很嚴重的疑問。他敏銳地意識到這點，一度把自己警作巴爾扎克(Balzac)的小說《不知名的傑作》(Unknown Masterpiece)中的主人公，他試圖繪出在自己頭腦中形成的一幅畫，沒完沒了的在畫布上塗抹，最終搞出了一大堆無形狀的顏色，在他眼裡這似乎表達出了他在想像中見到的畫面。馬克思所屬的那一代人，比前幾代人更熱切更有意識地培養想像力；馬克思是在這樣一些人的周圍成長起來的，對他們來說，觀念常常比事實更為真實，人際關係比外部世界的事件意味着更多的東西；確實，他們一再按他們自己個人經驗的豐富而又複雜的世界的條件來理解和解釋公共生活。馬克思生性就不是內省的，對人或心理與靈魂的狀態幾乎不感興趣。在他的同時代人

①對馬克思寫作方法感興趣的人最好閱讀《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見「參考書目」本書原文第二一〇頁至二一二頁)，該書一直以手稿形式保持着直到一九三九年纔出版，它包括了《資本論》和早期異化研究的主要學說。

中竟然有如此多的人沒有看出在他們的時代裡社會革命性變化所具有的重要性，這種變化皆起因於科技的飛速進步，連同伴隨而來的財富突然增長，以及，同時他們竟然沒有估計到社會和文化的脫序與紊亂所具有的重要性，這一切僅僅激起他的憤慨和輕蔑。

他有着強而有力的、活潑的、富於實際和不感情用事的頭腦，對不公平有敏銳的感受，幾乎不動感情。知識分子的華而不實和情感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愚鈍不化和自鳴得意同樣令他厭惡。在他看來，前者似乎往往是毫無目標的饒舌胡吹，遠離現實，無論其是真誠的還是虛假的，都一樣令人討厭；後者根本就是偽善、自欺欺人，由於着迷於追求財富和社會地位，因此對時代的突出的社會特徵視而不見。

生活在一個充滿敵意、鄙俗不堪的世界中的感受（或許因為他潛在的不喜歡他生而就是一個猶太人這個事實的進一步加強），使他天生的嚴厲和咄咄逼人之勢有了發展，並產生了一般人想像中的一個令人生畏的形象。最崇拜他的人也會發現，很難認為他是一個樂於響應別人或心腸柔和的人，或會關心大部份和他有聯繫的人的感受。在他看來，他所遇到的人中，極大部份要麼是傻瓜，要麼是拍馬屁奉承者，對他們，他的態度是公開的懷疑和蔑視。但是，如果說他在公眾場合中態度傲慢逼人，那麼在由他的家庭和朋友組成的親密圈子裡，他却體貼別人，和藹可親，他身處於其中而感到極其安全。他的婚姻生活不可謂不幸福，他熱愛他的孩子，他以幾乎沒有中斷過的一片忠心對待自己的終生好友和合作者恩格斯。他沒有什麼魅力，行為舉止常常粗魯不堪，並為盲目的憎恨所折磨。但是，對他的個性之強烈和具有的力量，對他的觀點之大膽和具有的氣勢，以及對他分析當代形勢範圍之寬廣和色彩的鮮明，甚至連他的敵人亦驚嘆不已。

在當時的革命家之間，他終其一生保持了一種奇特的孤立形象，對他們的人品、他們的方法以及他們的目的均不表示友好。然而這一孤立狀態並不僅僅由於氣質使然或時間地點方面的偶然性。大部份歐洲民主主義者在特徵、目標和歷史運動方面無論有多大不同之處，他們在一個基本標誌上却是相似的，這使得他們的合作成爲可能，至少在原則上是可能的。無論他們是否信奉暴力革命，他們之中絕大部份在最終的分析裡都訴諸於人類共同的道義標準。他們之批評和譴責人類的現存條件，是在某種預先設定的理想主義、某種體系的意義上，其合乎人意之處至少是無需證明的，以正當的道義觀點看，對所有人都是不言自明的；他們的綱領在實踐中可以實現的程度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並據此可以或多或少被歸入烏托邦模式，但在各種民主主義思想流派之間，關於追求的絕對目標方面，却存在着廣泛的一致性。他們對下列問題並不是一致的：關於提出的手段之效能；關於在何種程度上和現存權力進行的妥協在道德上或實踐方面是可取的；關於特定的社會機構的特點和價值；以及最終關於在這些問題方面究竟應採取何種政策。然而，即使是他們中最鼓吹暴力的——雅各賓黨人或恐怖主義者——他們或許比其他他人更爲——相信世上幾乎沒有什麼事情是擁有堅定意志的個人所不能改變的。他們也同樣相信，牢牢把握住的道德目標是行動的源泉，這些目標本身又因訴諸於某些被廣泛接受的價值尺度而被證實是合理的，從這兒起，正確的是首先確定你希望的世界是什麼樣的，接着就必須根據這個來考慮，現存社會結構中有多少是應該予以維護的，多少是給予譴責的，以及最終你有責任去尋求最有效的手段，以完成必要的社會變革。

對這種任何時代中大部份革命家和改革者共同具有的態度，馬克思是完全不予同情的。他深

信，人類歷史是受規律的支配，這種規律不可能被因此個或彼個理想所激勵的個人干預而有所改變。他確信，人們訴諸於內心的體驗來證明自己目標的合理，迄今是通過表明某一特殊的被稱作道德或宗教的真理來證明的，這種內心體驗，在人們歷史地置身於一定情境的條件下，總傾向於產生神話和幻想，既有個人的也有集體的。在他們生而來的物質環境的條件下，這些神話以客觀真理的面貌出現，常常包含了人們在悲慘環境下但願相信的東西。在這些神話的靠不住的影響下，人們錯誤地解釋他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性質，錯誤地理解他們在世界中所處的地位，因而也錯誤地估測他們自己和其他人的力量的範圍，錯誤地估測了他們自己和對手的行動的後果。和他的時代的大部份民主主義者不同，馬克思相信，價值不能脫離事實來觀察，而必然取決於觀察事實的方式。對歷史進程的本質和規律的真正洞察力，將以其本身而無須依靠獨立的已知道德標準的幫助，使一個有理性的人明白他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合適步驟，也就是，什麼樣的道路最適合他所屬於的階層所提出的要求。因此，馬克思並沒有把新的倫理道德或社會理想置於人類身上，也沒有為改變心靈辯護。僅僅改變心靈只不過是以一種幻想代替另一種幻想。他和他這一代的其他偉大思想家不同：他所訴諸的，至少按他自己的觀點，是理性，是實踐精神，斥責精神上的缺陷或盲目；他堅持認為，人們爲了知道如何把自己從他們深陷於其中的紊亂狀態中拯救出來，他們所需要的乃是努力去理解他們的確實狀況；他相信，正確估計在人們所屬的社會中各種力量的精確平衡，這本身就將表達出可以合理追求的生活方式。馬克思譴責現存秩序，他訴諸於歷史，而不是理想；他譴責這種秩序，因爲作爲一種規律，而不是作爲非正義或不幸現象，或歸之於人的邪惡或愚蠢，而是作爲社會發展規律的作用，它在歷史的一定階段乃是不可避免的，即一個階



級在以程度不等之合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時，就會剝奪壓榨另一個階級，因而導致對人的壓制和損傷。壓迫者之受到威脅，並不是由於來自他們的犧牲品方面的蓄意懲罰報應，而是由於不可避免之毀滅，這是歷史（以植根於一個對抗性社會集團的利益所產生的活動之形式）為他們所注定了的，作為一個階級，他們已經完成自己的社會任務，結果便很快就注定要退出人類歷史舞臺。

然而，儘管按其意圖是訴諸於理性，他的語言却是先驅者預言家式的，與其說是以人類的名義，不如說是以普遍法則的名義發出的，他所致力不是拯救，也不是改善，而是警告和譴責，是顯示真理，以及首先是駁斥謬誤。「我將摧毀，我將建設」，蒲魯東（Proudhon）寫在他的一本著作前的這句題辭，遠較貼切地描繪了馬克思對自己被賦予的任務所持的概念。至一八四五年，他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任務並開始瞭解社會演化的本質、歷史和規律，在這裡他正可施展身手了。他得出結論，社會的歷史，是人類通過創造性勞動這個手段努力達到掌握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歷史。這一活動是在對立階級的鬥爭中體現出來的，在這些鬥爭中，一個階級必將以勝利者出現，儘管是以變化很大的形式：進步是由連續的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勝利所構成的。這些在歷史的長河中包含了理性的進步。祇有這樣一些人是合乎理性的，他們投身於社會中進步的、也就是處於上升的階級中，要麼，如果需要的話，審慎地拋棄自己的過去並和進步階級聯合在一起，要麼，如果歷史已將他們置於這樣的地位，就有意識地去認識他們所處的形勢並據此而行動。

相應的，馬克思在他的時代的鬥爭中，既然已經看出無產階級為上升的階級，便獻身於為他們爭取勝利的鬥爭中，而他已經決定走在他們的前面了。這一勝利，這歷史的進程，在任何情況下都將是必然有保證的，但是人的勇氣、決心和才智可使它來得更快，使轉變較少痛苦，連同較

少的摩擦衝突、較少耗費人類的物質力量。至此他的地位便是指揮官式的，真正從事於一場戰役，他因此根本就不需要持續不斷地要求自己或其他人表現捲入一場戰爭的理由，或表明在戰爭中站在這一邊而非那一邊的理由；戰爭的狀態以及一個人的自身地位是給定的，它們是事實，不容置疑，祇需接受和檢驗；他的唯一任務是擊敗敵人，其他一切問題都是書生之談，建築在無法實現的假設條件上，因而不是不着邊際的。所以，馬克思在晚期著作中幾乎完全不討論基本原理，也幾乎沒有任何意圖要證明他反對資產階級的合理性。敵人的優劣之處，以及要是敵人或戰爭是他種狀態而非此種狀態，又可能會發生些什麼，這些在戰鬥期間是不會令人感興趣的。在真正的激戰時期引入這些不相關的問題，就會把支持者的注意力從關鍵問題中轉移出去，這些關鍵問題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了，都是他們所面臨的，這種轉移因而也就削弱了他們的抵抗力。

在這場真正的戰爭中，重要的是明確認識到自己的和敵人的資源，認識到以前社會的歷史，以及支配歷史發展的規律，這對實現目標乃是必不可少的。《資本論》是為提供這樣一種分析所作的嘗試。由於該書的注意力集中在行動的實踐問題上，它幾乎完全沒有明確的倫理道德論點，也不訴諸於良知或原則主義，亦同樣令人吃驚地沒有提及勝利之後將發生或應該發生什麼的詳細預言。那種不可改變的、普遍的、天賦的權利的概念，以及道德良知概念，作為屬於每一個人而無論其在階級鬥爭中處於何種地位的東西，都被指斥為自衛的自由主義幻想。社會主義不是呼籲而是要求，談論的不是權利而是新的生活方式，從壓抑的社會結構中解放出來的生活方式，在它不可抗拒地到來前，已經可以見到舊的社會秩序開始解體了。道德的、政治的、經濟的觀念以及理想，隨着它們由之而產生的社會條件改變而改變，把任何一種觀念認作普遍的不可改變的，也就

等於是相信它所隸屬的那個秩序——在這裡是資產階級秩序——是永恆的。持有這種謬論是爲了支持自十八世紀以來唯心論人道主義者的倫理和心理學說。因此，馬克思的輕蔑和厭惡便傾瀉於自由主義者和功利主義者們所作出的一般推斷上，他們認爲，由於所有人的利益絕對是、而且始終是一樣的，因此，就每一個人而言，一種理解、親善和仁慈的衡量尺度，或許仍然使達到令所有人滿意的某種廣泛的一致性成爲可能。如果階級間的戰爭確實是真的，那麼這些利益則是完全不相容的。拒不承認這個事實，祇能歸之於愚蠢的或目空一切的無視真理，這是歷史一再予以暴露的偽善或自欺的一種特別邪惡的形式。這個觀點上的基本區別，以及不僅僅是氣質或天賦才華的差異，把馬克思和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空想社會主義者截然區別開來，而令他們迷惑不解陷於憤慨的是，馬克思凶猛地攻擊辱罵他們，不斷地持續了四十多年。

他憎恨一切浪漫主義、感情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呼籲，並認真防止喚起他的讀者的理想主義感情，試圖系統地從他的運動的宣傳文字中，抹去一切舊的民主辭句的痕跡。在任何時刻他都不作讓步，也不要求別人讓步。他不加入任何含糊曖昧的政治聯盟，因爲他拒絕一切形式的妥協折衷。凡是他署上自己名字的宣言、表明信念的聲明和行動的綱領，幾乎都不涉及道德進步、永恒正義、人類平等、個人或國家的權利、心靈自由、爲文明而戰或諸如此類的詞句，而這些正是他那時代民主運動所慣用的（以前亦一度體現了它們的理想）。他把這些詞句看作極無價值的侈談，表明了思想上的混亂和行動上的無能<sup>②</sup>。

<sup>②</sup> 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了對第一國際賦予他起草宣言中主要條款裡這些表達的態度，這些看法在這方面是極有啓發意義的。

這戰爭必須在每一條戰線展開。鑒於現代社會是在政治上組織起來的，因而必須按這樣一些力量組成一個政黨，這些力量，根據歷史發展的規律，必定要作為一個征服統治階級的階級而出現。他們必須不斷地被告知，現存社會中似乎很牢靠的東西實際上註定要很快衰亡，人們之所以可能發現這是一個很難相信的事實，原因在於大量道德的、宗教的、政治的、經濟的假設和信念構成了保護性的表面外觀，這些假設和信念是垂死的階級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創造出來的，使他們自己和別人都看不到他們臨近的命運。穿透這層煙幕，看出各種事件的真正架構，需要有精神勇氣和敏銳眼光。這個社會之註定要走向終結，其紊亂狀況和大量危機本身就將使有興趣有眼光的觀察者相信，為了生存下去，他必須成為什麼樣的人，做什麼事；而他之所以有興趣觀察是因為祇要他不是死人或瀕死者，就不可能對和自己生活有密切聯繫的社會之命運不感興趣。對不同的人來說，揭示出來的任何價值的主觀範疇都是相同的，是根據內心的想像所決定的，但是瞭解事實本身，按馬克思的說法，肯定將決定合理的行為。一個社會被判斷為是進步的，因而也就值得去支持它。如果是這樣一個社會，其機構制度能夠勝任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就無須顛覆它的全部基礎。一個社會成為反動時，它就將不可避免地走入絕境，無法避免內部紊亂和最終崩潰，儘管它為了存在下去作出最大努力，這類努力本身就創造了不合理的信念，以為自己最終是穩定的，以這樣一帖止痛劑，所有垂死的秩序都必得把它們的真實狀況的徵兆掩蓋起來。無論如何，歷史所譴責的一切都將不可避免地被掃蕩殆盡。既知不可能，仍聲稱應挽救甚麼，這也就是否認宇宙的合理進程。斥責這種進程本身——通過這種痛苦的衝突，人類努力奮鬥，以達到其權力的完全實現——，在馬克思看來，乃是一種天真的主觀主義。這起因於病態的或淺薄的生命觀，亦起因

於鍾愛這個那個短暫無常的德行或制度的非理性偏見，它顯示了對舊世界的依戀，成爲無法徹底從其價值中掙脫的徵兆。對馬克思來說，似乎在極認真的博愛主義感情的偽裝下，悄悄滋長的是虛弱和背叛的種子，歸之於和反動力量達成妥協的基本願望，一種隱秘的對革命的恐懼，其基礎是害怕去超越生活和特權，而在深層中，則是害怕現實本身，害怕白天的全部光明。然而，就現實而言却不會有任何妥協。博愛主義祇是一種軟化了的、掙面子的妥協形式，源於避開一場公開鬥爭之危險的願望，以及更有甚者，躲避獲勝的風險和責任。沒有什麼比怯懦更激起他的憤慨了，因而產生了他提到怯懦時的狂怒常常是殘忍的口氣，並開始了那種生硬的「唯物主義」文風，它給革命的社會主義著作定下了一個人們所不熟悉的特徵。這種「赤裸裸的客觀性」風尚，特別在以後一代的俄國作家中，形成力求以最尖銳、最樸素、最震撼人的表述形式，把有時候並非很令人吃驚的主張包裹起來。

馬克思，按他自己的說法，是從幾乎偶然的情況下開始建立他的新工具的，因爲，在和政府就純具地方重要性的經濟問題展開爭論時，他正身任一家激進報紙的編輯，他意識到幾乎完全不懂經濟發展的歷史和原理。上述爭論發生於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八年，他作爲一個政治和經濟思想家的基本立場已經全部形成了。他以驚人的完整性構築了一整套社會以及社會演變的理論，它精確地指明了對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必須到哪裡和如何去探索尋求。它是否具有獨創性常遭到質問。但它是獨創性的，並不是在這種意義上，即如藝術作品包含了前人未曾表達過的個人經驗而成爲獨創性的，而是就它所表達的科學理論而言乃是獨創的，這裡，它提供了一種對迄今未解決的或者甚至未系統闡述的問題的解決方法，對這些問題，它或許可以通過修正和結合現有觀點

從而形成一種新的假設來解決。馬克思從不企圖否認他對其他思想家的懷疑。他傲慢地宣稱：「我從事的是歷史的正義行動，我給予每個人他理應所得的。」但他並沒有聲稱是他第一次充分回答了以前被錯誤理解的、或錯誤回答的、或答案不充分不清楚的所有問題。馬克思追求的特點並不是新奇，而是真理。當他在別人著作裡發現真理時，就嘗試把它們結合入自己的新的分析綜合中，至少在巴黎的早期歲月裡是這麼作的，在那兒他的思想的基本方向已經形成了。在最後結果中具有獨創性的並非任何單一的組合成份，而是主要的假設，通過它每一成份和其他成份結合起來了，因而這些部份看上去成爲在一個純粹的傳統的整體中相互聯繫又相互支持的各個方面。

因此，探求任何由馬克思提出的單一學說的直接來源乃是一項相對簡單的任務，是大量批評家們急不可待要去承擔的。可以這麼說，在他的觀點中，任何一個，其胚胎都能在某個以前的或同時代的作者中找到。因此，建立在取消私有財產的公有制學說在近二百年的大部份時間裡或許都以這種那種方式擁有信徒。那個常引起爭論的問題，即馬克思這一學說是否直接取自於莫雷利(Morelly)或馬伯利(Mably)，或巴貝夫(Babouv)和他的追隨者，或取自於法國平均共產主義的德國翻版，結果乃是太具純學術色彩的問題，並無太大重要性。至於更具體的學說，如歷史唯物主義，可以發現幾乎在一個世紀以前由霍爾巴赫(Holbach)在其論文中加以充分發展的，而這又歸之於斯賓諾莎(Spinoza)，它的經過修正的形式則在馬克思自己的時代裡由費爾巴哈(Feuerbach)重加論述的。把人類歷史看作社會各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個觀點可在林魁特(Linguet)和聖西門(Saint-Simon)那兒找到，並在很大程度上爲諸如梯葉里(Thierry)和米涅(Mignet)這樣的同時代法國自由派的歷史學家所採納，並且正如馬克思所承認的那樣，亦爲保守的基佐(Gизоt)所採納。

周期循環經濟危機不可避免這一科學理論，可能首先是由西斯蒙第(Sismondi)提出的；而第四階級(Fourth Estate)興起的理論，當然為法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所掌握，並在馬克思的時代裡由施泰因(Stein)和赫斯(Hess)在德國加以廣泛傳播。無產階級專政是在十八世紀的最後十年間由巴貝夫(Babouv)構劃出來的，並在十九世紀由魏特靈(Weitling)和布朗基(Blanqui)以不同方式加以明確發展的。工業社會中工人目前和將來的地位以及重要性，是路易·布朗(Louis Blanc)和法國國家社會主義者提出的，其程度較馬克思打算承認的要更為充分。勞動的價值理論取自於洛克(Locke)、亞當·斯密(Adam Smith)、李嘉圖(Ricardo)及其他古典經濟學家。剝削和剩餘價值理論可在傅立葉(Fourier)那兒找到，通過國家的有意識控制對剝削和剩餘價值說予以補救的理論，則出現在英國早期社會主義者的著作裡，如布雷(Bray)、湯普遜(Thompson)和霍奇斯金(Hodgskins)。馬克思·施蒂納(Max Stirner)至少比馬克思要早一年闡明無產階級異化理論。黑格爾和德國哲學則是一切中影響最為深刻且無處不在的。這張清單可以很容易地繼續進一步擴展下去。

十八世紀並不缺少社會理論。有些理論甫出世便夭折了，還有一些理論當思想氣候有利時，便矯正了社會輿論並對行動產生影響，馬克思篩選了大量材料，從中挑出一切在他看來是有獨創性的、真正的、重要的材料，並根據它們構築了一種新的社會分析工具，其長處並非在於它是美妙的或連貫一致的，亦非在於它具有情感的或精神的力量——偉大的烏托邦體系在理論思辨的想像力方面乃是更為壯觀的著作——而在於它以全面的理解、現實主義和完整的細節把單純的基本原理傑出地結合了起來。它所假設的環境，確實符合它所針對的社會公眾的個人的直接經驗。它所作的分析，當以最簡單的形式表述時，似乎立刻就顯示出是壯觀的有滲透力量的；其新穎的假

設，代表了對德國的唯心主義、法國的理性主義和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的一種特殊的綜合，似乎真正協調並說明了迄今為止被認為是相對分離的大量社會現象。這向新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準則和一般口號提供了具體的實際意義，以及首要的是，通過把重點放在這些準則和口號上，它就使得理論不僅限於激起不滿和反抗的一般情緒上，像英國的憲章運動所作的那樣，後者乃是一套具體但聯繫鬆散的政治和經濟目標。馬克思的體系把這些感情導向有系統內在聯繫的、即刻付諸行動的、可行的目標，這些目標並不被認為是對所有人在所有時候均有效的絕對目標，而是適合一個代表社會發展特殊階段的革命政黨的目標。

馬克思理論的主要成就，是對在那個時代最引起人們思索的那些理論問題，給予清晰的統一的答案，並從這些回答中，推導出明確的實踐方向，同時在這兩者之間，並不製造明顯的人為聯繫，這賦予他的理論以卓越的生命力，使它能夠在以後的歲月裡，戰勝對手而綿延長久。它主要形成於巴黎，在一八四三至一八五〇年這段麻煩叢生的時期，當時，在一次世界性危機的壓力下，通常隱藏在社會生活表面下的經濟和政治傾向，在範圍和緊張程度這兩方面都發展了，直到它們沖垮了由既定的機構制度在正常時候加以衛護的架構，這些傾向在明亮的插曲期間，有一剎那顯示出它們的真正特徵，而這些插曲發生在各種力量的最後碰撞之前；當最後碰撞時，一切問題便再次顯得模糊不清了。馬克思在社會理論領域作科學觀察，依靠這個罕見機會可謂獲益匪淺。對他來說，這似乎確實為他的假設提供了充分的肯定。

這一最終完成的體系是一個巨大的結構，無法對其進行直接攻擊，它包含了意在對付敵人擁有的已知的每一件武器的材料。它對朋友和對敵人一樣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對社會科學家、



歷史學家和批評家。它在這樣一種意義上改變了人類思想的歷史，即自有了這個體系後，某些東西就再也不可以振振有詞地說出來了。至少從長期來看，沒有一個研究領域會因成爲一個戰場而受到損失：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因素乃決定人類行爲的首要因素，這直接導致了對經濟史的強化研究，儘管經濟史在過去也並非完全受到忽視，但它從未達到過目前這種突出的地位，直到馬克思主義的崛起纔推動了這個領域裡的真正的歷史學術研究，其程度正如前一時代中，黑格爾學說有力地促進了總的歷史學術研究。對歷史的和道德的問題以社會學方法予以處理，這是孔德以及在他以後的斯賓塞(Spencer)和泰納(Tainé)都會討論和研究過的，但它之成爲一項精確的具體紮實的研究，則僅僅是由於富有戰鬥性的馬克思主義發起的攻擊，使它的結論成爲一個引起激烈爭議的問題，並且使尋找證據的工作更爲活躍，使注意力更爲集中在方法上。

一八四九年，馬克思被迫離開巴黎，到英國居住。對他來說，倫敦，特別是不列顛博物館的圖書館，乃是「研究資產階級社會的人的理想戰略制高點」，一個彈藥庫，其重要性連它的所有者似乎還未抓住。他保持了幾乎不爲周圍環境所動的狀態，生活在他自己圈子裡的主要是德國人的世界，由他的家庭及一小群親密朋友和政治盟友所組成。他幾乎不會見英國人，既不理解也不關心他們或他們的生活方式。他是一個格外不爲環境影響所動的人。他所看的幾乎全是印在報上寫在書裡的東西，直到去世，他對自己周圍生活的特性，或它的社會和自然背景，也不甚瞭然。就他的思想發展而言，他就是在馬達加斯加（印度洋西部島國——譯注）度過他的流亡生涯也無妨，祇要可以保證定期供應書報雜誌和政府報告。當然，倫敦的居民即使有人注意到他的話，也是少而又少的。他一生中的形成時期，也就是心理學上最令人感興趣的時期，至一八五一年已告結束。

至此以後，他在感情上思想上均已定型，幾乎再沒有改變過。當還在巴黎時，他已經在構思完整敘述和解釋資本主義制度崛起和即將衰亡的思想。基於此的研究工作始於一八五〇年春季，並持續了二十年，其間亦為日常生活所需和養家活口而從事的新聞寫作所打斷。

在倫敦三十年間，他寫的小冊子、文章和信件，形成了他根據自己新的分析方法對當時政治事務所作的連貫一致的評論。它們是尖銳的、清晰的、辛辣的、現實的，有令人吃驚的現代語氣，目標故意針對他的時代所流行的樂觀主義的傾向。

作為一個革命者，他不贊成密謀方法，認為是過時無效的，易激起公眾輿論而並不改變它的基礎；相反地，他決心創立一個受新社會觀支配的公開政黨。他的後期生活幾乎完全集中於為他所發現的真理收集證據並傳播這些真理，直到這些真理完全展現在他的追隨者面前，有意識地和他們的每一種思想、每一句話、每一個行動構成渾然一體。在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集中在達到這一目的上，並且，在他生命行將結束之時，完成了它。

十九世紀包括了很多傑出的社會批評家和革命者，他們和馬克思比較起來，也同樣有獨創性、同樣激烈、同樣固執己見，但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是如此嚴格的專心致志，如此全神貫注於使他生活中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行動都成爲一種手段，朝着一個單一的、直接的、實際的目標前進，爲了這個目標，沒有任何東西是神聖到不可犧牲的。如果說在這一層意義上他超越了他的時代，那麼在另一層同樣明確的意義上，他亦體現了最古老的歐洲傳統之一。他的現實主義，他的歷史感，他對抽象原則的攻擊，他提出的要求，即每一個解決方法都必須按照在實際情形中的適用性和結果加以檢驗，他輕視作爲不願採取激進行動的逃避模式的折衷妥協和漸進主義，以及他堅信大眾

是易受騙的，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去拯救他們，如果必要就通過武力手段，把他們從利用他們的惡棍和傻瓜那兒拯救出來，這些使他成爲下一世紀更嚴厲的實踐革命家這一代人的先驅。而且他堅定地信奉有必要和過去徹底決裂，需要建立一個全球的社會制度，祇有它能夠拯救每一個人，他們在社會壓抑下解放出來，就將和諧合作，但同時又需要堅定的社會發展方向。這種信念，使他廁身於偉大的新信仰的權威創立者、無情的破壞者和革新者之列，他們以一種單一的、清楚的、被熱情尊奉的原則來解釋世界，凡和這原則有衝突的，均予以譴責和消滅。他相信自己描繪的那幅秩序井然、紀律嚴明、自我導向的社會的概貌；而這一社會必定要從目前這個不合理的、混亂的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毀滅的世界中誕生出來。這種信念在性質上是無邊際的、絕對的，它中止了所有問題，使所有困難都消失了；它帶來一種解放意識，其意義相當於十六、十七世紀人們在新的清教徒信念中所看到的，在法國大革命的原則中所找到的，在德國形上學論者的體系中所發現的。如果說這些較早期的理性主義者正可被稱作是狂熱的，那麼在這層意義上馬克思也是狂熱的。然而他對理性的信念不是盲目的：即使他訴諸於理性，他也同樣訴諸於經驗的證據。歷史規律確實是永恆的、不可改變的——把握這一事實，需要某種準形而上的直覺——但它們究竟是什麼，却祇有通過經驗的事實證據纔能確立。他的思想體系是一個封閉的體系，進入於其中的一切東西，都符合預先確立的模式，但它却是建立在觀察和經驗之基礎上的。他不爲任何固定的觀念着迷。在他身上沒有體現出任何伴隨病理性狂熱的那種惡名昭彰的跡象，那種因孤寂感和被迫害感而起的情緒突然亢奮的改變，（這常常出現在完全生活在私人圈子裡的人身上，他們和現實保持了很大距離。）

他最重要著作的主要思想，似乎早在一八四七年已在頭腦裡成熟了。初步輪廓出現在一八四九年，並在七年以後再次表達出來，但在他真正使自己滿意、認為自己已完全掌握了課題的全部內涵之前，他無法着手寫作。這一事實加上尋找出版商有困難，他必須維持家庭生計以及時時伴隨着他的過度工作和頻繁病患，這一切使出版拖了一年又一年。第一卷終於出版是在一八六七年，即該書概念形成二十年以後，並成爲他一生的蓋冠成就。該書是一種嘗試，對社會發展的過程和規律作統一的整體描述，它包含了以歷史主義處理的完整的經濟理論，以及由經濟因素所決定的不太清晰的歷史和社會理論，其間並穿插了出色的題外議論，它們是對無產階級和他們的僱主的狀況所作的分析和歷史性描述，特別是從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工業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引入這些議論旨在解釋總的命題，但事實上表述了歷史寫作和政治闡釋的一種新的革命性方法，總的說來，它構成了迄今表達出來的最令人人生畏、最持續恒久、最雄辯有力的控訴，反對整個社會秩序，反對它的統治者、它的支持者、它的理論家、它的自願或非自願的工具，反對一切使自己的生活和他的生存息息相關的人。他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攻擊是在這樣一個時刻發起的，即資本主義在輕鬆的樂觀主義和信心十足的精神狀態中已經達到了它的物質財富的高峰，就在這一年，格萊斯頓(Gladstone)在一個預算發言中，就近年來所目睹的「財富和力量令人陶醉的增長」向他的同胞表示祝賀。在這個世界裡，馬克思是一個孤立的、充滿敵意的形象，像早期的基督徒，或法國的忿激派，隨時準備反對它和它所代表的一切，稱它的理想是一錢不值的，它的德行是罪惡，譴責它的機構制度因爲它們是資產階級的，也就是，因爲它們屬於一個腐敗的、暴虐的、不合理的社會，這個社會必須被徹底的永遠的消滅掉。馬克思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裡，它毀滅它的敵人，其方法

並不因為他們是有尊嚴的和活躍的人而效率差一點，它迫使卡萊爾(Carlyle)和叔本華(Schopenhauer)在遙遠的古代文明或理想化了的過去時代中尋求逃避，它把它的主要敵人尼采(Nietzsche)逼到歇斯底里和發瘋，而惟有馬克思仍然是安全的，令人生畏的。就像一個上天賦予他使命的古代先知，他對未來的和諧社會有着清楚明確的信念，在這個基礎上，他的內心寧靜安詳，他證明了他在每一處見到的腐朽和毀滅的徵兆。對於他來說，舊秩序似乎正在他眼前明顯地崩潰坍塌，沒有人比他更努力地加速這個過程，力求縮短達到這個目標前的最後的極度痛苦。

# 第二章

## 童年和青少年

我無法安靜地追尋它

那置我靈魂於奴役中的；

決不休憇，不在和平中陶醉

我橫衝直撞，永不停息。

——卡爾·馬克思：〈感受〉

（引自題獻給燕妮·馮·威  
斯特法倫的詩集）



卡爾·海因里希·馬克思，是海因里希·馬克思(Heinrich)和夫人亨麗塔(Henrietta)的長子，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於德國萊茵省的特利爾，其父操律師為業。該城一度是公國諸侯和大主教的首府。卡爾出生的十五年前左右，它為法國人佔領，並被拿破侖(Napoleon)併入萊茵聯盟。十年後拿破侖戰敗，維也納會議把特利爾分給了正在迅速擴張的普魯士王國。

德國諸公國的國王和諸侯們的個人權威因法國人不斷侵畧他們的疆土，幾乎已被摧毀殆盡。至是時，他們全忙忙碌碌於修補世襲君主國被損壞了的組織結構，這一過程要求消滅危險思想的每一點痕跡，而這些思想在傳統的懶散氛圍裡，甚至也已經激發起德國諸省溫和寧靜的臣民們。拿破侖之被擊敗和遭放逐終於摧毀了那些德國激進分子的幻想，他們指望，拿破侖的集權政策的結果即使帶來的不是自由，至少也將帶來德國的統一。然而現狀在一切可能實現的地方，又被重新確立起來，德國再次被分裂成半封建的諸王國和公國。那些復辟了的統治者們，決心要補償這些年裡他們身受的屈辱和失敗，着手在每一個細節方面都回復到舊政權上去，極力想一勞永逸地驅除民主革命的幽靈，而在他們的臣民中，那些較開明的人却致力於把對於這種革命的記憶栩栩如生地保留在心中。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特別賣力撲滅革命事業。在普魯士的那些大地主和擁有土地的貴族的幫助下，他緊跟維也納的梅特涅(Meternich)設下的榜樣，多年來成功阻止了他的大多數同胞的正常社會發展，導致了一種廣泛而又毫無希望的死氣沉沉氣氛，和它比較起來，甚至法國和英國在反動時期，似乎也是自由和生氣勃勃的。最敏銳感受到此的是德國社會中較進步的因素——不僅僅是知識分子，而且還有大批城市資產階級和自



由主義貴族，特別在德國西部，那兒總是和一般歐洲文化保持着接觸。普魯士的那些措施採取了經濟、社會和政治立法形式，旨在維護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恢復一大批特權、權利和約束，其中有很多條文可追溯到中世紀，那些破爛的老古董，多年來它們甚至已經是模糊不清了；鑒於它們和新時代的需要是直接衝突的，它們便需要並取得了一種複雜的災難性關稅體系以使這些條文存在下去，這導致了對貿易和工業產生系統的消極影響的政策；由於那種過時的體制必須得以保存以反抗普遍的壓力，所以，對創造一個專制的官僚機構來說，它的任務便是把德國社會和自由的觀念及制度的傳染性影響隔絕開來。

警察的權力加強了，對公共和私人生活的一切部門機構實施嚴格的監督，這激起了文化界的抗議，政府審查官則把這種抗議嚴厲地壓制下去。德國詩人和作家自願流亡到國外，從巴黎到瑞士展開反對該政權的激昂的宣傳。這一總的形勢特別清楚地反映在社會的一個羣體的狀況中，該羣體在整個十九世紀總是起着社會變化方向的最為敏感的晴雨計作用，這就是雖很小但分佈範圍極廣的猶太羣體。

猶太人有一切理由感謝拿破侖。他出現在哪裡，就着手摧毀社會等級和特權的傳統大廈，摧毀種族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障礙，施行他新頒佈的法典，該法典聲稱理性和人類平等的原則乃是它的權威根源。它向猶太人打開了通往迄今一直把他們嚴格隔絕在外的貿易和職業的大門，起到了釋放大量被禁錮的能量和野心的作用，並導致一個迄今為止極為隔絕的羣體熱烈地——在某些情況下過於熱烈地——接受一般歐洲文化，這從那時起便成為歐洲社會演變的一個新的重要因素。

拿破侖本人後來收回了一些自由權利，餘下的大部份亦為復辟了的德國諸侯們取消了，其結果是很多猶太人原來已熱情地放棄了他們父輩所過的傳統生活模式，嚮往更廣闊的生存前景，如今發現曾經在他們面前突然打開一半的道路又同樣突然封鎖住了，所以他們面臨着一種困難的選擇：要麼走回頭路，痛苦地重新進入猶太人區，他們的家族多半仍繼續住在那兒；要麼改變姓名和宗教，像一個德國愛國者和基督教徒那樣開始新的生活。赫舍爾·勒韋(Herschel Levin)的情況在整整一代人中是典型的。他的父親馬克思·勒韋、父親的兄弟、以及他們的父親，都是萊茵地的拉比（猶太教教士——譯注），像他們的大多數同胞一樣，在那個虔敬神明、近親往來、熱情地以自我為中心的社羣的範圍內度過一生。面對着充滿敵意的基督徒鄰居們，這個社團躲在以自豪和懷疑鑄起的防禦之牆後面，它多少世紀來幾乎完全保護了他們免和外界生活的變化發生接觸。然而，啓蒙的光芒還是開始穿透這層中世紀的甚至是人為的藩籬。赫舍爾接受了世俗的教育後，成為法國理性主義者和他們的信徒的信徒，一個德國的啓蒙主義者，在早年生活中便轉而信奉理性和博愛。他以一片爽直和天真接受了它，而長久的黑暗和反動亦沒有成功地動搖他對上帝和他的單純而樂觀的人本主義信念。他完全脫離了他的家庭，把他的姓改為馬克思，交了新朋友，有了新的興趣。他的法律生涯是比較成功的，作為一個受尊敬的德國資產階級家庭的一家之長，他開始期待一個穩定的未來。就在此時，一八一六年的反猶太法突然剝奪了他的生活工具。

他對英國國教大概並不感到有什麼格外的敬意，但和猶太教甚至更沒有什麼關係。他持有模糊的自然神論，看不出在完全尊奉他的普魯士鄰居的適度開明的路德教方面，有任何道德或社會障礙。無論如何，即使他猶豫過亦很短暫。他於一八一七年，即他的長子卡爾出生前一年，被接

納入教。卡爾對任何和宗教有聯繫的東西均充滿敵意，特別是和猶太教有關係的東西，這部份正是要歸之於改變信仰者有時發覺自己所處的那種獨特的令人為難的境遇。有些人通過成爲虔敬的、乃至狂熱的基督徒，而得以逃脫這種境遇，也有的人則通過反抗一切公認的宗教而達到目的。他們的痛苦程度和他們的敏感與知識成正比。海涅(Heyne)和迪斯累利(Disraeli)終生都爲他們的特殊地位而產生的個人問題所困擾。對他們父親的宗教信仰，他們既不完全斥責也不完全接受，而是嘲弄或爲它辯護，亦或在這些態度之間游來轉去，不自在地意識到他們所處的模稜兩可的地位，對隱藏在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完全接納他們的假象下潛在的輕視或恩賜態度，他們始終是疑心重重的。

老馬克思並不受這些複雜東西之累。他是一個單純嚴肅、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但他並不出人頭地的聰慧，也不格外的敏感。他既是萊布尼茨(Leibniz)、伏爾泰(Voltaire)、萊辛(Lessing)和康德(Kant)的信徒，亦有着一種溫柔、膽怯、隨和的氣質，並完全成爲一個熱情的普魯士愛國者和君主論者，他竭力通過抬出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形象，來證明這種立場是合理的。這個君主和拿破侖比較起來，和後者那種惡名昭彰的蔑視開明知識分子態度比較起來，他顯見的是能夠容忍異己的、開明的。經過洗禮後，他取了海因里希這個基督教名字，把他的家庭成員教育成自由主義的清教徒，忠於現存秩序和普魯士現任國王。他極認真地把這個統治者認作他所喜愛的哲學筆下的那種理想君主，但腓特烈·威廉三世那毫無吸引力的形象，打碎了他那即使是很忠實於君主的幻想。據知這位膽小而又行將退休的人頗有勇氣的舉止祇有那麼一次，那是在一次晚餐會上，他演講道，進行適度的社會和政治改革是合乎需要的，值得一個智慧和仁慈的統

治者去推行。這番話即刻引起普魯士警方對他的注意。海因里希·馬克思馬上收回他說過的每一句話，並使大家相信他是完全沒有惡意的。這一雖然細小但却令人感到恥辱的意外事件，以及特別是他的父親那怯懦和屈從的態度，給當時還十六歲的大兒子卡爾·海因里希留下了一定的印象，使他心頭鬱積着憤怒感，在以後的歲月中，形形色色的事件把這種感覺化成了一片熊熊烈火，這不是不可能的。

他的父親很早就意識到他的其他孩子在任何方面都無甚特出，惟獨卡爾是一個不平常的、難對付的兒子。他有着突出耀眼的智慧，連同固執和盛氣凌人的脾氣，酷愛獨立，在控制感情上不同凡響，以及最突出的是，異常的不可遏制的求知欲。這位小心翼翼的律師，其一生是在社會的和人際的妥協中度過的，對他兒子的決不妥協，既迷惑不解又擔憂害怕，在他看來，這種態度必定會招惹大人物，將來或許會給卡爾帶來嚴重麻煩。在給他的信裡，父親認真地請求他節制自己的熱情，用某種條規約束自己，不要把時間浪費在今後生活中十之八九證明是無用的課題上，培養文明禮貌的習慣，不要冷落今後可能會成爲恩人的人，以及首要的是，不要粗暴地拒絕使自己適應——總之適合他將度過一生的社會的基本要求，以免和他人疏遠。但是這些信中，哪怕是持極大反對意見的，仍然是親切的、充滿愛心的。儘管對他的個性和生涯越來越不安，海因里希·馬克思以一種本能的體貼對待兒子，在重大問題上從不試圖反對或威嚇他。因此，直到一八三八年老馬克思去世爲止，他們的關係一直是熱烈而親密的。

看來肯定的是父親對兒子的思想發展有着一種明確的影響。老馬克思和孔多塞(Condorcet)一樣，相信人生來是善良和理智的，爲確保這些品質取得成功，所需要做的一切便是除去橫在人類

前進道路上一切人爲的障礙，而它們已經在消逝了，並將更快地消逝，這一時刻正在迅速來臨，這最後的反動堡壘、天主教會和封建貴族階層，將在理性不可抗拒的大步前進中化爲煙雲。社會的、政治的、宗教的、種族的障礙，實乃神父和統治者們故意製造的蒙昧主義的大量產物，隨着它們的消失，人類將迎來一個新的時代，到那時，所有人都將是平等的，不僅在政治上、在法律面前以他們正式的、外部的關係而言是平等的，而且在社會生活和個人關係上，以他們最親密的日常交流而言也是平等的。

對於他來說，他本人的歷史似乎也成功地證實了這點。生爲一個猶太人，作爲法律地位和社會地位均低人一等的公民，他達到了和他較開明的鄰居一樣平等的地位，獲得了作爲一個人的尊嚴，並被同化入在他看來他們那種較合理較體面的生活方式中。他相信人類解放史的一個新時代即將來臨，據此，他的孩子們將在一個公正和自由的國度作爲生來自由的公民而生活。這一信念的諸種因素，清楚地出現在他兒子的社會學說裡。當然，卡爾·馬克思並不信奉可以影響行動的理性論的力量。和法國啓蒙時代的一些思想家不同，他不信奉人類條件是持續不斷得到改善的。在人類征服自然的意義上，任何已經爭取到的可以被定義爲進步的東西，都是以對真正生產者

——勞動大眾——日益增長的剝削和他們的價值貶落爲代價的，沒有任何穩定不變的運動，其方向是給大多數人帶來不斷增長的幸福和自由。通向完全地和諧地實現人類全部潛能的道路上，充斥着大量身受越來越多的痛苦和「異化」的人。這就是馬克思的人類進步的「矛盾」特徵之意義所在。無論如何，在一種明確的意義上，馬克思終其一生都是一個理性主義者和可臻完善論者（perfectibilian）。他堅信社會演化的過程是完全可理解的，他相信社會追求進步是不可避免的，它

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的運動是前進的運動，每一接續的階段都體現了發展，其意義在於，它所帶來的建樹比較其前階段，要更接近理性的理想。他和任何十八世紀的思想家一樣，強烈憎恨感情主義，對超自然原因的信仰，以及一切種類不實際的幻想；他整體地低估了諸如民族主義、宗教和民族團結這樣的非理性力量所具有的影響。因此，儘管真實情況仍然是黑格爾哲學大槪在他的生活中起了最大的單獨的構成性影響，但由他父親和父親的朋友植入他心中的哲學理性主義原則，却起到了明確的防禦作用，所以，當他後來碰上浪漫派發展出來的形而上學體系時，得以避免了完全屈服於他們的魅力，而這種魅力曾引誘了那麼多他的同時代人。正是這一早年就獲得的明確的鑒賞力，愛好清晰的論點和經驗主義的研究方式，使他能夠面對盛極一時的哲學保持批評性獨立態度，以及後來，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下，把它轉變成自己的更為實證主義的模式。這或許說明了他的思想的現實主義的具體紮實的質量，即使它受到浪漫主義觀念的影響，仍和他的時代像伯恩(Börne)、海涅(Heine)或拉薩爾(Lassalle)這樣的主要激進分子的觀點截然不同，他們的出身和受到的教育，在很多方面和他是非常相似的。

他在特利爾度過的童年和早期生活幾乎不為人們所知。他的母親在他的生活中起的作用極小。亨麗塔·普賴斯堡生於在荷蘭安家的一個匈牙利猶太人家庭。在荷蘭，她的父親是一個拉比。她是一個樸實的女人，未受過教育，全心放在照顧這個大家庭上，對她兒子的天才或思想傾向從來就沒有絲毫理解，對他的激進主義非常吃驚，再後來似乎對他的存在又完全不感興趣了。在海因里希和亨麗塔的八個孩子中，卡爾是第二個。在他還是孩子時對大姊索菲亞有一層溫和的愛，除此之外，他對其他弟妹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均不關心。他被送進本地的中學，在那兒，他既因

勤奮也因論道德和宗教题目的文章有高尙認真的格調而得到好評。他相當精通數學和神學，但他主要的興趣在文學和藝術，這個傾向主要歸因於兩個人，從他們身上他學得最多，並終其一生談起他們時總是懷着愛和尊敬。一個是他父親，另一個是他們的鄰居弗利爾·路德維希·馮·威斯特法倫(Freiherr Ludwig von Westphalen)，他和可親的律師及他的家庭有着友好的關係。威斯特法倫是一個可敬的普魯士政府官員，屬於德國上層階級中受過良好教育的自由主義階層，在十九世紀前五十年裡這個國家的每一次啓蒙進步運動的先驅者隊伍中，總可以找到這個階層的代表人物。他思想開明，富有感染力，教養有素，屬於這樣一代人，他們中的叱咤風雲人物有歌德(Goethe)、席勒(Schiller)和荷爾德林(Hölderlin)，在他們的影響下，他涉獵的文學領域已超出由巴黎的那些文學大家嚴格建立起來的審美範圍，溶入日益高漲的日耳曼熱情中，重新發現但丁(Dante)、莎士比亞(Shakespeare)、荷馬(Homer)和古希臘悲劇大師的天才。他深為海因里希·馬克思的兒子的驚人才能和孜孜不倦的求知欲所吸引，鼓勵他閱讀，借給他書籍，帶他去鄰近森林中散步，和他談論埃斯契羅斯(Aeschylus)、塞萬提斯(Cervantes)、莎士比亞，給這位熱心的聽眾引用傑作中長長的篇章。卡爾成熟得極早，成爲新的浪漫主義文學的忠實讀者，他在這些成長中的可塑歲月裡獲得的鑒賞力至死不變。他在晚年時極愛回憶和威斯特法倫在一起度過的夜晚，於他而言，這似乎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當他在特別需要同情和鼓勵的年齡時，一個年齡遠大於他的人以平等態度對待他：是時，一個不得體的或侮辱性的姿態，或許就會給他留下難以抹去的痕跡，而他却獲得了難得的善意和友情。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含有獻給威斯特法倫的激情題辭，充滿感謝和崇敬之意。一八三七年，馬克思向他的女兒求婚，得到他的同意，這一婚嫁據說由於

他們的社會地位的巨大差異令她的親屬好友們大為沮喪。馬克思對人的判斷並不著意於他們是否慷慨之類，在他晚年談到威斯特法倫時却幾乎動感情了。威斯特法倫增強了馬克思對自己和自己的力量的信念，使這種信念具有人格的力量，它在馬克思的一生中成爲他獨一無二的最突出的特點。革命家中很少有幾個在他們的早年生活中沒有受到挫折或迫害，馬克思是其中之一。結果，儘管也有着格外的敏感，自尊自大，咄咄逼人且傲慢，我們所面對的仍是一個在四十年的貧病交加和不停頓的戰鬥中不屈不撓、積極向上和充滿自信的形象。

十七歲時他離開特利爾的學校，按其父親的意見，於一八三五年秋季成爲波恩大學法律系的一名學生。在那兒他似乎完全是快活的。他宣佈在每週課程中打算至少聽七門課，其中有著名的施萊格爾(Schlegel)主持的荷馬課程、神話學課程、拉丁詩和現代藝術課程。他過着普通德國學生的歡快放浪的生活，在大學社團活動中起着積極活躍的作用，寫拜倫式詩歌，借債，並且至少有一次因行爲不軌遭當局逮捕。至一八三六年夏季學期末他離開波恩，秋季轉入柏林大學。

這次轉學標誌着他生活中一次尖銳的危機。在此以前，他的生活環境相對說是地方性的。特利爾是一個美麗的小城，尚維持着一種較古老的秩序，不爲正在改變文明世界輪廓的巨大的社會和經濟革命所觸動。科隆和杜塞爾多夫日益發展的工業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事，沒有任何急迫的問題，任何社會的、精神的或物質的問題，擾亂過他父親的朋友們身處溫文爾雅環境中的那份平和氣氛。這是一塊十八世紀的寧靜區域，人爲地維持保存到十九世紀。比較特利爾或波恩，柏林是一個人口衆多的龐大城市，現代，醜陋，虛情假意，高度緊張，同時又是普魯士官僚政治中心，是心懷不滿的激進知識分子的聚會之地，他們在那兒形成了愈益壯大的反對普魯士的中心。馬克



思終生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尋求快樂的能力，以及強烈的即使不免有點沉悶的風趣感，但沒有任何  
人即使在那時候會把他描繪成膚淺表面或輕浮瑣碎之徒。他因那種緊張和悲劇性的氣氛而冷靜下  
來，在這種氣氛中他突然沉着鎮定了，以他慣常的精力，立刻開始探索和批評這個新的環境了。

# 第三章

---

## 精神哲學

被稱為時代精神的東西實乃人的精神，時代在其中得到了反映。

理性總是正確的

——歌德

---



一

在柏林大學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影響，正如當時每一所德國大學的情況一樣，是黑格爾哲學。形成這種現象的土壤始於十七世紀對古典時期的信念和風格的逐步反抗之中，而在十八世紀得到鞏固，並歸之為一種體系。德國人在這一運動中最偉大、最有天才的人物是萊布尼茨，他的觀念被其追隨者和闡釋者，發展成一個一致的、教條的形上學體系，據那些將其體系通俗化者所宣稱，它從簡單前提出發，通過演繹步驟，而邏輯地表達出來，而這些演繹步驟本身對於能夠使用一切有思維者與生俱來的絕對可靠的理智直觀的人來說，也是不言自明的。這種僵硬的惟理智論在英國遭到攻擊，在那兒，沒有任何純理性主義的形式找到適宜的土壤，攻擊者有那個時代最具影響的哲學家洛克(Locke)、休謨(Hume)，以及將近十八世紀末期有邊沁(Bentham)和激進哲學家，他們一致否認存在着諸如對事物的真正本質作理智直觀這樣的本能。沒有任何其他的本能，祇有熟悉的物質感受纔能提供最初的經驗主義訊息，而有關世界的全部其他知識，正是完全在這些訊息之上建立起來的。由於一切訊息都是通過感覺傳達的，所以理性無法成為知識的一個獨立的源泉，它的責任僅在於整理、分類以及滙集這類訊息，並從這些訊息中引出推理，是依據材料進行操作的，而獲得這些材料並不需要理性的幫助。在法國，理性主義的地位於十八世紀遭到唯物主義學派的攻擊；但當伏爾泰(Voltaire)和狄德羅(Diderot)、孔狄亞克(Condillac)和愛爾維修(Helvétius)直陳他們從具有自由思想的英國人那兒獲益匪淺的同時，却又已構築了一個獨立

的體系，其對歐洲的思想和行動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有些人還不至於完全否認存在着除感覺之外還可從其他途徑獲得知識，但又聲稱道，儘管這種固有的知識本身是存在着的，也確實顯示了有價值的真理，但它並沒有向老一代理性主義者聲稱具有不可顛撲的真理的前提提供任何根據，對任何思想開放的人來說，祇要他不為宗教的教條主義或政治和倫理偏見所蒙蔽，審慎的一絲不苟的思想反省，都將向他顯示這是一個事實。有太多的弊病由於訴諸權力或某種特殊的直觀而得到衛護，因此，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爲了證實而求諸於理性，認爲人生來是不平等的，有些人人生來就是奴隸，也有些人生來則是自由人；《聖經》也是這樣，它教誨說真理可以通過超自然的手段顯示出來，它提供的內容可以被利用來證明人生來是邪惡的，必須加以約束——這些論點便被反動政府用來支持政治的、社會的、甚至倫理道德的現存不平等狀態。但是被正確理解的經驗和理性其結合在一起所表明的，恰恰是這種論點的反面。可以提供的論點毫無疑問將表明：人性本善、理性同等地存在於一切有感知力的人身上，以及一切壓抑和受苦的根源在於人的愚昧無知。這些論點部份產生於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和物質條件，部份起於野心勃勃的專制者和肆無忌憚的神父教士對真理的故意壓制，最常見的是這兩種因素的互相作用。通過一個開明和仁慈的政府採取的行動，這些邪惡的影響可得以暴露，從而將其消除。隨着人們的視線模糊，令他們的努力遭到挫折的障礙都消除後，留給他們的將是追求德行和知識；公正與平等將取代權力和特權，競爭將服從於合作，幸福和智慧將成爲人類的普遍財富。這半經驗主義的理性主義的中心原則，在於對解釋和改善世界的理性力量具有無限的信念，過去在這方面的一切失敗，被解釋爲完全起因於對主宰有生命和無生命的自然的行爲的規律的愚昧無知。苦難是無知的一種綜合

結果，不僅是對自然的無知，而且是對社會行為規律的無知。為消除無知，有一項措施是必需的，也是足夠的，那就是在指導人類事務時運用理性，祇需運用理性。

這項任務是被公認為極不容易的。人類在一個精神蒙昧的世界生活得太久了，無法在突然而來的時代曙光面前鎮定自若，因此就要求在科學原理方面有一個漸進的教育過程。理性的增長和真理的發展，就它們足以制馭偏見和無知的力量而言，要到進步開明的人已作好準備，把他們的全部生命獻於教育愚昧的芸芸眾生之事業中去，纔會實現。

然而這裡又有了一個新的障礙：人類苦難的原始根源是無視理性和精神上的懶散，這種根本的原因並不是故意造成的，而在我們的時代裡，以及在過去的多少世紀裡，存在着這樣一個階級的人，他們由於觀察到他們的權力依賴於這種無知，這種令人們看不到非正義的無知，他們便以他們的權力所能得到的每一種發明和手段來促進非理性。從本質上說，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一切理性的人在真正的理性審判席前都有着平等的權利。但是統治階級，那些王公貴族、神父將軍們，太充分地意識到理性的傳播將很快使人民看清他們的巨大欺騙，通過這種欺騙，在這樣一些空洞虛構之物的名義下，如聖潔的教會、君權神授、聲稱民族的驕傲，或對權力、財富的占有，在這些名義下，人民被迫放棄他們的天賦權利，毫無怨言地勞作，以維持一個並無絲毫權利可要求如此特權的小小的階級。因此，在社會等級制度中，阻撓真正的知識的發展，是符合上層階級直接個人利益的，在任何地方，祇要這種知識有暴露上層階級權威專橫特徵的危險，就要以一種教條的準則，一套以冠冕堂皇詞句表達的晦澀難懂的宗教玄義來取代它，以這種東西使他們不幸的臣民的疲弱智慧混亂不清，使他們處於盲目服從的狀態。即使統治階級中也有某些人可能負責

價實地自欺欺人，連他們自己也信奉自己的發明，但他們中肯定有人知道，祇有通過系統的欺騙，並輔之以間或使用暴力，這種如此腐敗、如此違反自然的秩序，纔能以維持。因此，一個開明統治者的首要責任是粉碎特權階級的力量，讓所有人都具有的天生的理性重新確立它的地位；鑒於理性是不能和理性相對抗的，所以一切私人的和公共的衝突，都完全歸之以某種非理性的因素，歸之以某種簡單的失敗，即看不到雖然是明顯對立的利益仍可以作出多麼和諧一致的調整。

理性總是正確的。對每一個問題，真正的答案祇有一個，以足夠的勤奮就必定能夠發現它，這適用於物理或數學問題，亦同樣適用於倫理或政治問題，適用於個人生活、社會生活的問題。一旦答案找到了，把解決的方法引入實踐中去，僅僅是一個技巧問題；但是進步的傳統敵人首先必須去除掉，必須按照無偏見的科學家的意見在一切問題上教導人們行動的重要性，而他們的知識是在理性和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旦達到這一點，通往光明盛世的道路也就清晰可見了。

但是環境的影響和教育的影響一樣重要。如果你但願預見到一個人的未來生活道路，那麼除了他的身體狀況和職業性質外，你還必須考慮到諸如他所居住地區的特點、氣候、土地的肥力，以及離海洋的距離等各種因素。人類是自然的一個客體，人的靈魂，和物質材料一樣並不受任何超自然事物的支配，也不擁有任何玄秘之物，可以通過一般可證實的物理假設手段對它進行充分的描述。法國唯物主義者拉美特里(La Mettrie)在他的一篇著名論文《人是機器》(*L'Homme Machine*)中把這一經驗主義加以發展，甚至超出了它的極限，該文的發表招致廣泛的憤慨。他的觀點是這派思想的極端例子，其他人如百科全書派的狄德羅和阿朗貝爾(d'Alambert)、霍爾巴赫(Holbach)、愛爾維修和孔狄亞克，亦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這種思想，不管他們間有多大不同，在這

一點上是一致的，即人和植物及低等動物的主要區別在於：人擁有自我意識，意識到自己的某些作用，能夠運用理性和想像，構築理想的目標，在任何行動或特徵中，根據它是促進還是延緩自己想實現的目標，把它和道德價值聯繫起來。這個觀點的嚴重困難，在於如何協調一方面是存在着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却完全為事物的性質和環境所決定的問題。但這祇不過是自由意志和神的第一知先覺這種古老的衝突的新形式，即以自然代替了上帝。斯賓諾莎曾經論述道，如果一塊從空中掉下的石頭也會思想，它也許就會認為自己是自由選擇道路的，意識不到外界的原因，諸如扔石頭者的目標和力量，以及自然的中介物，正是這些決定了石頭的下落。同樣的，祇不過是人對自己行為舉止的自然原因一無所知，這使他以某種方式認為自己和下落的石頭是不同的。萬能的主會很快驅散這種無望的幻覺，即使它所導致的自由感本身或許仍守着障地，但並無欺騙的力量。就極端經驗主義而言，這一決定論學說可以和樂觀的理性主義一致起來。但是對人類事務之改良可能性，它所具有的含意却完全是相對立的。因為，如果人僅僅是由空間事物的運動而成為聖人或罪人，那麼教育者的行動就和他們有義務要教育的人一樣，是嚴格注定了的。任何事物之發生均係自然的、不可更改的過程之結果，個人的自由決定影響不了任何進步，無論這種決定多麼智慧、多麼仁慈、多麼強有力，因為它們和任何實體一樣，都不能更改自然的必然進程。這一著名的難題在去掉掉它的陳舊的理論外衣後，以現世的形式出現時就更尖銳了，它給雙方帶來是同樣的困難。但在討論較大的問題時，它却變得模糊不清了。無神論者、懷疑論者、自然神論者、唯物主義者、理性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功利主義者屬於一個陣營，有神論者、形上學論者、現存秩序的支持者和辯護士屬於另一陣營。而啓蒙主義和教權主義(Clericalism)之間的分歧是如此巨



大，兩者間的衝突是如此劇烈，使得各自陣營內在教義上的難點相對地就不爲人注意了。

這是下一世紀成爲激進知識分子的基本學說的兩個議題中的第一個議題。他們強調未遭惡劣或無知的政府敗壞的人的天生或潛在美德，強調理性教育的巨大力量，以把人類從當前的苦難中拯救出來，創立一個更公正、更科學的財富分配制度，並因此把人性發揚到可臻之幸福的境界。十八世紀的想像力爲上一世紀數理方面的驚人進步所支配，一個很自然的步驟是，把在開普勒（Kepler）和伽利略（Galileo）、笛卡爾（Descartes）和牛頓（Newton）手裡已證明是成功的方法，應用於解釋社會現象和指導生活。如果可以說有哪一個人創造了這項運動，那就非伏爾泰莫屬了。即使他不是始作俑者，也是半個多世紀來最偉大、最著名的傳播者。在摧毀專制主義和天主教的統治方面，他的著作，他的小冊子，以及僅僅是他的存在所作出的貢獻，是任何其他單一因素所無可比擬的。他的影響並未因他的謝世而消褪。思想自由是和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爲此而作的戰鬥是在他的旗幟下進行的，從他的時代直到我們的時代，一切大眾的革命都不會不從那個無窮無盡的武庫裡取出一些最有效的武器，兩個世紀都未使它們過時。但是，如果說伏爾泰創造了人的宗教，那麼盧梭便是它最偉大的先知。他對人的概念，不同於（以及徹底推倒了）同時代激進分子對人的概念。然而，他是時代精神的鼓吹宣導者，他給予這個運動的是雄辯和激情，一種更豐富，更不明确、更帶感情色彩的語言，這深刻地影響了十九世紀的作家和思想家。確實，或許可以說他創造了思想和感覺的一種新模式，一種新的風格特色，它使意志輝煌奪目，但犧牲了理性和仔細觀察，這種風格被十九世紀的藝術和社會叛逆者採用爲自我表達的天然載具——那第一代的浪漫主義者，他們在法國革命史和文學中尋求靈感，並以她的名義，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舉起

反叛的旗幟。

在英國，該學說最強烈當然也是最有效的辯護者之一，是理想主義的威爾士工廠主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他的信念被濃縮成一個句子，題寫在他辦的刊物《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的卷首上：「通過運用合適的手段，也就是在很大的程度上處於對人類事物有影響的人的支配和控制下，可以把任何普遍的個性，從最優秀的到最惡劣的，從最無知的到最開明的，給予任何社會，乃至給予整個世界。」他在新拉納克自己的棉紡廠創設典範條件，限制工作時間，制訂健康醫療條例，設立儲蓄基金，通過這些，他成功地證明了他的理論所具有的眞理性。以這些手段，他提高了工廠的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改善了他的工人的生活水準，令外界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使他的財產增了三倍。新拉納克成爲君主和政治家們的朝覲中心；並且，作爲勞資雙方和平合作的首次成功實驗，它在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歷史上產生了相當影響。他以後進行的實際改革的嘗試不那麼成功。十九世紀中葉，年屆高齡的歐文逝世了，他是古典理性主義時期的碩果僅存者，他的信念不爲屢次失敗而動搖，直到生命的終結，他始終信奉教育的無限力量和人的至善至美。

新觀念的勝利前進對歐洲文化的影響，幾乎不亞於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自由探索個人和社會問題的精神，把一切討論的事物置於理性審判台上的精神，均得到了有條理的訓導，並在廣泛的社會領域裡獲得了愈益熱情的接納。理性的勇氣，甚至更進一步，在理性上保持的無有偏見，成爲流行的德行。伏爾泰和盧梭受到廣泛的讚譽和崇拜。休謨在巴黎受到極大的歡迎。正是這種思想觀念上造成的氣候形成了一七八九年的革命者的特徵：這嚴峻的英雄主義的一代人，對自己

信念之清澈和純粹，決不向任何人屈服；對它的人文主義所具有的健全而非感情用事的理智；以及最重要的，是對它在道德和理智上的絕對統一，而這種統一牢牢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之上，即認為真理最終肯定是要勝利的；因為它是真理，這種信念決非經年累月的流放和迫害所能削弱。這一切都是他們堅守不渝的。他們的道德和政治觀念，他們的讚美和譴責之詞，早已成爲形形色色民主主義者的共同遺產；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功利主義者和天賦權利論者，用他們的語言講授他們的信念，雖既無如此天真又無如此極端的信心，然而也沒有他們那樣雄辯，那樣純粹，那樣令人信服。

## 二

反擊出現於十八、十九世紀之後。它在德國土地上生長起來，但很快傳遍整個文明世界，阻止了經驗主義從西方的推進，代之以一個對自然和個體的較少理性主義的觀念，這無論好壞，於我們對人類和社會的觀點卻具有至關重要的轉折性影響。德國因「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歐洲歷史上第一次以德意志爲主的大規模國際戰爭——譯注）在精神和物質上大傷元氣，在度過一段漫長而平淡無奇的歲月後，至十八世紀末再次開始產生出自己的固有文化，受到整個歐洲競相仿效的法國模式的影響，但基本上獨立於這個模式之外。在哲學和批評兩方面，德國人開始貢獻出著作，它們在形式上雖較粗陋，但感受更熾烈、表達更激烈，以及除盧梭的著作外，和法國的任何著作比較亦更騷動不安。在這堆豐富的大雜燴中，法國人看到的祇是對他們自己的清澈文

體和精湛的勻稱性的一種古怪模仿。拿破侖戰爭給德國人已受傷害的精神自傲，增添了軍事上的失敗，令裂縫更大，強烈的愛國主義反應，在這些戰爭進行期間已冒頭了，至拿破侖戰敗後更氾濫成民族主義感情的洪流，和康德的繼承者費希特(Fichte)、謝林(Schelling)、施萊格爾兄弟(the brothers Schlegel)的所謂浪漫主義哲學形成一致，他們的哲學因此而獲得國家的首肯，被大大擴展廣泛傳播，幾乎成爲一種官方的德國信念。德國人反對法國人和英國人的科學經驗主義，提出了赫德(Herder)和黑格爾的形上學歷史主義，它建立在批評對手的基礎上，提供了一種大膽的替代學說，其影響改變了歐洲的文明史，給它的想像力和感覺模式留下了不可抹除的痕跡。

十八世紀的古典哲學家曾經問道：在人就是自然的一個客體的條件下，支配人的行爲舉止的法則究竟是什麼呢？如果說通過經驗的手段有可能發現在何種條件下物體下墜，行星旋轉，樹木生長，冰融爲水以及水化爲蒸氣，那麼肯定也可能找出是何種條件致使人吃飯、飲水、睡覺、相愛、憎恨、爭鬥、組成家庭、部落、國家，以及進一步，組織成君主政體、寡頭政體和民主政體。除非有一個牛頓或伽利略發現它，否則就談不上真正的社會科學。

對黑格爾來說，這一激進的經驗主義似乎體現了一種科學教條主義，比它希望取代的神學更具災難性，它涉及這樣一個謬誤，即祇有在自然科學中成功的方法，纔能在經驗的任何其他領域有效。對這種新方法甚至在物質世界的應用，他亦表示懷疑，並毫無根據地懷疑自然科學家隨意選擇他們討論的現象，也同樣隨意地把自己局限在僅僅是某幾類推理上。然而，如果說他對科學中的經驗主義不持同情態度，那麼他對把它應用到人類歷史課題中去會產生毀滅性後果這一點，就更強烈地深信不疑了。要是歷史根據科學的規則去寫，就科學這個詞按伏爾泰或休謨所理解的

那樣而言，其結果就會對事實進行荒謬的歪曲，而這正是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從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到孟德斯鳩(Montesquieu)，以及確實還有休謨和伏爾泰自己，當他們不在談論理論而是寫作歷史時，無意識地按照一種明確的歷史直覺而加以避免的。黑格爾設想歷史是兩個方面的：一是平面的，即各個不同領域活動的現象，以某種一致的模式廣泛地互相聯繫起來，使每一時期都具有自己獨特的、「有機的」、可辨識的惟一特徵；另一是垂直的，這裡，事件的同一橫截面被看作是暫時性的繼續部份，作為發展過程的一個必然階段，在某種意義上既為前一階段所包含，又為前一階段所產生，其本身亦被看作已經包含了那些必然傾向和力量，儘管尚處於較不成熟狀態，但這些傾向和力量的全部體現將使下一階段最終實現。因此，如果要真正理解一個時代，就必須不僅僅把它和過去聯繫起來考慮，因為它還孕育着未來的種子，預示着將來來臨的事物的輪廓。這層關係是任何歷史學家所不能忽視的，無論他多麼審慎，拘泥於避免偏離事實的赤裸裸證據。祇有這樣，他纔能以正確的觀點表述他所研究的階段的各種因素，把重大的和微不足道的加以區別，把一個時代的決定性中心特徵，和那些偶然的、不定的因素加以區別，後者或許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會發生，因而在特定的過去階段並無任何深的根源，對特定的未來階段亦無估計得出的影響。

增長發展(growth)的概念是一個古老的理論，可追溯到亞里斯多德乃至更遠，根據這種概念，一粒橡樹子據說潛在地包含了一棵橡樹，並且祇有在這層發展的意義上，纔能對這粒橡樹子進行充分的描述。在文藝復興時代，這一學說重見天日，被萊布尼茨發展至極限。他教導道，宇宙是由很多獨立的單純實體複合而成的，每一單純實體被設想為是由它自己的全部過去和它自己的全

部未來所構成的。沒有任何東西是偶然的，沒有任何物體可按經驗主義者希望描述的那樣來描述，諸如一系列連續或不連續的現象或狀態，至多僅僅是由機械的因果外在關係聯繫起來。物體的惟一真正定義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即解釋了在物體的個體歷史意義上，作為一個增長的實體，它爲何必須如此發展，其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以萊布尼茨的話來說，「有其過去，且發展至未來」。萊布尼茨沒有作過任何詳盡的嘗試，把這個形上學的理論運用於歷史事件，然而，對黑格爾來說，歷史似乎正是最適於運用它的領域，因爲除非以某種其他關係而非科學因果關係爲出發點，否則歷史就祇不過是一系列外在聯繫的事件。解釋就是給予合理的根據，而不僅僅是給予先例往事。在這層意義上，解釋一連串事件就是把它們歸入一個理性的可理解過程——即他或他們的有目的的活動——也就是上帝或人。沒有這個，事件就仍然得不到解釋，沒有根據，「毫無意義」。一個機械的模式或許能使人們預見或控制物體的行爲舉動，但無法給予一個理性的解釋，而人類生活中未經解釋的事件不會給人類歷史增添內容。同樣，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描述甚至表達某一具體個性或時期或歷史的個別特徵，描述甚至表達獨特的本質，也就是，包含在某一具體藝術或科學工作中的目的，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因爲，即使它的特徵或許確實相當近似於已經發生過的或以後要發生的事，但它在整體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獨一無二的，祇存在一次，因此，它是無法以科學方法來描述的。科學方法的成功應用，取決於明確的對立面的發生，即同樣的現象，同樣的特徵之結合應當重複發生，有規律地一再重現。

赫德首先成功地運用了新方法。他或許受到歐洲的民族和文化自我意識增長的影響，對占優勢的法國哲學咄咄逼人的世界主義和宇宙普遍主義的憎恨亦觸動了他。他把有機發展（如後來被

命名的那樣)的概念應用到整個文化的、國家的以及個人的歷史上。確實，他提出在文化和國家方面這一發展是更為根本的，因為個人祇能被合適地看作社會發展一個具體階段中的存在，這種存在，在最偉大的人的思想和行動中達到了它最典範的有意識表達。他投身於研究民族的德國文化，它的語言學和考古學，它的蒙昧野蠻的初始時期，它的中世紀史和制度，它的傳統的民間傳說和古蹟。從這些出發，他試圖描繪出活生生的德國精神的概貌，作為一種形成的力量，它的責任在於把獨特的民族發展統一起來，而這是無法僅僅以鬆散的時間先後順序這種粗糙的機械關係來描述的。事件的同一單調的循環，農作物的交替更生，大地上年年爆發的革命，這些並不是歷史，因為它們不是人類表達的方式，但運用這種方法，這些或許就可以得到滿意的解釋。

黑格爾更廣泛、更野心勃勃地發展了這一命題。他訓導說，法國唯物主義提供的解釋，充其量給予了解釋靜態而非動態現象，解釋差異而非變化的假設。設若在給定的此種彼種物質條件下，或許有可能預測到生於這些條件中的人將發展出某些特徵，直接歸之於物質原因和上代人給予他們的教育，而上代人亦受到同樣條件的影響。然而，即使情況就是如此，它又真正告訴了我們多少呢？例如，意大利的物質條件其大部份本和八世紀、十五世紀時是差不多的，但古代羅馬人却極大地不同於他們的後代，而文藝復興時代的人顯示出來的一些顯著特點，在意大利衰落時都在失去或已經全部失去了。因此，對歷史變化現象，對進步和反動，對繁榮和衰弱負責的，不可能這些相對恒定的條件，而自然科學家僅以這些條件便能進行研究。必須以某些動態的因素為出發點，來描述上述這些變化，並描述這些變化所具有的獨特的形式和方向。這類變化根本就不重複發生的：每一時代都從前一時代中繼承了某些新的東西，並且由於這些新的東西，該時代便

區別於以前的任何時代。發展的原則排斥同一重複的原則，後者乃是伽利略和牛頓賴以建樹的基礎。如果歷史有着規律，那麼這些規律在性質上肯定明顯不同於迄今已經通過的僅僅適用於科學規律模式的東西。鑒於任何現存事物在持續着，都有着某種歷史，就因為如此理由，因此歷史的規律也必定等同於任何事物之所以存在的規律。

到什麼地方去發現這一歷史運動的本原呢？如果聲稱這一動態本原是經驗主義者嘲弄的聲名狼藉的目標，是人所無法期望可以探索出來的神秘、難以理解的力量，那就是承認人的失敗，承認理性的失敗。如果支配我們正常生活的東西不是更向我們顯現出來，如果它不是一種較之我們所有的都更令人熟悉的經驗。那倒是很奇怪的。因為我們所需要的僅僅是把我們自己的生活看作宇宙的縮影和模式。當描述一個人的行為和思想時，我們相當熟悉地談到他的個性、氣質、目的、動機和目標，並不把這些當作區別於行為思想的獨立之物，而是當作思想行為表達出來的一般模式。我們對一個人瞭解越深，或許也就可以說我們較好地理解了他在和外部世界的關係上的道德和思想的活動。黑格爾把個人品性的概念，把人的思維的目標、邏輯、素質、人的選擇——把人在其一生中展開的全部活動和經歷——把這概念轉植於整個文化和國家的發展。他程度不同地把這歸之於「觀念」或「精神」，區分它在發展中的各階段，並斷言這就是特定民族和文明的發展動因，動態因素，亦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有知覺的宇宙的動因和動態因素。他進一步宣稱，以前一切思想家的謬誤，在於他們都假定在一個既定時期中活動的不同領域是相對獨立的，一個時代的戰爭和它的藝術是互相獨立的，它的哲學和日常生活也是互相獨立的。在分析個人的情況裡，我們自然不應該作如此分隔；在我們最熟悉的人的情況中，我們半無意識地把他們的所有行為互相聯



繫起來，作為有目的行動的單一主流的不同現象；我們受到從他們生涯中此階段或彼階段得出的無數材料的影響，這些便集合在一起構成了我們腦海中的他們的形象。按黑格爾的說法，這也同等地適用於我們對一個文化或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概念。研究過去時代的歷史學家總是就此城彼邦或此戰役彼戰役歷史、就這個國王那位司令官的行動的歷史耗費筆墨，似乎這些是可以表述的，無須和他們時代的其他現象聯繫起來。但是，正如某個人的行動屬全體個人的行動一樣，一個時代的文化現象，即構成該時代的各種事件的具體模式，也是整個時代和它的全部個性的表現方式，是探索的人類精神的一個特定階段的表現方式，它致力於理解、控制它所面臨的一切，也就是追求完全的自我控制，這就是黑格爾的自由概念。時代的這種作為表達一個整體的觀點的一元特徵，在我們談到典型的古代而非現代世界的現象時，或談到一個混亂而非安定和平的時代時，乃是我們確實不言而喻地可以認識到的一個事實。

這點是應當明確認識到的。例如，在寫作十七世紀音樂史時，以及考慮到對位法的一個特殊形式產生時，問一下或許是否沒有觀察到當時的科學史中一種相似形式的發展，這至少也是有關聯的問題；又例如，牛頓和萊布尼茨之發現微積分學是否確係純粹偶然的，或者歸因於歐洲文化的那個特定階段的某個普遍特徵，它在巴赫(Bach)和萊布尼茨那兒，在密爾頓(Milton)和普桑(Poussin)那兒，產生出了並非截然相異的天才。著迷於嚴格的科學方法或許會導致歷史學家，就像自然科學家一樣，在他們的研究領域劃地為牢，把人類活動的各個分支處理成相對孤立狀態中的活動，就好像如此衆多的平行支流，難得相交，互不影響，反之，如果一個歷史學家充分意識到他的任務，不限於作一個年代史記錄者和古物收藏家，他就必須努力描繪出一個運動中的時代

的形象，在它的構成因素之間，在新的和舊的之間，在有結果的和無效的東西之間，在以前時代瀕臨死亡的倖存物和誕生於時代之前的未來先驅者之間，努力收集有特徵有區別意義的東西。

要求以特殊的、具體的、有區別的、獨特的方式尋求普遍性的最生動表現形式，要求仿效傳記作家和畫家的藝術與現實主義，而不是仿效攝影師與統計家，這乃是德國歷史主義的一項特殊遺產。如果歷史是一門科學，它亦決不可被物理學或數學的虛假類推所迷惑，這種類推由於尋求最具可獲性、最少變量的普遍特徵，便故意無視僅屬於一個時代、一個地點的特殊東西，盡可能使自己成爲普遍的、抽象的、合乎規範的。相反，歷史學家必須在現象的最廣泛範圍，根據它們的過去背景和未來前景，去觀察和描述它們，俾使它們和產生於同一文化衝動的所有其他現象，有機地聯繫起來。

這一學說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同時就整整一代人而言，它又是觀念改變的一個跡象和原因，如今並已爲人們所熟知。我們習慣於把個人以及他們的行動看作國家或時代的典型，習慣於把他們自己的一種個性，把積極的起因果作用的性質，加諸於一定的時期和民族，或者甚至加諸於廣泛體會得到的社會觀念，由於這，行動被描述爲文藝復興時代、法國大革命、德國浪漫主義或維多利亞時代的精神的表現形式，我們的這些習慣正起源於這一新歷史主義觀。黑格爾的特殊邏輯教條以及他對自然科學方法的觀點，均是徒勞無益的，其作用從整體上說是災難性的。他的真正重要性，在於對社會和歷史研究領域的影響，在於創造了新的方法，它們形成於對人類制度機構的歷史研究和批評之中，把這些制度機構看作巨大的集合起來的準個性，具有自己的生命和特性，不能純粹以構成這些制度機構的個別方面來描述它們，這一思想上的革命孕育了非理性的危險的

神話——例如，把國家、種族、歷史、新紀元等等看作發揮影響的超人力量——但它對人文研究的作用却是富有成果的。德國歷史學家的一個新學派之產生主要歸之於它的影響，他們使所有那些作家，那些把事件解釋為性格或意圖的產物、這個國王那個政治家的個人失敗與勝利的結果的作家，顯得是幼稚天真的，反科學的。

黑格爾沒有把「絕對精神」(Absolute Spirit)僅僅和人的精神等同起來，因為他否認精神和物質有任何本質的分離。如果歷史是絕對精神的發展，就有必要把歷史重寫成「精神」的業績史。眼界似乎一下子極大地開濶了。法律史不再是考古學家和古物玩賞者的遙不可及的特殊禁區，它被轉化為歷史法學，在那裡，當代的法律制度被闡釋為從「羅馬法」或更早的法律而來的有條理的演化，在演變中本身包含了「法」的「精神」，在其法律範圍裡包含了社會的「精神」，並和其活動的政治、宗教和社會領域交織在一起。

從此藝術史和哲學史開始被處理為一般文化史中補充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以前被看作是微不足道、黯然無光的事實，突然被賦予重要性，作為迄今未被探索過的「精神」活動領域——貿易史、服裝史、時尚史、語言史、民俗史、實用藝術史，都被看作是人類完整的、「有機的」、制度史中基本的因素。

然而有一個方面是黑格爾極端背離萊布尼茨以本體從潛在狀態逐步展開至現實性的和平前進這個發展概念的。他堅持認為世界上衝突、戰爭和革命、悲劇性的浪費和毀滅，都是現實的、必要的。他聲稱（跟著費希特），每一過程都是互不相容的力量之間一種必要的緊張狀態，一種力量竭力反對另一種，並通過這種彼此衝突推進自身的發展。這一鬥爭有時候看不見，有時候公開。

作為如此衆多對立的物質、道德和思想的態度、運動之間的衝突，可以在一切有意識活動領域尋到鬥爭的踪跡，而在這些態度和運動中，每一項都聲稱提供了全部解決方法，並確實由於它的片面性而孕育着新的危機，它在力度和尖銳性兩方面發展着，直到轉化爲一場公開的衝突，在最終的碰撞中達致頂點，其產生的暴力摧毀了所有競爭者。這些先前持續着的發展招致中斷的轉折點，一次突然的飛躍產生了，到達一個新的層次，於是一組新的力量之間的緊張狀態再次開始了。無疑在這些飛躍中，有那麼一些，它們有着足夠大的可觀的規模，便被稱爲政治革命。但是，在較小規模上，它們在每一活動領域發生，在藝術和科學中，在生物學家研究的物質有機體的發展中，在化學家研究的原子過程中，以及最後在兩個對手的一般論爭中，當兩個不完全的謬誤處於衝突時，新的真理發現了，其本身也僅僅是相對的，亦受到對立面的攻擊，它之被另一真理所摧毀再次導致一個新層次，在這個層次上，對立的因素又被美化爲一個新的有機整體——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黑格爾把它稱作辯證。鬥爭和緊張狀態的概念，正好提供了爲描述歷史中的運動所需的動態本原。思想之有自我意識是現實的，它的過程是形式最爲清晰的自然過程。在一種更高的統一性上不斷地吸收和分解（揚棄），這一原理在自然中起着作用，正如在推論的思維中也起着作用，並表明了它的過程並非無目的（像唯物主義假定的機械運動），而是有着一種內在的邏輯，並向着越來越高的自我實現方向前進。每一次重大的轉變都以一次大規模的革命性飛躍爲標誌，例如，基督教的崛起，野蠻人摧毀羅馬帝國，或偉大的法國大革命和新的拿破侖帝國。在每一種情況中，「精神」或普遍觀念（universal idea）都前進了一步，更接近完全的自我意識，人性朝前推進了一個階段，但決不是嚴格按照最初涉入衝突的任何運動所預見的方向，不是按照某一派的預

見，他們因極堅定的相信自己擁有通過努力塑造世界的特殊能力，從而更深刻地、更不合理地感到失望。

突然顯示出來的研究和闡釋新方法，對已經啓蒙了的德國社會產生了令人吃驚的、乃至令人陶醉的影響；而對依屬德國文化的如聖彼得堡大學和莫斯科大學，影響程度則較小。黑格爾主義成爲幾乎是每一個有精神要求的人的官方信條：新觀念在思想和行動的每一領域得到應用，帶着不可抑制的熱情，這種熱情乃是一個對思想觀念較爲懷疑的時代或許很難設想到的。學術研究起變化了：黑格爾邏輯學、黑格爾法學、黑格爾倫理學和美學、黑格爾神學、黑格爾語言學、黑格爾歷史方法學，這一切包圍了人文學科的學生。柏林，黑格爾度過晚年的地方，成了該運動的總部，愛國主義以及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反響令他們再次振作起來。那種認爲人皆兄弟，認爲國家的、種族的、社會的差別皆爲缺乏教育所致的人爲結果的學說，其發展勢頭被唯心主義的反理念觀所阻遏。根據這種理論，這類差異，就其所有的明顯的非理性而言，表達了一個既定種族或國家的特定歷史作用，基於某種形而上的必要性。它們對於「觀念」的發展是必需的，在這種發展中，國家是一部份體現，它不可能於一夜之間僅僅以個別改革者的運用理性便會消失。改革必須產生於有歷史基礎的土壤，否則注定要失敗，超越於時代之前，就要受到以其自身邏輯按其自身的時間和速度發展的歷史力量的譴責。向這些力量要求自由，竭力想超越它們之上，也就是希冀從自身符合邏輯必然性的歷史地位中脫身而出，從自身成爲統一體之一部份的社會中逃脫，從各種複合的公私關係中逃脫，正是由於這些關係，每一個人成其爲每一個個體，使人成其爲人的，便是使個體成其爲個體的，希冀從這些方面逃脫也就是希冀失去自身的合理本質，這是一個自相矛盾

的要求，祇會由那樣一些人提出，他們不理解他們要求的是什麼，他們關於個人自由的概念是幼稚的主觀主義。

真正的自由在於自我控制，擺脫外界的制馭。這祇有通過發現自身是什麼以及自身能成爲什麼纔能實現，也就是發現在自身生活於其中的具體時間和地點中，自身必定受到支配的規律，以及努力使自身的那些潛在的理性成爲現實，即自身的守法本質，它的實現促進了個人，從而也促進了他所「有機」屬於的社會，而這守法的本質，是在他以及和他一樣的人那兒體現出來的。祇有「世界歷史主義的」(World-historical)個人，他們在對自己目的的認識中體現了歷史的規律，纔能成功地和過去決裂。但是，當一個人處於較低境界，以某種主觀理想的名義，試圖摧毀一種傳統，而不是修補它，並且在摧毀過程中試圖反抗歷史的規律，那麼他的努力是無望的，從而也就顯示了他自己的非理性。這種態度之受到譴責，不僅因爲它注定要失敗因而是無益的：有時或許也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即唐吉訶德式的毀滅可能被看作比生存要來得更高尚；它之被譴責還由於它是非理性的，因爲它所反對的歷史規律是「精神」的規律，「精神」乃構成一切事物的終極本體，因而它的規律必定是合乎理性的，如果它們不是合乎理性的，就無法經受人的解釋。「精神」通過伴隨每一代而來的逐漸達到更高的自我意識而接近完美，它的發展在那些任何時候在他們和他們所處的世界的關係中都極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也就是，在每一時代最深刻的思想家當中，達到了最高點。對黑格爾和他的信徒來說，這些思想家包括藝術家和哲學家，科學家和詩人，所有那些敏銳的孜孜以求的靈魂，他們比人性已經達到的他們那個社會的發展階段中所有其他人，更尖銳、更深刻地感受到部份由於他們的努力在他們的時代已經取得的成就。

哲學的歷史就是這一自我意識增長的歷史，「精神」在其中意識到了自己的活動；以這種觀點，人文學的歷史其本身也正是自我意識增長過程中精神進步的經歷。因此，所有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即哲學的歷史，它等同於歷史的哲學，因為這祇不過是一個名稱，爲了表示意識到這種自我意識。對任何接受黑格爾形上學論的人來說，他的著名格言「歷史的哲學是哲學的歷史」並非一個模糊不清的悖論，而是一句表達精緻的老生常談——帶着一個重要的具體的結論、一切真正的進步都是精神的進步——這種精神是人類最能感受到的，而不是自然——因爲精神是一切事物賴以構成的本體。因此，那些具有社會優良本質的人能夠改善社會的唯一方法，是在他們自身以及他人那兒發展出分析自己和環境的力量，一種後來被稱作批評的活動，它的發展壯大和人類的進步是同一的。從這一點出發，它接着提出，涉及暴力和流血的變化的惟一原因，是蠻橫無理的事物的抗拒，按照萊布尼茨的說法，這本身亦是一種精神，但在一個較低的、較少意識的層次上，因此，由蘇格拉底、耶穌或牛頓開創的革命乃是真正的革命，其意義遠較一般被稱作革命的事件來得真實，儘管它們並沒有發生戰火。一切真正的征服，一切真正的勝利，毫不誇張地說都是在精神領域裡取得的。因此，當哲學家已經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意識，當斷頭台尙未開始執行它的使命之前，法國大革命事實上已經結束了。

這一學說似乎終於解決了令十九世紀早期的人苦惱的大問題，當時所有重要的政治理論成爲如此衆多的針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法國大革命之產生是爲了在人類中達到自由、平等和博愛，它是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嘗試，就理論家自身而言，通過以暴力手段成功奪取權力，它以具體的制度機構體現了一種全新的革命意識形態，它失敗了，它的目的——建立人類的自由和平等，距實

現似乎還像過去一樣遙遠。對這樣一些人來說，他們痛苦地遭到幻想破滅，墜入憤世嫉俗的冷漠，聲稱善無力戰勝惡，真理無法戰勝謬誤，斷定人類完全無能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善自己的命運，對他們來說，答案究竟是什麼呢？這一問題困擾著歐洲反動時期的社會思想。黑格爾以他歷史過程有不可避免的特徵這個學說，向這問題提供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解答，它包含了任何通過暴力扭曲或加速這個過程的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這種企圖乃是狂熱症跡象，也就是，片面誇大辯證的某一個方面。黑格爾的這一觀點直接反對當時在法國由聖西門和傅立葉提出的對立的技術性假設。因此，社會自由的問題，以及為獲得自由而失敗的原因問題，很自然地成爲馬克思所有早期著作的中心主題。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方式以及他的解答，在精神上受到黑格爾的深刻影響。他早期受到訓練和他的天賦直覺令他傾向於經驗主義，屬於這種觀點的思維模式，有時候在形而上的結構下顯現出來，但其大部份在這個結構下隱藏不露，而在於他熱情揭露每一種形態、在每一種偽裝下的非理性和神話時，最清楚地出現了。在論證中，他常常運用十八世紀唯物主義的方法和例子，但其表達的形式，其用以證明的論點，卻全部是黑格爾式的：人性的昇華，它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自身，和這有機聯繫在一起的外部自然，以及通過克服它所面對的一切達致理性的控制。馬克思在青年時代轉而信奉新觀念，其後很多年，儘管他猛力抨擊唯心主義的形上學，但仍然是這位偉大哲學家的忠實如一、崇仰備至的追隨者。





# 第四章

---

## 青年黑格爾派

他們〔德國人〕決不會起而抗爭。他們寧可死去也不反叛……也許即便是一個德國人，當他被驅入徹底的絕望時，也會停止爭辯，但是他陷於這種狀態，就需要有大量難以形容的壓迫、侮辱、不公平和痛苦。

——巴枯寧

---



馬克思在柏林大學就讀的歲月，正是德國激進的知識階層意氣極度消沉的時期。一八四〇年普魯士的一位新王登基，人們對他寄予厚望。這位國王在即位前會不止一次說到愛國主義、民主原則和君主制度的天然同盟；他還曾許諾要頒佈一部新憲法；自由主義報刊上開始欣喜若狂地談論起唐·卡洛斯（Don Carlos，西班牙王位繼承人，後成為大作家席勒的一部悲劇的主人公，以及威爾第的歌劇《唐·卡洛斯》的主人公。——譯注）和王室宮廷的浪漫主義，這些諾言竟比沒有更糟。新君主與其父親相比，其反動性毫不遜色，但更狡詐，更不受約束。他的警察所使用的鎮壓手法，較之威廉三世時手法更富於想像力而且更有效率，不然的話，他的統治和前者就沒有什麼區別了。既沒有政治改革的跡象，也沒有社會變革的徵候；法國的七月革命受到德國激進派熱情洋溢的歡迎，卻僅僅導致梅特涅（Meternich）建立了一個集權的中央機構以鎮壓德意志土地上的危險思想，這一措施即受到普魯士土地貴族額手稱慶。正是這些人繼續把持著的權力，挫敗了每一項爭取自由的努力。統治階層儘管不可能把冉冉上昇的工業家、銀行家階級徹底鎮壓下去，但他們正盡全力利用手中的權力，來阻止這個階級的昇騰。即使在落後、馴良的普魯士，該階級也已經明白無誤地顯露出騷動的徵象。在新聞媒體和公眾會議上敞開思想是不可思議的；官方的新聞檢查滴水不漏；議會中充斥著保皇黨人；對於地主和官吏的仇恨積聚起來，隨著中產階級自我力量的意識增長而增長，最後，通過德意志民族自我表達這個唯一的宣泄口，以一種對立的哲學體件之以豐富的語言而出現。

如果說，正統的黑格爾主義曾是一種保守主義運動，是受到傷害的德意志傳統主義對法國人試圖將其新的普遍理性的原則加諸於世界所作的回答，那麼，青年黑格爾派和此告別表明，他們

要為自然發展的法則找到某種進步的解釋，要把黑格爾哲學從昔日歷史之著眼點分離出來，使它和未來具有同一性，並使它適應於到處可見的新的社會因素和經濟因素兩個陣營，一個右的，一個左的——老年的和被人們稱作青年的黑格爾派。——皆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下其宗師的名言：現實的是合理的，合理的是現實的；兩派都同意可以把它解釋為：對任何現象的真實解釋均等同於對該現象之邏輯必然性揭示——這種邏輯對他們來說即意味著歷史的或形上學的必然性（兩者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同一的），這種必然性亦等同於它的理性的合理性。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既是惡的，又是必要的，因為一切現實的都是必然成為現實的，一切必要的事物其本身也都是合理化的。世界史即世界之正義（World history is world justice）。雙方對此完全接受，但僅此而已。他們的分歧在於對關鍵字眼，「合理」（rational）和「現實」（real）的側重點不同。

保守派認為祇有現實的才是合理的，故宣佈衡量合理性（rationality）的尺度就是現實性（actuality），或曰生存的能力——社會的和人的機構制度，當它們存在於某個既定的時間裡，達到了某個階段，這足以衡量出它們的卓越來，因此，舉例說，德意志（即西方）文化——正和黑格爾事實上宣佈的那樣——是一種高一級的，很可能是最高級的文化，它是前德意志文化、東方文化和希臘羅馬文化之集大成者。這位大師的某些弟子由此得出，最後階段必然是最好的階段。必然是人類目前所取得的最完善的政治架構，它存在於迄至那時為止西方價值的最高體現之中——也就是現代的、即普魯士國家。想要改變或者推翻這個國家在道義上是錯誤的，既因為反對的是寓於其中的合理的意志，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徒勞的，也因為違抗的是已由歷史作出的決定。這是一種與自身目的相符的論證方式。以後馬克思主義亦以這種方式令世人所熟知。

激進派強調它的反面，認為祇有合理的才是現實的。他們堅持認為現實的東西常常充滿著不一致、時代錯誤和盲目的非理性；因而它不能被看作在任何真正的——即形而上的——意義上的現實。他們根據黑格爾的大量著作，指出這位導師承認時間或空間上的純存在，並不同於現實：這種存在完全可能是一套混亂的機體，此部份挫敗彼部份的目的，因而從形上學的觀點來看是矛盾的，所以完全令人失望。衡量現實性的程度就是要看在什麼程度上，被檢驗的實體傾向於構成一個合理整體，它或許可以根據理性的旨意使劇烈改造一個既定制度成為必需。這些東西，對下述這些人來說是再清楚不過了：他們已經掙脫了純存在的專橫束縛，揭示了純存在歷史作用方面的不是之處，作為正確闡釋過去和現在的性質和方向時得出的推斷。這種反對個人所處之社會制度機構的批判行為，就其個人超越這些制度機構之上而言，乃是人的最可貴的功能。批判者越開明，批判越孜孜探求，通向現實的實際進步就越迅速。因為，正如黑格爾曾明確無誤地說過，現實性是一種過程，是達到自我意識而作出的普遍努力，將隨著人們自我批判意識增長而更加完美地發展：沒有任何理由認為這種進步必須是漸進的和無痛苦的。激進派再一次引用黑格爾本人闡發的原話來提醒他們的對手，進步是兩營對壘的強力所致，它上昇為危機，然後爆發為公開的革命；那時，惟有那時纔出現通向下一個階段的飛躍。這些發展的法則可見諸於最蒙昧的自然界過程，也同樣見之於人類與社會的事務中。

因此，肩負文明重擔的哲學家，他的明白無誤的責任便是運用惟有他纔掌握的特殊技能，——也就是通過精神鬥爭來推動革命。他的任務是將人們從懶散和麻木中喚醒，正像法國哲學家僅用思想觀念的力量推翻了古代政權那樣，他將以批判的武器去掃除成為障礙的和僵死的制度。

這裡不可訴諸物質上的暴力或大眾的野蠻力量；暴民代表著「絕對精神」(Spiriti)在人類中達到的最低水平的自我意識，訴諸於暴民就是使用非理性手段，這只能產生非理性結果，一場思想意識的革命本身將引起一場實踐的革命：Hinter die Abstraktion stellt sich die Praxis von selbst (實踐本身在抽象理論的背後自行實現)。但是，由於公開的政治宣傳遭到禁止，反對派被迫使用迂迴的進攻戰術，最初的反正統戰鬥是在基督敎神學領域內展開的，迄至那時為止，神學教授們對於傾全力支持現行秩序的哲學，即使不鼓勵也採取容忍的態度。一八三九年，大衛·弗里德里希·施特勞斯(Dauid F. Strauss)出版了一本考證耶穌生平的书。他在書中採用了一種新的考證方法，表明《聖經》中某些部分純屬虛構，而其他部分陳述的也不是事實，祇不過是早期基督敎社會——人類的一個自我覺悟時期——的半神話傳說。整個課題被處理成對一部有歷史重要性但又不可靠的經文進行考證的操作。他的書一經發表，不僅立即在正統的圈子裡，而且在青年黑格爾派之間掀起一場風暴。後者最傑出的代表，布魯諾·鮑威諾(Bruno Bauer)當時任柏林大學的神學講師，他發表了數篇文章攻擊《聖經》，其觀點甚至比黑格爾主義的無神論更為極端——完全否定耶穌在歷史存在過，試圖把《聖經》解釋為一部純粹杜撰的作品，解釋為當時廣為流行的「意識型態」在文字上的體現，是「絕對觀念」(Absolute Idea)之發展在當時所能達到的頂點。普魯士當局對哲學界的派系之爭一般並不感興趣，但在這場爭論中雙方似乎都持有反宗教觀點，因此也就很可能持有反正統政治的觀點。黑格爾主義作為一種無害的、乃至忠誠的愛國的哲學運動，以前並不受到當局的注目，這下突然被控有煽動傾向。黑格爾的最大對手謝林(Schelling)當時是一個虔誠但卻反動的老浪漫派。他被召到柏林以公開駁斥這些論調。但是他的演講沒有獲得預期的

效果。新聞檢查更緊了，青年黑格爾派發現自己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要麼徹底投降，要麼轉向大多數人還不想走的更左的政治方向。惟一還能提及這個問題的地方是大學，那兒，受到限制但無論如何仍是真正的學術自由得以繼續保持。柏林大學當時是黑格爾主義首要據點，不久以後馬克思便沉浸在那兒的哲學政治氣氛裡。

他是從作爲一個法律系的學生開始其學術生涯的。他的聽講課程中有薩維尼(Savigny)的法學和甘斯(Gans)的刑法。薩維尼是法學歷史學派的奠基人和最偉大的理論家。他還是一位堅定而狂熱的反自由主義者、十九世紀普魯士專制主義最著名的衛士。他不是一個黑格爾主義者，但是在反對不可改變的自然權利和功利主義理論方面，和該學派是一致的，以歷史的觀點把法律和制度闡述爲一種連續有序的、繼承性的發展，產生於在其自身歷史環境下的某個特定民族的理想和特性，並由這些理想和特性證明是合理的。

馬克思定期聽了兩們學期的薩維尼的講座，薩維尼以其博學多識和嚴密的歷史證論力量而著稱。馬克思也許就是從他那兒首次接觸到新的歷史研究方法——它需要具備對各種事實的詳盡知識，並以此作爲基礎來解釋宏大的主題。薩維尼在專業領域中的首要對手，是那位刑法學教授愛德華·甘斯(Edward Gans)，他對馬克思的影響更加實在。甘斯是黑格爾的得意門生之一，猶太人血統、海涅的朋友。像海涅一樣，他是人道主義激進分子。他不同意他的老師對法國啓蒙運動的低貶。他的演講似乎是雄辯和膽識的典範，很多人參加他的講座。他的批判無拘無束，以法律制度的原理和立法方法爲依據，沒有任何有關過去的神秘主義的痕跡，這深刻地影響了馬克思，在目的明確的概念和理論批判的方法上給了他啓示，是他以後從未完全放棄過的。



在甘斯的影响下，他在法學中看到了運用和檢驗一切歷史哲學的固有領域。黑格爾主義首次排斥了他固有的實證智慧。馬克思在一封給他父親的親切的長信中，談到了他為構築一個對立體系所付出的努力；在與對手苦苦較量中度過了數個晨昏失序的日子後，他病倒了，離開柏林休養去。返回柏林時，他感受到失敗和受挫，既不能工作，也無法休息。他父親給他寫了一封充滿長者肺腑之言的長信，懇求他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徒勞的形上學的思辨上，他應該考慮他的職業生涯了。這些話完全沒有發生作用。馬克思決心投入對黑格爾著作的勞思傷神的研究中。他夜以繼日地苦讀，二星期後，毅然地宣佈完全皈依黑格爾學說，並通過加入「Doktorclub」（研究生俱樂部）對該學說表示首肯。這是一個自由思想的大學知識分子學會。他們在啤酒屋裡聚會，撰寫一些溫和的、帶有煽動性的散文，表白自己對國王、教會和資產階級的強烈仇恨，而且最主要的，是無休止地爭論黑格爾的神學要義。他在這裡遇見、並很快結交了這個放蕩乖僻的小組的領導成員。他們中有布魯諾兄弟（艾德加 [edgar]、艾格伯 [Egbert] 和鮑威爾）、科本 (Köppen)，他是最早研究西藏喇嘛教的學者之一和一部法國恐怖時期歷史著作的著者、馬克斯·施蒂納 (Max Stirner)，他極少鼓吹自己的絕對的個人主義。馬克思還結識了其他一些自由精靈 (free spirits) (他們是這樣稱呼自己的)。

他放棄了他的法律研究，並開始全心全意地投身於哲學。對他來說，似乎其他課題都不具有足夠的時代重要性。他打算成爲一名大學哲學講師，與鮑威爾一起，發動一場激烈的無神論運動。這場運動將結束畏縮、三心二意地玩弄危險教義的作法——這正是較溫和的激進主義停止不前的地方。他們採用了一種精心策劃的惡作劇形式，以一個虔誠的路德教徒面目出現，引用黑格

爾原著中的大量語錄，指責黑格爾宣揚無神論，顛覆公共秩序，敗壞社會道德。這個合作的騙局確實問世並引起一些風波；有些讀者真的上了當，但作者也給發現了。這齣鬧劇最後以鮑威爾被撤職而收場。至於馬克思，他常出入於社交和文學沙龍，結識了貝多芬和歌德的摯友、著名的貝蒂娜·馮·阿爾尼姆(Bettina von Arnim。德國近代傑出女作家之一——譯注)，後者為馬克思的膽識與智慧所吸引。馬克思寫了一部傳統的哲學對話錄，創作了一部不完整的拜倫體悲劇和幾部蹩腳詩集。詩是題獻給燕妮·馮·威斯特法倫的，正是這個時候，馬克思同燕妮秘密地訂了婚。馬克思的父親為馬克思這種精神上的耗費行為擔心不已。在給馬克思的一封封充滿焦慮和忠言的信中，老馬克思懇求兒子考慮自己的將來，應準備使自己成爲一名律師或公務員。他的兒子在回信中安慰老人，但卻繼續他自己過去的生活方式。

他那時已經二十四歲，是一個沒有固定職業的業餘哲學家。由於他博學，也由於他作爲愛挖苦、好尖刻的辯論家所具有的力量，在上層知識界中受到人們的尊敬。他很快便開始愈益討厭他的朋友和盟友們流行一時的文字和哲學風格。他們組成了一個學究氣和傲慢自大的特殊混合體，充滿了晦澀的悖論和絞盡腦汁的警言，行文間夾雜著咬文嚼字、押頭韻和雙關語，決不可能被人充分理解。馬克思本人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其影響，尤其是他早期的論戰文章；但是他的行文同當時在德國大眾中風行的新黑格爾派的大量廢話相比，是緊湊的，明白易懂的。幾年後，他在描述這段時期的德國哲學狀況時寫道：「正如德國的思想家們所宣告的，德國在最近幾年裡經歷了一次空前的變革。在普遍的混亂中，一些強大的國家產生了，但是立刻又消逝了，瞬息之間出現許多英雄，但是馬上又因爲出現了更勇敢、更強悍的對手而銷聲匿跡。這是一次革命，法國革命

同它比起來祇不過是兒戲。在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五年這三年中間，在德國所進行的清洗比過去三個世紀要徹底得多。據說這一切都是純粹思想的領域中發生的。然而不管怎樣，我們碰到的是一個有意義的事件：絕對精神的瓦解過程。

「當它的生命的最後一個火星熄滅時，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們重新化合，構成新的物質。那些靠哲學過活，一直以經營絕對精神為生的人們，現在都在貪婪地攫取這種新的化合物。每個人都熱心兜售他所得到的那份。競爭在所不免。起初這種競爭還相當體面，但是後來，當商品充斥德國市場，而在世界市場上儘管竭盡全力也無法找到銷路的時候，一切便按照通常的德國方式，因工廠的過度生產、降低質量、原料摻假、偽造商標、買空賣空、空頭支票以及沒有任何現實基礎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競爭變成了殘酷的鬥爭，而這個鬥爭現在卻被吹噓和描繪成一種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變革，一種產生了偉大成果的因素。」（中譯文根據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十九至二十頁，和英譯文稍有出入。讀者或可參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德文原著第一卷第一章〈費爾巴哈〉——譯注）

這一段文字寫於一八四六年；如果馬克思的生活環境沒有在一八四一年遭到一場災難性的變故，那麼，他很有可能仍然生活在這個荒誕的世界裡，廁身於這個大量擴展和製造語彙概念的行列之中。這次變故是他在經濟上依靠的父親死了，留下一份僅夠他的遺孀和最幼小的孩子們勉強過活的遺產。與此同時，普魯士教育大臣最終決定解除鮑威爾的職務。這一下有效地打消了馬克思謀取一份學術生涯的可能性，因為他的聲譽在鮑威爾事件中受到嚴重損害。他被迫去尋求另一種職業。他用不著等得太久。在他的最熱烈的崇拜者中有一位名叫莫塞斯·赫斯（Moses Hess）的

人，一位來自科隆的猶太評論家，忠誠狂熱的激進分子。即使在當時他都比黑格爾左派走得更遠。他去巴黎，並在那兒會見過這一時期法國重要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家，並轉而熱情信仰他們的觀點，把狂熱的傳統猶太教與唯心的人道主義古怪地混為一體，鼓吹經濟對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宣傳不首先解放掙工資的無產階級就不可能解放全人類的思想。他宣稱無產階級繼續所處的奴役狀態使得知識份子建立一個新道德世界的所有努力都成為徒勞的，因為在一個容忍經濟不平等和剝削的社會裡，公正便不可能存在。財產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祇有廢除私有的和國有的財產，人方可獲得自由，這就必須取消國界，在合理的集體主義的、經濟的基礎上，重築一個新的國際社會。他與馬克思相會，後者使他完全傾倒。他在寫給一位激進派友人的信中宣稱：「他是當今活著的最偉大的，也許是唯一真正的哲學家，並將立即……引起所有德國人的注意……馬克思博士——這是我的偶像的名字——還很年輕（至多二十四歲），但將給予中世紀宗教和政治致命一擊。他將最深刻的哲學嚴肅性和最深邃的智慧結合起來。想像一下如果你能夠將盧梭、伏爾泰、霍爾巴赫、萊辛、海涅和黑格爾融合成一個人——我說把他們融合起來而不是擺成一堆——那麼，此人便是馬克思博士。」

馬克思認為赫斯的熱情很討人喜歡，但也可笑，於是擺出了傲慢的姿態，赫斯對此開始是太溫順了，沒有怨恨。說赫斯是位有獨創性的思想家，例不如說他是一位思想傳播者、一名狂熱的傳教士，使不止一個同代人皈依共產主義，其中就有青年激進主義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當時，恩格斯還沒有見過馬克思。他們倆就是經他的介紹纔認識的，但他倆誰都不願承認這一點；此後幾年中，他們卻把他看成無害的但卻是討厭的傻瓜。赫斯仍然是一個鞠躬盡瘁的馬克思主義者（但

是後來又加上了猶太復國主義狂熱，而且，無論如何他都不是一個行動者。但是，就在這個時候，馬克思發現赫斯是自己的一個有用的同盟，因為他是個不知疲倦的鼓動家。他終於說服了一幫住在萊茵河畔的自由主義工業家資助出版一種激進的期刊，它應該含有這樣的文章，其政治和經濟主題是攻擊柏林政府反動的經濟政策，並且總的來說，同情上昇中的資產階級的需要。它在科隆發行，刊名叫作《萊茵報》。

馬克思受到了邀請，他欣然同意，定期向這份刊物撰寫文章；十個月後，他成了該報的總編輯。這是他首次涉足實際政治。他把刊物辦得生氣蓬勃但難容歧見。他的獨斷性格在一開始時就表現了出來。他的下屬也樂得讓他隨心所欲地幹，祇要他願意，就隨他在刊物上寫多少文章。這份報紙的政治傾向，從頗為溫和的自由主義，迅速變為激烈的激進主義——其對政府敵視態度之猛烈，沒有任何其他德國報紙能與之相比。它發表長文，惡毒地攻擊普魯士新聞檢查和聯邦議會，攻擊整個地主階級；它的發行量擴大，名聲遍揚全德意志。政府終於被迫注意到萊茵地區資產階級令人驚異的行爲。股票持有人對此所抱的驚異幾乎毫不遜於當局，但是他們並不提出抗議，因為該報訂戶數量穩定地上昇，並且，此報贊同審慎的自由經濟政策，主張自由貿易和德國經濟一體化。而普魯士當局由於擔心激怒新近併入國土的西部省份，便克制對該刊的干預。為這種容忍所鼓舞，馬克思加緊了攻勢。除了討論一般政治和經濟主題之外，他還增加了兩項別的問題，該省對此兩項問題有非常慘痛的感受：第一個問題是，莫塞爾種植葡萄的農民處境十分悲慘；第二個問題是，窮人因偷竊鄰近森林中的枯木而遭受嚴厲的法律懲罰。馬克思將這兩個問題作為激烈控訴地主政府的題目。政府方面，在謹慎地查證了該地區對這些問題的感受後，決定動用它的

間檢查權，並且審查愈益嚴厲。馬克思竭盡才智地躲過了檢察官的眼目（他們中大多數智力有限），並且成功地發表了大量稍加掩飾的宣傳民主和共和的文章。這些文章不止一次受到檢察官的譴責，並導致檢察官一再易人，且一個比一個嚴格。一八四二年就是在這種巧妙的周旋中度過的。如果馬克思不是無意中越界的話，這種遊戲或許會一直繼續下去。俄國政府是整個十九世紀歐洲愚昧、野蠻和壓制的集大成，是各國反動派汲取力量的不竭之源，因此成爲威嚇各個自由主義門派的幽靈。俄國政府是當時俄普同盟中的支配力量，正因爲如此而遭到馬克思的猛烈攻擊——社論文章一篇接一篇，對他而言，向俄國人發動一場戰爭，無論當時還是後來都是一種最能代表歐洲自由主義者的出擊。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也碰巧看到了這些檄文中的一篇。他向普魯士大使表達了他的憤怒與驚託。俄國首相對此發出嚴重照會，指責普魯士國王的檢察官玩忽職守。普魯士政府急於討好它的強大鄰邦，當即採取緊急步驟；一八四三年春天，《萊茵報》被查封，事先沒有警告。馬克思又一次地自由了。就這麼一年的功夫，便使他成爲一名具有惡名昭彰觀點的才華洋溢的政治性記者，並且帶有一種爐火純青的、以挑釁非自由主義政府爲樂的癖好，他今後的整個生涯，給他以足夠的機會來滿足這種癖好。

同時，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工作著：他通過閱讀巴黎社會主義——傅立葉、蒲魯東、德札米（Dezamy）、卡貝（Cabet）和勒魯（Leroux）的著作，自學地掌握了法語。他讀了法國和德國的近代史、馬基維利的《君王論》。他花了整整一個月鑽在古代和現代藝術史裡，爲了蒐集證據用以證明黑格爾的基本範疇，其特點基本上是革命性和破壞性的：正像這一時期年輕的俄國激進主義者一樣，他把黑格爾的這些範疇看作爲——以赫爾岑的話來講，「革命的代數」（the algebra of revolu-

Ion)。赫爾岑寫道，「這位老哲學家嚇得不敢公開在風暴迭起的政治海洋中運用這些範疇，而祇是將它們飄浮在美學理論這方平靜的內陸湖泊裡。」然而，馬克思對這些範疇之正確解釋的觀點，後來受到那年出現的一本書的影響，就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著的《關於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Preliminary theses on the Reformation of Philosophy)。

費爾巴哈是一位極有趣的作家之一，在思想史上也並非罕見，他們雖非第一流思想家，但給更有天賦的人提供瞬間火種，點燃積蓄已久的燃料。費爾巴哈堅持經驗主義的立場，而此時的馬克思在沉醉於唯心主義之中達五年之久後，正強烈地反對著這門衰退哲學的繁文縟節。費爾巴哈比較簡樸的風格，好像突然間打開了一扇通向真實世界的窗口。鮑威爾及其弟子的新黑格爾主義經院哲學對他來說，似乎突然間成了一場夢魘，但它終於消釋了，他決定把它忘得一乾二淨。

黑格爾斷言：在一定文化之同時期的人物中，其思想和行動是由作用於它們的同一精神所決定的，該精神在這個時期的所有現象中表現出來，費爾巴哈強烈反對這種觀點。他有力地質問道，「一個時代或一種文化的精神，若非構成所有現象之總和的一個簡稱，又是什麼呢？」因此，說現象之所以如此由它所決定的，無異說現象是由它們自身的總和所決定的——一個空洞的套套邏輯(tautology)。他繼續指出，用模式(pattern)的概念來替代這種總和，情況也絲毫沒有改善，因為模式不能引起事件(events)。模式是一種形式(form)，是事件的外部屬性，它們本身祇能夠由別的事件所引起。希臘精神、羅馬特徵、文藝復興精神、法國大革命精神，這都不過是一些抽象的觀念，不過是爲了簡要描述某一特定的、由各種特質和歷史事件構成的混合體的標誌，不過是人們爲了方便而創造的一般術語，都不在任何意義上於這個世界中真正地客觀的存在，都決不可

能引起人類事務的這種或那種變化，除此之外又能是什麼呢？較古老的觀點認為是個人的決定和行為導致變化產生，這種觀點從根本上說還不那麼荒謬了：因為個人至少是存在的，並且在這種意義上是行動的，即一般概念和術語並無這種行動。黑格爾正確地指出了這種看法的不是之處，因為它未能解釋總體結果如何產生於大量個人生活和行動的相互作用。黑格爾的天才之處，在於試圖找出某種單一的共同力量，它負責向這些意志提供明確方向，找出某種普遍的法則，根據這種法則，歷史就可以成為對整個社會之進步的系統敘述了。但是，他終於沒有成為理性的，反而是一種晦澀的神秘主義而告終，因為黑格爾的絕對觀念如果不是對它旨在解釋的東西套套邏輯似的或重新組合，就祇能是基督教的人格化上帝的化名，從而將這個題目拉出了理性討論的範圍之外。

費爾巴哈的下一步是宣佈歷史的動力不是精神的，而是物質條件的總和，這些物質條件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期內，決定著生活於其中的人的思想和行動。但是，他們在物質世界上遭受的苦難導致他們在他們自己創造的非物質的理想世界中找尋慰藉，儘管是無意識的，作為他們在塵世上之不幸的一種報償，他們以後將在這個非物質的理想世界中，享受永恒的極樂世界。他們把他們在塵世上所缺乏的一切——正義、和諧、秩序、善、統一、永久性——都轉化為一個超驗世界的超驗屬性，並且認為祇有這個世界纔是真的，使它轉化為崇拜的對象。如果要揭示這種幻覺，就必須把它放在心理上，引起這種幻覺的物質失常(material mal-adjustments)這個範疇來分析。和霍爾巴赫(Holbach)及《人是機器》(L'Homme Machine)的作者一樣，費爾巴哈對先驗論的憤恨，經常導致他去尋找最簡潔的純物質方法的解釋。「Der Mensch ist was er ist」(人是他吃



的東西)是他自己對他的學說的黑格爾式的模仿之詞。人類歷史是物質環境對生活在社會中的人，起決定性作用的歷史；因此，祇要了解物質規律，就能使人類通過使自己的生活有意識地適應這些規律，來掌握這些物質的力量。

他的唯物論，特別是他的以下這種理論，即一切「意識形態」(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都是企圖以理想來補償現實的痛苦，因此，既揭示了痛苦的存在，也遮掩了它們的存在，這些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後又給列寧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西伯利亞流放時讀了費爾巴哈的著作。費爾巴哈最出名的著作、馬克思讀過的《基督教精義》(*Essence of Christianity*，一八四一年出版，由喬治·愛略特譯成英語)以及更早一點出版的《黑格爾哲學批判》(*Criticism of the Philosophy of Hegel*)是感覺深刻、激情論辯的論著，有時思路簡單並缺乏歷史感，但卻組織嚴密，簡潔洗練，經過三十年代黑格爾主義的荒謬擴張之後，這兩本書的簡潔、樸實和勇氣，似乎肯定顯示出清新的清明感。當時仍是一名激進主義者和唯心論者的馬克思，則被費爾巴哈從教條中喚醒了。黑格爾的絕對觀念成了一種毫無意義的表達：在他看來，黑格爾似乎建造了一座關於詞語的似是而非的詞語大廈；而他這一代人的責任在於，將有價值的黑格爾的方法來武裝自己，用這樣一些符號(symbols)來取代它，這些符號指示著時間和空間中，在它們之間可觀察到經驗關係的真實物體。馬克思仍然信奉諸理性的效力，反對暴力革命。他是個持不同意見的唯心論者，但仍然是唯心論者。他在一年前獲得耶拿大學(University of Jena)博士學位，論文是典型青年黑格爾派的，論述德謨克里特(Democritus)和伊壁鳩魯(Epicurus)思想的差異。在論文中，他為他認為是伊壁鳩魯的命題辯護，所使用的方法，比被他自己後來所譴責的典型的、難懂的唯心

論詞藻，不見得清楚多少。

一八四三年四月他同燕妮·馮·威斯特法倫結婚，此事違背了她家庭裡大部分成員的意願。這種敵視，反而使這位端莊而又極其浪漫的少婦，增強了對馬克思的一往情深和忠貞不渝。她的丈夫向她揭示了一個新世界而改變了她的存在，而她把整個身心都獻給了他的生命和工作。她愛他、敬仰他、信任他，而且在感情上和理智上完全由他支配。他在所有危機和災難時刻毫不猶豫地倚靠她，並終生為她的美貌、出身和智慧而自豪。詩人海涅在巴黎同他們常有來往，他對她的才貌讚不絕口。在以後的歲月裡，當他們幾乎落得一貧如洗時，她表現出偉大的英雄主義情操——維持著最低限度的家庭結構和生計，就是這使她的丈夫能夠繼續他的工作。

他們決定一同移居法國。他知道他必須對當時困擾人心的問題作出創造性的貢獻，並且知道在德國是不可能對任何嚴肅的問題發表公開的講話。沒有東西可以阻擋住他：他父親死了，他對他的家什麼也不用再操心。他在德國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柏林的老友們如今看來似乎是一群思想騙子，他們只能用惡毒語言和搬弄隱私來掩蓋他們思想的貧困和混亂。他平生特別憤恨兩種現象：放蕩的生活和矯揉的造作。在他看來，放蕩不羈的生活和故意輕視傳統，似乎就是變相的庸俗主義，以過份詆毀某些價值，來強調和崇奉同樣這些價值，因此表現出一樣根深柢固的庸俗市儈。他對科本(Köppen)還是很尊重，但他失去了所有與科本的個人聯繫。他同阿諾德·盧格(Arnold Ruge)形成了一種新的不冷不熱的友誼。盧格是一位很有天賦的薩克森地區報紙的撰稿人，編輯一份激進的期刊，馬克思曾經常為它撰稿。盧格是一個浮誇的、容易激動的人，忿忿不滿的黑格爾主義者、激進分子，一八四八年後逐漸轉變為反動的民族主義者。作為一名作家，他眼界遼闊、

品味明確，非許多德國激進分子所能比擬。他欣賞較偉大的人物的才具，如馬克思和巴枯寧，並同他們有所接觸。他看不出在德國的土地上，在檢察官和薩克森警察的窮凶惡極下，還有任何繼續辦刊物的可能性，於是決定在巴黎建立基業。他邀請馬克思幫助他出版一份稱作《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的新期刊。馬克思欣然應允。他在一八四三年夏天寫給盧格的信中說道，「這裡的空氣簡直難以形容，令人窒息。佩戴了勳章而不是長劍去卑躬屈膝，即使是爲了爭取自由，也談何容易！我已經受夠了這種虛偽和愚蠢，我厭惡官吏的粗野笨拙，我再也受不了向人打躬作揖、編造一些完全無害的話語。我在德國已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在德國，人們祇有對自己也弄虛作假。」一八四三年十一月，馬克思離開了普魯士國土，兩天後到達巴黎。他的名氣在某種程度上先於他的人而遠揚。那時他主要被視爲一名筆鋒犀利的自由派記者，他被迫離開德國是因爲曾激烈地支持民主改革。兩年後，許多國度的警察都知道他是一名毫不妥協的革命共產主義者、改革的自由主義(reformist liberalism)的反對者，分佈世界各地的顛覆運動的惡名昭彰的領導人。一八四三—四五年是他一生中更具有決定性的時期：他在巴黎經歷了最後一次思想轉變。在這一時期末尾，他在個人與政治方面都達到了一種清晰的立場，此後，他始終致力於發展它，並在實踐中實現它。

# 第五章

---

## 巴 黎

這一天一定會到來，那時，太陽照耀下的將僅有承認理性為主人的自由人世界，那時，暴君與奴隸、牧師，和他們的愚蠢或虛偽的工具，都將不復存在，除非是在歷史中或舞台上。

——孔多塞

---



一

十九世紀中葉，巴黎的社會、政治和藝術的騷動，是歐洲歷史上一個無與倫比的現象。一大群詩人、畫家、音樂家、作家、改革家和理論家聚集在法國的首都。在相對上比較寬容的路易——菲利浦王朝的統治下，巴黎提供了庇護所給來自許多國家的流亡者和革命者。長期以來，巴黎以廣招知識精英而稱著於世；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正是歐洲其他地方經歷深刻的政治反動的時期，越來越多藝術和思想家棄暗投明，滙集到巴黎來；他們發現，在巴黎既不像在柏林那樣被當地的文明強求一律，也不像在倫敦那樣被冷落在一邊、組成孤立的小團體，而是受到相當慷慨乃至熱烈的歡迎，被允許自由進入王朝復辟時期倖存下來的藝術和社交沙龍。這一使這些人談話寫作的思想氣氛是令人振奮且具理想主義的。一般的情緒是激烈地反對舊秩序、國王和暴君、教會和軍隊，尤有甚者，是反對缺乏理解力的俗不可耐的群眾、奴隸和壓迫者、生命和人權的敵人；這就產生了一種精誠團結的振奮感，把這個喧囂的、異質性極高的社會凝聚起來。各種情緒急劇地醞釀起來，個人情感和信仰無不被激烈地表白，革命和人道口號為人們熱烈地喧騰，他們準備隨時為它們赴湯蹈火；這十年間，思想觀念、理論學說，個人情感和國際大交匯，比以往任何時期更豐富；這是一個天才輩出的時代，他們相互排斥、相互吸引、相互改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使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各個時期都為之遜色。每年都有來自普魯士帝國和沙俄的流亡者。意大利、波蘭、匈牙利、俄國和德國僑民區，在一片同情和敬仰的氣氛中發展壯大。他們組成了國際社團，撰寫

小冊子、舉行集會演講、陰謀策劃，而更多的却是在秘密處所裡，在街上、在咖啡館、在公開宴會上進行的無止休的討論和辯論；他們沉浸在一片高昂、樂觀的氣氛中。

革命作家和激進政治家們正處在希望和權力的高峰，他們的理想沒有被扼殺，他們的革命讖論也沒有被一八四八年的洪水所淹沒。這種為自由的事業而組成的國際陣線，以往從未在其他地方實現過：詩人、音樂家、歷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覺得，他們不是為自己或什麼特別的公衆而寫作，而是在爲了人類而著述。一八三〇年，反動勢力遭受過一次失敗，於是他們便繼續利用這一勝利的果實。大多數浪漫的自由主義者曾經把被鎮壓下去的布朗基主義陰謀（一八三九年）貶爲一種意義含糊的暴動（*amateur*），然而，它也不是一次孤立的爆發：因爲這一火熱而又緊張的策略性活動，是在金融業和工業蓬勃發展的背景下發生的，伴之以無情的腐化，爆發戶轉瞬又傾家蕩產了。醒悟過來的現實主義者組成的政府被新的統治階級所控制，後者的那些金融鉅頭、鐵路大王、大工業家們周旋於一座陰謀和賄賂的迷宮裡，卑鄙的投機家和冒險家在其中控制着法國的經濟命脈。南方產業工人的頻繁鬧事表明了一種不穩定的騷亂狀態，這既歸之於勞工僱主的魯莽行爲，也歸之於法國的產業革命，在規模上它雖然遠小於英國，但却更迅速更猛烈地改變着這個國家。尖銳的社會不滿，伴隨着人們普遍認爲政府的無能與僞詐，使總的危機感和變革感顯得更突出，更令人覺得祇要有足夠的才具，敢想敢爲且精力充沛，就似乎沒有得不到的東西了。這使人想像力倍增，並造就出幹勁十足、雄心勃勃的機會主義者。這種機會主義者出現於巴爾扎克(Balzac)的小說和司湯達(Stendhal)未完成的小說《呂西安·婁凡》(*Lucien Leuwen*·又譯作《紅與白》——譯注)，因爲當時鬆懈的新聞審查和七月王朝推行的寬鬆的忍讓政策，允許尖銳而且激烈的政治寫作

形式，它有時亦上昇到一種高雅雄辯的境地，在文字發揮較大威力的時代裡，激發起人們的才智和激情，並進一步加劇了本來已經是一觸即發的氣氛。繆塞(Musset)、海涅、托克維爾(Tocqueville)、德拉克魯瓦(Delacroix)、華格納(Wagner)、柏遼茲(Berlioz)、戈蒂埃(Gautier)、赫爾岑、屠格涅夫(Turgenev)、雨果(Victor Hugo)、喬治·桑(George Sand)、李斯特(Liszt)等作家、畫家和音樂家們留下來的回憶錄和書信帶着某種魅力，它充溢在那些歲月裡，它們是以下列特徵為標誌的：一個天才輩出的社會有着銳利自覺的敏感和高揚的生命力；雖然執着於自我剖析和病態的自我戲劇化，但也以其創新和力量而自豪；忽然解脫了過去的種種桎梏，頓感天地之寬廣，可於其間行動和創造。到了一八五一年這種情緒便壽終正寢了；但是偉大的傳說已經塑成，一直流傳到今天，使巴黎在巴黎人和旁人眼裡都成了一個革命進步的象徵。

但是馬克思不是來巴黎獵奇的，他不動感情，甚至天性冷漠，環境對他沒有什麼影響，而且他在自己所處的任何環境中，都能堅持自己的不變的方式，他不信任一切衝動激情，特別是那種以華麗詞句裝飾起來的熱情。和他的同胞、詩人海涅，或俄國革命者赫爾岑和巴枯寧不同，他沒有體驗到他們所表達出來的那種狂放感，當時，他們在一封封欣喜若狂的信中宣稱，他們在這個中心裡已經找到了歐洲文明中最可羨慕的一切。他選擇巴黎而不是布魯塞爾或瑞士的某個城市，其理由在他看來似乎更為現實和具體，這是發行《德法年鑒》最方便的地方，這份刊物旨在既面向德國人又面向非德國人。再則，他希望能找到一個問題的解答。對這個問題，無論是百科全書派，或黑格爾，或費爾巴哈，還是在一八四三年他飛快地、不耐煩地吞下的大量政治和歷史書卷裡，都一直沒有找到滿意的解答。法國大革命失敗的終極原因是什麼？理論上或實踐上有什麼錯



誤纔使得法國五人執政內閣、法蘭西第一帝國及最終波旁王朝復辟成爲可能？半個世紀後仍在竭力尋求建立一個自由和公正社會的途徑的人必須避免的錯誤是什麼？是否根本就沒有支配社會變化的法則？瞭解這點或許本來可免去這場大革命。百科全書派中較極端者無疑是明顯地把人性過於簡單化了，以爲祇要通過啓蒙教育，人性就可以在一夜之間變得完全地理性和完全的善。至於黑格爾主義的答案，它認爲時機尚未成熟，認爲革命失敗，是因爲絕對觀念尚未達到合適的階段，是因爲革命者想要獲取的理想太抽象、是非歷史的，這反過來似乎也犯有同樣的錯失之處。由於合乎時宜的標準並沒有給定，除了已經發生事件的該階段以外。代替正統答案的那些新的公式，諸如人的自我實現，或被體現出來的理性、或批判的考證等，似乎也未見得使之更具體、或確實帶來什麼重要意義。再說，絕對觀念的任何階段都沒有被認爲包含了馬克思的激進派所理解的那個「自由和公正的社會」。

面對這個問題，馬克思以其特有的徹底精神(thoroughness)行動起來：他研究事實，遍讀了這場革命本身的歷史記載；他還埋頭研讀了用法文寫的有關這個問題和類似問題的大量論爭文獻，不出一年，他便完成了這兩項任務。從學生時代起，他就把閒暇時間泰半用於閱讀，但在巴黎的時候，他讀書的胃口突破一切界限。他讀書之狂熱和當初轉向黑格爾主義時一樣，在筆記本上作摘要和長評，並在以後的寫作中大量引用。至一八四四年底，他業已熟稔了英法主要思想家的政治和經濟學說，按照他自己仍然持有的半正統黑格爾主義對它們進行了考察，最後通過自己對這兩個不可調和的明確傾向的態度，建立起自己的立場。他主要是讀經濟學家的著作，從魁內(Quesnay)、亞當·斯密(Adam Smith)開始，到西斯蒙第(Sismondi)、李嘉圖、薩伊(Say)、蒲

魯東及他們的追隨者。他們明晰、冷靜、不動情感的風格，和德國人混亂的激情主義(emotionalism)與浮誇的文風形成有利的對照。他們把實際的機敏和對實證探究方法的重視結合起來，加上大膽的、獨創的一般假設，這深深地吸引了馬克思，並加強了他固有的傾向，即避免所有形式的浪漫主義，祇接受可以被切實觀察到的證據所證實對現象的合乎自然的解釋。法國社會主義著作家和英國經濟學家的影響，正開始驅散無所不包的黑格爾主義迷霧。

他將法國的一般性狀況同他祖國的狀況作了比較，並對法國極高的政治思考水平和智慧產生深刻印象：「在法國，每個階級都帶有一種政治理想」，他在一八四三年寫道，「而且覺得自身代表着總的社會需要……而在德國，實際生活缺乏智慧，智慧又不實際……驅使人們抗議的祇是物質需要——本身便是真正的鎖鏈……但革命的能量和自信，其本身並未充足到能夠使一個階級成為社會的解放者——它必須認同另一具有壓迫原則的階級……正如在法國是貴族和僧侶互相認同的階級。德國社會缺少這種戲劇性的張力……這裡祇有一個階級，它的過錯不在自身而在於整個社會——無產階級。」他宣稱德意志人是西方民族最落後的一員。昔日的英國和法國就是今天不折不扣德國：德國人面對更先進的民族，就如其無產階級面對其他階級，德國的真正解放必定擔負起把整個歐洲社會從政治和經濟壓迫中解放出來。

不過，如果說這些著作家的政治現實主義(Political Realism)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話，那麼，對歷史感的缺乏亦同樣令他震驚。在他看來，單單缺乏歷史感這一點就可能使他們在方法上採取一種簡便、膚淺的折衷主義，他對修改和補充他們的體系，明顯地不感興趣，也不感到在精神上有任何顯著的不妥。對他來說，這種容忍的態度似乎證明他們不是缺乏嚴肅性，就是忽略了整體

性，他自己的觀點從來就是一清二楚和極端激烈的，是從決不允許在結論中有絲毫模糊不清的前提下推導出來的；因此，在他看來，這種精神上的游移不定，祇能歸咎於對歷史過程的嚴格構造把握得不夠。古典經濟學家認為，該時代的政治範疇可適用於所有時間和所有地點，這種推斷以其特別的荒謬令馬克思深為震驚。恰如恩格斯後來對它評論，「按該時代的經濟學家的說法，好像祇要獅王理查(Richard Coeur de Lion)懂一點經濟學，也許就可以通過建立自由貿易而免於六個世紀的周折，不至於把他的時間浪費在十字軍東征上」(史學家一般認為八次十字軍東征前後凡兩個世紀，但十字軍最後一個島國塞浦路斯滅亡於十六世紀，按此計算，或也可作六個世紀。——譯注)，彷彿以往一切經濟制度都是很多偏離資本主義的重大錯誤，必須根據資本主義的標準，對它們進行分類和評價。他們不能把握這麼一個事實，即每一個歷史時期祇能根據其自身特有的觀念和範疇來加以分析，並由它自身的社會經濟結構來決定。這導致了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產生，亦導致產生了那些周密詳盡的計劃，它們根本就是對資產階級的或封建的社會理想化描述，並把其「惡」的方面剔除了。而要提的問題不是人們希望發生什麼，而是歷史將允許發生什麼，在當前的形勢下，哪些趨勢注定要發展，哪些趨勢將消失。人們創立學說時，必須僅僅根據這樣的科學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結果。

儘管如此，馬克思覺得這些作者的道德傾向是值得同情的。他們也不相信固有的直觀，不相信訴諸於超越邏輯和經驗主義觀察的情感；他們也在這其中看到了反動和非理性主義的最後堡壘；他們也熱烈地反教權和反威權。他們中許多人持有異常陳舊的、關於一切人類利益可以達到自然和諧的觀點，或者相信個人能夠掙脫國家和王朝的枷鎖，去尋求他自己和他人的幸福。這類

觀點是他的黑格爾主義修養所完全不可能接受的，但歸根結柢，這些人是他的敵人的敵人，被列在進步的陣營裡，是為理性進步而戰的鬥士。

## 二

如果說馬克思的歷史結構的觀點——即構成人類歷史的各種因素之間的正式關係的觀點，是從黑格爾那裡得到的話，那麼，他對這些因素本身的了解，是從聖西門及其追隨者那裡獲得的，以及還有新自由派歷史學家們，基佑(Guizot)、梯葉里(Thierry)和米涅(Mignet)。聖西門是個大膽、有獨創性的思想家：他是第一個宣稱經濟關係的發展係歷史的決定性因素的作者——在他的時代，宣稱這一點本身已可以說是不朽的了——而且他還進一步地分析歷史過程，把它當作不同的經濟階級間持續不斷的衝突，是這些階級之間的衝突，在任何特定的時期，一部分人佔有該社會的主要經濟資源，另一部分人則沒有這種優勢，為了生存，只得依靠前者。按照聖西門的觀點，統治階級幾乎不會具有充分的能力亦或沒有興趣來完全合理地使用它的資源，或者判定一種秩序，讓最有能力合理使用資源的人去應用和增加該社會的資源；這個階級也不會靈活使到自身和它所控制的機構，去適應由它自己的活動所產生的新的社會條件。因此，它趨於追求一種短視自私的政策：造成一種等級森嚴的制度，財富積累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並依靠這樣獲得的威信和權力，使大多數被剝奪者淪為社會的和經濟的奴隸。這些不情願的子民自然日益不安份，並以自己的生命相押去從事推翻少數暴虐者；當時機和條件有利於他們的時候，他們最終將成功地做到這

一點。但他們在長期的奴役中愈益墮落，無法比他們的統治者構想出更高的理想，因而，當他們獲得權力時，他們像以前的壓迫者一樣非理性和不正地使用權力；這一回是他們創造一個新的被壓迫階級，如此，這種鬥爭便是一個新層次上繼續下去。人類歷史就是這類衝突的歷史：正如亞當·斯密和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本來也會指出的那樣，歸根究柢是由於主從雙方看不到在合理分配經濟資源的條件下，雙方的最大利益是一致的。相反地，統治階級竭力阻止任何社會變革，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抵制以技術發明為形式的經濟進步——這種經濟進步祇要獲得正確的發展，便能通過創造無盡的財富和科學的分配，迅速地使人類獲得永恆幸福和繁榮昌盛。聖西門與他的百科全書派前輩相比，是一位更好的歷史學家，他以真正的進化論觀點來看人類社會。他在評價以往的各個時代時，並不是根據它們的機構與當時的社會和經濟的要求相應的程度；結果，他對於例如中世紀的敘述，比他同時代的絕大多數自由主義者更深入、更富同情感。他把人類進步看作為人們在社會中的發明和創造活動，他們以此來改造和豐富他們自己的本質和需要，以及滿足這些需求的手段，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質上的，人性並不是像十八世紀所假定的那樣，是固定的本質，而是一個發展過程，其方向由自身的成敗所決定。由此，他注意到一個關注自己時代的真實需要的社會秩序，可能會傾向於阻礙以後時代的發展運動而成為一種約束，這種本質，被因它的存在而得到保護的階級掩蓋起來了。曾經是中世紀等級社會 (medieval hierarchy) 中有機的和進步因素的軍隊和教會，現在已成了陳腐過時的遺物，它們的作用已由近代社會的銀行家、工業家和科學家來發揮了，結果，教士、兵勇、領年俸者，祇有作為游手好閒者和社會寄生蟲纔能苟延，他們浪費財富阻擋新階級的前進，因而必須予以消滅。在他們的位置上，勤勞、有能力

的專家，因其經營能力而中選，必須被置於社會的首要地位。銀行家、工程師、高度集中的大型工農企業的組織者，必須起來治理管轄社會。聖西門主義者教誨道，繼承法導致不正當的財富不均，故應予以廢除之；但這一點決不可擴展至一般的私有財產權：每一個人都對他個人的勞動果實享有權利。聖西門和他的弟子們，像法國大革命發起者及其後來的傅立葉和浦魯東一樣，堅信唯有財產權纔能刺激人們賣力的勞動，同時，財產權還奠定了私人和公共道德的基礎。銀行家、公司創建者、工業家、發明家、數學家、科學家、工程師、思想家、藝術家、詩人等等，國家必須根據他們的效能給予足夠的報酬；一旦社會的經濟生活被專家們合理化了，進步人性的自然美德、各種利益的自然和諧，將保證所有人均享有普遍的公正、安定、富足和均等機會。

聖西門生活的時代，正是西歐封建主義最後殘餘即將消失於資產階級企業家和其新的機械發明登場之前。他對於技術發明的鉅大可能性及其對人類社會的有益影響，擁有無窮的信念：他在冉冉上昇的中產階級身上看到了身強力壯和精力旺盛的人，他們被正義感和無私的利他主義所激發，又受到地主貴族和教會的盲目敵意的阻擋，但這二者因為極為擔憂自己的特權和財產，從而成爲一切正義、科學和道德進步的死敵。

這種信念拿到今天來看似乎是天真的，但在當時却不然。正如馬克思本人後來重複過的，作爲一個國家的上升階級的先鋒，自然要把自己的事業同整個被壓迫民衆聯繫起來，並且覺得，在某種程度上也確實是一種新理想的無私鬥士，在進步陣線的最前哨戰鬥。聖西門是上升的資產階級處於最慷慨、最理想主義階段的最雄辯預言家。他自然要高度評價工業、首創精神 (initiative)、發明和大規模計劃的能力；但他同樣尖刻地推出了階級鬥爭的理論，並不知道他的學說中的這一

部份將來某一天會如何付諸應用。他自己是一個十八世紀的土地貴族，受到法國大革命的毀滅性打擊，但他選擇和進步的力量保持一致，從而解釋並合理化了他自己這個被取代了的階級。

他思想意識上的著名對手查理·傅立葉是個商業旅行家，十九世紀初期住在巴黎。當時，聖西門的全部希望所寄的金融家和工業家離開了有效的社會調和，通過創立強大集中的壟斷康森聯合企業(centralised monopolist concerns)，開始加劇階級對立。他們控制信貸，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僱傭勞力，以此開闢了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批發商品的可能性，並同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以不平等的條件展開競爭，系統地把後者逐出公開市場，並把他們的子女吸收到礦廠裡去。法國產業革命的社會後果，就是在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之間構築了一條裂痕，形成一種長期不和的狀態。傅立葉是一名典型的沒落階級代表。他猛烈抨擊資本家注定要成為社會救星這種幻想。比他年長的同代人、瑞士的經濟學家西斯蒙第(Simoneti)，以大量歷史證據捍衛在當時需要某種近乎天才的素養方能理解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鑒於以往一切階級鬥爭均起源於世界上物資的匱乏，新的機械化生產手段的發現將使世界充滿過量的財富，除非遭到阻遏，否則這將很快導致一場階級戰爭，一場使過去所有衝突都相形見绌的戰爭。銷售不斷增加的產品的必要性，將導致競爭的資本家之間持續的競爭，他們將被迫系統地降低工資、延長僱工工作小時，以此獲得對較弱的競爭對手的哪怕是暫時的優勢，這反過來又會導致一系列尖銳的經濟危機，以社會的和政治的騷亂而告終，其原因在於資本家集團之間自相殘殺的戰爭。這種人為的貧困，成比例地隨着商品的增長而增長，首先野蠻地踐踏那些最基本的人權，而大革命就是為保護這些權利而掀起的。這祇有通過國家干預纔能阻止。國家必須剝奪資本累積和生產方式權。但是，囿於西斯蒙第是主張新政

的先驅者，或者說，是福利國家的預言者，確信一個中央組織的、理性和人道管理的社會是可能的，但他對此僅限於一般的介紹，而傅立葉則不信任一切中央權威，宣稱如果政府機構過於龐大，官僚主義暴政必定接踵而來；他建議應把全球分為小塊區域，他稱之為社會主義村落，每一個村落都實行自治，然後聯合成逐漸擴大的單位；一切機器、土地、建築物、自然資源必須共同所有。他的想法是希奇古怪和天才靈感的一種奇妙結合，在其最富啓示之處，亦不失為深思熟慮和精闢之至：一座大型的中心發電廠可以用它的電力驅動村落的所有機械工作；所得利潤嚴格按照五：三：二的比例在勞動、資本和才能之間分割；該村落的成員一天祇工作幾個小時，這樣他們就可自由支配剩下的時間，發展他們的精神、道德和藝術修養，其程度之高乃是迄至那時為止史無前例的。

這樣的論述不時地被一陣又一陣純粹的荒誕言論所打斷，諸如預言不久之未來將出現一種新的野獸物種，它與現存野獸的外表沒有區別，祇是更強壯，數量更多——「反獅」、「反熊」、「反虎」，它們對人既友善又依戀，不像它們目前的祖先，對人既敵對又戕害；它們運用技能、智慧和遠見為人類所做的大量的工作，正是單純的機器所沒有的。這一命題的卓絕之處在於其極具破壞性。傅立葉以其無情的精確性，剖析了中央集權和自由競爭的自我毀滅結果；對金融家及其僱員、法官、軍隊、官員組成的龐大政權的全然無視個人的生活和自由，有着激烈的憤恨和真正的恐怖感。傅立葉的指控乃成爲所有後來者的樣板，他們當中的有的抨擊不加限制的放任學說（laissez-faire），有馬克思和卡萊爾的激烈譴責，有杜米埃（Daumier）的卡通漫畫和布希納（Büchner）的戲劇，也同樣有左右翼人士反對以新的特權形式代替舊的，反對爲解放人而設計的機器對人的奴役。



一八三〇年的革命把查理十世紀趕了下去，並把路易·菲力浦推上王位，再一次激起了公眾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在緊接着的十年裡，不計其數的著作和小冊子紛紛出版，攻擊現存制度的罪惡，並提出各種各樣的醫治方案，從拉馬丁(Lamartine)或克雷米厄(Crémière)的溫和自由主義建議，到馬拉斯(Marrast)或賴德律·洛林(Ledru Rollin)的較激進半社會主義主張路易·勃朗(Louis Blanc)的發達國家社會主義(developed State Socialism)，以及最後是巴爾貝(Barbès)和布朗基的激烈綱領——他們在所辦的刊物《自由人》(*L'Homme Libre*)中鼓吹暴力革命和廢除私有財產。傅立葉的門徒孔西德朗(Considerant)聲稱，現行的財產關係制度即將崩潰；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間，當時著名的社會主義著作家——裴柯爾(Pecqueur)、路易·勃朗、德薩米(Dézamy)，及他們中間最獨立、最有創見的人物蒲魯東，相繼發表了他們最出名的抨擊資本主義制度的文章。接着是一大羣較不出名的人散佈並普及他們的學說。一八三四年天主教牧師拉梅耐(Lamennais)出版了他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信徒的話》(*Words of A Believer*)。一八四〇年，阿貝·康斯坦(Abbé Constant)的《自由的聖經》(*Bible of Freedom*)問世。這乃是清楚的證據，表明了甚至在教會中也有人無法抵禦這種新的革命理論的號召力。

路易·勃朗的《十年》(*Ten Years*)一書出色而又無情地分析了一八三〇至四〇年這個時期，它的巨大成功亦表明了這種傾向。文學上和哲學上的共產主義思潮風行一時。卡貝(Cabet)寫了一本極為流行的描寫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書，題為《伊卡利亞旅行記》(*Voyage to Icaria*)。彼爾·勒魯(Pierre Leroux)向小說家喬治·桑鼓吹一種神秘的平均主義思想(egalitarianism)，然後，海涅還在他的那些著稱於世的描寫七月王朝時期巴黎社交界和文學界生活的散文中，以同情的口吻討

論過這種平均主義思想。

這些運動的命運後來都不太美妙。雜亂無章地存在了幾年後，這些聖西門主義者一如作為一種運動般地消失了：他們中有的人後來成了腰纏萬貫的鐵路大王和承租人，至少應驗了他們的導師所預言的一個方向。更為理想主義的傅立葉主義者在美國建立起共產主義社區，其中有些如奧尼達(Oneida)社區，持續了幾十年，吸引過美國重要的思想家和著作家；六十年代，他們借助於他們的報紙《紐約論壇報》(Tribune)產生過相當的影響。

馬克思潛心研究這些理論，他自己的學說也從中得益匪淺。聖西門的觀點，即巨大的、新生產力的可能性，以及這種生產力對社會的革命性影響，當時（而且現在依然）對那樣一些人有號召力，他們認為祇有大膽的工業化，才能提供向權力迅速推進的遠景，纔能提供人各方面的能力在最充分的程度上得以擴張和實現。而傅立葉則對另一些人有號召力。他們與前一種人正相反，認為奔騰不羈的生產狂潮，分配上的隨心所欲，乃是破壞自然的人際關係、把人變為商品、蔑視公正、把人的能力扭曲到要麼它遭到限制阻礙，要麼轉而反對人的最本原的需要的途徑上、製造出導致人類自相殘殺的叢林戰爭——它祇能為無情的中央集權所抑制，它一視同仁地粉碎了它的犧牲品，它乃是生產企業瘋狂擴張不可避免的結果。馬克思對這兩種論點全接受；他力圖表明人類是進步的，通過泥濘血腥的海洋，走向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類最樂觀的關於生產力無限發展的預言，將與社會的控制結合起來，從而把人從浪費、壓迫、挫折和分裂中拯救出來。為了顯示這種結論並提供具體證明，他盡其所能地考察了這些法國思想家的社會理論。為了取得當代社會史的詳盡知識，他找來了一切可以得到的資料、書籍、報刊，並遍訪作家記者，夜晚出

入於革命者活動小組，它們的成員都是來自德國的外籍工人，他們在共產主義鼓動家的影響下，聚集一起討論那些分散零落的組織的事務，並且比較含糊地討論在他們的祖國搞一次革命的可能性。他在同這些手工業者的談話中，發現了一個階級的某種需要和希望。聖西門及其追隨者曾經描繪過該階級的某種抽象圖景。過去，馬克思對於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理性的進步和社會的改善中所起的精確作用，沒有給予過什麼考慮。此外，還有一個不穩定的、失去社會地位的社會成份，其成員是一些邊緣分子、舊行業的操持者、波希米亞人、失業軍人、演員、知識分子，他們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隸，獨立地但却不穩定地處於生存的邊緣。他們的存在很少被社會歷史學家所認識，更不必提被描寫或分析了。馬克思關注形成法國改革派左翼社會主義者的經濟學著作，這使他把注意力轉到這些問題上來。盧格約馬克思在他辦的刊物寫一篇關於黑格爾《權利哲學》的論文，他寫了該文，並同時完成一篇有關猶太人問題的論文，時間是一八四四年初。關於猶太人的論文，是爲了答覆布魯諾·鮑威爾關於這一題目的文章而寫的。鮑威爾宣稱，從歷史上講猶太人比基督徒落後一個階段，所以必須經過洗禮後纔能有理由宣佈獲得完全的人的解放。馬克思在他的反駁中聲稱，猶太人已不再是一個宗教或種族的實體，而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實體，因他們的鄰居給予他們待遇而被迫從事高利貸和其他沒有吸引力的職業，這是資本主義的贅生物；因此，祇有隨着歐洲社會其他人的解放，他們纔能獲得解放；給他們施洗禮就是用一副鏈鎖去替換另一副鏈鎖；僅僅給他們政治自由，正中那些自由主義者的下懷，他們就是認爲政治自由乃任何人都希望，並且確實應當擁有的全部東西。儘管該文不時閃爍着卓越的智慧，但它的分析是膚淺的，不過它顯示出馬克思所處的典型心態：他下定了決心，祇要他能對之有所作爲，他就決不允

許人們用加諸於和他同代的著名猶太人，如海涅、拉薩爾、迪斯累利等人身上的諷刺和侮辱再加諸於他身上。因此他決定盡力而為，求一勞永逸地解決猶太人問題，宣稱這是一個不真實的題目，之所以提出，祇是為掩蓋其他更緊迫的問題：猶太人問題本身並不構成特殊的困難，它產生於總的社會紊亂，所要求的也正是糾正這種紊亂，使之歸於正常。他受過路德教洗禮，娶了一名非猶太教人；他在科隆時曾一度為猶太社團做過事；在他一生大部份時間裡，他對與他的種族即使有些微關係的事務都敬而遠之，公開敵視它的所有社會機構和習俗。

他對黑格爾的批判更為重要：這一次他所闡述的思想與他以前發表的東西截然不同。正如他自己宣佈的，他在這篇論文中開始清算唯心主義哲學。這是一個漫長、堅苦和徹底的過程的開端，當它於四年後達到顛峰時，證明了已經為一種新的運動和新的世界觀創立了基礎，並且已經變成一種教條和行動的計劃，它支配着歐洲的政治意識，直到今天。

### 三

如果馬克思所要求的是一項完整的、建立在研究歷史和觀察現狀基礎上的行動計劃，那麼，他肯定發現自己剛到巴黎時對聚集在巴黎沙龍和咖啡館裡的改革家和預言家們毫無同情之感。他們確實比柏林咖啡館的哲學家們更聰慧，更有政治影響力，更有責任感，但在他看來，他們縱然是像羅伯特·歐文一樣的天才的幻想家，像賴德律·洛林一樣的改革家，或者像馬志尼般兩者合兼，却並不準備豁出性命為工人階級做事；要不然，他們就是偽裝的、感情用事的小資產階級理

想主義者——披着狼皮的羊——如蒲魯東或路易·勃朗，他們的理想確實至少來說部份是可取的。但是他們漸進主義的非革命的策略，表明他們完全錯估了敵人的力量，因此，作為革命內部的、常常是沒有意識到的敵人，對他們的鬥爭也就更為艱苦。儘管如此，他還是從他們那裡學到不少東西，雖然他不承認這一點，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路易·勃朗，他關於勞動組織的書影響了馬克思的關於工業社會的演進觀點和他對工業社會的正確分析。

他遠較強烈地為這樣一個黨派所吸引，該黨為了和被稱為社會主義者的溫和派區別開來，採用了共產主義者的名稱。這兩個黨均非現代意義上的黨：它們都是由鬆散的組織和個人構成的。前者，即社會主義者，主要由知識分子所組成，而後者幾乎全部由產業工人和小手工業者構成。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單純的、自我完成教育的人，為身受的不公正待遇所激怒，並很容易使他們相信有必要採取革命的密謀，來廢除特權和私有財產。這是一種由巴貝夫的信徒菲力浦·波拿洛蒂(Philippe Buonarroti)鼓吹的學說，並被一生從事密謀的雅各賓共產主義者布朗所繼承。此人在一八三九年的未遂起義中有牽連。馬克思對布朗基的組織才能及其對信念的執着和強烈，印象深刻；但他認為此人缺乏思想，尤其是對起義成功後應採何步驟的思想特別模糊。他發現在其他主張暴力的人身上，也有與此相同的不負責態度。其中最著名的是四處漫遊的德國裁縫師魏特林(Weilting)和俄國流亡者巴枯寧，馬克思當時和他們很熟。他在巴黎認識的共產主義者中間，祇有一個人表現出對形勢的真正掌握，這就是那位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人，一名年輕、富有的德國激進主義者，是在巴門(Barmen)的一位棉紡織老闆的公子。緣由於恩格斯的經濟學文章在馬克思辦的刊物上的發表事宜，他們得在巴黎相會。這次會晤對雙方都是決定性的，它開始了非同尋常的

友誼和合作，並由他們終生保持着。

恩格斯是從作爲一名激進詩人和記者開始的，至馬克思逝世之後，他成爲公認的國際社會主義領袖而結束其一生。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在他還活着的時候，已經發展成爲一種世界性的運動。他是一位思想堅定、頭腦健全、但不太具有創造性的人，有正直和堅強的個性，多才多藝，特別是有着迅速汲取知識的驚人能力的天賦。他頭腦敏銳清晰，富有現實感，這在他同時代那些激進分子中，即使有也極其罕見。他自己雖然沒有創造力，但他另具無與倫比的才華、探索、估量和洞察如何將別人的發現應用於實踐之中。他那敏捷清晰的寫作技巧，他那無限的忠誠和忍耐，使他成爲馬克思的理想盟友和合作人，後者脾性乖張，不易相處，而且寫的東西晦澀難懂，累贅臃腫，意義含混。恩格斯對自己的命運沒有更多的奢望，但求能生活在馬克思的訓導底下，把馬克思視作天才創造之源，並以它給自己所特有的天賦注入生命和眼界；恩格斯把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同馬克思的名字聯在一起，以分享他的導師的不朽業績。恩格斯開始時乃是赫斯(Hess)的信徒，在和馬克思認識前，他已經獨立達到了一種立場，和馬克思的也無甚差別。在以後的歲月裡，他掌握了他的朋友的新的、但表達不夠完善的思想，有時甚至比馬克思本人更清楚地掌握它們，並在語言上使其比馬克思的那種常常拐彎抹角的風格對大眾更有吸引力、更簡潔明瞭（有時是以過於簡化馬克思思想爲代價的）。在所有這一切中最重要的是，他擁有一種基本素質，可與氣質如馬克思那樣的人長期交往，那就是在和馬克思的關係中全無競爭性的，沒有絲毫抵制他那強有力人格的影響的想法，也不存絲毫保留和維護爲自己立場辯護的想法。相反，他惟恐不及地從馬克思那裡汲取他所需的全部精神食糧，絕無疑問，像一名恭恭敬敬的小學生，他奉獻給馬克思的是他

的心智、熱情、生命力、喜悅，以及最後，在最為直接的意義上，向處於絕望貧困中的馬克思提供生活資源。像許多獻身的知識分子一樣，馬克思自己已被一種恆久的不安全感所籠罩。對他個人或學說哪怕是有一絲敵視跡象，也會使他產生病態的敏感和猜忌，對他來說，至少要有一個人能理解他的觀點，可以給予他完全的信賴，並且在任何時候、任何程度上都能給予他所需要的依靠。他在恩格斯身上找到一個至交和精神盟友。恰恰是恩格斯的平凡氣質使馬克思恢復了洞察力，以及對自己和自己目標的信心。在馬克思一生的大部份時間裡，他的活動之展開無不伴隨着這樣一種意識，即有這麼一個魁偉、可靠的人，總是近在咫尺，隨時在最緊急的時刻助以一臂之力。對此，他報之以愛戴，為恩格斯的素質感到自豪，這是他除了他的妻子和兒女外，再沒有給過其他人的。

他們於一八四四年秋見面。當時正值恩格斯給他送去將在他刊物上發表的對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批判文章之後，在此之前他們祇見過一面。馬克思對柏林知識分子中間的恩格斯祇有一個模糊的印象，祇是上次見面以來尚未消散而已。這時他立即給恩格斯寫了一封信；結果他們在巴黎相會，在會晤中，彼此已經很清楚他們對基本問題的觀點是相似的。恩格斯曾經遊歷過英國，出版了一本生動描述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著作。他甚至比馬克思更加不喜歡西斯蒙第學派的社會人道主義。恩格斯提供的關於一個進步工業化社會中實際狀況的豐富具體的材料，正是馬克思尋覓已久的東西。它實際上為一個更為宏大的歷史主題提供了物質證據。這一歷史主題正迅速地在馬克思的頭腦中結晶成形。另一方面，恩格斯發現馬克思給予了他所缺乏的，即使他的事實得以容於其中一個紮實的架構，從而使這些事實成為反對盛行的抽象觀念的武器，在恩格斯看來，任何

嚴肅的革命哲學都不能建立在這些抽象觀念的基礎上。與馬克思的這次會晤對他所產生的影響，肯定與前一次會晤對這位易受影響的赫斯所產生的作用不相上下。它增強了恩格斯的活力，廓清了他迄至那時為止尚未發展成熟的政治觀念，向他提供了明確的方向感，一種規定了的社會觀，據此，他可以放心地去幹，不用擔心找不着具體可行的革命目標的本質。這對恩格斯來說——在漫無目的地徘徊於青年黑格爾運動的迷宮之後——肯定等於是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後來確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們巨量的書信往來持續了四十多年，從一開始就相互一見如故，談論正事；誰也沒有過多地向個人內心表白，而是完全集中在他們所創建的運動，對他們來說，該運動已經成了他們生活的最穩固的現實。在此堅實可靠的基礎之上，他們建立了一種獨特的友誼，不帶絲毫佔有、凌駕或妒忌的痕跡。沒有一個人會提到這種友誼而不感到羞怯和窘迫。恩格斯心裡知道他得到的遠遠超過給予的，因為他生活在馬克思以其心智所創建並裝修的精神大廈裡。馬克思去世時，他把自己看作為這座大廈的指定監護人，小心翼翼地防範著任何來自冒冒失失的、心急氣躁的年輕一代社會主義者的修正企圖。

馬克思客居巴黎的兩年，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有機會遇上一些人，而且是出於友誼而與之交往的。他們即使不總是在智力上、至少在個性和生活的創造性方面和他是平等的。一八四八年的大災難摧毀了除了性格最堅強者外的所有的激進分子。死亡、監禁和驅逐，使他們再也沒有恢復元氣。剩下的人大多數意志消沉或感到幻滅。馬克思退入一種咄咄逼人的孤立姿態，祇同被證明效忠於他所認可的事業的人保持聯繫。這樣，恩格斯自然是他的頭號參謀；其餘的人，他公開地將他們當敵手或附庸來處理。



從他當時的那些友人，盧格、弗賴利格拉特、海涅和安尼科夫(Annenkov)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大膽和精力充沛的人，一個嚴厲的、熱心的、傲慢的辯論家，無論什麼題目，他都運用他那累贅、沉重的黑格爾主義武器，然而，儘管它有着臃腫的機制，但仍然顯示了敏銳和強有力的智慧，這種品質即使是對他最懷敵意的人以後也不得不承認——著名激進分子而沒有被他以某種方式加以傷害或侮辱的幾乎沒有。

他會見詩人海涅，並形成熱烈的友誼。他可能受到海涅的影響，儘管他持反民主主義觀點，但在海涅身上，他看見了一個比黑爾韋格(Herwegh)或弗賴利格拉特更真實的革命詩人，後者當時被德國的激進者奉為偶像。他跟俄國自由主義者的圈子相處也不錯。他們當中有些人是真正的叛逆者，另有些人則是有教養的貴族出身的藝術愛好者和鑒賞家，品味異國人情風俗。其中有一位機敏、隨和的文人，名叫安尼科夫，馬克思對他很賞識。他留下了一則對當時的馬克思的簡短的描寫，「馬克思屬於這樣一種人，他的精力旺盛，意志堅定，有不可動搖的信念。他有一頭濃密蓬亂的黑髮和一雙多毛的手，身着一件打扣起皺的禮服大衣。他給人一種習慣要別人尊敬他的感覺，他動作笨拙卻很自信。他的舉止言談顯然不符合社交常規，而且很慢，幾乎蔑視一切。他說話的語氣令人刺耳，他論人評事的時候有一種不容別人反對的調子，彷彿在表示對自己的使命的堅定信念，以支配人們的思想，規定他們的行動規則。」這個圈子中的另一位遠較顯赫的人是著名的巴枯寧，他與馬克思當時在巴黎的會見對他具有更持久的影響。巴枯寧離開俄國的時間與馬克思離開德國的時間相仿，而且理由也差不多。他當時是一名熾熱的「關鍵」的黑格爾左派，是沙皇和一切極權政府的不共戴天的敵人。他的性格豪放不羈，異常衝動，想像力既豐富又雜亂無章。

他對暴力、對巨大和莊嚴的事物滿懷熱情，他痛恨一切紀律束縛和制度主義，對個人財產全無興趣，以及尤有甚者，是他那無情的、壓倒一切的願望，即毀滅當時那個窄小沉悶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個人就像小人國裡的格列佛那樣，爲了找到最充分、最高貴地實現自己才能的空間而窒息死亡。他的朋友和同胞亞歷山大·赫爾岑一度很敬佩他，但也被他激怒過。赫爾岑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巴枯寧無所不能——他可以成爲鼓動家、護民官、宣傳家、黨派、宗派和教派的首腦。隨便把他放在哪裡，祇要這個地方是一種運動的最突出點，他就能喚起民衆並指定他們的方向……但是在俄國，這個哥倫布既沒有美洲讓他發現，也沒有船隻讓他航行，違心地在炮兵營裡服了一、二年兵役，以後又在莫斯科的黑格爾派陣營內幹了一、二年，於是他極其盼望離開這塊土地，在那兒任何形式的思想都被作爲邪念遭到迫害，並把獨立的判斷和言論看作爲對公共道德的侮辱。」

他是一個出色的大眾演說家，對社會不公懷有切骨的仇恨。他的強烈使命感，是喚起人類幹一番壯觀的集體英雄主義事業，使人類永遠獲得自由和解放，通過他傳達勢不可擋的革命熱情，他以個人的極大魅力壓倒人們，使他們看不見他的不負責任，分辨不清他的謊言和輕浮無聊。他不是一個有創見的思想家，很容易吸收別人的觀點，但是他是一個鼓動性極強的教誨者，儘管他的整個信念充其量不過是一種熱烈的平均主義思想，用以摧毀一切權威和解放被壓迫者，並混合有短命的泛斯拉夫主義，但他就是在這種基礎上創建了一個運動，其生命力在他死後仍然持續了很久。

巴枯寧之不同於馬克思，猶如詩之不同於散文；他們倆結成政治關係的基礎相當薄弱，因而

是極其短命的。把他們倆聯繫在一起的主要紐帶，是他們共同憎恨任何形式的改良主義；但這種憎恨的出發點卻迥然相異。對馬克思來說，漸進主義是站在統治階級的一邊作出的努力，經過喬裝打扮，以分散統治者的敵人的精力，將其引入無效亦無害的軌道；他們中頭腦較清醒者知道這種政策是一種用心良苦的計策，而其他人則受其欺騙，就像激進的改良主義者一樣信以為真，他們害怕暴力本身就不自覺地破壞了他們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巴枯寧拒絕改良，因為他認為所有對人的自由的限制都是徹頭徹尾的罪惡，而一切毀滅性的暴力——當它矛頭直指權威時——本身就是善的，因為這是一種創造性的自我表現的基本方式。據此，他極力反對馬克思以及改良主義者都接受的目標——以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取代現狀——因為，根據他的觀點，這是一種新形式的暴虐，比它旨在取代的個人專制和階級專制更卑鄙、更極權。這種態度以感情為基礎，從氣質上說，不喜歡正常文明社會中有秩序的生活形式，而這種形式所體現的原則，乃是西方民主主義者的思想觀念所肯定的，該原則對於一個有著漫無邊際的想像力、凌亂的生活習慣、憎惡一切束縛和障礙的人來說，卻簡直味同嚼蠟、小家敗氣、令人壓抑、平凡庸俗。幾乎完全缺乏共同目標之基礎的同盟是不能長久的：有條有理、堅定執着，且不為外界影響所動的馬克思，開始把巴枯寧看作半騙半瘋的人，把他的觀點視為荒唐野蠻。他發現巴枯寧的學說是放肆的個人主義發展的結果，他已經為此譴責過施蒂納，但是施蒂納祇不過是一位女子中學不起眼的教師，政治上起不了作用的知識分子，既沒有能力也沒有野心去煽動羣衆，而巴枯寧卻是一個堅定的行動者，一個駕輕就熟、無所畏懼的鼓動家，一個堂堂皇皇的演說家，一個危險的自大狂，一心祇想支配人——至少在精神上是這樣，這一點活像馬克思。

巴枯寧多年後在他的一本政治小冊子上錄下了他對馬克思的看法。他寫道，「馬克思先生是猶太人血統。他一身滙集那個天賦民族的所有優點和缺點。有人說，他膽怯到了怯懦的程度，非常邪惡、虛榮、爭執不休、像耶和華——他父輩的上帝——一樣，不能容忍和專橫，亦像上帝一樣瘋狂地好報復。」

「凡是他妒忌和憎恨的人，他竭盡編造和誹謗之能事，祇要他認為能提高他的地位、威信和權力，他不用使用最卑鄙的陰謀。」

「這些都是他的瑕疵，但他還有許多美德。他很聰明，而且知識淵博。一八四〇年左右，他主宰了激進黑格爾派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圈子，並成為它的靈魂。這些德國人始終如一的冷嘲熱諷，甚至使當時最偏激的俄國民粹主義分子相形見绌。幾乎沒有人可以像馬克思那樣讀得那麼多，也許還可補充一句，讀得那樣出色……」

「他像路易·勃朗一樣，是狂熱的專權主義者——作為一個猶太人，一個德國人和一個黑格爾主義者，更是三倍於此——不過，在論辯時，前者使用雄辯的詞藻，而作為一個博學、思辨的德國人的應盡責任，後者為此原則潤色的更有黑格爾辯證法的全部玄妙和深奧，以及他的廣博學問中的一應財富。」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之間的交惡已日見顯著：表面上的友誼關係不自在地持續了幾年，之所以沒有徹底破裂，是因為各自對於對方令人生畏的素質都懷有既不情願又不無擔憂的敬意。當雙方的衝突最後爆發時，差一點毀掉雙方的事業，並且對歐洲社會主義運動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害。

如果說馬克思是平等對待巴枯寧的，那麼，他毫不掩蓋他對另一位著名的鼓動家——他在這

一時期認識的——魏特林的蔑視。這個兢兢業業、無所畏懼的德國空想家的職業是一名裁縫師，又是一個四處鼓吹的說教者。他是曾在中世紀末掀起農民起義的最後、也是最雄辯的繼承者，他們的在現代的代表大部份是手工業者和客居工人。他們秘密結社，獻身於革命事業，德國內外的許多工業城市有他們的分部機構，以及四散各處的政治異己中心，那裡聚集了衆多社會進程中的犧牲品和受傷害者。他們對蒙受的不公正滿腔怨恨，對其根源和糾正方法卻很迷茫，但是共同的不滿和剷除了他們生活的這個制度的共同願望，使他們聯合起來。魏特林在他的《一個窮苦罪人的福音》(A Poor Sinner's Gospel)和《和諧與自由的保證》(Guarantees of Harmony and Freedom)這兩本書中，宣揚一場窮人反對富人的階級戰爭，以公開的恐怖主義作為主要武器；特別是要組織突擊部隊，成員來自最苦的大深仇者，也就是社會的棄兒和無所畏懼的分子——不法之徒和罪犯——這些人將會為報仇雪恨而拚死地向剝奪他們的那個階級進攻，去迎接一個嶄新的、非競爭的社會，他們將在其中開始新的生活。魏特林對於各國工人團結一致的信念，他的斯多噶主義的生活方式，他在各種監獄裡度過的歲月，更重要的是，他著作中狂熱傳教色彩式的激情，在他的同行手工業者中吸引了諸多忠實追隨者，曾使他一度成為歐洲的重要人物。馬克思對誤導的真心誠意不感興趣，尤其不喜歡游移不定的預言家和含糊的情感主義(emotionalism)，正由於此種情感主義，他們將不可避免地攪亂嚴肅的革命工作。儘管如此，他不得不承認魏特林是舉足輕重的。魏特林的這一概念，即由絕望的人公開向統治階級宣戰，在徹底摧毀現存社會中，他

們沒有任何東西可失去，獲得的將是一切<sup>①</sup>，魏特林那使他痛斥現存社會並使聞者為之感動的個人經歷；他對經濟現實的強調；他為戳穿政治黨派的騙人外衣而作的努力，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在創建一個國際共產主義政黨核心時所取得的實際成就，這一切都給馬克思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以公開的蔑視態度來對待魏特林的具體學說，並不無道理地相信他頭腦不清、歇斯底里，是黨內混亂思想的根源，他把自己的無知暴露無遺，並在可能的各個方面降低了自己的威望。從當時保存下來的一則文件中可以看出在一八四六年布魯塞爾一次會議期間，馬克思要求魏特林敘述他對工人階級的具體建議。當魏特林支支吾吾說到在研究中運用批判是無用的、遠離勞苦大眾時，馬克思當即擊案驚呼，「無知從來無濟於事」，此後聚會迅速結束。從此他們再沒有相會。

他與蒲魯東的關係更為複雜。還在科隆時他就已經讀過使蒲魯東一舉成名的書《財產是什麼？》(What is Property?)，並讚揚了這本書的卓越風格和作者的勇氣。一八四三年，在馬克思看來一切都向他展示出一種革命的星星之火，一切都清楚地、決定性地、公開地表明推翻現存制度是合理的。但是，很快他就相信蒲魯東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就馬克思所宣稱的對黑格爾的崇拜而言，完全不是歷史的，而是道德的解決方法，蒲魯東直接以自己的絕對道德標準來評判是非曲直，根本無視機構和制度的歷史重要性。從這時起，他把蒲魯東視作爲僅僅是另一個法國的市

<sup>①</sup>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祇有依靠一無所有、無家可歸的人，因爲其他人在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必然會停止不前。這一理論對巴枯寧產生過決定性的影響，通過他，形成了無情的革命精英這一概念，並爲我們今天所熟知。——原注。

會道德家，一個自覺或不自覺地捍衛小資產階級——工業社會的犧牲者——的社會理想的人，從而對其個人及其學說再無一絲敬意。

馬克思剛到巴黎的時候，正值蒲魯東處在聲譽的頂峯期。他出身於貝桑松(Besancon)的一個世代農家，本人職業是排字工人。他性格狹隘、固執、無畏、清教徒似的。他是法國中下階級的一個典型代表。該階級在最後推翻波旁王朝的鬥爭中起過積極作用，之後，發現這僅僅是換了主人，而這個由銀行家和大工業家組成的新政府僅僅加快了他們毀滅的速度，儘管聖西門教導他們要對這些銀行家和大工業家寄予厚望。

蒲魯東設想有兩種力量對社會公正和人間博愛是致命的，一是資本積累的趨勢，它導致不斷增長的財富分配不均，另一是與此直接聯繫在一起的趨勢，即公開地把政治權力和經濟控制聯合起來，旨在以自由制度的偽裝、求得專制的富豪統治集團的發展。根據他的理論，國家成了為少數人的利益而剝奪多數人的工具，成了掠奪的合法形式，通過讓富人完全控制社會立法和金融信貸，它系統地剝奪個人對財產的天賦權利，與此同時，小資產階級亦束手待斃了。蒲魯東的那本最有名的書一開始便宣稱一切財產都是行竊，這會使許多人誤以為乃是他的成熟觀點，他早年確實認為一切財產都是盜竊；但後來他又教導說，每一個人必須有最低限度的財產以維護其個人的獨立以及道德和社會的尊嚴：在一個連這種最低限度的財產也喪失的制度下，在這種制度的法律底下，一個人通過商業交易出賣了這種獨立和尊嚴，從而實際上也就是出賣了自己，成為他人的經濟奴隸，這樣的制度就是使偷竊合法、並鼓勵偷竊的制度，偷竊的是個人基本權利，沒有這種權利，人就沒有追求正當目的的任何手段。蒲魯東認為導致這一過程的根本原因，是個人、集團、

社會秩序之間不加限制的經濟競爭，它必然導致最有能力和組織最佳的人，以及最不受道德或社會責任感束縛的人，對社會大多數的統治。這就說明了，在策略上有能力的邪惡力量戰勝理智和正義。但是，對並非決定論者的蒲魯東而言，並沒有任何歷史理由可以說這種形勢應該無限持續下去。競爭，這是前一世紀啓蒙思想家最推崇備至的靈丹妙藥，也被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和理性主義者奉為聖物，是個人能動的理性力量最充分、最豐富的表達，也是個人對盲目的自然力量和他自己桀驁不馴的行爲的勝利。但對蒲魯東來說，競爭是一切罪惡之最，它使人的一切才幹能力扭曲墮落，傾向於非自然地推進一個貪婪的、因而不公正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的利益取決於、乃至於存在於他在能力上超越、戰勝或消滅他人。這種罪惡與盧梭、傅立葉、西斯蒙第早些時候所攻擊的罪惡是同一的，祇不過表達不同，闡述的原因不同。傅立葉繼承了十八世紀的思想和風格，他把他這個時代的災難解釋為通過精心策劃壓制理性的結果，壓制者站在懼怕運用理性的人一邊，就是那些教士、貴族、官吏和富人。蒲魯東沒有接受這種簡單的觀點；他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他這個時代的歷史主義的影響；他不懂德語，但巴枯寧及後來的德國流亡者向他灌輸了黑格爾主義。蒲魯東試圖把這種新的理論套入他自己的學說，把重點放在正義和人權上，這產生的結果，在馬克思看來，似乎是對黑格爾主義的拙劣模仿。

這種方法，即對每一事物都用兩種相對立的概念加以描述，並使任何陳述似乎馬上成爲現實的和自相矛盾的，確實迎合了蒲魯東編造聾人聽聞語句的才能，迎合了他對醒世警語的偏好，也迎合了他對行動、發動、挑動的渴望。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財產是行竊；做一個公民意味着被褫奪權利；資本主義是弱肉強食和少數壓迫多數的專制主義；積累財富是搶劫；廢除財產是削弱



道德基礎。蒲魯東對此開出的藥方，是壓制競爭並代之以「互助」的合作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允許、而且確實是堅持有限的私有財產，但不可積累資本。鑒於競爭激發起人的最低劣，最野蠻的本性，因此，合作除了促進更高的效率，尚可通過揭發社會生活的真正底蘊，而催生人的道德和文明。國家可以被賦予某種中央集權的職能，但它的行動必須嚴格地受制於行業聯合會、職員聯合會、工人聯合會以及消費者和生產者協會，社會便在此之下組織起來。根據非競爭性的「互助」原則把社會組織成單一的、非集權化的經濟統一體，各種自相矛盾現象將得到解決，善者留存，惡者消逝。貧困、失業，以及作為無計劃社會階級失調之結果，人們被迫從事非情願工作所帶來的失望，這一切都將不復存在，人的善的本性將可能得到伸展，因為人的本性中不乏理想主義的東西，但在現存的經濟秩序底下，它祇是徒有虛名，或者在錯誤導向下，成為危險的東西。但是，對蒲魯東來說，乞靈於富人是徒勞的，他們慷慨的天性早已退化。百科全書派、時或還有聖西門和傅立葉所夢寐以求的開明君主，永遠不會降生，因為他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矛盾。祇有這個制度的真正的受害者——小農、小資產階級和城市無產階級，纔可以依靠。惟有他們纔能改變他們自己的狀況，因為他們是社會中數量最多、同時又是最必不可少的人員，所以惟有他們纔有力量改造這個社會。因此，蒲魯東向他們發出呼籲。他告誡工人們不要在政治上組織起來。因為，假使他們模仿統治階級，他們將不可避免地為統治階級所支配。在政治策略上，經驗更豐富的敵人將通過恫嚇、或通過金錢和社會地位的利誘，成功地引誘那些革命領導者中意志較薄弱，或不如那麽機敏能幹的人，從而使運動不攻自潰。無論如何，即使起義者獲勝，他們也將要求控制，從而亦保留了集權政府的政治形式，這就將給他們避之不及的矛盾帶來了新生。因此，工人和小資

產階級必須通過純粹的經濟壓力，努力將他們自己的模式施加給社會其他人身上；這一過程必須是漸進的與和平的。蒲魯東反反覆覆宣稱工人決不可訴諸武力，甚至罷工也不應允許，因為這將侵犯工人自由處置其勞動力的個人權利。

蒲魯東把他的《貧困的哲學》(philosophy of poverty)一書送交給馬克思去評判是不明智的。馬克思在兩天內讀完全書，並宣佈該書既錯謬又膚淺，但寫得頗有吸引力，有着把羣衆引入歧路的足夠雄辯和真誠。多年後，馬克思在一個類似的場合下宣稱，「姑息謬誤等於鼓勵精神墮落」。因為，也許有十個工人會繼續前進，但卻有九十個工人可能會隨蒲魯東駐足不前，仍然處於黑暗之中。馬克思於是決定一勞永逸地摧毀蒲魯東的思想體系及蒲魯東作爲一個嚴肅思想家的聲望。

一八四七年，爲回擊《貧困的哲學》，《哲學的貧困》(Poverty of Philosophy)一書問世。書中含有文藝復興著名論戰以來一名思想家對另一名思想家的最尖刻的攻擊。馬克思在書中不厭其煩地證明蒲魯東根本沒有能力作抽象思維，這是蒲魯東徒勞地企圖以僞假的黑格爾術語加以掩蓋的事實。馬克思指責蒲魯東根本誤解了黑格爾的哲學範疇，將辯證的衝突天真地解釋爲簡單的善與惡之間的鬥爭，這種解釋導致了一種謬誤，以爲所需要的一切便是去除惡，這樣善就將留存下來。這正是極端膚淺之所在了。把辯證衝突的這一面或那一面稱爲善或惡，是一種非歷史的主觀主義表現，和嚴肅的社會分析是不相稱的。對立的兩個方面在人類社會發展中均是不可缺少的。真正的進步並不是由一方勝利另一方失敗所構成的，而是由雙方的衝突鬥爭本身所構成的，它必然涉及雙方的毀滅。祇要蒲魯東繼續對社會鬥爭中這個或那個因素表示同情，那麼，不論他可能認爲自己多麼真誠地相信鬥爭本身的必要性和價值，他仍然是一個無可救藥的唯心主義者，即效力於

按照他的以永恆價值面貌出現的小資產階級意願和選擇來判斷客觀現實——這種永恆價值本身亦是荒謬的——而且絲毫不提階級鬥爭已經達到的演變階段。緊接着，馬克思對蒲魯東的經濟理論大加討伐。馬克思宣稱，他的經濟理論建立在交換機制的錯誤概念之上：蒲魯東誤解李嘉圖程度之嚴重不亞於他對黑格爾的誤解。他把人的勞動決定經濟價值同勞動應該決定價值這兩個命題混為一談。這反過來又導致他完全錯誤地表述貨幣與其他商品的關係，從而表明他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全部描述都是無效的。最猛烈的攻擊指向蒲魯東的個人秘密主義，他對任何集體組織趨勢的公開的憎恨、他對健全的自由農民和其道德倫理的留戀、對私有財產制度不可摧毀的價值所持的信念、對家庭婚姻的神聖性所持的信念、以及他相信這樣的家庭中一家之主對其妻子兒女擁有絕對的倫理上和法律上的權威，這正是他個人生活的基礎，並導致他深深地懼怕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懼怕任何會摧毀小農莊這個基本生活方式的東西，他的祖先便是在那樣的小農莊裡繁衍生長的，他對此亦保持著不可動搖的忠誠，儘管他把革命的詞句喊得震天價響。實際上，馬克思譴責蒲魯東指望醫治現存制度的直接弊端而並不摧毀這個制度本身，因為他像所有他這個階級的法國同胞一樣，從感情上留戀這個制度，馬克思譴責他披着黑格爾主義的外衣，卻不相信歷史的進程既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轉，不相信歷史通過革命的跳躍向前發展，也不相信現存的罪惡本身嚴格地為作為一定階段的歷史之法則所必需，歷史階段終將取代超越這些罪惡。因為，祇有假定這些罪惡乃是偶然的過錯，纔會以為有可能通過大膽的立法加以鏟除，無需涉及摧毀這些罪惡作為其歷史產物的社會形態。在一段神采飛揚的文字中，馬克思這樣寫道，「僅想摧毀這些形態是不夠的，還必須老老實實地知道它們是按照什麼規律形成的，以便知道如何在這些規律的

架構內行動，因為任何違反規律的行動，無論是有意或無意的，盲目地無視原因和性質，都將是徒勞的和自殺的行動，將引起混亂，從而使革命階級遭到失敗，使他們失去士氣和力量，因而將延長現存的痛苦」。這便是他用來反對所有聲稱給工人階級帶來新福音的烏托邦主義者們所作的批判。

馬克思相信蒲魯東在氣質上是無法把握真理的，雖然他擁有無可置疑的論爭天賦，但他根本上是一個蠢人，他無所畏懼，胸襟坦誠，吸引了日益增多的忠實追隨者，這一事實僅僅使他和他的狂熱更具有危害性，因此，馬克思企圖以沉重的一擊，鏟除他的學說和影響。但是他的過度殘忍，卻使人們出於義憤對他的犧牲品產生了同情。蒲魯東的體系並沒有被馬克思的這一次以及後來馬克思主義者的多次殺戮所擊倒，其影響在隨後的歲月中日益擴大。

蒲魯東根本上不是一個有獨創性的思想家。他有着把他這個時代的激進思想加以吸收並使之具體化的天賦：他的文章寫得很好，有時光艷照人，他的雄辯被他為之而寫的大眾看作是天才的表現，源自於他與大眾共同具有的需求和抱負。他最有力地予以捍衛的政治非參與、行業行動和非集權化邦聯主義的傳統，在法國激進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中強有力地保存下來，在個人主義傾向中獲得支持，並在拉丁語國家中表現得極為顯著，那裡，大多數人是小農、手工業者 and 自由業者，遠離大城市的工業生活。蒲魯東主義是現代工團主義的鼻祖。它起先受到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半個世紀之後，受到另一種學說的影響。這種學說認為，由於經濟類型是最根本的，所以，反資本主義力量必須由這樣一些組織所構成，他們的成員並不是由共同的信念——一種純精神的上層建築——所聯繫起來的，而是由他們從事的職業所聯繫起來的，因為職業是決定他們

行動的基本要素。舉行總罷工，暫停所有要害部門的服務，使社會生活瓦解——以運用這種可怕方式進行威脅業已成爲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各地最強大的左翼學說，與此同時在那兒，工聯主義確實也沒有走得太遠，一種農業手工業者的個人主義傳統依然存在。一個運動或一種學說，無論其外部表現形式如何，馬克思總是能毫厘無差地察覺出它的總方向和政治韻味。這一次，馬克思立即看出了這種態度中的個人主義，因而對他說，乃是反動的根基。因此，他激烈攻擊這種思潮，其程度不亞於他對公開宣稱的自由主義的攻擊。《哲學的貧困》一書，如今正像它所攻擊的那些具體觀點一樣，大部份已經過時。但它代表着作者精神發展的一個特定的階段：成爲他把他經濟、社會和政治觀點綜合成統一學說的畢生努力的諸因素之一，這種統一學說可以適用於社會領域的所有方面，並以「歷史唯物論」而著稱。

# 第六章

## 歷史唯物論

有一個好漢一天忽然想到，人們之所以溺死，是因為他們被關於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們從頭腦中拋掉這個觀念，比方說，宣稱它是宗教迷信的觀念，那麼他們就會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險。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鬥爭，統計學給他提供愈來愈多的有關這種幻想的有害後果的證明。這位好漢就是現代德國革命哲學家們的標本。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

（中譯文引自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十六頁。）

（譯注）



馬克思本人從未發表過完整或傳統闡述歷史唯物論的文章。該理論散見於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八年撰寫的早期著作裡。至一八五九年他對此有所闡述，在他後來的思想中歷史唯物論已被肯定下來。與其說他將歷史唯物論看作新的哲學體系，不如說把它視為分析社會和歷史的實際方法，視為政治策略的基礎。他晚年時曾抱怨他的某些追隨者對歷史唯物論的運用，他們似乎以為歷史唯物論可以提供一種代數「表」，祇要給予足夠的事實數據便可以機械地從這張「表」中得出一切歷史問題的自動解答，從而使他們無需花費精力去研究歷史。他在臨終前不久曾給一位和他通信的俄國人寫過一封信。他在信中舉了一個例子證明，儘管羅馬的平民和歐洲工業無產階級有著類似的社會條件，但他們的歷史發展卻是不同的。他還寫道：「當你分別研究這些發展形式，然後對它們加以比較，便可以很容易發現這一現象的線索；但是，如果把某種普遍的歷史哲學理論用作為萬能鑰匙，那是無法達到這點的，這種歷史哲學唯其什麼也不解釋，從而便解釋一切事物，它的最高價值在於它本身是超歷史的。」

這種理論在他腦子裡日臻成熟。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和《論猶太人問題》(On the Jewish Question)兩本書中有可能摸索到它的發展踪跡；在這兩本書中，無產階級第一次被作為注定要按照哲學預示的方向改變社會的使者，然而，由於該理論作為仍然是與行動分離的哲學，因此其本身象徵並表現出無所作為。該理論進一步在《神聖家族》(The Holy Family)一書中得到發展。該書是為反擊「批判之批判」(critical critics)，即青年黑格爾派——主要是鮑威爾兄弟和施蒂納——而爆發的論戰總匯集，中間點綴著有關歷史哲學、文學的社會批評以及其他古怪問題的片段；該理論在另一部著作中獲得了最充分的闡述，該書有



六百多頁篇幅，係由他與恩格斯於一八四六年合著，題為《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但從未發表。這部冗長沉悶、組織得極差的著作，涉及了早已死去並被公正地忘卻的人物和觀點，但在它的長篇導言中，卻包含著馬克思歷史理論中最有生命力、最富想像和最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論述。正如同期寫成的洗練而光彩奪目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Theses on Feuerbach*）和一八四四年的《經濟學和哲學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一樣，都以它們新的方法運用了黑格爾關於異化的概念。《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絕大部份內容也是在著者逝世後數年纔見著於世（《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書於一八八八年出版，另外兩本則是到了本世紀纔發表）。這本書在哲學上比馬克思的所有其他著作都更令人感興趣，代表著他思想上一個湮沒無聞但卻是最關鍵、最有創造力的時期。他的直接追隨者（包括俄國革命的發動者）對此一無所知或完全無視導致祇強調他思想中歷史的和經濟的方面，錯誤理解他思想中社會學和哲學的內容。這一事實造成了明顯地、半實證論半達爾文主義地解釋馬克思思想，我們把這主要歸之於考茨基、普列漢諾夫，以及最重要的，恩格斯——這一傳統已經對以馬克思名字命名的運動的理論和實踐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新理論的架構是不折不扣黑格爾式的。它認定人類歷史是一個單一的、非重複的過程，它所遵循的規律是可以發現的。該過程的每一時刻都是新的，也就是說它擁有新的特徵，或已知諸特徵的新的結合；然而，儘管它是獨特的和不可重複的，它仍然是遵循同樣的規律、緊隨前面狀態而來的，正如這一面面狀態亦從自身的前面狀態而來一樣。然而，按照黑格爾的觀點，在構成歷史的發展狀態中，其單一的本質是永恆的、自我發展的、普遍的「絕對精神」，其諸要素的內部衝

突在譬如宗教衝突或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中得以具體化，其每一項都是自我實現的「絕對觀念」的體現，而理解「絕對觀念」則要求有超驗的直覺。有鑒於此，馬克思追隨費爾巴哈，將它斥為一件任何知識都無法建立於上的神祕之物。因為，倘若世界是這樣一種形而上的本質，那麼，它的行為便不可能由我們能力範圍內唯一可靠的方法，也就是經驗主義的觀察來檢驗；因而，其理論便無法為任何科學的方法所證實。當然，黑格爾學派可以不怕駁斥地按其願望，把任何事物歸之於難以捉摸的世界本質之不可觀察的行為，很像虔誠的基督教徒或唯神論者把此歸之為上帝的行為，但是如此的唯一代價是什麼也不能解釋，是宣佈其答案為正常人的官能所無法接受的神祕境界。祇是把一般的問題如此轉換成難解的語言，纔使由此產生的晦澀看上去像一種唯一正確的答案。以不可知解釋可知，猶如用一隻手拿去另一隻手想要給予的東西。無論這種程序的價值有多高，它也不能與科學解釋相提並論，即不可把它等同於用相對少量相互聯繫的規律，對大量有區別的、表面上互不聯繫的現象所作的解釋。這些就是對正統的黑格爾主義所作的評價。

不過，鮑威爾、盧格、施蒂納、甚至費爾巴哈等「批判」學派的解決方法，大體上也未見得好一點。照馬克思看來，他們在無情地揭露他們的老師的缺陷之後，自己隨即也陷入更為糟糕的錯覺之中：因為，鮑威爾的「自我批判的批判主義精神」(Spirit of self-critiquing criticism)，盧格的「進步人類精神」(progressive human spirit)，以及被施蒂納加上引號的「個體自我」(individual self)和「它的不可剝奪的所有物」(its inalienable possessions)，甚至費爾巴哈所追尋的血肉之軀的人的進化發展，都不過是概括了的抽象。相比之下，正統的黑格爾主義提供的大廈雖然同樣是非實質性的，但更加宏偉，更具有想像力；雖然晦澀難懂，但卻豐富和周全，並且沒有降格

為某種簡單蒼白的抽象。而他們諸位的抽象也一樣空洞，不見得更有能力可訴諸於現象以外的、作為現象之原因的東西。

尋找歷史動力的原則唯一可能的地方，必須是面向科學的，即規範的經驗主義的探究方法。馬克思認為，鑒於要解釋的現象都是那些社會生活的現象，所以，這種解釋在某種意義上必須存在於構成人們生活範圍的社會環境的性質之中，存在於私人 and 公共關係的網絡之中；個人形成了這些關係的範圍，個人又正是這些關係的焦點，是形形色色分流的交匯處，這些分流的總和被黑格爾稱之為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黑格爾的天才之處，在於他看出了歷史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進步，是偶爾要受到挫折抑制——如後來的思想家聖西門及其弟子孔德所指教的那樣——是保證歷史發展不斷向前運動的對立力量之間持續緊張的產物：表面上有規劃的行動和反應是一種錯覺，它是由忽前忽後的衝突趨勢這一事實所引起的，這種表面現象使自身被極其強烈地感受到了。事實上，進步是非連續性的，因為當緊張達到臨界點時，纔促成了變化；緊張的量的增長成為質的變化；在表面底下起作用的對立力量成長、積聚、爆發成公開的鬥爭；它們碰撞後產生的影響，轉化了衝突產生的媒介；正如恩格斯後來所說的，冰成爲水，水成爲蒸氣；奴隸成爲農奴，農奴成爲自由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一切進化都同樣以創造性的革命而告終。在自然界，這些力量是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而在人類社會中，則是明確的經濟和社會力量。

社會衝突是在哪些力量之間產生的？黑格爾假定，在現代世界它們體現在國家(nations)中，國家代表了特定文化之發展，或者是絕對觀念(Idea)或世界精神(World Spirit)的具體體現。馬克思跟在聖西門和傅立葉後面——也許西蒙蒙第的危機理論(theory of crises)對他亦不乏影響

——就此回答道：這些力量主要是社會的和經濟的力量。他於十二年後寫道：「我得出的是這樣的結論：法(Legal)的關係和國家形態一樣，既不能由其本身來理解，也不能由所謂人類思想的一般進步所解釋，它們根植於黑格爾稱之為……市民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對市民社會的剖析將在政治經濟學中得以探索。」衝突總是在由經濟決定的階級之間進行的。一個階級被定義為社會中這樣一羣人，他們的生活是由他們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所決定的，而生產關係則決定那個社會的結構。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是由他在社會生產過程中起的作用所決定的，而社會生產過程又直接取決於生產力的性質和生產力在任何一個特定階段中的發展程度。人們是根據他們與他們社會中的其他成員所結成的經濟關係——不論他們意識到這些關係與否——而行動的。正如聖西門曾經教導的，這些關係中最強大的關係，是建立在生存工具所有之基礎上的：一切需要中最迫切的是生存的需要。

黑格爾的中心概念仍保留在馬克思的思想基礎之中，儘管它已經改換成半經驗主義的詞句。歷史不是一連串對人的外部環境產生的結果，也不是對他們自己不可改變的法規制度產生的結果，甚至也不是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早期的唯物論者所假定的那樣。歷史的本質，是人為實現人的全部潛能而進行的鬥爭；由於人是自然王國的成員（因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超越這個王國），所以為充分實現自己而作的努力，便是力爭逃脫使自己成為乍一看來神祕、專斷和醜惡力量的玩偶，也就是力爭達到主宰這些力量和主宰自身，這就是自由。人對他所處的世界的這種征服，並不是（像亞里斯多德曾設想的）通過人腦的沉思默想而獲得的知識增長而取得的，而是通過行動、通過勞動，通過人對他的環境和塑造和人的相互塑造——願望、思想和行動，或者理論

和實踐這一首要的最為根本的統一方式。勞動在其活動過程中改造了人的世界以及人本身。某些需要比其他需要來得更基本——赤裸裸的生存需要先於更高級的需要。但是，人之不同於動物，在於人擁有發明創造的天賦——儘管人和動物同樣具有肉體的需求。因而人改變了自己的本質和需求，擺脫了動物的周而復始的循環，而後者是不改變的，故無所謂歷史。社會的歷史就是創造性勞動的歷史，它改變人、改變人的需要、習慣和看法，改變人與人以及人與物質自然界的關係。由於這一創造性的勞動，人處於永恆的身體上和技能上的新陳代謝狀態。人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創造性活動之一是勞動分工，它產生於原始社會，並且大大提高了生產力，創造出超過其直接需求的財富。財富積累轉而開闢了休閒的文化的可能性，但從而也開闢了另一種可能：即把財富的積累——這些囤積的生活必需品——用作壓制他人利益的手段，因而欺侮他人，強迫他人為財富積累者而工作，強制他人，剝削他人，從而把人分成不同的階級，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最後這種結果也許是所有的發明、技術進步和隨之而來的物質結果的無意結局中，最有深遠意義的。歷史就是主體的生活之間的交互作用，為獲取自我目標而參與鬥爭的人以及他們活動的結果。這些結果也許是預想的，也許不是；它們對人的影響和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也許可以預料，也許不可以；這些結果可能發生在物質領域或思想和情感領域，或者發生在人的生活上的無意識層次；它們可能僅作用於個人，或者以社會制度或社會運動的形式出現，但要理解和控制這個複雜的網絡，祇有抓住決定這一過程之方向的主要動因。黑格爾首次以如此透徹，如此深邃的方式看到了這個問題。他在絕對精神中發現了它。絕對精神追求的是在制度民俗習慣中理解自身，無論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正是絕對精神本身在意識的不同層次上創造了它們。馬克思接受了這種宇宙體

系，但他指責黑格爾及其門徒給予起作用的最高力量以一種神祕的解釋——這種神話本身就是人格體現的外化過程的非預想結果之一——即賦予事實上是人類勞動之產物以獨立的、外在的物體或力量的外表。黑格爾曾講述過客觀精神(Objective spirit)的前進。馬克思把主要因素等同於尋求可以把握的人類目的的人——沒有像快樂、知識、安全、或死亡後獲得拯救這樣單一的目標，而是根據理性的原則，和諧地實現人的一切能力。在這一追求的過程中，人改造了自身，這樣，決定一羣人或一代人或一個文明的行為，並向竭力理解它的其他人解釋這些行為的範疇和價值本身在其部份實現並且必然地部份受挫的過程中，改變了後人的範疇和價值。這種不斷的自我改造，是一切工作和創造的核心，它使固定的無時間變化的原則的概念、不變的普遍目的的概念，和永恒的人類範疇的概念，成為荒謬絕倫。依馬克思的觀點，他所研究的時代特徵是由階級鬥爭的現象所決定的；個人以及社會的行為和觀念完全是由這個因素決定的；這是有關文化的主要歷史真理，文化取決於積累，取決於為控制這種積累而展開的鬥爭，進行鬥爭的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力圖實現自己的力量，其方式常常是無效的或自我毀滅的。但正因為這是一種歷史的範疇，所以它不是永恆的，過去它曾經是不同的，以後也不會永遠持續下去。它正臨近毀滅的徵兆，也確實很顯著地為明眼人所見到。人類歷史中惟一恆久的因素就是人本身，這祇有在並非人類選擇的鬥爭的範疇裡纔是可以理解的，這鬥爭乃是人類本質的一部份（這是馬克思的形而上時刻），即主宰自然並以構成內在和外在和諧的理性方式去組織生產能力的鬥爭。馬克思的宇宙觀中的內容，好似宇宙愛之於但丁(Dante)——是宇宙之愛造就了人之所以為人和人際關係，假如他們誕生於其中的這個外部世界的諸因素相對不變的話；宇宙愛被勞動分工和階級戰爭所扭曲，導致墮落、非人

化、人際關係反常和為維持這種秩序並掩蓋真實事態而產生的自覺和不自覺的錯覺。理解了這一點後，具體地表達這種理解的行動由此產生，勞動，不是分裂人和奴役人，而是團結他們、解放他們，使人的創造力以人性的完整和自由的惟一形式得到充分的表達，在共同的、可被理性所理解和接受的活動中，作出共同的努力和社會合作。然而，馬克思對其體系中所有概念的最精髓部份，卻一直難以理解的不確定：有時他把勞動等同於自由的創造，後者乃是不受阻礙的人性的最充分表達，幸福和解放的本質，人的內部和人與人之間完美無缺的理性和諧。其他時候，他卻又把勞動和休閒對立起來；並且許諾隨著階級戰爭的被根除，勞動將降低到最低點，但不是完全消除；它將不再是被剝削的奴隸的勞動，而是自由人根據自己制定的並自由採納的規則，建設他們自己的社會化生活的勞動，但他在《資本論》第三卷結尾處告訴我們，某些勞動的形式將仍然是「必然王國」(the realm of necessity)。真正的「自由王國」(realm of freedom)始於這條界線之外，但是，勞動仍然祇有在「作為其基礎的必然王國」(the realm of necessity as its base)之上纔能繁榮發展。這種最低限度的勞動需要，是物質世界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僅有烏托邦主義纔指望擺脫它。這些觀點最終並沒有協調一致。前一個預言可能受到傅立葉完全實現之夢想的啓示，後一個預言則遠較清醒，兩者之間明顯的互不相容，是引起關於「青年」馬克思和「成熟的」馬克思之間關係的爭論根源之一。同樣的模稜兩可亦影響他對進化決定論和自由選擇的自由意志信念的結合；兩者在他的思想中都存在，一種「辯證的」矛盾一直困擾著他的追隨者，並使他們分裂，尤其在東歐，決定性地影響了他們的革命實踐。

費爾巴哈曾正確地看到了人是有飯吃然後纔思維的。要充分地保證滿足這種需要，唯有通過

掌握物質生產的手段，即掌握人的力量和技能、自然資源、土地和水、工具、機器、奴隸。這些東西一開始自然是缺乏的，因此，誰擁有它們，誰就能夠支配不擁有這些東西的人的生命和活動——直到他們也失去這些，這要歸之於他們的臣民們，後者在勞作中愈益強大和狡猾，從而推翻他們並奴役他們，祇不過在以後輪到他們時再被推翻、被剝奪。數不勝數的制度，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被創造出來，爲了保持現存的所有者手中之所有，這不完全是一種蓄意的政策，而是無意識地產生於一定社會之統治者一般的生活態度。但是，黑格爾曾假設賦予一定社會以具體性質的是它的國家性質，國家（在整個文明的廣義上）對黑格爾來說是世界精神發展的一定階段的體現，而對馬克思來說，支配該社會的是經濟關係體系，在達到這一立場的十年後，他在一段著名的文章中如此概括這一觀點：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祇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



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

「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祇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祇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祇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纔會產生。」（中譯文引自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上冊第八十二至八十三頁，原英語譯文係作者引自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39》，英譯者 T. B. Bottomore，略經作者修改，參見《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倫敦一九五六年版，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頁——譯注。）

資產階級社會是這些對抗形式的最後一種。它消亡以後，衝突就將永遠消失了。前歷史階段將終結，自由人的歷史終於將開始了。

一類人有別於另一類人，一套社會建制和信念對立於另一套社會建制和信念，其唯一的起因，至此時馬克思已確信是它由以構成的經濟環境，是由占有者構成的統治階級與被他們剝削的人所結成的關係，它產生於他們之間始終存在的緊張狀態。他相信，人們生活中行動的原動力（儘管為他們所大力否認），乃是他們在經濟鬥爭中所結成的階級組合所產生的相互關係：該因素便是他們實際的社會地位——無論他們是在統治階級之內還是之外，無論他們的幸福是否取決於統治

階級的成功還是失敗，無論繼續維持現存的制度對他們所處的地位是否必要——任何瞭解該因素的人都能夠成功地預測人們行爲的基本軌迹。一旦瞭解了這點，人們各自特有的個人動機和情感對研究來說，便相對地成爲無關緊要了。他們可以自私或利他，慷慨大方或卑鄙小器，聰明或愚笨，雄心勃勃或安份守己。他們的自然品性將受制於他們的環境而按照設定的方向發展，不管他們的自然傾向如何。其實，「自然傾向」(natural tendency)或某種不變的「人性」(human nature)的說法本身，是誤導的傾向，也許可以根據人們產生的主觀感受（這對科學預測目的無關重要），或根據人們的由社會條件決定的實際目的，加以區分。人們總是先行動，然後纔思考他們的行爲合理或正當與否。一個社會共同體中的絕大多數成員，都會以相似的方式行事，無論他們自己以爲他們行事時的主觀動機是什麼。而下述事實卻使這一點顯得模糊不清了，即人們竭力使自己相信他們的行爲是由理性或道德或宗教信仰所決定的，總是煞費苦心地賦予他們的行爲以理性化：這些理性化的作用在影響行爲時也不是完全無能爲力的，因爲當它們成長爲如道德規範或宗教組織那樣的巨大制度、風俗規範時，常常在造成它們產生的社會壓力消失之後，仍然延續很久。因此，這些已經構成的巨大錯覺本身，成爲客觀社會形勢的一部份，成爲限定個人行爲的外部世界的一部份，其功用與不變的因素、氣候、土壤、自然有機體在它們與社會制度發生相互作用時的功用是一樣的。

馬克思的直接繼承人都會傾向於縮小黑格爾對馬克思的影響；然而，如果力圖把他表述爲像他自己設想的那樣的一個冷峻的、嚴格根據事實出發的社會科學家，抽去或削弱他賴以思考的那個統一的、不可或缺的巨大模式，那麼他對這個世界所描畫的圖景便崩潰了，提供的祇是孤立的

見解。

馬克思像黑格爾一樣，把歷史處理成一種現象學(Phenomenology)。在黑格爾那裡，人類絕對精神的現象學，常以巨大的洞察力和獨創性，致力於揭示人類意識發展中心以及具體體現人類意識的一系列文明中的客觀過程。黑格爾受到文藝復興時一個傑出概念的影響，但卻回溯到較早期的神祕的宇宙起源學說。他認為人類的發展與單一的人的發展極為相似。正像一個人一樣，非到其他能力首先得到發展時，他對付現實的具體能力、觀念或方法就不可能形成——這的確是一個人的成長或教育概念的本質——因此，種族、國家、教會、文化，均以一種固定的秩序交替出現，都為表現在整個藝術、科學、文明中的人類集體能力的發展所決定。當帕斯卡(Pascal)說到人類猶如單一的、以世紀計年歲的、一代一代向前發展的個體的時候，他也許已經有幾分道出了這層意思。在黑格爾看來，一切變化都歸之於辯證的運動，它通過不斷的邏輯批判來進行，即對已經體現了通過人類精神的不斷發展(黑格爾稱之為邏輯上的自我實現)而達到該時代之頂點的思想方式和情理構造進行鬥爭，以及最後的自我毀滅；然而，由於它們體現在社會規範或社會制度中，並被一個特定的社會或社會觀念誤作為終極的和絕對的，從而成為進步發展的阻礙，成為邏輯上被「超越」階段的即將死亡的殘存者，通過它們的極端片面性，它們滋生出邏輯上的悖理和矛盾，根據這些悖理和矛盾，它們將被暴露和消滅。馬克思把這種視歷史為具體觀念之戰場的觀點引入社會領域，視歷史為階級鬥爭的戰場。依他看來，異化(跟在黑格爾、盧梭和路德以及較早的基督教義後面，稱異化為人類永恒地自我分離於與自然的統一、與人際間的統一、與上帝的統一，這是正反兩方面鬥爭所必需的)是社會進程中所固有的，它的確是歷史本身的核心。

當人們行爲的結果與他們的真正目的相矛盾，當他們的官方價值觀或他們發揮的作用歪曲了他們的真實動機、需要和目標，異化便產生了。例如，以下這個例子就是這樣的：當人們爲滿足人的需要而做了某件事物——譬如，一套法律體系或作曲規則——這件事物便獲得了一個自身獨立的地位，而被人們看成並非是他們創造出來滿足一種共同的社會需要的（這種需要也許早已消失了），而是一種客觀的法則或制度，有著其自身權利上的永恆的、非人化的權威，恰似科學家和普通人眼中不可改變的自然法則或某個信徒眼中的上帝及其旨意。依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制度正是這樣一種實體，因可以理解的物質需要而產生的龐大工具，是它所處時代中改善生活、拓寬生活的進步力量，產生了它自身的精神、道德、宗教信仰、價值和生活方式。無論擁有它們的人是否知曉，這類信仰和價值正是支持了其利益爲資本主義制度所體現的那個階級的權力；然而，它們卻被全社會看作爲客觀的，對全人類都是永遠有效的。因此，舉例說，大工業和資本主義的交換方式並不是永遠合理的制度，它們產生於農民和手工業者對受制於盲目的自然力量愈益劇烈的抗拒。它們已經發揚光大過了；隨著它們的改變或消亡，它們所產生的價值也將改變或消亡。

生產是一種社會活動。任何一種形式的合作勞動或分工，無論它的起因是什麼，無不創造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利益，不可僅僅作爲參與者的個人目的或利益加以分析。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如果一個社會的全部社會勞動產品被這個社會的一部份人盜用以使自己專享其利，作爲一個不可抗拒的歷史發展的結果，這是恩格斯比馬克思更清晰（而且也更機械）地試圖說明的，那麼，這便是違反了人的「自然」需求，違反了其本質乃社會的人爲了自由和充分發展而提出的要求。按照馬克思的看法，那些積聚生產方式的人，從而也積聚著以資本形式出現的它的成果的人，

強行剝奪絕大多數生產者——工人——所創造的東西，因而把社會分成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這些階級的利益是相對抗的；各階級的利害得失，取決於它在一場連續不斷的戰爭中制伏對手的能力，這個社會的所有制度、法律、道德風尚，全決定於這場戰爭。在這場鬥爭的過程中，技術發展了。以階級劃分的社會的文化，變得更為複雜、社會產品更加豐富、社會的物質進步滋生的需求更為多樣、更人為化了，也就是更不「自然」了。其所以不自然，是因為參戰的各階級都「異化」了，衝突取代了出於共同目的的合作，衝突背離了統一的共同生活和創造，根據這種理論，這種創造是人的社會性質所規定的。一羣特殊的人對生產方式的壟斷，使得這羣人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其他人，並迫使他們去做背離他們自己需要的事情。因此，社會統一被破壞了，兩個階級的生活皆被扭曲。大多數人——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根據這種理論）如今為別人的利益而幹活：他們勞動的果實以及勞動的手段被奪去；他們的生存方式、他們的觀念和理想，不和他們自己真正的危境相呼應——作為人，卻被人為地剝奪他們的自然特性所要求的生活（即作為一個統一社會的成員，能夠瞭解他們之所以如此幹的理由，能夠享有他們自己統一的生活、自由的、理性活動產生的果實）——卻和他們的壓迫者的目的相呼應。這樣，他們的生活便構築在一個謊言上。他們的主人，無論自覺或不自覺的，忍不住要企圖證明他們自己的寄生生活是自然的，合乎要求的。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產生出觀念、價值、法律、生活習慣、機構制度（馬克思有時把這一混合體稱為「意識形態」），其全部目的在於支持、開脫、捍衛他們自己享有特權的、非自然的、故而也是不合理的地位和權力。這些意識形態有國家的、宗教的、經濟的等等，乃是集體的自我欺騙的形態；統治階級的犧牲品——無產階級和農民——卻把它們當作正規教育的一部份，當作這個

不自然社會一般觀念的一部分，囫圇吞下，因而視其為客觀的、公正的和必要的，是偽科學隨之創造出來用以解釋自然秩序的一部份，予以接納。正如盧梭曾教導的，這導致了進一步加深人類的錯誤、衝突和失望的作用。

異化的癥結在於，最高權威或者被歸之於某種非人的力量，譬如說供求規律，（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即是從這兒作為邏輯推導得以表述的）；或者被歸之於想像中的人或力量——神仙、教會、神祕人物如國王或主教，或其他壓迫人的神話的偽裝形式。人們既經從生活的「自然」方式中分離（就這種方式便使全部社會成員有可能認識真理，生活和諧），祇有靠著這些東西竭力尋求對他們的非自然的狀況作出解釋。如果人們確實想要解放自己，就必須教導他們看透這些神話。在馬克思的仇敵名單中最具壓迫性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它把商品或貨幣的運動，也就是生產、消費和分配的過程，表述為一種類似自然過程的非人過程，一種不可更改的客觀力量的模式，人在它面前祇能俯首貼耳，試圖抵抗它乃是發狂。然而，作為一個決定論者，馬克思決心向人們證明，任何把既定的經濟或社會結構的概念作為一種無可改變的世界秩序的一部份，乃是由於人「異化」於自然的生活方式而產生的錯覺，是一種典型的「神秘玄虛化」，把純粹是人活動的結果偽裝成自然的法則。要消除（「揭開」）它，也祇有依靠別的同樣也是人的活動，運用「非神秘玄化」的理性和科學。但這還不夠，祇要產生這種錯覺的生產關係，（即社會和經濟結構依然存在），這種錯覺必定會持續下去；惟有運用革命這一武器纔能改變之。這些解放活動本身是由客觀規律所決定的，但客觀規律所決定的，是人的思想和意志的活動（特別是大眾的思想和意志），而不僅僅是物質實體的活動，它們依照的是它們自己的不可抗拒的方式，這些方式是不以人們的決定和行動為

轉移的。如馬克思所相信的那樣，假如人的選擇可以影響事件的進程，那麼，即使這些選擇本身是決定了的，可以被科學預測的，情況仍然是，黑格爾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是自由的乃是合理的，因為這種選擇不同於自然中的其他事物，不是機械地被決定了的。

歷史的規律不是機械的：歷史是由人創造的，即使不是憑空捏造的；但歷史是由人所身處的社會環境為條件的。照馬克思的看法，這些規律與人（無論是個別的還是集體的）的自由的關係是什麼呢？很清楚，他把社會進步等同於自由之進步性的征服，他的社會進步概念就在於以自覺的、統一行動的、合理計劃的，因而是和諧的社會活動愈益控制大自然，「達爾文寫到了自由競爭、生存鬥爭（這是被經濟學家奉為歷史的最高成就），他揭示了它們乃是動物王國的正常狀態，此時他並不知道這對人類，特別是對他的同胞們是何等辛辣的諷刺。惟有自覺地組織社會生產，生產和分配在其中得以有計劃地進行，纔能使人類社會高於動物王國，正如在某些方面，一般的生產對人來說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或者還有，「人的社會化，以往會是自然和歷史加於他們的一個事實，到時將由他們自己的自由行動來獲取……這將是人類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什麼樣的自由？馬克思一般把社會發展說成爲一個客觀的過程。在《資本論》的導言中，經濟形態的交替被描述爲「自然歷史的一個過程」。一八七三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的跋文中引用了一段一名俄國人對第一版的評語：「馬克思把社會運動看作是自然歷史的一個過程，制約社會運動的規律不以人們的意志、意識和意願為轉移，相反，是社會運動決定人們的意志、意識和意願。」馬克思宣佈這段話正確地解釋了他的目的，即發現制約社會發展的規律。

正是諸如這樣的一些論述，纔激發出馬克思對關於人類歷史的概念和決定人類歷史之規律的

概念，作出嚴格的決定論闡述，（連同「鐵一般的必要性」）。這種歷史進程至多可以放慢或加快，但是「即使當一個社會已經摸到了支配這個運動的自然規律，它仍然既不能跳過它發展的自然階段，也不能令其消除」。它祇能「縮短……新生的陣痛」。這就是爲什麼「工業上較發達的國家給欠發達的國家指出的恰恰是後者的未來圖景」。很清楚，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說的話就是這個意思，他說馬克思的偉大成就在於他發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即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發展的矛盾，導致不可更改的經濟關係系列，是經濟關係決定了集體生活的政治、經濟以及所有各個方面。不過，人「自由發展」的概念——在人類互相聯繫的狀態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共產黨宣言》）——仍然不是一個淺顯易懂的概念。假如人本身祇是客觀條件的產物，並且這些客觀條件不但是經濟上的，而且是環境上的——地理的、氣候的、生物的、生理的等等——（根據馬克思通過《資本論》旨在進行的研究中已經意識到的規律），這些力量不單單作用「於」他們，而且是「通過」他們起作用，再假如運用這一知識至多祇能「縮短……無階級社會前已經有的誕生的陣痛」，但運用這一知識本身並無法改變這一過程，那麼，人的自由的概念（無論在其社會方面抑或個人方面），顯然都還有待解釋。一種說法是除非人們懂得支配他們的規律，否則他們將違背規律，成爲他們所不知道的力量犧牲品；另一種說法是，人的一切所作所爲均服從於這些規律，自由僅僅是認識這些規律的必然性，自由本身亦是不可改變的過程中的一個因素，在這種過程中，人的選擇——無論是個人的或是社會的——服從於完全決定這種選擇的原因，從原則上講，選擇是可以被一個對情況有足夠瞭解的外部觀察者預測的。這兩種說法並不是一回事。馬克思本人的話可以在此引用來支持這兩種不同的說法。致力於闡述這兩種顯然



自相矛盾的觀點，無論其目的是使之對立或使之融合，這本身已經產生出大量的、並不斷增長的著作文章，尤其是在我們的時代裡。

由於資本主義的歷史作用及其和一個特殊階級的利益的關係還不為人們所了解，所以它並沒有豐富、而是踐踏和扭曲了數以百萬計工人的生活，而且還踐踏和扭曲了壓迫他們的人的生活，正如一切沒有被合理把握的東西那樣，資本主義因而被盲目地奉為主臬。例如，金錢在使人類擺脫以物換物的過程中曾發揮過進步的解放作用，但如今已成了為金錢而金錢的追求和崇拜的絕對目標，摧殘和毀滅把它發明出來旨在求得自身解放的人類。人分離於自己含辛茹苦製造出來的產品，分離於他們用以進行生產的工具：它們獲得了自身的生命和地位，在保存和改善它們的名義下，活生生的人卻被當作牲口和買賣的商品對待，受到壓迫。這對一切制度、教會、經濟體系、政權形式、道德規範都是真實的，它們系統地（在階級鬥爭的一定階段，也是必然地）遭到誤解，變得比它們的發明者更強大，成為龐然怪物，受到它們的製造者崇拜——那些盲目的不幸的作孽自斃者，其生活被它們所阻撓和扭曲。同時僅僅看透或批判這一困境，在青年黑格爾派看來是足夠了，卻並不會消滅它。要產生實際效力，用以戰鬥的武器，（包括觀念在內），就必須是響應歷史形勢之要求的武器，既不是在以前階段起過作用的，亦不是歷史進程尚未要求的。人們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必須是弄清楚目前處於階級鬥爭——辯證法運動的結果——的什麼階段，然後纔採取相應的行動。這並不是沒有時間概念的，或理想主義的，或「抽象的」，而是「具體的」。異化——這乃是以沒有生命的物體或觀念之間的想像關係或對它們的崇拜，來代替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關係或對人的尊崇——惟有在最後一個階段，即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時，纔告終結。到那時，

由這個勝利所產生出來的思想觀念，將自動地體現並有利於一個無階級社會——即全人類。一切制度或思想觀念，要是它們存在的基礎是竄改人類任何方面的本質，從而導致產生或體現出它們的對立面，那麼它們都將不復存在。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力被任意買賣，工人僅被當作勞動的來源。這個制度根本歪曲了關於人究竟是什麼、以及能夠是什麼的真理，它企圖使歷史依附於一個階級的利益，從而必將被其憤怒的犧牲者所積蓄的力量推翻，後者正是該制度本身的勝利所帶來的產物。對馬克思來說，一切挫折失望都產生於異化，即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所創造的隔閡和扭曲，它們把人的此部份或彼部份排除於人的本質所渴望的相互之間的和諧合作之外。

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一書中，新黑格爾派的主張都被一一檢驗，並且有功必「賞」。鮑威爾三兄弟（布魯諾、艾德加和艾克貝爾特），在這本書中，像在那本已出版的但鮮為世人所讀的《神聖家族》中一樣，受到簡單而粗暴的對待。他們被形容為兜售形而上學破爛的下流商販，相信祇要有一批在超越於芸芸衆生的思想天賦下成長起來的、愛挑別的批判精英，這本身就將實現把人類中值得解放的那部份人解放出來。這種信奉冷然脫離於社會和經濟鬥爭而達到改造社會力量的信念，被看作是學院主義的發狂，是鴛鳥式的制度，它終將像它所屬的那個世界一樣，被不久肯定就要到來的真正的革命所擯除。施蒂納(Stirner)遭到了更多的攻擊。他在「聖麥克斯」(St. Max)標題下，經受了七百頁篇幅的粗劣取笑和侮辱。施蒂納相信，一切綱領、理想、理論，以及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秩序，構成了如此之多的思想和精神的人為監獄，是抑制人的意願的手段，令人看不到自己的無限創造力量，因而他相信一切制度都必須被摧毀，並非因為它們是邪惡的，而是因為它們是制度，屈從於它們就是盲目崇拜的新形式；祇有完成了這個目標，人類纔可能從

他的非自然的枷鎖中得到解脫，真正成爲自己的主人，並獲得他自己那作爲人的完整形象。這種學說會對尼采，（可能還有巴枯寧），發生過很大的影響（也許因爲它過於準確地走在馬克思自己的異化經濟理論的前面）。它被處理成一種病理現象，是遭虐待的神經病患者的一聲極痛苦的叫喊，屬於醫界而非政治理論界處理的問題。

對費爾巴哈的處理比較客氣。他被認爲寫得比較冷靜，作出了誠實的（即使是粗糙的）努力，以剖析唯心論的神秘化。馬克思在同時期寫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十一篇文章中宣佈：從前的唯物論思想家正確地看到了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但他們沒有進一步看到環境本身亦爲人的活動所改變，而教育者本身也是時代的產兒。這種學說（馬克思這裡主要指歐文的學說）人爲地將社會分成兩部份：毫無希望地處於各種影響之下的大衆，他們必須被解放；以及因某種原因竟然作到使自己免受環境影響的導師。但是心(mind)和物(matter)的關係、人和自然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否則，歷史學就會降格爲物理學。費爾巴哈受到讚揚，是由於他揭示出：人在宗教中通過發明一個幻想世界來欺騙自己，以求得平衡現實生活中的苦難——這是一種逃避方式、一個美夢，或以馬克思的名言來說，是人民的鴉片，因此對宗教的批判肯定在本質上是人類學的，形式上必須是揭示和分析它的世俗起源。但費爾巴哈因爲沒有觸及到這個主要的任務而受譴責；他看到了宗教是不幸的人不自覺地製作出來的一服鎮痛劑，爲了緩解由物質世界的矛盾所引起的痛苦，但他卻沒有看到在此情況下，這些矛盾必須被消除，不然它們仍將繼續滋生麻痺和宿命的幻覺：完成此項任務惟有革命，它必須發生在物質基礎中，即人和物質的真實世界中，而不是發生在上層建築，即思想的世界裡。迄至那時爲止的哲學認爲，觀念和信念擁有它們本身的固有合理

性；這決不是正確的。信念的真實內容是體現信念的行動。人或社會的真正信念和原則不是體現在話語裡，而是體現在行為中的。信念和行為是同一的；如果行為沒有表達信念，這種信念就是謊言——「意識型態」，自覺或不自覺地掩蓋着它們所承認的東西的對立面。理論和實踐是，（而且必須是），一體的和同一的。「哲學家以前提供了對世界的各種各樣的解釋，我們的事業則是改變世界。」

所謂「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格律恩和赫斯，遭遇更壞。毫無疑問他們寫到了實際情形，但他們把思想觀念的重要性排列在實際利益的前面。他們兩人都遠遠沒有達到關於事實的清楚觀念。他們正確地相信，政治不平等和他們這代人在情感上的一般病徵，都可以追溯到經濟矛盾，這些矛盾祇有在徹底廢除私有制之後纔能消除。但他們還相信，使上述情況成爲可能的科技進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相信惟有訴諸道德觀念的行動纔是合理的；也相信使用武力，無論其目的多麼崇高，都玷污了它的目的，因爲它使鬥爭的雙方都殘忍無情，並在鬥爭結束時，使雙方都無法獲得真正的自由。人的解放，必須僅僅以和平和文明的方式進行，盡可能迅速地、無痛苦地實現，在工業化尚未擴散到使一場血腥的階級戰爭成爲不可避免以前實現。確實，除非做到這一點，否則剩下的祇有暴力一條路了，而暴力最終自身亦將失敗；因爲，一旦社會是由劍創立起來的，即使正義最初站在它這一邊，它仍然不會不發展成勝利的階級對其他人的暴政——縱然是工人的暴政——這將與真正的社會主義力圖創造的人類平等背道而馳。「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反對以公開的階級鬥爭爲必然性的學說，其理由是：這種學說使工人們看不清他們爲之而戰鬥的權利和理想。祇有從一開始就平等待人，把他們當作人類一員，也就是擯棄武力，訴諸於人類的團結一致、平

等正義和寬宏情懷，纔能獲得持久的利益和諧。一言以蔽之，無產階級的包袱切不可通過轉至某個其他階級肩而上而得以消除。他們堅持認為，馬克思及其他的黨，僅僅旨在改變現存階級各自的角色，剝奪資產階級的權力祇不過爲了毀棄和奴役它。但是，除了道德上不可接受外，這樣做還將使階級鬥爭依然存在，因而就不能以惟一有效的方式，即通過把相互衝突的利益溶化爲一個共同的理想，從而調和現存的矛盾。

馬克思將此視作愚蠢至極或異想天開。他不耐煩地指出道，他們的整個論點基於這個前提：所有人，甚至資本家，都服從於某一理性的觀點，在適當的條件下，出於道德的原則，會自願放棄他們通過出生或財產或能力取得的權力，以便創造一個更公正的世界。依馬克思的看法，這是一切理性主義者諺論中最古老、最熟悉、最陳腐的一個。他早已在他父親和那一代人的信仰中領教過這種諺論的最惡劣的形式，以爲理性和道德之善最終必將勝利，這種理論被法國大革命黑暗結局中的事件，批駁得威信喪失殆盡。現在宣揚它，猶如一個人仍然生活在十八世紀，乃是有罪的，罪在要麼是愚蠢至極，要麼是怯懦地躲進純粹的詞藻、或者係明知故犯的烏托邦主義，而所需要的卻是對實際形勢作科學考察。馬克思又小心翼翼地指出，他自己沒有滑入相反的錯誤：他不是簡單地同關於人性的這種論點相對立，沒有說鑒於這些理論家假定人從根本上講是寬容的、公正的，而他發現人是貪婪的、自私的、不會做無利可圖的事情。不然就會得出一種與他的對立者一樣主觀、一樣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臆斷。這兩種結論均蒙上了以下這種諺誤，即人的行動最終決定於他們的道德特徵，這種特徵可以相對脫離於他們的環境予以解釋。馬克思即使不堅持黑格爾的結論，但仍忠實於他的方法，認爲人的目的之形成，在於他事實上所處的社會的、也就是經

濟的狀況——無論他知道這點與否。無論一個人的觀點主張如何，他的行動卻不可避免地為他的真實利益和物質條件的需要所引導。無論如何，絕大多數人的有意識目標，和他們真正的利益是不相抵觸的，也就是和他們所屬的階級利益是不相抵觸的，儘管這些目標有時候以如此眾多獨立、客觀，和利益無關的目標的偽裝面目出現，有政治的、道德的、美學的、情感的，諸如此類。大多數個人甚至對自己都如此有效地隱瞞了他們是依賴於環境和形勢的，特別是依賴於他們的階級屬性，以致他們極真誠地相信，心靈的改變可以導致生活方式的急劇改變。這是現代思想家所犯的最嚴重的錯誤。它部份地起源於基督新教的個人主義——作為日益發展的自由貿易和生產的「意識型態」的副本，它教人相信個人手中掌握着使自己幸福的手段；有足夠的信念和能力可獲得幸福；每一個人自身都有獲取精神和物質福祉的力量；至於他的軟弱和不幸，最終他祇能責怪自己。馬克思根本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始終認為行動的自由——人可以選擇的可能性範圍，是由他在社會地圖上佔據的實際位置決定的。一切正確和錯誤、正義和非正義、利人和利己的觀念，都是離開中心的主題要義的，祇是涉及思想狀態而已，其本身是完全真實的，同時又祇不過是觀念持有者的實際狀況的映像。祇有行動——特別是某一羣體的客觀行為，無論其成員的主觀動機是什麼——纔是決定性的。有時，當一個患者本人通曉醫學，他便可以頗為精確地診斷自己的身體狀況；這便是就社會科學家而言的真正見識意義之所在。但較常見的是症狀佔據着患者的整個注意力，作為惟一真實的現實。而在這裡，由於症狀乃是心理 (mental) 狀態，因此，正是它滋育了否則就會不可理解的謬誤，即現實在本質上是心理的或精神的，或者歷史可以由不受束縛的人的意志作出的孤立決定所改變。原則和動機除非結合於引起行動的真正利益，否則就是些空洞的詞語

而已；以它們的名義引導人們的行動，猶如給予他們以虛無縹緲之物，把他們引入這樣一種境地，即因無法領悟真實狀況而陷入混亂和毀滅。

欲改變這個世界，首先必須懂得與之打交道的物質世界。資產階級不想改變這個世界，希望保持現狀，他們按照這樣一些概念行動和思想，其本身由於是一定發展階段的產物，無論它們偽裝得如何，都是作為暫時的保持現狀之工具在起作用。而無產階級，改變世界是他們的利益所在，卻盲目地接受中產階級思想的全部思想工具，它產生於中產階級的需要和社會條件。儘管兩個階級存在着懸殊的利益分歧。如果正義或自由的語言出自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之口，那麼多少表述了某種確定的含義，即他對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與其他社會階級成員的實際或期望的關係的態度——無論它有多麼騙人。但是當「異化」了的無產階級也重述這些語言，它們就成了空話，因為這些語言並不能真實描述他們的生活，祇是暴露了他們思想的混亂狀態，顯示了語言的催眠力所產生的後果，通過把問題搞亂，它們不僅不促進，而且阻礙並有時渙散了無產階級行動的力量。因此，互助主義者(Mutualists)、「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神秘的無政府主義者，無論其動機多麼純潔，仍是無產階級的敵人，甚至比資產階級更危險。因為資產階級至少是一個公開的敵人，工人能學會不相信他們的言行。而其他這些人，他們聲稱與工人團結一致，並斷定始終存在着如此這般的人類普遍利益，對一切人都是共同的，即人有着獨立於或超乎階級屬性的利益，這樣，他們便是在無產階級營壘內部散播謬論，宣揚無知，從而削弱無產階級在即將興起的鬥爭中的力量。必須使工人懂得，現代工業制度就像它以前的封建制度以及任何其他制度一樣，是階級統治制度，祇要統治階級為了自己作為一個階級繼續延續而需要這種制度，它就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

配方式所決定的鐵的專制，沒有任何人可以逃脫，不管他是主人抑或奴隸。祇要為控制生產方式的鬥爭還將繼續，一切人類自由——屆時人們可以發展他們的天賦使之達到最充分程度，自願地生活和創造，不依賴他人，自由地想其所想，為其所欲為——這樣的夢幻就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烏托邦。嚴格地說，這已經不是一場為爭取生存方式的鬥爭，因為現代發明和發現已經消滅了匱乏，如今這是一種人為的匱乏，它正是由為獲得新工具而進行的鬥爭本身造成的，這一過程必然導致在社會天平的一端產生壟斷而帶來權力集中，在另一端則是赤貧和墮落，日盛一日。就是以經濟分類的人之間進行的戰爭，使人們互相分離，使他們看不清他們社會狀況的真相，令他們做他們不敢有疑問的習俗和戒律的奴隸，而這些習俗和戒律在歷史的解釋面前不堪一擊；惟獨祇有一種藥方——階級鬥爭的消失——纔能達到消除這條日益擴大的鴻溝。但是，一個階級的本質就是與其他階級競爭，因此達到上述目標不是通過創造階級的平等——一種烏托邦的概念——而是通過完全徹底地廢除階級本身。

依馬克思看來，人有着潛在的智慧和創造性，是自由的，在這一點上，他毫不遜於以前的理性主義者。倘若人的本質已經頹化得不可辨認，其根源蓋在於這場漫長而血腥的戰爭。自社會不再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以來，（按當代人類學家的說法，社會是由原始共產主義中發展而來的），人類就一直生活在這場戰爭中。直到共產主義狀態再次達到之前，和平和自由是無法獲得的，但這種狀態包含了人類在荒漠遨遊徘徊的過程中，贏得的所有技術上和精神上的征服。法國大革命是僅僅依靠更改政治形態而取得和平和自由的一種嘗試——這種政治形態祇不過是資產階級需要的，因為資產階級業已佔據了經濟現實；從而，它完成的一切事情（確實也是它出現的發展階段



對它提出的歷史任務），是最終摧毀腐朽的封建主義政權的腐敗殘餘，並建立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這項任務不能不由拿破侖來繼續。誰也不懷疑拿破侖誠心地切望解放人類；不論他的所作所為的個人動機是什麼，歷史環境提出的要求，使他不可避免地成為社會改革的工具；確如黑格爾業已看出的，在拿破侖的作用下，歐洲在實現自己的命運道路上又跨出了一大步。

人類的逐漸解放已經獲得了一個確定的、不可逆轉的方向：每一個新紀元都誕生於迄至那時仍受壓迫的階級所獲得的解放之中；而一個階級既被摧毀之後，就再也不能復活了。歷史不會倒退，或者循環往復；它的一切征服都是最後的、和不可違抗的。以前大多數理想中的制度都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它們忽視歷史發展的實際規律，而代之以思想家的主觀任意想像。懂得這些規律是進行有成效的政治行動所必需的。古代世界讓位於中世紀，奴隸制代之以封建主義，封建主義又為工業資本主義所代替。這些轉變沒有一個是和平進行的，都經過戰爭和革命的洗禮，因為決不會有既成的制度不經過鬥爭，而拱手讓給接替者的。

如今，祇有一個社會階層仍然居於其餘階層的底下，祇有一個階級仍被奴役，即沒有土地、沒有財產的無產階級，它產生於技術的進步，一直在協助居於其上的階級擺脫它們共同的壓迫者設下的枷鎖，但在共同的事業告成後，它總是注定要受到它自己過去的同盟者、新的勝利階級的壓迫，受到主人的壓迫，他們自己不久前也是奴隸。無產階級位於社會標竿上可能的最低層，再沒有什麼階級在它下面；無產階級通過解放自身，從而也就解放了全人類。無產階級不像其他階級，它對任何東西都不享有特殊的佔有權，它沒有什麼利益可以不與所有人共享的，因為它除了自己赤裸裸的人性之外，什麼都被剝奪了；它的極度赤貧使它在這樣一種意義上代表了人類，即

賦予它的最低限度之物，乃是賦予所有人的。因此，他們爲之戰鬥的並非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的自然權利：因爲自然權利無非是資產階級對私有財產神聖性的態度的理想公式；真正的權利祇有是歷史賦予的權利，即擔當被歷史地加諸在一個階級身上的角色的權利。從這層意義上講，資產階級有充分的權力和大眾進行決戰，但這項任務是毫無希望的：它必將失敗，正像封建貴族當時被擊敗一樣。至於大眾，他們爲自由而戰，不是因爲他們作此選擇，而是因爲他們必須如此戰鬥，或者不如說他們選擇是因爲他們必須選擇：戰鬥是他們生存的條件；未來屬於他們；在戰鬥中，他們像其他一切處於上升時期的階級一樣，衝向注定要滅亡的敵人，因而他們是在爲全人類而戰。然而，以前一切勝利都把一個階級推上權力的位置，其本身最終注定要消亡，而這一次衝突卻是無後來者的，因爲所有這些鬥爭的條件注定要終結，階級得以消除；國家迄至那時一直是某個階級的工具，其本身得以化爲一個自由的社會，因爲它是無階級的。必須使無產階級懂得任何與敵人的真正妥協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可能爲了打擊某些共同的敵人，而同無產階級結成暫時的同盟，但資產階級最終必將轉而反對無產階級。在落後的國家，資產階級自己仍在爲權力而鬥爭，無產階級必須與其共命運而不問資產階級的理想可能是什麼，祇問在特殊的形勢下被迫做什麼；必須使自己的策略適應於這種形勢。正因爲歷史是決定的，因此勝利屬於上升階級，無論特定的個人是否希望如此；而勝利到來的迅速程度、有效程度或痛苦的程度，以及在什麼程度上按照有意識的大眾願望取得勝利，這些都取決於人的主動性，取決於大眾對其任務的理解程度和他們的領袖的魄力和才能。

因此，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明確這一點並教育大眾知曉他們的命運，乃是當代哲學家的全部

責任。但人們不禁要問：怎麼可以從一門歷史理論的真理中演繹出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的行動命令呢？歷史唯物論也許可以解釋事實上發生的事，但正因為它祇關心「是什麼」，所以它不能回答價值問題，即告訴我們「應是什麼」。馬克思沒有明顯地劃分這種區別（這會被休謨和康德推到哲學探討的最前沿），但是在馬克思看來似乎很清楚（他在這一點上步黑格爾後塵），對事實的判斷不可以與價值判斷截然分開：人的一切判斷都受制於在一個特定社會背景中的實踐活動，而社會背景反過來又是一個人所屬的那個階級在其歷史衍變中達到的階段的各種作用所使然：人們相信，某物之切實存在和對該物的褒貶取捨是相互滲透的。道德判斷若要聲稱是客觀合理的，就必須以經驗活動加以解釋，必須根據經驗活動加以檢驗。他不承認存在着經驗以外的、純思辨的或特殊的道德直覺或道德推斷。祇有證明某事物符合還是不符合歷史進程，促進還是阻礙人類集體的進步活動，並延續下去還是必然消亡，那麼，說該事物是好的還是壞的，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纔有意義。在人類複雜但却由歷史決定的昇華發展中，一切永遠失敗的或終將失敗的事業，僅因為失敗這一事實即足以證明其是壞的和錯的；的確，正是這構成了這些評語的意義。但這是一個危險的經驗主義標準，因為看似失敗的事業，事實上祇是遇到暫時的挫折，最終卻將佔上風。

他的真理觀總的直接來自於這種立場。有時有人批評他堅持這樣一種看法，即由於一個人的思想完全是由他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因而，即使他的某些言論是客觀真實的，他也不知道這一點，因為它們之被認為是真實的乃是由物質原因所決定的，而不是因為它們的真實性。馬克思對這一題目的闡述有點含糊不清；不過，總的也許可以說，當說到自然科學的或一般的感覺經驗的一項理論或命題是真實的或虛假的，對這種說法所蘊含的意義所作的規範解釋，他可能會予以接

受。但他幾乎不關心現代哲學家所探討的這種最普通的類型的真理。他關心的是社會、道德、歷史判斷何以被認作是真是假的理由，在這裡，爭論者雙方的論點都無法通過直接訴諸於雙方都可獲得的經驗事實而得以輕易地確立。他可能會同意拿破侖死於流亡途中，這個命題可以被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歷史學家一視同仁地當事實來接受。但他會接着說，真正的歷史學家不會滿足於一張串有各種事件和日期的清單：歷史學家對往昔事件敘述的或然性，它之不僅僅停留在一部簡單的編年史上，至少取決於他對基本觀念的選擇，他強調重點和排列次序的能力；而選擇材料的過程本身暴露出一種傾向性：重視這個或那個事件，強調這個或那個行動是重要的或微不足道的，對人類進步有利或不利，好的或壞的。在這種傾向中，歷史學家的社會根源、環境和階級屬性與利益便躍然紙上。

這種態度似乎構成了作為必然性規律而繼承的知識的他那黑格爾理性主義觀點的基礎。馬克思幾乎不從事任何哲學分析；他在知識、道德、政治方面的理論的總線條，必須從零碎的言論和被他十分肯定予以接受的东西上推演出來。他對諸如自由或理性概念的使用，對倫理道德術語的使用，似乎依據如下這些觀點：（無法引用使用它們的章節，但它們在他的正統弟子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列寧、托洛茨基的思想中得以體現，在這方面，他們並不亞於馬克思的較獨立的追隨者盧卡奇和格拉姆奇（Gramsci），如果你瞭解世界進程的方向，就可以站或不站在這一邊；如果你不站在這個方向裡，如果你跟它鬥，便將因此而招致自身的毀滅，必然被歷史的車輪輾得粉碎。執意反其道而行則是非理性的行為。惟有完全的理性者纔是完全自由地進行選擇，這裡有一種選擇不可抗拒地通向自我毀滅，他不能自由地作這一選擇，因為，說某項行動是自由的，正如馬克

思使用該詞的意義那樣，也就是否認該行動相悖於理性。資產階級作爲一個階級是注定要消亡的，但它的個體成員也許會遵循理性，在它最終崩潰之前脫離它，從而拯救自己（正如馬克思也許會宣稱自己是這麼做的那樣）。真正的自由要到社會成爲理性的纔可獲得的，也就是社會克服了滋長幻覺、歪曲主人和奴隸雙方的理解的矛盾。但是，人通過發現力量平衡的真實狀態並作出相應的行動，能夠爲自由的世界而奮鬥。因此，通向自由的道路包含着對歷史必然性的認識。馬克思對諸如「權利」、「自由」或「理性」等詞彙的使用，祇要他沒有不知不覺地滑入常規用法，都賦有古怪的意味，蓋在於他的形上學觀點，因而與普通用語大相徑庭，後者主要旨在記錄和交流對他說來是興趣索然的東西——被階級屬性所歪曲的個人主觀經驗，發自於感覺或自我意識的靈魂和肉體狀況。

這就是構成共產主義的經常「隱含」着形上學之基礎的歷史和社會理論的大致輪廓。這是一個博大綜合的學說，它的結構和基本概念來自黑格爾和青年黑格爾派，富有生氣的原則來自聖西門，物質至上的信念來自費爾巴哈，而無產階級觀點則來自法國共產主義傳統。儘管如此，它完全是獨創的，各因素的結合在這裡沒有導致拼湊，而是形成一種大膽的、內部一致的體系，範圍之廣泛和構造之恢宏，使它成爲一切形式的黑格爾主義思想的最大驕傲，也體現了它的致命弱點。但是這不能歸罪於黑格爾對他那個時代的科學研究結果所抱的武斷和鄙視態度，相反，它企圖沿着經驗科學所指出的方向，把其一般的結果結合起來。馬克思的實踐並不總是符合這種理論上的理想，而他的追隨者的實踐有時與之相差更遠，事實即使實際上沒有遭到扭曲，有時也造成了使它們在適合於錯綜複雜的辯證模式的過程中來一番特有的改造。它根本不是一種完整的經驗主義

的理論，因為它沒有把自己局限於描述現象和形成有關它們的結構與行為的假設。馬克思主義的辯證相對運動的學說，不是一種根據事實證據證明其可靠性大小的假說，而是一種模式，由一種非經驗主義的、歷史主義的方法加以闡明；這種方法的效力是不容質疑的。依馬克思看來，否認這一點即等於回到「庸俗」唯物論上去，它由於否認黑格爾的，而且實際上是康德的重大發現，因而僅認為繫於感官的可糾正證據的關係纔是真實的。

歷史唯物論的理論提出問題的尖銳性和鮮明性、尋求答案所用方法的嚴謹性，以及把注重細節和廣泛綜合概括能力結合起來，在這些方面它是無可比擬的。即使它的所有具體結論都被證明是錯誤的，但它對社會和歷史問題採取了一種全新的態度，並因而開闢了一條人類知識的新途徑，其重要性因此仍然絲毫不減。對於歷史地發展的經濟關係的科學研究，和對於這些關係對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帶來的影響所進行的科學研究，是通過運用馬克思主義解釋原則開始的。以前的思想家，如維科、黑格爾、聖西門，描畫了總的圖式，但他們體現在諸如孔德和斯賓諾莎的巨大體系中的直接結果過於抽象，亦過於模糊，在今天，祇有思想史學家還記得它們。現代經濟史，而且確實還有現代社會學的真正開山祖，祇要任何個人能夠聲稱獲得此項稱號，那就是卡爾·馬克思。如果把原來自相矛盾的東西轉化為真理乃是一種天才的標誌，那麼馬克思受此稱號是綽綽有餘的。而他在這一領域裡的成就，與其成果業已成爲文明思想永久背景的一部份相比較而言，則前者又必定被忽略不計了。



# 第七章

## 一八四八年

對付民主，惟有靠戰士

——普魯士之歌

自由、平等、博愛……而這個共和國真正意味  
著的是步兵、騎兵、炮兵……

——卡爾·馬克思：《路易》波拿  
巴的霧月十八日





馬克思於一八四五年初被基佐政府驅逐出巴黎。這是普魯士抗議的結果。普魯士要求查封社會主義的《先鋒報》(Vorwärts)，該報刊載「攻擊普魯士攝政王的評論。驅逐令最初打算適用於整個集團，其中包括海涅、巴枯寧、盧格和其他一些較次要的外國流亡者。後來盧格因為是薩克森公民，所以沒有碰他；法國政府自己也不敢張榜加害海涅，他是歐洲名人，當時正處在他的才能和影響力的頂峰。巴枯寧和馬克思被如期驅逐，儘管激進報紙對此提出了嚴重的抗議。巴枯寧去了瑞士；馬克思携夫人和一歲的女兒燕妮前往布魯塞爾，不久在那兒和恩格斯會合，後者是爲此目的離開英國的。一到布魯塞爾，馬克思趕緊與各種德國共產主義工人組織建立聯繫，它們中包含有解散了的「正義聯盟」成員，這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國際性團體，有著模糊但卻很激烈的綱領，受到魏特林的影響。它在各歐洲城市都設有分部。馬克思同比利時社會主義者和激進分子建立了關係，並和其他國家的同類組織成員保持著密切的通信聯繫，他還爲交換政治信息設立了一個常設機構。但是，他的活動的主要領域還是在布魯塞爾當地的德國工人中間。他通過演講，以及在他們的喉舌《德意志布魯塞爾報》(Deutsche Brüsseler Zeitung)上發表文章，試圖向德國工人們解釋他們在即將到來的革命中所起的正確作用，他像絕大多數歐洲激進主義者一樣，相信革命迫在眉睫。

他一旦得出結論，認爲建立共產主義祇有依靠無產階級的崛起纔能完成，便全力以赴地著手爲此進行組織和訓練工作。他的個人歷史在此前可以被看作個人生活的一系列插曲，然而至此卻成爲歐洲總的社會主義歷史不可分割的部份：敘述馬克思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敘述到歐洲社會主義史。企圖把馬克思在指導這項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同運動本身區別開來，那麼馬克思的歷史和運

動的歷史都將模糊不清。對他來說，使工人為革命作為準備這項任務是一項科學的任務，一份日常的固定職業，應該盡可能把它幹得既踏實又有效，而不是一種個人藉以自我表現的直接手段。因此，他的外部生活環境就同達爾文或巴斯德（Pasteur，法國化學家和生物學家——譯注）等其他受過教育的專家的外部環境一樣，是枯燥而單調的，並與他那個時代其他革命者躁動不安、感情用事的生活形成鮮明的對照。

十九世紀中期的幾十年是情感備受重視的時期。由盧梭和夏朶勃里昂（Chateaubriand，席勒和讓·保羅，拜倫和雪萊等人個別的孤立的經歷而開創的風氣，不知不覺成為形成歐洲社會某一部份的一般看法的一個因素。整整一代人第一次為形形色色的個人體驗而入迷，以對立於整個集團或社會生活的相互作用所構成的外部世界。在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的生活和學說中，在他們的追隨者對他們的熱烈崇拜中，這種傾向得到了公開的體現。馬志尼、科蘇特、加里波第、巴枯寧、拉薩爾，他們不僅作為自由的英雄鬥士而備受敬仰，而且作為浪漫和富有詩人氣質的個人而令人傾慕。他們的成就被認為是深刻的內心體驗的體現，這種內心體驗的熾熱性賦予他們的語言和姿態以感人的個人素質，全然不同於一七八九年的人的嚴峻的、非個人化的英雄主義，這種素質構成了那個時代的突出特點、獨特氣質和觀點。卡爾·馬克思在精神氣質上屬於前一代人或後一代人。他缺乏心理上的見識，貧困的生活和艱苦的工作也沒有使他在情感上更多地接受他人；除自己直接接觸的人以外，他對其他人的經驗和脾性極度地不聞不問，這使他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似乎簡直是遲鈍麻木的；他在柏林就學時有過一個富有情感的短暫時期，現在早已一去不復返了。他把道德或感情上的痛苦和精神危機視為資產階級的自我放縱，這在戰鬥時期乃是不可饒恕

的。正像在他之後的列寧一樣，他對這樣一些人祇有鄙視，他們在激烈的戰鬥中，當敵人攻占了一個又一個陣地時，他們卻全神貫注於自己的靈魂狀態。

他開始著手締造一個國際性的革命組織，立即得到設在倫敦的一個團體的最熱烈響應。這個團體名叫「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German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為首的是一小群流亡的手工業者，他們的革命秉性是毋庸置疑的。排字工人沙佩爾(Schapper)、製錶工人莫爾(Moll)、製鞋工人鮑威爾，都是他的首批可靠的政治盟友。他們的團體加入了一個稱作「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的聯盟，後者接替已解散的「正義聯盟」(League of the Just)。他與他們在一次和恩格斯同行去倫敦的旅途中相會，並發現這些人正合他的心意——堅定、能幹、精力充沛。他們卻以頗為懷疑的眼光視他為一名記者和知識分子；他們的關係保持著一種完全不帶個人色彩的、公事公辦的特點，達數年之久。該組織有著直接的實際目標，對此他是贊成的。在他的指導下共產主義者同盟發展迅速，並開始團結吸收各類激進的工人小組，它們分散在德國絕大部份工業區，其成員中並夾雜著少量軍官和職業人士。恩格斯以熱情洋溢的筆調，報導了在他的祖國裡，組織成員數量的增長和他們的革命激情。馬克思第一次發現自己已身處他朝思暮想的位置——一個活躍的、日益擴大的革命政黨的組織者和領袖。巴枯寧也來到布魯塞爾，他同國外激進分子與本地的貴族均有著良好關係。他對馬克思頗有微言，認為馬克思喜歡手工業者 and 工人的社團甚於知識分子團體，並且往工人的頭腦中灌輸他們根本不懂的抽象理論和晦澀的經濟學說，從而害了這些善良純樸的人，祇會使他們成為不可容忍的自高自大者。巴枯寧看不出對這些缺乏教育、褊狹無知的德國手工業者進行演講，並把他們組成小團體有任何意義。他們根本不

解煞費苦心給他們闡述的東西，這羣單調乏味、營養不良的人，決不會在任何決定性的衝突中起什麼想像的決定性作用。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攻擊使兩人的關係更爲疏遠了。蒲魯東是巴枯寧的親密朋友，並且，在黑格爾主義的問題上，又是他的一個門徒；因而，這種攻擊便同樣是針對巴枯寧自己在具體的政治分析中沉湎於閃爍其詞和高談闊論的習慣。

一八四八年的事件改變了兩人對即將到來的革命應取的策略的觀點，但改變的方向完全相反。巴枯寧後來轉向秘密的恐怖主義組織，馬克思則轉向奠定根據公認的政治方式而進行公開且正式的革命政黨的基礎。他決意要清除在德國人中間存在的華而不實和目標不清的傾向，他不是完全沒成功，這一點也許在兩年革命及其後年代中，他在德國的組織成員之有效和有紀律的行爲中得以佐證。

一八四七年，駐在倫敦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總部委託馬克思和恩格斯擬寫一份文件，明確聲明該組織的信念和目標，這表明他們倆獲得該組織的信任。馬克思熱切地抓住這個機會，把最近在他腦中最終形成的新學說，作一次清楚的總結。他於一八四八年初把稿子交給他們，並在巴黎革命爆發的若干星期前發表，題爲《共產黨宣言》。

最初它由恩格斯以問答形式寫出草擬稿，但由於這被認爲仍然不夠有力，馬克思便完全推倒重寫。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重寫的結果是一次創作，幾乎沒有一點出自他的手；但在有關他倆的合作方面，他總是過於謙虛，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寫作份量是很大的。其結果是產生了最偉大的社會主義小冊子，任何現代政治運動或事業都無法聲稱曾經在雄辯和力量上產生過可與之匹敵的東西。這是一部極具戲劇效力的文件，形式上，它是一座大廈，對歷史作出了大膽的引人注目

的總結概括，並以未來的復仇力量的名義譴責現存秩序。其大部份以散文體寫成，有著偉大的革命讚歌的奔放抒情風格，其效果甚至在今天仍然很強大，當時可能更為巨大。它劈頭就是一段反映出它基調和意圖的威脅性詞句：「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黨人和警察，都為驅除這個幽靈而結成了神聖的同盟。……它已被歐洲一切勢力公認為一種勢力。」文章以一連串相互關聯的主題發展而成，並出色地渲染了這些主題，最後以一句向世界工人發出的著名壯觀的口號結尾。

這些主題中的第一個包含在第一段落的開首語裡：「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在有記載的所有歷史時期裡，人類被分成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奴隸主和奴隸，貴族和平民，在我們這個時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人類的發現和發明的巨大進展改變了現代人類社會的經濟制度：行會讓位於工廠手工業，後者又轉變為大工業。在其擴展的每一階段，都伴隨著自身特有的政治形態和文化形態。現代國家的結構反映出資產階級的統治作用——事實上，國家是一個管理整個資產階級事務的委員會。資產階級在它的時代裡實現了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推翻了封建制度，在此過程中，它摧毀了把人和「自然主宰」(natural masters)聯繫在一起的古老的、田園詩般的、宗法的關係，在人們中祇留下了一種真實的關係，即現金交易關係，赤裸裸的個人利益。它把人的尊嚴轉化為可供商討買賣的商品；它創造出來的貿易自由代替了以條例律文所保障的古代特許權；它以直接的、毫無顧忌的、無耻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和政治面具掩蓋起來的剝削。它把過去認為是受人尊敬的為社會服務的職業，變成了純粹的僱傭勞動：為了達到它的目標，它已經貶低了一切生活方式。這都是通過起用大量新的自然資源而實現的：封建制

度無法容納新的發展而崩潰，如今這一過程又重新開始。由過度生產引起的頻繁不斷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再也不能控制它自己的資源這一事實的徵兆。當一種社會制度被迫毀滅它自己的產品以防止自己的設施擴展過快過遠，這就是它接近破產和末日的一個確定的跡象。資本主義制度創造出來的無產階級既是它的繼承人，又是它的死刑執行人。資本主義成功地摧毀了所有和它對立的組織形式的勢力——貴族階級、小手工業者和封建領主——但是它卻不能摧毀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對它的存在是必要的，是這個制度的一個有機部份，並構成了一支龐大的被剝奪者隊伍。正是在對他們的剝削過程中。它不可避免地把他們訓練並組織起來。資本主義越是國際化——因為它擴張，就不可避免地愈益國際化——那麼，它就更廣泛地、更國際性地把工人自動組織起來，他們的聯合與團結最終將把它推翻。國際資本主義必然造就國際工人階級，作為它自身的必然補充。這個辯證過程是不可避免的，沒有力量可以阻止它或控制它。因此，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的思想意識代表人物所渴望的恢復古老的中世紀田園生活，在返回過去的懷舊願望基礎上建立烏托邦計劃的企圖，都是徒勞的。逝者如斯夫，歷史的前進步伐早已決定性地擊敗屬於過去時代的階級；他們對資產階級的敵視，常被誤稱為社會主義，實則是一種反動的態度，是為扭轉人類演化進程而作出的無望的努力。他們可以戰勝敵人的惟一希望，在於放棄他們自己獨立的存在，並和無產階級溶為一體，後者的發展壯大，從內部不斷地侵蝕資產階級；因為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的日益加深，迫使資產階級為養活它的奴僕而筋疲力竭，而不是依賴它的奴僕而生存，而這本來乃是它的本質機能。

《宣言》由攻擊走向防禦。社會主義的敵人宣稱廢除私有制將毀滅自由並顛覆宗教、道德和

文化的基礎。這一點是被確認的，但是，它因而要毀滅的價值僅僅是這樣一些價值，它們和舊的秩序相聯繫，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產階級的文化，它們之絕對適合一切時代、一切地點的外表，乃是一種幻覺，僅僅歸諸它們作為階級鬥爭的一種武器而起的作用。真正的個人自由就是擁有獨立行動的力量，而這在小手工業者、小商人、農民是早已被資本主義剝奪了的。至於文化，「失去它將為之痛惜不已的文化，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不過是使人如機器一樣行動而進行的訓練罷了」。隨著階級鬥爭的完全消除，這些虛幻的觀念必將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建立在無階級社會之上的新的、更廣闊的生活方式。為它們的失去而悲哀，就是為一種熟悉的老毛病的消失而惋惜。

革命在不同的環境中肯定是不同的，但它在任何地方的第一批措施必須是對土地、銀行、信貸、交通運輸實行國有化，廢除繼承權，增加稅收，加強生產，消除城鄉隔閡，對所有人實行義務勞動和免費教育。祇有到那時，真正的社會重建纔能夠開始進行。《宣言》的其餘部份揭露和駁斥了各種類型的偽社會主義——形形色色的敵人，資產階級，貴族，教會，試圖以共同利益的似是而非的借口，把無產階級爭取到他們的事業上去。沉淪的小資產階級加入到這一類人中，他們的著作家們精於揭示資本主義生產的紊亂，因引進機器而產生的貧困潦倒，以及財富分配的極為不均，但他們開出的藥方是以陳腐的詞句表達的，是烏托邦式的。甚至這還不能用以論述德國的「真正」社會主義者（即赫斯、格律恩等人，他們的錯誤在於：他們捍衛社會主義不是因為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而是因為社會主義是正義的，是人性所要求的，而人性被設想為一種永恆的本質，一種實體，不會為歷史或階級鬥爭所劇烈改造），他們把法國的陳腔濫調轉換成黑格爾主義的語言，從而創造出不可能長久欺騙世界的廢話集成。至於蒲魯東、傅立葉或歐文，他們的追隨



者們設計出拯救資產階級的計劃，似乎無產階級是不存在的，或者可以把它們拉進資產階級行列，留下來的祇有剝削者，而沒有被剝削者。這些觀點種類之多，正表明資產階級已落入無望的境地，不能或不願面對它自己的末日來臨，祇是傾全力於徒勞的努力，希望在模糊的、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偽裝下生存下去。共產主義者不是一個黨派或一種宗派，而是無產階級自己的具有自我意識的先鋒隊，並不僅僅著迷於理論上的結論，而是力圖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他們不隱瞞自己的目的。他們公開宣佈這些目的祇有當通過武力推翻整個社會制度，並由他們自己來掌握一切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時候纔能達到。《宣言》以這樣的著名詞句結尾：「無產者失去的祇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後來的學者已經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有多少取自較早的綱領——特別是巴貝夫(Babouvis)綱領的相似材料被結合進《宣言》中去，然而，這些材料已融入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沒有任何概括要能夠傳達它的卷首和末尾所具有的品質。作為一種破壞性宣傳的工具，它是蓋世無雙的；它對於後代人造成的影響，除宗教歷史之外，沒有可以和他比擬的，即使其作者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作品，這部《宣言》亦可保證使他名聲長存。然而，它的最直接結果卻是影響了作者本人的命運。對政治流亡者相當容忍的比利時政府無法忽略這一可怕的出版物，毫不猶豫地把馬克思及其家眷逐出了國境。次日，期望已久的革命在巴黎爆發。法國新政府的一名激進成員弗洛孔(Flacons)在一封討好逢迎的信中邀請馬克思回到革命的城市。後者立刻動身，翌日便到了巴黎。

他發現該城沉浸在一種普遍的、不挑剔的熱情狀態中。街壘又一次被攻陷，這一次看上去是以至永遠了。國王已經出逃，他宣稱，「他是被道義的力量趕出去的」。新政府被委任了，它包括

人道和進步的所有朋友的代表：大物理學家阿喇戈(Arago)和詩人拉馬丁出任部長。路易·布朗和阿爾伯(Albert)代表工人。拉馬丁撰寫了一篇雄辯的宣言書，到處被人閱讀、引用、宣講。街上的歌聲響徹雲霄，形形色色不同國籍的民主派人士成羣結隊在那兒歡呼。反對派幾乎沒有任何活動的跡象。教會發表了一份宣言書，斷定基督教對個人自由不懷敵意，正相反，是它的天然盟友和捍衛者；它的王國不在這個世界上，因此，它過去被人譴責的會給予反動派的支持，既不發源於它的基本原則，也不起因於它在歐洲社會中的歷史地位，並且可予以急劇地更改而無害於它的教義的本質。這些聲明被人們以熱心和輕信接受了下來。德國流亡者同波蘭人和意大利人一起競相預測反動派近在眼前的全面崩潰，預測在它們的廢墟上即將出現一個嶄新的道德世界。消息不斷傳來，那不勒斯發生暴動，接著米蘭、羅馬、威尼斯及其他意大利城市也相繼起義。柏林、維也納和布達佩斯已經武裝起義。歐洲終於點燃了。巴黎的德國工人欣喜若狂。為支持暴動的各共和國，一支德國軍團組織起來了，由詩人赫維(Herwegh)和一名普魯士共產主義者退役軍人維利赫(Willich)指揮。它已整裝待發。法國也許並非不願意看到這麼多外國鼓動家離開它的國土，便鼓勵這項計劃。恩格斯受到這項計劃的極大吸引，並且幾乎肯定要註冊入伍了，但為馬克思所勸阻。馬克思是抱著不信和敵意的眼光來看待這個過程的。他看不出有任何大規模德國羣衆起義的跡象。一個個專制政府被推翻，各公國親王被迫允諾立憲並指定溫和的自由主義政府，但是普魯士軍隊基本上依然效忠國王，而民主主義者卻四分五裂，領導糟糕，對重大問題不能達成一致意見。當選的議會在法蘭克福聚會決定未來的德國政府，但從一開始就告失敗。未經訓練的僑居國外的知識分子軍團突然出現在德國國土上，在馬克思看來是一種革命精力無謂的浪費，很可能獲得

一個可笑或可悲的結局，隨之而來的是恥辱和幻滅的懊喪情緒。因此，馬克思反對組織軍團，它從巴黎開拔後去接受皇家軍隊給予它的不可避免失敗，馬克思便再也不感興趣了。他跑到科隆去看看他在故鄉萊茵省可以做些什麼宣傳工作。在那裡，他發揮了極大作用為說服一羣自由派工業家和共產主義同情者以創建新的《萊茵報》，繼續被查封五年的同名雜誌，並指派他為總編輯。當時的科隆，正是控制著地方武裝的當地民主派和從柏林派來的衛隊之間，維持著不穩定力量的平衡之處。馬克思以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名義，派一些人員到工廠羣衆中去進行鼓動，並根據他們發回的報告，作為他的重要文章的素材。當時萊茵省還沒有正式的新聞檢查，於是他的煽動性語言傳到了日益增多的公衆那裡。《新萊茵報》消息靈通，而且在左翼報紙中惟有它有著自己清楚的政策。它的發行量日益上升，並且開始被德國其他省份的讀者所廣泛閱讀。

馬克思已經根據他在前些歲月裡精心創造的堅實的理論基礎，搞出了一份完整的政治和經濟的行動計劃，爲了迅速推翻反動政府，他主張工人和激進的資產階級結成有條件的聯盟。他宣稱，鑒於法國人已經在一七八九年把自己從封建主義的枷鎖下解放出來，通過這從而能夠使自己在一八四八年採取進一步的步驟，而德國人迄今僅在純思想領域取得了他們的革命；作爲思想家，他們在觀念上的激進主義已經遠遠超過法國人，但政治上他們仍然生活在十八世紀。作爲西方最落後的國家，他們因此還需要走過兩個階段纔有希望達到發達工業主義階段，然後纔能與鄰國的民主政體並肩。歷史的辯證運動不允許跳躍，無產階級的代表輕視資產階級的主張是錯誤的，後者在解放自身時推動了總的事業，而它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比無知、分散、組織不善的工人階級羣衆更加組織良好，更有能力實行統治。所以，對工人們來說，最恰當的步驟，是與中產階級和中下

階級中和他們同道的犧牲者，結成同盟，隨後，在取得勝利時，再設法通過他們的懸殊人數和經濟力量優勢，控制、並在必要時阻礙他們的新盟友的工作，這時候，他們的盟友無疑也急於想中斷他們的妥協關係。他反對科隆的極端民主派安內克(Anneke)和哥特沙克(Gottschalk)，他們主張完全放棄這種機會主義，或者不妨說放棄一切政治行動，這些行動極可能損害和削弱純潔的無產階級事業。這對馬克思來說，是德國人看不清真正的力量平衡的典型事例。他要求直接干預，並派代表去法蘭克福作為惟一有效的實際步驟。政治上的清高在他看來猶如策略上的愚頑絕頂，因為這極可能使工人們陷於孤立的境地，從而聽從勝利階級的擺佈。在對外政策上有他一點泛日耳曼主義，以及患有偏執的恐俄症。在關係到民主和進步力量的問題，俄國多年來所處的地位和法西斯在二十世紀的地位相同，並在感情上激起同樣的反應。各種派別的民主主義者都對它又恨又怕，把它看成是反動派的得力打手，既有能力也願意粉碎其國內外一切爭取自由的努力。

正如在一八四二年那樣，馬克思要求立即與俄國交戰，一則是因為考慮到俄國干涉的肯定性，任何民主革命的嘗試都不會在德國成功；二則是因為這樣可以作為一種手段，把德意志各公國溶於一個聯合的民主整體，以與一個其整個勢力影響覆蓋歐洲政治的王朝因素的大國相對抗；三則大概還可以援助俄國內部那些分散的革命力量，巴枯寧曾一再神秘地提及存在著俄國的革命者。馬克思準備放棄其他許多考慮，致力於統一德國的目標，因為他發現德國不統一就是它軟弱、低效和政治落後的原因，在這一觀點上，他和黑格爾和俾斯麥不相上下。馬克思既不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把小國家看作阻礙社會和經濟進步的衆多過時的倖存者。因此，他後來始終公開首肯德國對丹麥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省)的殘酷入侵；這一被大多數德國

民主派頭面人物公開支持的行動，使他們在其他國家的自由主義者和立憲主義者中間的盟友感到相當難堪。

馬克思譴責早夭的自由派的普魯士政府的一連串更替，它們輕易地，並且在他看來，幾乎是心安理得地，把自己手中的權力拱手交給國王及其黨羽。法蘭克福的「連篇空話」和「議會癡呆症」(parliamentary cretinism)遭到馬克思的猛烈攻擊痛罵，並以怒吼的風暴告終，其激烈程度亦非《資本論》的激烈所能比擬。無論當時還是過後，他都沒有對這場衝突的最終結局感到失望，但他對革命策略的概念，和他對羣衆及其領導人的智慧和可靠性的觀點，徹底改變了：他宣稱，他們自身無可救藥的愚蠢對於進步造成的阻礙，比資本主義本身還要大。但事實表明，他自己的策略證明，是比他責備的不妥協的激進派的策略更爲不切實際的。他在過後的分析中，把革命遭到的災難性結局，歸咎於資產階級軟弱和議會自由派的低效無能，但最主要的，是極易上當受騙的羣衆的政治盲目性，他們頑固地忠於他們最凶惡的敵人的代理人，受欺騙，被逢迎，被輕易地引上毀滅之路。他之所以把他大部份精力放在對純策略的問題上，考慮什麼是革命領導人爲了不諳事理的大衆的利益所應採用的最好方法，正如他把精力放在分析實際條件上一樣，原因主要在於德國革命的教訓。一八四九年，維也納和德累斯頓起義失敗後，他寫文章激烈地嘲諷各色自由派爲懦夫和害羣之馬，他們仍然被國王和軍隊督導員迷住雙眼，想起徹底的勝利便慌作一團，隨時準備出賣革命以防範也許會決堤而出的危險勢力，因而他們在還未開始時就肯定已被擊敗了。馬克思聲稱，縱使資產階級以犧牲它的小資產階級和工人盟友爲代價而與其敵人搞骯髒交易，其所得最多也不會超過法國自由派在法國七月王朝統治下所贏得的東西，而在最壞的情況下，這

種交易會被國王斷然拒絕，並成爲新王朝恐怖統治的前奏。在德國，沒有第二張報紙在斥責政府方面敢於走得如此之遠。這些分析的毫不妥協的直截了當，以及馬克思從這些分析中得出的結論的大膽放肆，既強烈地吸引了讀者，又違背了他們的意願，儘管在報紙股東們中間已開始顯示出明白無誤的驚慌跡象。

到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革命的英雄主義階段已經告終，而保守勢力開始集聚力量。內閣裡的社會主義者和激進派成員路易·布朗、阿爾伯·弗洛孔被迫辭職。工人們起而反抗繼續執掌政權的右翼共和黨人，並築起障礙物。經過三天短兵相接的巷戰，工人們被繼續效忠政府的國民警衛隊驅散並擊潰。六月起義或許被看作歐洲史上第一次純社會主義起義，其有意識地直接反對自由派並不亞於反對保皇黨人。布朗基（他當時在獄中）的追隨者們，號召人民奪取政權並建立軍事專政：《共產黨宣言》中提到的幽靈終於顯形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有史以來第一次亮出了自己這種凶猛恐怖的面目，並自此以後在世界各地以這種面目出現在它的對手面前。

馬克思當即作出反應。他的報紙所有人以極度的恐懼注視著一切形式的血腥和暴力。但馬克思不顧他們竭力抗議，發表了一篇火一般的重要長文，把國家爲在巴黎暴亂中陣亡戰士舉行的葬禮作爲他的主題：

「這就是博愛，這是一方剝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對立的階級之間的博愛，這就是在二月間所昭示的，用大號字母寫在巴黎的三角牆上，寫在每所監獄上面，寫在每所營房上面的博愛。……博愛祇有在資產階級利益和無產階級利益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纔繼續存在。學究們拘守於一七九三年舊的革命傳統；社會主義的空談家曾爲人民向資產階級乞求施捨，並且被許可做冗長的說教和敗

壞自己的聲譽，直到把無產階級的獅子催眠入睡爲止；共和黨人要求全部舊的資產階級制度，祇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領；王朝反對派從事變中得到的不是內閣的更換，而是王朝的崩潰；正統主義者不是想脫去奴僕的服裝，而是僅僅想改變一下式樣，——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實現自己的二月革命時的同盟者。人民本能地仇恨的路易·菲力浦並不是路易·菲力浦本人，而是一種加了冕的階級統治，是坐在王位上的資本。但是人民終於是寬宏大量的，他們以爲祇要打倒了自己敵人的敵人，打倒了共同的敵人，就是消滅了自己的敵人。

「資產階級社會條件本身所產生的衝突必須在鬥爭中加以解決，靠空想是消滅不了的。不掩蓋社會矛盾，不用強制的因而是人爲的辦法從表面上制止社會矛盾的國家形式纔是最好的國家形式。有人問，難道我們對那些在人民的憤怒面前犧牲的人，對國民自衛軍，對別動隊，對共和國近衛軍，對現役軍人不流一滴眼淚，不嘆一口氣，不發一言嗎？」

「國家將關懷他們的孤兒寡婦，法令將頌揚他們，隆重的殯儀將送他們的遺體入土，官方的報刊將宣佈他們永垂不朽。……但是平民則受盡飢餓的折磨，遭到報刊的誣衊，得不到醫生的幫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縱火者和流刑犯；他們的妻子兒女更是貧困不堪，他們的那些倖免於難的優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給這些臉色陰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種特權，是民主報刊的權利。」

（中譯文引自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五八年版，第五卷第一五四頁以及一五七頁，和原英語譯文略有出入。——譯注）

這篇文章（同他在二十多年後爲巴黎公社所寫的文章沒什麼兩樣）引起報刊訂戶的驚恐。報紙開始賠錢了。此刻的普魯士政府，深信大眾情緒中已沒什麼東西可害怕的，便命令解散民主議

會。後者以宣佈政府一切課稅爲非法作爲回答。馬克思堅決支持該項決定，並號召人民抵制徵稅的企圖。這一回政府立刻採取行動，勒令立即查封《新萊茵報》。該報最後一期以紅字刊出，其中含有馬克思寫的一篇煽動性文章和弗賴利格拉特(Freiligrath)的一首雄辯激昂的詩。它即刻被人們出於收藏目的而購買一空。馬克思以煽動罪被捕，並受到科隆的一個陪審團的審訊。他藉受審之機作了一次博學的長篇演講，詳盡分析了德國內外的社會和政治形勢。其結果出乎預料：審判長在宣判被告無罪時說，他希望以他自己和陪審團的名義，感謝馬克思給他們作了一次有著非同尋常指導意義的、令人感興趣的演講，使他們都獲益匪淺。四年前取消馬克思公民權的普魯士政府無法推翻判決，便於一八四九年七月把馬克思逐出萊茵省。他去了巴黎，在那裏，波拿巴主義者替拿破侖的侄兒所作的鼓動，使政治形勢較以前更加混亂，看上去似乎隨時都可能發生重大事情。馬克思的合作者們分散在四處：恩格斯不願無所作為並宣稱他不會失去什麼，便加入了由維利赫率領的巴黎軍團。後者是一位頭腦簡單的共產主義者和出色的指揮官。馬克思把他貶爲一名浪漫的冒險家，而恩格斯則欽佩他的真誠、冷靜和勇氣。該軍團在巴登被皇家軍隊輕易舉地擊敗，並井然有序地撤退至瑞士聯邦邊界，然後解散。大多數倖存者越過邊界進入瑞士，其中有恩格斯，他把這次行動當作美好的回憶保留在心中，以後常常樂意向人講述這段戰鬥的歷史，把它描述爲沒有什麼特殊重要性的一段快樂而無傷大雅的插曲。馬克思尋求快樂的能力較爲有限，他發現巴黎是個令人意志消沉的地方。革命已經失敗無疑了。保皇黨人、奧爾良黨人和波拿巴分子的陰謀，破壞了民主結構的一切存在：沒有逃走的社會主義者和激進分子，不是蹲監獄便是隨時可以指望他們蹲進監獄。這時的馬克思已是歐洲的一位聲名狼藉的人物，巴黎當局極不歡迎他出



現在那兒。他來此不久被迫接受兩種選擇：離開法國或到布列塔尼的莫比哈去過隱居生活。在自由國家中，比利時對他較近；瑞士已經驅逐了魏特林，對巴枯寧也無友好表示，因此不可能允許他居留。歐洲祇有一個國家可能不在他的路途上設置任何障礙。馬克思於七月自萊茵省來到巴黎。一個月後他的友人們認捐幫他支付去英國的旅費。在這些友人中第一次出現了拉薩爾的名字；他於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到達倫敦，他的家眷於一個月後也來了。恩格斯則在瑞士閑逛了一段時期後，從熱那亞出發，作了一次漫長而愉快的海上旅行，於十一月初也來到倫敦。他發現馬克思對革命將隨時再次爆發深信不已，並忙於撰寫一本小冊子攻擊保守的法蘭西共和國。

# 第八章

---

## 流亡倫敦： 第一階段

精神痛苦的惟一解毒劑是肉體折磨。

——卡爾·馬克思《福格特先生》

---



馬克思於一八四九年抵達倫敦，打算在英國待上幾星期，也許是幾個月，結果却一直不間斷地居住在那裡直到一八八三年去世。英國在思想精神和社會生活上，同歐洲大陸生活主流始終有着巨大的隔絕，處於孤立狀態，十九世紀中葉亦不例外。震撼歐洲大陸的問題越過英吉利海峽傳到英倫要花多年時間，而當這些問題來到英國時，又傾向於以新的特殊面貌出現，在遷移過程中起了變化，英國化了。外國革命者在那裡總的說來是不會受到煩擾的，祇要他們的行為舉止合乎規矩，方式不引人注目。然而，英國人也不和他們接觸。英國人對待他們禮儀有加，合乎準則，又混合了一種對他們的事務的溫和冷漠態度，這既令他們氣憤，也使他們感到有趣。多年來生活在精神和政治活動騷動中的革命者和文人們，發現倫敦的氣氛不近人情的冷漠。和他們有聯繫的為數極少的英國人，用樂善好施、避之惟恐不及，又常略帶屈尊就教的態度對待他們，這給他們帶來了更為強烈的孤獨和流亡感。這種寬容的、有教養的態度確實創造了一個真空，在這真空中，他們有可能在肉體上和精神上從一八四九年的惡夢後恢復過來，與此同時，遠離事件而創造了這種寧靜感，資本主義政權似乎在英國擁有極大穩定，以及完全缺乏任何革命的徵兆，這些都一再引起毫無希望的停滯感，它使涉於其中的幾乎所有人士氣低落，滿腔怨恨，祇有極少數人例外。在馬克思的情況中，令人絕望的貧窮慘境，折磨他那從來就不是過於浪漫或柔順的性格，這就更是雪上加霜了。當這些流亡的歲月使他作爲一個思想家和革命家大獲收益時，上述這些亦導致他幾乎完全退入一個狹窄的小圈子裡，它由家庭、恩格斯以及一些親密的朋友如李卜克內西(Liebknecht)、沃爾夫(Wolff)，和弗賴利格拉特(Freiligrath)所組成。作爲一個知名人物，他那天生的苛刻、咄咄逼人和妒嫉，他那粉碎所有對手的願望，都隨着歲月的流逝而發展；他對自己生活於

其中的社會嫌惡越來越尖銳，他的人際交往越來越困難，他對待自己圈子以外的社會主義者，還不如對「資產階級」陌生人來得親切友好；他很容易和人爭吵，不喜歡和解。當他有恩格斯可依靠時，便不再要求別的幫助，到了暮年，當他受到的尊敬和崇拜達到頂峰時，已沒有人敢於太接近他，惟恐遭到某種特別令人羞辱的冷淡。像衆多偉人一樣，他喜愛被人奉承，乃至於人們完全服從他，在他晚年時，這兩者他都充分得到了，並在他早先任何時期都未曾得到過的巨大榮耀和舒適的物質條件中去世。

在這些歲月裡，浪漫的愛國主義者，像科蘇斯(Kossuth)或加里波第(Garibaldi)，在倫敦街頭受到公衆的歡呼，得到極大的榮譽。他們被認作是生動的形象，從他們那兒可以期望見到英雄主義的行爲，聽到高貴的詞句；而不是被看作可以與之建立人際關係的有趣或體面人物。他們的追隨者，大部份被看成是無害的怪人，正如他們中很多人確實是這樣的。馬克思並不擁有足夠的名聲或魅力來如此吸引公衆注意力。他發現自己幾乎沒有什麼朋友，實際上一貧如洗，居住在一個國家裡——儘管距他上次來訪還不到三年，這個國家對於他仍然是陌生的。像他那樣生活於一個極其多樣化的繁榮興旺的社會之中，是時正處於它經濟和政治力量非凡增長的全盛時期，馬克思却保持着同它隔離的個人生活，把它看作僅僅是科學觀察的一個對象。好戰的激進主義在英倫之外的崩潰使他別無選擇，至少在一段時期裡，祇有過觀察思考和學術研究的生活。這一選擇的重要結果是，由於他所引用的材料大部份是英語的，因此，他爲他的假設和歸納概括尋求的證據，便幾乎全部依賴英語作家和英國的經驗。形成《資本論》中最出色、最有獨創性章節的那些詳盡的社會和歷史的研究，它們主要所涉及的那些時期的大部份證據，均可以從報紙《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 的金融專欄，從政府藍皮書中找到統計材料（馬克思是使藍皮書起嚴肅科學作用的第一位學者），以及從其他材料來源，而無需步出倫敦，或者乃至於無需步出不列顛博物館的閱覽室。這是在他偶爾進行宣傳鼓勵以及進行實際組織活動的一生中完成的，但是帶着一種極其孤零的氣氛，似乎這位作者所處之地遠離他所討論的那個地方，這一點有時候會導致對流亡期間的馬克思產生完全謬誤的印象，正如已經發展起來的那種印象一樣，把他看成一個冷淡超然的學問高深者，年方三十二歲就已經把行動的生活拋於身後，涉入純理論探索之中。

馬克思抵達英國的這個時刻，特別不利於革命的任何發展前景。羣衆運動——憲章運動（*Chartism*）——被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者，看成工業最發達因而社會也最進步的國家中有組織無產階級的行動典型，但却在不久前才剛經受了一次無法抵擋的失敗。外國觀察家，包括恩格斯，曾經認真地高估過它的力量。它是參差不齊的利益和人員的鬆散集聚，包括有浪漫的保守主義者，受到歐洲大陸模式影響的先進激進分子，福音派改良主義者，哲思的激進派，一無所有的農夫和手工業者，以及狂熱放縱的空想家。標誌着工業革命每一次進步的愈益貧困化和社會地位降入中下階層，對此的恐懼令他們團結起來，他們中很多人從暴力思想中後退了，隸屬於被《共產黨宣言》輕蔑歸入的那個階級，是「經濟家、慈善家、改善工人階級狀況的人道主義者，賑濟施捨組織者，防止虐待動物組織成員，有節制的狂熱者，任何想像得到的各處改良主義者」。

運動被組織得極糟糕。領導人之間無一致的意見，既無個人的、更少集體的清楚信念：如為追隨者確定目標，或者為實現這些目標應當採取的手段。運動最堅定的成員是那些未來的工聯主義者，他們主要關心改善勞動條件，提高勞動工資，更廣泛的問題祇有在涉及他們的具體目標時，

他們纔會感興趣。一場嚴肅的革命運動在任何條件下，是否可能在這一奇特的大雜燴中產生出來，是令人懷疑的。就憲章運動來看，是什麼都沒有。或許由於議會選舉法修正案提供了似是而非的鬆弛，或許由於原先便使浪潮平息的新教教義的力量，總之，那場始於一八四七年的巨大危機，到一八五〇年已經過去了。隨之而來的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公認的經濟繁榮，它極大地提高了工商發展的速度，並撲滅了憲章主義烈火的最後一點餘燼。組織者和煽動家仍然繼續和工人的錯誤作鬥爭，但是，彼得盧大屠殺和托爾普德蒙難者的那些羣情激憤的歲月，在霍奇斯金(Hodgskin)和布雷(Bray)那些冷酷無情、令人激奮的小冊子的鼓動下，在威廉·科貝特(William Cobbett)的嚴厲諷刺中，曾留下了愚蠢的鎮壓和廣泛的社會崩潰的悲慘記錄，至此不知不覺為較溫和的時代所代替，其中有約翰·斯托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同情社會主義的英國實際主義者，有六十年代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有諸如克里默(Cremat)或盧克拉夫特(Lucraft)那樣精明謹慎的基本上非政治性的工聯主義者，他們不相信以外國的理论學說來指導他們自己的事務。

馬克思自然是從和德國流亡者建立聯繫開始的。倫敦當時匯集了德國流亡者，已解散的革命委員會成員，被放逐的詩人和知識分子，早在革命前就定居在英國，態度含糊的激進德國手工業者，以及不久纔從法國或瑞士被驅逐的活躍的共產主義者。他們試圖重組共產主義聯盟，加強和同情他們的英國激進分子的關係。馬克思按其通常的策略行事，刻板地堅守着德國社團；他堅信革命還未過去；他也確實深信不疑，直到改變發生把路易·拿破侖送上法蘭西王位。同時，他在戰鬥期間亦有一些在他看來是間歇的時間，進行政治流亡的一般活動，參加難民會議，和引起他懷疑的人爭吵。教養有素、生性挑剔的赫爾岑當時也在倫敦，對馬克思有很深的厭惡，在他的回

憶錄裡，惡毒而又出色地描繪了馬克思和他的追隨者當時及以後在其他政治流亡者中所處的地位。德國人一般以不會和其他流亡者——意大利人、俄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合作而著稱，令德國人吃驚和厭惡的是，後者缺乏維持熱烈人際關係所需要的方法和激情；就後者來說，他們發現德國人同樣沒有吸引力，他們不喜歡德國人的木訥笨拙，舉止生硬，自視甚高，而更重要的是，不喜歡他們那種卑賤的、決無寧日的、並引起自相殘殺的宿怨。在這種爭鬥過程中，把私生活的瑣細情節弄到新聞媒體上公開化，加以殘酷地醜化，這並非是罕見的。

一八四八年的災難並沒有動搖馬克思的理論信念，但迫使他修正他的政治綱領。在一八四七至四八年間，他受到威特林（Weitling）和布朗基（Bianchi）的很大影響，乃至於違背了他固有的黑格爾主義傾向，開始相信通過一場軍事政變可以使革命成功：它可以由受過訓練的革命家組成的一個小小的堅定集團來開展，他們既經掌權後便將保持權力，把他們自己組成民衆的行政委員會，而他們則以民衆的名義行動。這個集團將起無產階級進攻的先鋒作用。不能期望廣大工人階級羣衆在處於長期的奴役和愚昧狀態後，會成熟到建立自己的政府，或控制和消滅將被他們取而代之的力量。因此必須形成一個政黨，發揮作為人民的政治、思想和立法的精英的作用。靠着它的無私、受過優等訓練、和對當前形勢的要求有着實際見識，而享有人們的信任，能夠在新自由的最初階段，引導人民的不確定步伐。這一必要的插曲他稱之為不斷革命狀態，在革命無產階級對他階級實行階級專政的指引下，「作為一個必要的中間步驟，以消滅一切階級差異，消滅這些差異所賴以產生的一切現存生產關係，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對應的一切社會關係，以實現把來自這些社會關係的一切思想觀念顛倒過來。」然而，這裡儘管目標是清楚的，但實現的手段相對仍然



是含糊不清的。這「不斷革命」要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支配，但這一階段得如何實現呢？將採取什麼形式呢？毫無疑問，至一八四八年，馬克思認為它將由自封的精英們所產生，既不是秘密工作的，像布朗基所堅持的那樣，也不是由某一極權人物所統帥，像巴枯寧偶爾辯稱的那樣，而是如巴貝夫(Babouv)在一七九六年所設想的那樣，可能是一小羣信念堅定、冷酷無情的個人，他們行使專政的權力，教育無產階級，直到後者達到領悟自身的正確使命的水準。正是把此作為一種手段，一八四八至四九年，他在科隆為和激進資產階級領袖達成的一項臨時聯盟作辯護。小資產階級因反對直接來自他們之上的階級壓力，從而是工人在這一階段的天然盟友。但是，由於小資產階級不能以自身的力量進行統治，它就會越來越依靠工人的支持，直到這一時刻的來臨。當工人已經成為整個局面中的經濟主人，他們將獲取政治權力的正式形態，無論是通過暴力改變、還是通過逐步的壓力來完成。這個學說（對此最清晰的闡述可見於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對共產主義聯盟所作的演說）之為世人所熟知，是因為（為俄國鼓動家巴伏斯〔Pavlov〕所復興）它在一九〇五年為托洛茨基〔Trotsky〕所極力鼓吹，為列寧所採納，並在一九一七年由他們以更加實在的精確性付諸實踐。然而，馬克思本人根據一八四八年發生的事件放棄了該學說，至少在實踐上，放棄了至關緊要的核心部份。他逐漸拋棄了由一部份精英執掌權力這整個概念，在他看來，從一支敵對的常規軍和因循苟安、未受過訓練的無產階級這個角度來判斷，這些精英似乎無有任何影響。工人領袖既不缺少勇氣也不缺少實際感，但是在一八四八年他們根本仍無絲毫可能在反對保皇黨人、軍隊和中上階級的聯合力量的鬥爭中保住權力。除非使作為整體的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歷史作用，否則它的領袖肯定仍將是沒有希望的。他們也許可激發起一場武裝起義，但是如果得不

到大部分工人階級有意識的自覺支持，他們就別指望可以保住勝利的果實。因此，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一八四八事件至關緊要的教訓是，革命領袖的首要職責就是向民衆傳播他們的命運和使命的意識。這也許證明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但除非這一步實行了，否則終將一事無成，祇不過是在由冒險家和狂熱分子領導的偶爾爆發中浪費革命的力量而已，這類爆發由於沒有真正的大衆意願基礎，必將在短時期的勝利後，不可避免地恢復過來的反動力量所擊敗，接踵而來的必將是殘酷的鎮壓，那將長時期地削弱無產階級。根據這一點，他在導致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誕生的革命爆發的前夜，拒絕支持它——儘管以後主要出於策略動機，他還爲巴黎公社寫了一篇令人感動的雄辯有力的悼文。

他改變的第二個觀點，是和資產階級合作的可能性。理論上他仍然相信，歷史的辯證法決定了資產階級政權作爲達到共產主義的一個前奏，乃是必要的；但是在德國和法國，這一階級的力量，（及其公然決心保護自己以反對無產階級聯盟），使他相信和資產階級的契約會妨礙工人，使他們成爲更疲弱的力量，而從幕後支配的計劃却仍無法實現。這曾經是他和科隆的共產主義者之間主要的不同點，後者反對和自由主義者結盟，把它看成是自殺性的機會主義。至此，他自己也容納了他們的觀點，儘管並非出於他們的理由，也就是說，並非因爲此種機會主義係道義低下，或必定自我招致失敗，而是因爲在這一特殊情況裡，它注定是不成功的，注定要在一個並不可靠組織起來的政黨裡造成混亂，從而導致內部疲弱和失敗。由此，他在以後的歲月裡始終堅持黨的純潔性，以及擺脫任何妥協折衷的糾葛。逐步擴張的政策，通過公認的議會機構慢慢獲取政治權力，伴之以在國際範圍內通過工會和類似組織向僱主施加系統壓力，作爲促成工人經濟條件之改

善的一個手段，它體現了十九世紀後期以及二十世紀初期社會主義政黨的策略，這些是馬克思對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災難之原因所作分析的合理結果。

他的主要目標——創造使無產階級專政、「不斷革命」或許可得以實現的條件——沒有受到影響：資產階級和它的一切制度機構，不可避免地註定要滅亡。這個過程或許比他本來設想的要長；如果確是這樣，就必須教導無產階級要有耐心，一俟形勢本身成熟到可以介入了，領導人必須號召起來行動。與此同時，無產階級必須致力於耕耘、組織和訓練自己的力量，在決定性危機來臨時作好準備。歷史對這一結論提供了一個諷刺性注解：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創始人（或許可補充一句，馬克思認為他的理論不適用於俄國），根據馬克思較早期的以及一八五〇年被拋棄的觀點採取行動，當大眾對他們的任務還明顯不成熟時發動打擊，至少成功地改變了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那樣的結局；同時，當正統的德國和奧地利的社會民主黨人忠實於其導師後來的學說，小心翼翼地行動，把力量用在教育民衆意識到其成爲他們的使命時，却恰好被重新組織起來的反革命力量所壓倒。後者的力量，就無產階級而言，是不斷耗竭的，是歷史進程本應當早就給予致命地削弱的。

與此同時，在任何地方都見不到革命的跡象，不合理的樂觀主義情緒則爲一種深刻的沮喪所取代。「追憶起這些歲月，人們不能不忍受尖銳的痛楚」，赫爾岑在回憶錄中寫道，「……法國以流星飛逝的速度走向不可避免的政變，德國被可鄙的、叛變的匈牙利拖倒，對尼古拉沙皇府首稱臣……革命者鼓弄着空洞的宣傳。即使是最嚴肅的人，有時亦被徒具形式的東西所表現的魅力壓倒，竭力使自己相信，如果他們舉行各種會議，帶着大疊文件、草案，記錄事實，作出決定，印發宣

言，或諸如此類，那麼他們事實上確是在做事。革命中的官僚主義者可以沈湎於這類事情中，其程度恰如真正的衙門。英國湧現了數百個這樣的協會組織。莊嚴的會議舉行了，王公貴族牧師大臣隆重出席；財政部大臣籌措資金，記者孜孜於筆耕。人人都忙忙碌碌，却根本什麼都沒有做。這些慈善機構的或宗教的集會，實現了雙重功能，既作為一種滑稽逗人的形式發揮作用，又是塞給這些有點老於世故的基督徒的煩惱良心的一種賄賂……這整個事情是一項矛盾，一個公開的密謀，一個在敞開的大門背後策劃的陰謀。」

對任何大規模的政治流亡團體來說，它的成員之互相聯繫在一起，與其說是由於某個綱領清楚的事業，不如說是由於他們所處的環境——他們在早期歲月裡充斥着連綿不絕的陰謀、猜疑和指控。就在這種激動狂熱的氣氛中，馬克思度過了在倫敦的頭兩年。他堅決不和赫爾岑、馬志尼以及他們的同伴們打交道，但他並不是不活躍的。他把《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 改辦成評論刊物，組織救濟難民的委員會。他指斥科隆法院審判他的同伴所用的警察方式，揭發它的幫手們犯下的十足的偽造和假證；如果法庭不釋放他的同志們，他所做的就會使將來同樣的審判更難進行。馬克思還在共產主義聯盟內部，繼續展開反對維利希(Willich)的鬥爭，他相信一個倡導半真理的組織，要比它完全不活動更危險，還不如消亡，以通過無情的手段讓其解體更好些。既經成功地拋棄他以前的同伴，以及對其他流亡者又祇感到蔑視，把他們看成一羣既無益也無害的饒舌者，馬克思把自己和恩格斯組成爲一個獨立的宣傳中心，一個個人間的聯盟，圍繞着它，德國共產主義分散零亂的殘餘分子，會逐步再次集合成一股力量。這個計劃完全成功了。

這期間他最重要的著作，是關於法國近年來的事件。他在探討抽象問題時的風格，常常是晦

澀模糊的，但在探討事實時，却是簡潔明瞭的。論者《法蘭西內戰》（*The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以及重刊時題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的論文，都是分析透徹、以著作從事黨派論爭的典範。兩種著作涉及的範圍大部份相同，對革命和第二共和國作了出色的、論辯性的描述；按照階級的組合，詳細分析了政治、經濟與個人因素之間的關係和相互作用。這些因素包含了階級的需求。對法蘭西國家的作用有一段出色的分析：國家在這裡發揮的作用，與其說是統治階級的執行機構（《共黨宣言》的公式），不如說是一種權力的獨立來源，得到資產階級的支持，但也一再壓倒資產階級的願望以維護社會和政治現狀。在一系列敏銳簡練的敘述中，各黨的重要代表被劃分出來，歸入他們所依賴的階級。政治局勢從含糊的自由主義演變到保守的共和國，並由此演化成公開的階級鬥爭，並以赤裸裸的專制政治告終。這被表述為對一七八九年事件的一種滑稽仿效——一七八九年革命中相繼而來的每一個階段，都比它更為暴力、更為革命。一八四八年的情況則是實實在在地顛倒過來了。六月，無產階級被其小資產階級同盟軍背棄出賣了，後來又輪到小資產階級被中產階級拋棄，最後中產階級也為大地主和大金融家所擊敗，被送入軍隊和路易·波拿巴的口中。就政治家個人而言，這種情況是無法通過執行不同的政策來防止，因為它是由當時法國社會達到的歷史發展階段所決定的。

馬克思在這一時期進行的其他活動，包括向德國工人教育協會發表政治經濟學通俗演講，以及和當時散在各處的德國革命者相當可觀的通信往來，特別突出的是和恩格斯通信。恩格斯由於沒有其他維持生計的手段，既不情願也不樂意和其父母達成和解，因而定居在曼徹斯特，在其父的棉紡紗公司裡工作。以這種方式獲得了相對穩定的收入，並將此用來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支持馬

克思，直到他生命的終結。多年來，馬克思自己的經濟地位是毫無希望的，他沒有固定收入來源，家庭愈益龐大，而且其名聲亦妨礙了任何體面的公司有可能僱用他。他一家人在接下來的二十餘年間，生活在赤貧之中，以及由這種赤貧而身受難以言說的羞辱。這些常常被人描述。最初，全家從這幢簡陋房屋搬到那幢，從契爾西(Chelsea)到蘭開斯特廣場(Lancaster Square)，再到蘇荷(Soho)的污穢叢生的貧民窟，常常一貧如洗，無錢支付商販，全家直挺挺地挨餓，直到有一筆借貸或收到恩格斯的英鎊期票，纔暫時解了窘境。有時全家衣服送去典當，他們被迫數小時乾坐於沒有燈光沒有食品的情境，登門造訪的祇有債款催逼者，由這個或那個孩子將他們擋在門口，一成不變地脫口回答，「馬克思先生不在樓上。」

對馬克思最初七年流亡生活的情況，有一個生動的描述保存在設法潛入他在迪恩大街(Dean Street)寓所的普魯士密探的報告裡。「他所居住的是倫敦最惡劣最便宜的街區之一。他佔着兩個房間，裡面沒有一件乾淨像樣的家具，每一樣東西都是破爛碎裂、體無完膚的，上面蓋着厚厚的灰塵……手稿書報堆在孩子的玩具旁，從他妻子的縫紉筐裡又露出一、兩本。杯口碎裂的杯子、骯髒的匙子、刀叉、燈盞、墨水瓶、酒杯、烟斗、烟灰，一切都堆在同一張桌子上。走進房間時，濃烟嗆得你淚水直流，以至於一開始你似乎是在洞穴裡摸索行進——直到你習慣了，纔終於能在烟霧中分辨出某些東西。往下坐是一件危險的事情。這兒一張椅子祇有三條腿，那兒有一張恰好是完整的，孩子們正在上面玩烹調遊戲。給來訪者坐的就是這張椅子，但孩子的炊事玩具並未撤去，你要是坐下了，就得擔當損失一條褲子的風險。但是所有這些至少不會令馬克思夫婦難堪。你受到最友好的歡迎，並親切地向你奉上烟斗、烟絲或隨便什麼恰好有的東西。隨之就有一場聽

明有趣的談話，那將彌補所有家計方面的不足，並使客人的不舒坦成爲可以忍受的了……」<sup>①</sup>

一個才華橫溢的人，被迫住在閣樓上，當他的債主逼債益急時便東躲西藏，或因爲衣服進了當舖而被迫臥床不起，這是歡快傷感的喜劇的傳統題材。馬克思不是什麼豪放藝術家，他的不幸給了他悲慘的影響。他驕傲，特別敏感，向世界提出很高的要求。他的處境帶給他羞恥和侮辱，他自認爲非他莫屬的領導地位這種願望受到挫折，他那強大的天賦生命力受到壓抑，這些使他常常處於突發的憤恨和狂怒之中。他的怨恨情緒常常在他的著作中、在長時期的殘忍的個人爭鬥中得到宣洩。他看到處處是詭計、迫害和密謀。他的犧牲品越是辯稱自己的無辜，他就越認定他們是奸詐有罪的。

他的生活方式包括白天造訪不列顛博物館的閱覽室，在那兒他一般從上午九點待到下午七點的閱覽室關閉，接着是晚間的長久工作，不停地吸煙，這從一種享受開始已經變成不可缺少的鎮痛劑，給他的健康帶來持久的影響，使他易受肝部疾病的頻繁侵襲，有時候並伴之以癩瘡和眼睛發炎，干擾了他的工作，使他疲乏和易怒，給他本來就不穩定的生活來源帶來麻煩。「我像約伯（《聖經》中人物——譯注）一樣深受折磨，儘管不像他那樣畏懼上帝」，他在一八五八年寫道，「這些紳士們（醫生）所說的，一切歸結爲作人理當富足興旺，不像我這般的窮鬼，窮得像教堂裡的耗子（西方諺語——譯注）。」在其他場合他又常常發誓說，資產階級最終將爲他的每一處癩瘡炎付出昂貴的代

<sup>①</sup> 即 B. Nicolaievsky 與 O. Maenchen-Helfen 所著《Karl Marx... Man and Fighter》一書，第二百五十六頁至五十七頁。（Penguin Books 1976 年版）。

價。恩格斯在這段時期的年收入似乎沒有超過一百英鎊，作為他父親的代理人，他必須用這些錢維持一個在曼徹斯特體面的寓所，因此，以他全部的慷慨，一開始亦無法全部包下馬克思的生計；科隆的朋友們，或慷慨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像李卜克內西或弗賴利格拉特，盡力為他籌措小筆款項，加上他偶爾為報刊撰稿的稿酬，從他在荷蘭的富有的叔叔那兒得到的零星「貸款」，以及親戚那兒的小額遺產，這些使他得以在生存的邊緣維持下去。所以，不難理解，他憎恨貧困以及它所帶來的邪惡的奴隸般勞動和墮落，至少和他憎恨奴性一樣激烈。他在著作各處裡描寫了工業貧民窟、礦山村莊和種植園的生活，描寫了文明輿論對此的態度，這些描述結合了激烈的憤慨和冷冰冰的、完全非歇斯底里的尖刻，這些，特別當他的敘述愈益詳盡、他的口吻愈益反常的安靜和平板時，就具有一種威脅性的品質，在讀者中引起震怒和恥辱感，而卡萊爾(Carlyle)的熾熱言辭、穆勒(J. S. Mill)的尊嚴與人性呼籲，或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遒勁雄辯，却並不能打動他們。這些年裡，他的三個孩子死去了，他們是兒子奎多和埃德加，女兒弗朗西絲卡，主要原因是他們的生活條件太壞。弗朗西絲卡去世時，他無錢買一口棺材，靠了一位法國難民的慷慨資助纔解決了問題。這次變故在馬克思太太寫給一位流亡者的信裡，有十分慘痛的詳盡描述。她本人亦常常疾病纏身，孩子們則由終身陪伴他們的家庭僕人海倫·德莫斯照顧。

「我不會也不能去請醫生」，他就某一次窘況致信恩格斯，「因為我沒有錢配藥。最近八天或十天來，我給全家吃的是麵包和馬鈴薯，而我今天是否還能弄到甚至這些東西，都還是一個問題。」他天生沉默寡言，沒有人比他更不會自怨自憐了，確實，他在致恩格斯的信裡，有時候以無



情的嘲諷口氣譏刺自己的不幸，這或許對漫不經心的讀者隱瞞了他常常身處於絕望的情況。但是，一八五六年，他極鍾愛的兒子埃德加年方六歲時去世了，這甚至打破了他那鐵一般的緘默。「我已經忍受了每一種不幸」，他給至友寫信道，「但是我實在是剛剛領略到真正的不幸是什麼……我在這些天裡經歷的所有痛苦中，想到你，你的友誼，想到這個世界上我們也許仍然還有合情合理的事情可做這一希望，這使我振作起來……」

「培根說真正的大人物和大自然及世界有着如此之多的聯繫，有着如此之多事情令他們感興趣，使得他們可以很容易地從任何損失中恢復過來。我不屬於這些大人物之列。我的孩子的去世極大地影響了我，以至於我至今仍像他去世的那一天一樣痛苦地感受到這個損失。我的妻子也完全崩潰了。」

全家人可以得到的唯一歡樂，是夏日假期間偶爾在漢普斯坦德野餐。他們常在星期天早晨從迪恩街的寓所出發，一起前往的有萊徹·德莫斯(Lenchen Demuth) (馬克思愛上了她<sup>②</sup>) 以及一、兩個朋友，帶上食品籃子和路上購買的報紙，向漢普斯坦德走去。那兒，他們總是坐在樹蔭下，孩子們遊戲採花時，大人們談話、閱讀或睡覺。隨着午後時光的消逝，情緒愈益歡快，特別是快樂的恩格斯也在場時。他們講笑話、唱歌、賽跑。馬克思背誦詩歌，這是他極愛作的，他讓孩子

② 一八五一年，她給他生了一個兒子，人們稱他為弗里德里克·德莫斯。馬克思似乎並不喜歡這個兒子，就目前所知也從未承認過他。他得到忠實的恩格斯的照顧，以後又由他的異母姊姊愛琳看管。恩格斯臨死前向她透露了真相。弗里德里克·德莫斯是一個體力工人，好像在八十歲時死於英國。

們騎在他的背上，讓每個人都快樂一番，以及作為最後一個高潮，他會莊重地登上一匹驢子在大家面前來回走動，這番景象總是給大家帶來歡快。夜幕降臨，他們走回家去，在路上常唱起德國或英國的愛國歌曲。然而，這些令人愉快的場合是難得的，也並沒有給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稱之為流亡的無眠之夜帶來什麼光明。

這一狀況因《紐約論壇報》突然地邀請馬克思定期撰寫歐洲形勢的文章，而得到舒緩些。發出約請者，是該報國際事務編輯查爾斯·奧古斯特斯·戴納(Charles Augustus Dana)，他於一八四九年在科隆由弗賴利格拉特介紹給馬克思。馬克思的政治敏銳性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紐約論壇報》是一份激進的報紙，由傅立葉的一群美國追隨者所創辦，在那個時期有二十萬份的發行量，當時大概是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它的觀點完全是進步的：在國內事務方面，它堅持反對蓄奴、支持自由貿易政策；在國際事務方面，它攻擊專制原則，從而發現自己和歐洲的所有政府完全是對立的。馬克思固執地拒絕和歐洲大陸刊物合作的要求，他認為它們的傾向是反動的。他欣然接受了《論壇報》的約請。這位新記者的每篇文章將得到一英鎊的稿酬。在將近十年裡，他為它寫每週電訊，涉及題目非常廣泛，即使今天看來，這些題目仍令人產生某種興趣。戴納最初要求他就德奧戰爭中雙方軍隊的戰略戰術寫系列文章，同時一般地評論現代戰爭藝術。鑒於馬克思對後一個題目一無所知，而且他當時的英語水準亦極差，所以他發現現實這個要求遠非易事，但是，拒絕任何可以提供穩定的、即使是不很足夠的收入來源的東西，乃是不可想像的。進退兩難中，他轉向恩格斯，正如以後很多場合的情況一樣，恩格斯隨時樂意寫這些文章並署上馬克思的名字。自此，每當題目是馬克思不了解或不適宜寫的，或因他人不在或健康問題而不能寫時，

就請出恩格斯，由他操刀代庖，其效率之高，使《論壇報》駐倫敦記者很快在美國得到可觀的名聲，作爲一個格外多才多藝、消息靈通的記者，有著他自己明確的讀者群。

恩格斯關於德國革命的文章，被結集爲馬克思的一本小冊子，題爲《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Germany)，其結尾處斷定，在不久的將來革命就將以甚至更大的暴力爆發。後來朋友們承認他們兩人是過於樂觀了。馬克思系統地闡述過一個著名的概括，即祇有一次經濟蕭條纔會導致一場成功的革命，因此在一八四七年的經濟崩潰中，一八四八年革命成熟了；而一八五一年繁榮，打消了即刻燃起革命烈火的希望。

所以，兩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找出重大經濟危機的徵兆。恩格斯從他在曼徹斯特的辦公室發出的信裡，充滿了世界市場狀況的訊息；英格蘭銀行的黃金損失，一家漢堡銀行的破產，法國或美國的農業收成很差，這些都被他們欣喜地注視著，認爲表明了大危機就將來臨。一八五七年，一場如此規模的真正危機終於發生了，然而並沒有任何革命的發展隨之而來，祇有農業國的意大利是例外。從那以後，不可避免的危機就較少提及了，討論較多的則是組織一個革命政黨。急劇的失望起作用了。

當恩格斯探討美國公衆感興趣的軍事情報問題時，馬克思發表了一連串文章，討論英國的內政、外交政策、憲章主義，以及英國政府各部的性質特點，這方面他成爲用幾個惡毒的句子加以歸納總結的專家，常常損害令他頭痛的《泰晤士報》。他寫了大量關於英國在印度和愛爾蘭的統治的文章。他聲稱，印度無論如何也注定要被一個較強大的力量征服：

「問題並不在於英國人是否有權利征服印度，而在於我們是否寧可讓它被土耳其人或俄國人

征服……當然，強迫英國資產階級要解放或改善印度人民的社會條件是不可能的，它們不但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取決於人民對生產的所有權。但是能夠做的事，是創造實現這一雙重要要求的物質條件。」

再者，他於一八五三年寫道，「成千上萬勤勞和平的、族長的、社會的部族團體，突然被切斷了和他們的古老文明、他們的傳統生存手段的聯繫。這種崩圯荒涼的景象，無論在我們看來可能會多麼令人憂傷，我們決不可忘記這些田園式的鄉村社團……始終提供了東方專制的一個堅實基礎，把人的理性智慧禁錮在最狹窄的範圍裡，使它成爲迷信的傳統盲從工具，阻礙它的發展成長，使它喪失……歷史活動的所有能力；讓我們不要忘了野蠻的利己主義，他們緊守住地球表面的一個無關緊要的部份，當巨大的帝國崩潰瓦解時，當無法形容的酷行犯下時，當整座整座城市的人慘遭屠戮時，他們卻無動於衷，——看著它們發生，好像是自然的事情，所以有哪個侵略者一旦把注意力轉向他們時，他們自己就成了毫無希望的犧牲品。……英國在導致印度社會革命方面的動機是微乎其微的，緩慢地、笨拙地進行著這場革命，這毫無疑問。但問題的關鍵不在這裡，而在於在亞洲沒有一場完全的社會革命，人類能否實現自身的目的。如果不能，那麼英國儘管有著它犯下的一切罪惡，仍然成爲引起這場革命的無意識的歷史工具。」

關於愛爾蘭，他說英國勞工的原因和愛爾蘭的解放牢牢地聯繫在一起，後者的廉價勞工對英國的工會是一個持續的威脅，它在經濟上的屬從，正如俄國的農奴制和美國的蓄奴制的類似情況一樣，必須消除，愛爾蘭的英國主人纔能希望解放自身和創造一個自由的社會，這裡，英國的工人階級也必須包括進去（他們對待愛爾蘭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和美國南方各州的「貧窮白人」對

待黑人)。在以上兩個例子裡，他始終低估了正在崛起的民族主義力量，他痛恨一切分裂主義，正如痛恨一切建立在某種純粹傳統的、或感性的基礎上的制度機構，這使他看不清它們真正的影響。恩格斯在寫到捷克人時，以同樣的精神認為斯拉夫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人爲維護的、不真實的現象，將不能長期抵擋優等的德國文化的前進。這種同化吸收，對弱小的當地文明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命運，其原因在於歷史向心趨勢的力量，導致了較弱小的文明被兼併入較強大的，這種傾向是一切進步的政黨都應該積極鼓勵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民族主義，連同宗教和軍國主義，均爲諸多不合乎時代潮流的事物，同時又是資本主義秩序的副產品和堡壘，不合理的反革命的力量，隨着它們的物質基礎的消失，都將自動地消亡。馬克思自己在考慮它們時，採取的策略性政策是在一個既定的情形下，看它們是有利、抑或不利於無產階級的事業，僅僅按照這一準則，決定應當支持還是攻擊它們，因此他贊成在印度和愛爾蘭的民族主義，因爲它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一種武器；他攻擊馬志尼或科蘇特的民主民族主義，因爲在如意大利、匈牙利或波蘭這樣的國家，在他看來，它的作用似乎祇是爲了以本國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來取代外國的，從而就阻礙了社會革命。在英國政治家們中，他攻擊羅素(Russell)爲冒牌的激進分子，其每一步驟都暴露了他的目標，但是馬克思所嫌惡的人無疑是帕麥斯頓(Palmerston)，指控他是一個偽裝的俄國代理人，嘲笑他對歐洲弱小民族的多愁善感的支持。然而，馬克思在鑒定一切形式的政治能力方面是一位行家，他承認相當佩服這位憤世嫉俗、無憂無慮的政治家在應付最無恥的打擊時，表現出來的才幹和機敏。

馬克思對帕麥斯頓的攻擊使他和一位特別古怪、鋒芒畢露的人物建立了聯繫。大衛·厄克特(David Urquhart)年輕時在外交界工作，在雅典成爲一個親希臘的人之後，他又被轉派到君士坦

丁堡，在那兒他產生了對伊斯蘭教和土耳其人的熾熱的終生激情。他讚美土耳其憲法的「純潔」，稱頌土耳其蒸氣浴的精神和肉體作用，並把它介紹給自己的同胞。他同樣崇拜羅馬天主教，和它保持着極好的關係，儘管他終生都是一個加爾文派教徒。結合這點，他同樣激烈地憎恨輝格黨人，自由貿易，英國新教，工業主義，特別是憎恨俄羅斯帝國，認為它的惡毒的無所不能的影響，要對歐洲一切罪惡負責。這位怪僻的人物，一個從較寬鬆多樣的時代殘存的生動形象，作為無黨派人士任議員多年，出版了一份報紙和大量小冊子，幾乎全部致力於揭露帕麥斯頓這個單一目的，指控他是沙皇僱傭的一個代理人，終其一生努力企圖按其主子的利益破壞西歐的道義秩序。甚至帕麥斯頓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的態度也沒有動搖他的看法，把這種態度解釋為掩蓋他的真正活動的狡猾詭計，由此就有了他對整個戰役的蓄意破壞，很清楚其意圖是盡可能少地損害俄國。馬克思以某種方式得出了同樣古怪的結論，似乎亦同樣真正相信帕麥斯頓是被收買了。這兩個人相遇了，結成聯盟。當馬克思正式成為厄克特分子，為厄克特的報紙撰稿並出現在他的會議講壇上時，厄克特出版了馬克思寫的反帕麥斯頓的小冊子，馬克思的文章後來亦結集出版，最奇怪的是《帕麥斯頓勳爵傳》（*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和《十八世紀秘密外交史》（*The 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兩本書都致力於揭露在所有重大的歐洲災難中隱藏着的俄國之手。兩個人都以為出於自己的目的，在高超地利用着對方；馬克思認為厄克特是一個無害的偏執狂，一個或可以利用的人；厄克特就他這方面而言，高度看重馬克思作為一個宣傳家的才能，在某一次場合他祝賀馬克思擁有的智慧，簡直可以媲美一個土耳其人。這般古怪的關係和諧地（即使是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多年。在帕麥斯頓和沙皇尼古拉去世後，聯盟逐

漸解體。馬克思在和這位古怪的資助人的關係中感到極大的快樂，獲得他所能得到的財政幫助，很快就非常喜愛他了，他們的關係一直是完全友好的，直到厄克特去世，在這點上，厄克特在他的政治盟友中確實是獨特的。

馬克思在工會領袖中找不到什麼支持者。他們中最能幹者，要麼持和歐文沒有什麼差異的觀點，按照歐文的成就的光輝榜樣，竭力證明階級鬥爭學說是邪惡的、沒有根據的；要麼就是一些忙忙碌碌的當地勞工領袖，爲此行業彼產業的眼前需求而工作，對範圍較大的問題充耳不聞，隨時準備歡迎所有激進分子平等加入一個叫「兄弟民主主義者」(The Fraternal Democrats)的同盟，就這名稱已令馬克思噁心。他容忍像口若懸河、精力飽滿的喬治·哈尼(George Harney)這樣的激進分子，他和恩格斯稱其爲「公民希伯·烏拉」。(原文 Hip Hip Hurray，是英國人激動時的呼喊聲——譯注)。在這些日子裡，唯一和馬克思立場接近的英國人是歐內斯特·瓊斯(Earnest Jones)，一個革命的憲章主義者，毫無希望地企圖重振正在消亡的憲章運動。瓊斯出生在漢諾威，並在那兒長大，在英國他是最近似於馬克思所熟悉的那種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者，他的觀點，特別在晚年時，雖然太類似於「真正社會主義者」赫斯(Hess)和格律恩(Grün)的觀點，完全爲了取悅於馬克思，但馬克思需要同盟者。選擇是有限的。他接受瓊斯，把他看作英國可提供的、最好最進步的同盟者。瓊斯對馬克思和他的家庭懷有極大的崇敬和愛慕，向馬克思提供了大量有關英國狀況的訊息。正是他使馬克思的注意力轉向當時仍在蘇格蘭進行的圈地活動，爲了開闢養鹿場和牧場，那裡成千上百弱小的佃農租戶被逐出家園。馬克思了解的結果是在《紐約論壇報》刊載一篇尖刻的文章，談蘇瑟蘭公爵夫人的私人事務，後者曾對美國黑奴的解放事業表示過同情。該文章

是《資本論》中一大塊文章的梗概，是一篇尖刻激烈的雄辯傑作，深得伏爾泰和馬拉(Marati)之猛烈抨擊的遺風，成爲以後很多社會主義者發表抨擊之詞的典範。它的攻擊與其說是針對個人的，不如說是針對制度的，在這制度下，一個反覆無常的老太婆，和她那個社會的大多數人一樣瘋狂、沒心肝，心懷惡意，以其絕對的權利，完全得到她的階級和輿論的批准，侮辱和毀滅了所有那些誠實勤勞的男男女女，把他們趕出家園，使他們在一夜之間成爲赤貧，就在完全屬於他們的一片土地上，因爲這片土地上一切人所製造的東西，都是他們和他們的祖先通過勞動創造出來的。

這類社會分析和攻擊，和馬克思就外交事務所寫的枯燥的諷刺性文章，一樣使美國讀者滿意，而後一類文章亦消息靈通，機智敏銳，語氣上不偏不倚。它們並不顯示出先見之明的特別力量，也從未試圖綜合評述作爲一個整體的當代事務。作爲對事件的評論，它們不如作者在這一時期致恩格斯的信那麼坦率 and 有趣，但作爲新聞寫作，它們是走在時代前面的。馬克思的方法，是向讀者提供事件或人物的簡潔概述，強調十之八九要由此產生的隱藏起來的利益和邪惡活動，而不是行動者自己提供的明確動機，或這種措施那項政策的社會價值。他的新聞寫作，比理論作品更生動地展示了他那自然主義的、尖刻的、不信任的、倫理道德上的懷疑主義態度，和同時代大部份多少是人道主義和惟心主義的社會歷史學家與批評家之間的態度有所差別。同時，他從事於爲經濟論文蒐集材料，這些論文應該作爲一種武器發揮作用，反對鬆散結合的激進團體的模糊的唯心主義，在他看來，這將導致思想和行動的混亂，瓦解工人擁有的數量已經如此之少、頭腦清楚的領袖的努力。就在這裡，他致力於建立一個沒有模稜兩可詞句的學說，而不管他本人的意圖是否如此，是否堅持這個學說立刻成爲社會革命者團結的及更重要的是鬥爭的團體的檢驗、根據和保



證。他們的力量來自於團結，而他們的團結來自於共同具有的實際信念的一致性。

他的學說的基礎體現在他以前的著作裡，突出地體現在《共產黨宣言》中。在他寫於一八五二年的一封信中，他謹慎地表述了他在他看來是學說中的原來思想：「我所創新的是證明：一、階級的存在，僅僅和生產發展的特定的歷史的階段聯繫在一起；二、階級鬥爭必定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三、這一專政本身僅僅構成了消滅一切階級和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階段。」新的運動便將建立在這些基礎上。

在某種意義上，他獲得成功之快出乎他的意料。在一八四八年的崩潰基礎之上，德國社會主義工人的一個新的戰鬥性的政黨，迅速崛起壯大，為他創造了一個新的實際活動領域，並使他把後半生精力投入於其中。這個政黨並非由他所創，但是他的思想，以及更重要的是他詳盡闡述的政治綱領的信念，啟發鼓舞了黨的領袖。在每一個轉折點，都有人和他商量探討；每一個人都知道是他，僅僅是他喚起了這場運動，創造了運動的基礎，所有理論和實踐的問題都本能地向他請教；人們崇拜他，害怕他，懷疑他，服從他。然而，德國工人並不把他看作他們最重要的代表和戰士。把他們組織進一個政黨，並以絕對權力支配黨的人，比馬克思小幾歲，在和馬克思相似的環境下出生和成長，但在氣質和觀點上，比當時明確承認的要更不同於馬克思，乃至於和他是對立的。

弗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創建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它最初的輝煌歲月裡領導了它。他是十九世紀最熱情的政治人物之一。生而為一個西里西亞猶太人，操過律師生涯，生就浪漫革命家的氣質，拉薩爾的突出特點，是他的敏銳的悟性，是他作為一個組織者的才華，是他的

自負虛誇，是他的無窮精力和自信。鑒於往上爬的大部份正常途徑因為他的種族和宗教使他無緣跨入，他便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革命運動，在那兒，他的非凡能力，他的激情，但首先是作為一個鼓動家和受歡迎的演講者的天才，迅速使他升入領導層。在德國革命期間，他發表反政府的煽動性演說，為此他受到審判，關進監獄。在反動恥辱時期以後的歲月裡，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國外，在仍然待在德國的原來的領袖中，祇有李卜克內西(Liebknecht)繼續忠誠於社會主義事業，而拉薩爾親自擔當起這項任務，在一八四八年的崩潰基礎上，創建一個新的、組織得更好的無產階級政黨。他設想自己成為黨的唯一領袖和激勵者，黨的精神的、道德的和政治的獨裁者。他以輝煌的成功完成了這項任務。他的信念分別均等來自黑格爾和馬克思：從後者那兒，他得到經濟決定論，階級鬥爭學說，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剝削不可避免理論。但是他反對以社會的名義譴責國家，拒絕按照蒲魯東和馬克思的說法，把國家看作僅僅是統治階級的強制性工具，他接受黑格爾的論點，根據這個論點，國家，即使在其目前的狀況中，亦起着人類聯合起來過共同生活的過程中最進步最有生氣的作用。他強烈信奉中央集權化，以至於達到這樣一種程度，亦信奉內部的國家團結。至後來，他開始相信有可能在國王、貴族、軍隊和工人間建立反資產階級的聯合陣線，其頂點是建立一個獨裁的集體主義的國家，由君主領導，按照唯一真正生產的，即勞工的階級利益組織起來。

他從來就不很容易和馬克思、恩格斯相處。他聲稱在理論問題上馬克思是他的導師，戰戰兢兢地向馬克思表示敬意。他到處宣揚馬克思是一個天才人物，安排馬克思的著作在德國出版，要不然就在其他很多方面努力為他服務。馬克思不情願地承認拉薩爾精力充沛的價值以及他的組織

能力，但在個人方面拉薩爾卻使他反感，政治上更是很深地懷疑他。馬克思不喜歡他的賣弄、放肆、自負、裝模作樣的態度，他那種喧喧嚷嚷的公職口味，以及他的觀點和野心。馬克思憎惡他浮光掠影地評述社會的和政治的事實時所表現的浮華，在馬克思看來，和他本人痛苦而又艱難的透徹研究比較起來，這似乎是沒有價值的、浮淺表面的，靠不住的。他不喜歡也不信任拉薩爾對工人施行衝動無常、變幻莫測的控制，乃至於他和敵人專心致志的調情。最後，馬克思對這次運動既感到妒嫉，又想佔有它，該運動在實際政策和思想基礎上都歸功於他，此時卻似乎拋棄了他，迷戀於一個政治蕩婦，一個華而不實、閃閃發光的冒險家，一個在私生活和公共政策上均公開承認的機會主義者，不受任何明確的計劃指導，不依附於任何原則，沒有任何清楚的目標可以為之努力。然而，在他們之間也存在着一定的親密關係，或者說，即使不是親密的，雙方也互相讚賞。拉薩爾出生和成長的精神氛圍和馬克思的相類似，他們和同樣的敵人作鬥爭，在所有基本的問題上，他們的說法也是一樣的，而這是蒲魯東、巴枯寧和英國工聯主義者所沒有做過的，亦是前青年黑格爾派早就不再做的，再者，拉薩爾是一個行動的人，一個真正的革命家，絕無畏懼。雙方都意識到（儘管馬克思或許把恩格斯排除在外）對方擁有比黨內任何人都要高的政治智慧、洞察力和實際膽識。他們本能地互相理解對方，並發現互相交流既容易也令人振奮。當馬克思去柏林時，便很自然地 and 拉薩爾待在一起；而拉薩爾來倫敦時，也和馬克思待在一起。拉薩爾在倫敦時，馬克思正處於赤貧狀況，僅僅因為拉薩爾親眼目睹了他的狀況，因此也因為拉薩爾快活的饒舌和隨便鋪張，在雪茄和鈕扣上的花費比馬克思全家一週的生活費還多，使這位高傲敏感的主人大為惱火。另外在馬克思向他借的一筆款子方面也有些難處。而拉薩爾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因

爲他對自己周圍的環境格外淡然處之，正如生機勃勃、浮誇激動的性格常常表現的那樣。馬克思從沒有忘記自己身受的羞辱，自拉薩爾倫敦之行後，他們的關係迅速惡化了。

拉薩爾以在他的時代還是新的方法創建了新的政黨，這種方法當時僅偶爾爲英國憲章主義者所運用，儘管以後爲人們所熟知。他進行一系列廣爲宣傳的政治旅行，橫越德國工業區，發表激烈的煽動性演說，使無產階級聽衆爲之傾倒，激起他們極大的熱情，並在當時當地把他們組成新的工人運動的各部份，再組織成一個正式的合乎法律手續的政黨，從而公開告別了那種秘密碰頭，並開展地下宣傳活動的革命小組的陳舊方法，他在追隨者的簇擁下在被佔領的土地的最後一程旅行是凱旋式的，進一步加強了他在各種年齡、不同職業、形形色色的德國工人中已經具有的獨一無二的影響。

黨綱的理論基礎是借來的，主要是來自馬克思，也許在一定程度上來自激進的普魯士經濟學家羅德貝爾圖斯(Rodbertus)，但是該黨卻有着很多強烈的非馬克思主義特點：它並不是爲進行一場革命而組織起來的；它準備和其他反資產階級政黨結成聯盟；它的目標似乎是國家資本主義；它是民族主義的，主要局限在德國的環境和需求上。它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發展一個工人的合作體系。它並不是替代政治行動，而是作爲政治行動的一個內在因素，由國家來組織，或得到國家的財政資助。然而它仍然差不多類似於蒲魯東的非政治性互助主義，（以及在政治上麻木的英國工聯主義），從而招致馬克思的公開敵視。此外，該黨是以某個人的個人優勢手段創建的。拉薩爾在晚年時推行的沒有遭到異議的專權中，有一個強烈的感情因素，一種崇拜英雄的方式，這令馬克思感到本能厭惡，他不喜歡任何形式的非理性，亦不信任政治上以魅力迷人者。拉薩爾把那種

理論引入德國的社會主義中，或許會產生這樣的環境條件，可以和專制的普魯士政府結成真正的聯盟反對工業資產階級。這種機會主義，肯定被馬克思看成一切可能的缺陷錯誤中最具毀滅性的。一八四八年的經驗即使沒有提供其他教訓，也確切表明了，對一個年輕的而且相對來說仍無抵抗力的政黨來說，和另一個基本敵視它的要求、基礎牢固的較老的黨結盟，其結果是致命的。在這種聯盟中，雙方都試圖利用對方，而力量較強的一方終將不可避免地取勝。馬克思正如他於一八五〇年在共產國際中央委員會所作的演說明確闡明的那樣，認為自己犯了嚴重的錯誤：假定和激進資產階級結盟在無產階級取得最後勝利之前乃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但是甚至他也從未夢想過爲了攻擊諸如此類的自由放任主義去和封建貴族聯盟，其目的僅僅是達到某種國家的控制。他把此項行動看作對他的政策和抱負所作的典型的巴枯寧式歪曲仿效。

在對民衆的態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都是堅定的德國民主主義者，本能地反對浪漫的精英論萌芽。現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種精英論存在於拉薩爾的信念、行爲和演講中：特別存在於他的熱烈的愛國主義中：他那種作爲獻身的領袖所表現的自我戲劇化行爲，他對至少在一段時期裡由軍事貴族控制的國家計劃經濟的信念，他擁護在義大利爭取統一和共和運動中德國站在法國皇帝一邊進行軍事干預（他爲此辯護，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理由是祇有一場戰爭纔會加速德國的革命），他決不隱瞞對馬志尼和波蘭民族主義者的同情，以及最後一點，他相信普魯士現存國家機器能夠用來支援德國的小資產階級以及無產階級，反對商人、工業家和銀行家的日益蠶食。本世紀法西斯政權的經濟政策，給拉薩爾的這種信念作了一個古怪的注解。他按照這些路線確實走到和俾斯麥談判的地步，兩個人都有這種印象，以爲時機來臨時，一方可以利用另一方來達到

自己的目的；雙方都意識到並佩服對方的大膽，智慧，擺脫了謹小慎微的顧慮；在政治現實主義的坦率方面，在公開蔑視他們平庸的追隨者上，在崇拜權力和成功方面，以及諸如此類，他們倆是互不相讓的。俾斯麥喜歡個性鮮明的人，晚年時常快樂地提到他們倆之間的交談，說他決不指望再碰到如此有意思的人了。拉薩爾在這方面事實上走得有多遠，這在一九二八年發現的俾斯麥的談判私人記錄中，陸續披露出來。這些談判因拉薩爾在一次決鬥中早逝而中斷了，該次決鬥起因於一次偶然的愛情糾葛。如果拉薩爾仍活着，如果俾斯麥繼續以其幾乎是妄自尊大的虛誇玩弄手法，拉薩爾最終幾乎肯定會輸掉，新建的黨或許也早就垮掉了。作爲一個鼓吹國家至上的理論家，作爲一個蠱惑民心的政客，拉薩爾確實應當被看作不僅是歐洲社會主義的創始人之一，而且同樣是領導論和浪漫的權力主義論的創始人之一。也許就是它的這種法西斯主義的特色吸引了俾斯麥。

在馬克思主義者和拉薩爾派之間隨後發生的衝突中，馬克思正式取得了勝利，挽救了他的學說和政治方法的純潔性，奇怪的是，這並沒有應用在它們最初爲之而創造的德國，卻應用在難似令他想到的遠較落後的國家裡：俄國、中國，以及在某些程度上，應用在西班牙、墨西哥和古巴。拉薩爾死於一八六四年春的消息，並沒有在馬克思或恩格斯的心中引起什麼同情。在他倆看來，如此死去似乎是自負浮華，愛出鋒頭的荒謬生涯中一個典型的愚蠢結局。要是他仍活着，也許會證明是一個極大的障礙。然而這種寬慰，至少在馬克思的情況下，不見得就不混合了一定的感情上的遺憾，爲失去如此熟稔的人，失去一個他所看得起的人，這種人爲數極少，儘管拉薩爾有諸種缺陷弱點；也不見得就不混合了某種並非完全不是愛慕的感情。拉薩爾是一個德國人，一個黑

格爾主義者，和一八四八年事件以及他本人的革命歷史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儘管他有着極大的缺陷，他仍然遠遠高過他所活動於其中，並在短暫時期裡傾注了自己的生命力的、愚昧民衆之上，他很快就筋疲力竭地沉沒在他們原有的冷漠淡然之中，甚至顯得比以前更弱小，更畏縮、更平庸了。

「他畢竟是老派人物之一，」馬克思寫道，「我們敵人的敵人，……令人難以相信的是如此喧鬧、如此轟轟烈烈、富有進取心的一個人如今死去了，像個老鼠，必須鎖住自己的口舌……魔鬼知道，民衆運動在縮小，沒有新鮮血液再湧出來。」

拉薩爾的死訊使他的情緒處於極少見的抑鬱狀態，幾乎是絕望了，大異於他生活中常見的憤怒和怨恨。感受到自己完全處於孤獨狀態，面對歐洲反動力量的勝利，一個個人的努力都是毫無希望的，感到英國生活的寂靜和單調，遲早會在所有流亡的革命者中瀰漫，這突然把他壓倒了。確實，他們中很多人談起英國人的生活和英國的制度習慣是尊敬的，甚至是崇拜的，這便無疑是承認他們自己個人的失敗，承認他們失去了對人類爭取自身解放的力量所持的信念。他們看到自己逐漸沉入謹小慎微，幾乎是憤世嫉俗的清靜無爲之中，他們自己也明白這便是承認失敗，承認戰鬥的一生是完全無價值的，承認理想世界的最後崩潰，在這個理想世界裡，他們已經無可挽回地投入了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以及很多屬於別人的東西。這種情緒發生在赫爾岑、馬志尼、科蘇特身上是人們所熟知的，但在馬克思卻很不平常。他真正相信歷史的進程是不可避免的，儘管有倒退，但總是進步的。這一強烈的信念，排除了在基本問題上所有懷疑和幻滅的可能性：他從不依賴個人的或大眾的遠見或理想主義，把它們看作社會革命的決定因素；既然不作此等考慮，在

六十和七十年代精神道義的鉅大崩潰中也就沒有失去什麼。他一生致力於摧毀或削弱那些相信個人力量可改變國家命運的民衆領袖與煽動家們的影響，他猛烈攻擊蒲魯東和拉薩爾，以及後來和巴枯寧的爭鬥，並不僅僅是這樣的行動，即作爲一個決心要摧毀所有可能的對手、野心勃勃、專橫暴虐的人在力爭取得個人優勢。本質上他有着幾乎是病態的妬忌。這是真實的。然而，混雜在他個人感情中的，還有對嚴重的判斷錯誤的憤慨。在他看來，這些人對此似乎負有極大的罪責，他甚至，（儘管想到他自己的地位這似乎是有諷刺意義的），更爲強烈地感到，極度不贊成此類占支配地位的個人所具有的影響，不贊成個人權力的因素，這種個人權力因素導致了領袖和追隨者之間的虛假關係，遲早必定使雙方都看不到客觀形勢提出的要求。

然而情況仍然是，在他一生的最後十年中，他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佔據的獨特權威地位前所未有地加強了他的理論體系，並確保了諸體系被採納，而非僅僅是對他的著作表示關注，或按照它們來考慮歷史。他晚年在倫敦出版的有些著作讀來令人壓抑；除了在德國和美國報刊上的新聞寫作，以及因貧困所迫而賣文外，他幾乎全身心投在宣傳小冊子上，其篇幅最長者《福格特先生》（*Herr Vogt*）寫於一八六〇年，意在洗清他在科隆審判期間給朋友帶來不必要危險的污名，反擊指控者——一位著名的瑞士博物學家（*naturalist*）和激進政治家卡爾·福格特（*Karl Vogt*），馬克思指稱他受僱於法國皇帝。有意義的僅僅是馬克思的這種作法，有助於理解隨着英雄主義時代接踵而來的十年失望挫折帶來的抑鬱，其中充滿了爭吵和詭計。一八五九年，他終於發表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然而，儘管它的導言部份包含了他的歷史理論的最清晰表述，但仍沒有什麼讀者。八年以後，其主要論點在《資本論》



第一卷中得到遠較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

他對自己事業的必勝信念，即使在最黑暗的反動時期也未動搖過。五十年代初，在一次歡迎《人民報》(The People's Paper)的排字工人和工作人員的晚餐上，回答「歐洲無產階級」的祝酒詞時，馬克思宣稱道：「在我們的時代裡，一切事物似乎都孕育着矛盾，機器提供了減輕人力和多產的驚人力量，而我們看到的却是飢餓和疲累不堪。技術勝利的代價似乎是個性的喪失。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芒也祇能依靠無知的黑暗背景而照耀……這種以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以當代的悲苦和解體為另一方之間的對抗性，這種生產力和我們時代的社會關係之間的對抗性，乃是一個事實，明顯可見的，壓倒一切的。有人為此悲嘆，也有人或許想消滅現代技術以便消除現代衝突，……就我們而言，我們並不錯認那仍在繼續表明這些矛盾的精靈的形態……我們認出了我們的老朋友，『羅賓漢小子』(英國民間傳說中的小精靈——譯注)，那在土地中如此迅速掘進的老鼯鼠……革命。」這個論點，在他的大多數聽眾看來肯定是十分沒有道理的：當然接下來的歲月裡發生的事件，也幾乎沒有證實他的預言。

在一八六〇年，馬克思的名聲和影響還局限在一個狹窄的範圍裡。自一八五一年科隆審判以來，對共產主義的興趣已經消逝了。隨着工商業的表面發展，對自由主義、科學、和平進步的信念再次開始高漲。馬克思自己也幾乎開始被人們看作一個歷史人物而對他產生興趣，被視為上一代人中一個令人可畏的理論家和煽動者，目前流亡在外，一貧如洗，在倫敦的一個慘淡角落裡靠臨時寫些新聞報導來餬口。十五年以後，一切都改變了。在英國，他相對地仍沒沒無聞，但在英國之外，他已經成為名聲既顯赫又狼藉的人物，被某些人看作歐洲每一次革命運動的煽動者，

一場發誓要顛覆人類道德秩序、和平、幸福和繁榮的世界性運動的狂熱獨裁者。由於這些，他被描述為工人階級的惡魔般的天才，陰謀削弱和摧毀文明社會的和平和道德，系統地利用愚昧民衆最惡劣的熱情，憑空捏造出子虛烏有的苦難，在不滿現實者的傷口上灑鹽，加劇他們和僱主間的關係以便製造令人人都受損失的普遍混亂，這樣，所有人最終都被拉到同一水準上，富有的、貧窮的、壞的、好的、勤奮的、懶散的、正直的、邪惡的。另有些人在他身上看到的，則是全世界勞工階級最不屈不撓、忠實獻身的戰略戰術家，一切理論問題上不容置疑的權威，一場不可抵抗的旨在以說服或暴力手段推翻非正義、不公正統治的運動的創始人。對他們來說，他似乎是一個憤怒的、永不屈服的現代摩西，一切被侮辱、被壓迫者的領袖和救世主，在他一旁是較溫和較傳統的恩格斯，一個亞倫（《聖經》中摩西之兄，猶太教第一祭司長——譯注），隨時準備向愚昧的半知半解的無產階級大眾詳述馬克思的話。對這一轉變負有最大責任的事件，是一八六四年第一國際的創立，它急劇改變了歐洲社會主義的特徵和歷史。



# 第九章

---

## 第一國際

法國大革命是另一場將成為最終的更為壯麗的  
革命的先聲。

—— 巴貝夫

---



第一國際是以最爲偶然可能的方式成立的。儘管各類組織和委員會努力協調各國工人的活動，但在他們之間並沒有建立真正的聯繫，這要歸之於數重原因。鑒於這類組織的共同特徵是從事密謀，因此祇有一小部份思想激進，無所畏懼和「先進」的工人被吸引在它們那兒。此外，情況一般總是還沒有能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東西，一場對外戰爭或政府採取的鎮壓措施，就已經中止了秘密組織的存在。還須加上一點的是，工人們由於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工作，彼此間缺乏交流和同情。以及最後，接着飢餓和反叛的歲月而來的，是經濟增長的繁榮，提高了普遍的生活水準，這自然有助於較強的個人主義，刺激了大膽者的個人野心，促使較有政治頭腦的工人，努力在地方上搞自我改善，追求眼前目標，離開相對朦朧的國際反資產階級同盟的理想。拉薩爾領導的德國工人運動發展，是此類純國內運動的一個典型例子。嚴格集權化，但限於一個國家內，爲一種樂觀的希望所激勵，希望直接以數量上的壓力，逐步迫使資本主義敵人屈服，無須訴諸一場革命起義或以暴力奪取權力。這一希望爲俾斯麥的反資產階級政策所鼓舞，這種政策似乎偏向於工人。在法國，一八四八至四九年的可怕失敗，使城市無產階級垮掉了，多年來無法進行大規模行動，他們組成多少受蒲魯東主義啓發的本地小團體來醫治傷口。在這方面，他們也並非完全沒有受到拿破侖三世政府的鼓勵。這位皇帝本人年輕時曾擺出一副農民、手工業者和工人的朋友樣子，反對資產階級官僚機構，他但願把他的君主制描繪成一種新穎的特別微妙的政府形式，君主主義、共產主義和托利黨民主政治的一種獨特混合體，把政治專制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糅合在一起的一種新秩序；同時，儘管政府集權化，僅對皇帝負責，但在理論上最終取決於人民的信任，因而是一個全新的徹底現代型的機構，對新的需求是敏感的，對社會變化的每一細微差別均作出反應。

拿破侖三世煞費苦心的社會和解政策，有一個方面是在各階級間挑撥離間，維持階級力量的巧妙平衡。因此，工人被允許在嚴格的警察監督下組織工會，以抵銷金融貴族聯合可疑的奧爾良保皇黨人日益強大的危險力量。工人們由於沒有任何可替代的選擇，便接受了這一謹慎伸出的官方之手，開始組成產業協會，這一過程既得到官方半心半意的鼓勵，也受到阻撓。

一八六三年，「現代工業博覽會」在倫敦舉辦。法國工人得到訪問的便利，選出一個代表團按時來到英國，成員中一半是旅遊者，一半是法國無產階級的代表，理論上，派他們到英國來是爲了研究最新的工業發展。在他們和英國工會代表之間安排了一次會議。該次會議召開的意圖也許和諸如此類會議一樣是模糊不清的，似乎主要起因於幫助當年由於起義夭折而流亡國外的波蘭民主主義者這一願望。而會議卻提出了諸如英、法勞動工時和工資的問題，提出有必要防止僱主爲了粉碎當地工會組織的罷工從國外僱用破壞罷工的廉價勞動力。爲組成一個協會，還召開了另一次會議，該協會不應當僅僅限於舉行討論和比較文件材料，而且要進行積極的經濟和政治合作，以及也許要促進一場國際民主主義革命。這次會議上提出的倡議並非來自馬克思，而是出自英法勞工領袖們自己。在他們的周圍，是各種激進分子：波蘭民主主義者，義大利馬志尼派，蒲魯東派，以及來自法國和比利時的布朗基主義者和新雅各賓派。所有希望現存秩序倒臺的人，起先都確實受到很大歡迎。

這次會議在倫敦的聖馬丁堂舉行，由愛德華·比斯利(Edward Beesly)主持，他是一位魅力十足、樂善好施的人物，當時在倫敦大學任古代史教授，是一個激進分子和實證主義者，屬於一個小小的但很有名氣的團體，該團體還包括有弗里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和克朗普頓，深受孔德

和法國早期社會主義者的影響。人們可以期待它的每一個成員支持一切開明進步的措施，在那個時代受過教育的人中，唯有他們多年來和穆勒站在一起，捍衛工聯主義的不受歡迎的事業，當時，工聯主義在下院被譴責為煽動階級仇恨而故意發明出來的工具。會議決定要組成一個工人的國際同盟，發誓對經濟關係的普遍體系不是進行改良，而是加以摧毀，代之以一個新體系，在這個新體系裡，工人將獲得生產資料所有權，這將結束他們在經濟上所受的剝削，使勞動果實成爲共同享有——這一目標需要完全消滅一切財產私有形式。馬克思以前曾冷淡地避開其他民主主義者會議，但對這一次聯合起來的最新努力，他看出了其中的可靠特徵：它由真正的工人代表所組織，公開宣佈明確堅定的目標，其中可清楚地追溯到他自己的影響。他極難得參加不是他倡導的任何運動，這一次是例外。在倫敦的德國手工業者推舉他爲他們在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至第二次會議舉行投票表決章程時，他已經負責起全部議程了。法國和義大利代表團被授予起草章程的任務，他們除了那些常見的民主主義乏味老調外，沒有搞出什麼東西來，此後，馬克思接過手把它擬定出來，並加上他爲此而寫的一篇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該章程按第一國際委員會設想，原是含糊的，人道主義的，帶有自由主義氣息。而出自馬克思之手的，是一份大膽設想的戰鬥性文件，旨在組成一個紀律嚴明的團體，其成員立誓不僅在改善他們的經濟條件方面要互相支援，而且在以公開的政治行動系統地顛覆，一旦有可能，則推翻現存資本主義政權方面也要互相支援。特別是他們要爭取進入民主的議會。像拉薩爾的追隨者在德意志諸公國中開始嘗試的那樣。根據提出的要求，即在章程中應包括對「正義和責任、真理、公平和自由」表示敬意的詞語，這些詞被插進去了，但是在這樣一個行文範圍裡，即如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說，「它們不會造成任何可能



的損害。」新章程通過了，馬克思開始以他所習慣的狂熱速度投入工作，在過了十五年即使不是湮沒無聞也是若明若暗的生活後，又出現在國際舞臺活動中心。

第一國際成立宣言是繼《共產黨宣言》之後社會主義運動最引人注目目的文件，它的篇幅差不多有八開本的十二頁，開場便聲明，「……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勞動者在經濟上受勞動資料的壟斷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會貧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因而工人階級的經濟解放是一切政治運動都應該作為手段服從於它的偉大目標。為達到這個偉大目標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沒有收到效果，是由於每個國家裡各個不同勞動部門的工人彼此間不夠團結，由於各國工人階級彼此間缺乏親密的聯合。……鑒於上述理由，下面署名的委員會委員……採取了必要的步驟來創立國際工人協會。」（本書作者有誤，此段文字刊在馬克思的「國際工人協會臨時章程」中，不是「成立宣言」，中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十五至十六頁，一九六四年版——譯注）

它包含了對一八四八年以來工人階級的經濟和社會狀況的評述，對照了有產階級財富的迅速增長和工人的惡化蕭條狀況。一八四八年被看作他們的一次沉重失敗，然而即使如此，也不是對他們沒有一點好處：作為這次失敗的結果，工人中爭取國際團結的意識甦醒了。這一發展並非完全不成功地鼓動了對工作日作出法定限制——取得針對極端自由放任政策的首次明確勝利。合作運動證明，工業高效率 and 消除資本主義的奴役驅使是一致的，甚至因而得以提高。工資勞動因而被表述為非必要的，是一個短暫的可消滅的魔鬼。工人終於開始領會到，聽從他們的資產階級顧問，他們就會一無所獲，就會失去一切。這些顧問們每當他們不能使用武力時，就竭力不擇手段

地利用民族和宗教偏見，利用個人或地方利益，利用大眾極度的無知。無論誰通過民族的或王朝的戰爭獲益，受損失者總是雙方的工人。然而，工人的力量在於通過共同行動，他們可以在戰鬥時與在和平時一樣防止被利用：正如他們在英國成功地干預了美國內戰時向南方各州提供幫助這件事所證明的那樣。在反對他們的敵人的令人可畏、表面上壓倒一切的力量量的鬥爭中，他們祇有一件武器——他們的數量，「但是數量祇有在他們聯合起來，組織起來並且有意識地被導向單一的目標時纔真正有份量。」正是在政治領域他們的受奴役狀況最明顯。像蒲魯東和巴枯寧所教的那樣，在經濟組織的名義下遠離政治，是犯罪的、短視的；他們祇有在任何正義遭到蹂躪的地方都堅持它，如果必要就用強力，祇有這樣，他們纔能得到正義。即使他們無法似武裝力量進行干預，他們至少可以向政府抗議示威，進行騷擾，直到傳統上賴以判斷個人關係的道德和正義的最高準則成爲支配國家關係的法律。但是不改變社會現存經濟結構就無法做到這點，這種結構儘管也有些微改善提高，但它必定使工人階級退化墮落，受到奴役束縛。祇有一個階級，它的真正利益在於遏止這種降低的趨勢，消除其發生的可能性：就是這個階級，一無所有，和非正義的或悲慘的舊世界沒有任何利益的或情感的聯繫，——這個階級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時代的產物，正如它是機器本身的產物一樣。「成立宣言」的結束語一如《共產黨宣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正如在該文件中所體現的那樣，新組織的任務是建立各國和各產業工人間的緊密關係，蒐集有關的統計材料，在各國工人間傳遞彼此的狀況、需求和計劃等訊息，討論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在國際危機形勢下確保各國的行動協調一致，出版各協會工作的定期報告等等。第一國際召開年會大會，由民主選舉的總委員會召集，在總委員會中，所有會員國都將有代表。馬克思盡可能使

章程靈活一點，以便可以盡可能地包容積極的工人組織，無論它們的方法和特點如何迥異。最初，由於漸漸達成了一項較大的協議措施，他決定謹慎謙卑地行動以團結凝聚力量，並逐步消除異見者。他精確地按計劃推行了他的政策。其結果證明是自我毀滅，儘管也很難看出除此之外馬克思還可以採取其他什麼和他的原則相一致的策略。

第一國際迅速發展。歐洲主要國家的工會，一個接一個改換到它的門庭下，期望聯合起來為更高的工資、更短的工作時間，和政治代表權而鬥爭。它的組織之良好，非憲章運動或早期共產主義聯盟所能比擬，部份原因在於它汲取了策略上的教訓。個人方面的獨立活動遭到禁止，通俗演講不受鼓勵，在一切部門中引入嚴格的紀律，主要原因在於它受一個人的領導和支配。早些時候唯一或許會試圖和馬克思競爭的人是拉薩爾，而他去世了；即使如此，他那傳奇般的魅力仍足以使德國人不至於全力支持設在倫敦的中心。李卜克內西，一個才能平平的人，無限忠於馬克思，全心全意地鼓吹新綱領，但是俾斯麥繼續反對社會主義的政策，以及來自拉薩爾的民族主義傳統，使德國工人的活動保持在國內，專心致力於國內組織的問題。至於巴枯寧，這位人類精神的偉大擾亂者，從西伯利亞經歷了一次傳奇式逃亡後已經返回西歐，但是，儘管他在第一國際內部及外間的個人威望均很高，他卻沒有任何有組織的追隨者。他已經游離於赫爾岑和俄國流亡者中自由主義的農民黨之外，沒有人知道他在走向何處，而最不了解者還是他本人。和極大多數蒲魯東主義者一樣，他同他的追隨者也成爲第一國際的成員，然而，由於這是公開對政治行爲作出的承諾，他們如此做便是無視他們闡述得比較模糊的無政府主義原則。此時第一國際最熱心的成員是英法工聯主義者，他們暫時還迷戀於新的實驗，連同它帶來的財富和權力的鉅大諾言。他們既不是、

也不想成爲理論家，把所有理論問題都丟給第一國際的總委員會。當這種氣氛持續時，馬克思在組織中就沒有任何須認真對待的競爭者，從而在精神、革命經驗和意志的力量上，都優於混雜一氣的專業人士、工人和喪失方向的理論家。這些人，加上一、二可疑的冒險家，組成了第一國際工人協會。

馬克思此時年屆四十六歲，在外貌和心境上都過早衰老了。他的七個孩子死去三個，主要原因是在蘇荷的家庭物質生活條件太差。他們曾設想搬到肯蒂希城裡一所較寬敞的房子，儘管他們仍然幾乎是一貧如洗的。歐洲迄未經歷的經濟大危機始於一八五七年，受到他和恩格斯的熱烈歡迎，認爲它十之八九會孕育出不滿和反叛，但是危機也削減了恩格斯的收入，因而在馬克思最難承受的時刻給了他一個打擊。《紐約論壇報》以及偶爾給德國激進報紙撰稿，使他不致陷於赤裸裸的飢餓之中，但是這個家庭二十年來處於危險的生存邊緣之上。至一八六〇年，甚至美國的來源也開始中斷：《紐約論壇報》編輯霍拉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是民主民族主義(Democratic nationalism)的強烈支持者，他發現自己越來越不同意那位歐洲記者言辭尖銳的觀點。經濟危機，加上內戰的影響，導致《論壇報》解僱很多歐洲記者，戴納(Dana)請求保留馬克思，但沒有成功。一八六一年初他的位子逐漸被排擠掉，一年後，聯繫終於中止了。至於第一國際，它增添了他的責任，給他的生命帶來了活力，但並沒有給他增添收入。絕望中，他申請火車站的一個售票員職位，但是他的襤褸衣衫和咄咄逼人的容貌，決不會給辦事員工作的潛在僱主留下一個好印象，他的申請最終被拒絕了，理由是他的字迹難以辯認。要是沒有恩格斯的資助，很難知道他的家如何在這些可怕的歲月裡生存下去。

此時，第一國際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建立了分部。至六十年代中葉，政府開始感到威脅大起來了，便議論起逮捕和禁止。法國皇帝作了一次半心半意的努力來鎮壓它。這僅僅起了在工人中提高這個新團體名聲和威望的作用。對馬克思來說，經過五十年代的黑暗隧道之後，這又是一次生命和活動。第一國際的工作耗去了他的日日夜夜。在恩格斯一如往常的忠心耿耿的幫助下，他個人接管了中央機關，不僅作為半專權的顧問，而且作為一切通信的中央起草往來機構。事無鉅細均經他的手，並按他指出的方向進行。法國人，一部份瑞士人，在一定程度上還有比利時人，以及後來加上意大利人，他們受過蒲魯東和巴枯寧的反權力主義熏陶，提出了含糊其辭但仍無效的抗議。馬克思在委員會中享有完全的優勢，並進一步加緊控制。他堅持嚴格遵照原綱領的每一點。他以前的精力似乎都回復了。他給恩格斯的信是精神十足的，幾乎是歡欣鼓舞的，甚至他的理論著作都帶有這一新產生的活力的痕跡。正如常見的那樣，在一個領域裡的緊張工作激勵了另一領域潛伏的活動。他的經濟理論概述在一八五九年已經出世，但被貧困和疾病所打斷的主要工作，至此終於開始接近尾聲了。

馬克思幾乎不出席第一國際代表大會的會議。他寧可從倫敦控制第一國際的活動，在那裡他出席總委員會會議，並就第一國際的活動，向他的追隨者發出詳細的指示。他始終信任並幾乎全部依靠德國人，找到一位名叫埃卡柳斯(Eccarius)的老裁縫師作為其忠實的代言人，後者長年居住英國，並無有傑出的智慧和想像力，但對馬克思來說，他似乎是靠得住的有始有終的人。埃卡柳斯像馬克思的大部份下屬一樣，最終亦反叛了，加入脫離主義者的行列，但是有八年時間，他作為第一國際總委員會的書記，不折不扣地執行了馬克思的指示。一年一度在倫敦、日內瓦、洛桑、

布魯塞爾、和巴塞爾舉行大會，討論一般的問題，就明確的措施進行投票表決，就工資和工時問題採納共同的決議，並考慮諸如婦女兒童的地位、何種政治經濟壓力最適合歐洲各國不同環境，以及其他組織合作可能性之類的問題。馬克思最關心的，是就各派互相協調提出的特殊要求方面，達到清楚地闡明一項具體的國際政策，並制訂出保證堅定不移地支持這項政策的嚴格紀律。因此，他成功地拒絕了諸如「和平自由聯盟」(League of Peace and Freedom)這樣的純人道主義組織提出的結盟要求，該組織是在馬志尼、巴枯寧和穆勒的庇護下新成立的。馬克思的這種獨裁政策早晚必然要導致不滿和反叛；圍繞着巴枯寧，不滿和反叛明朗化了。巴枯寧關於建立半獨立地方組織的鬆散同盟的概念，開始得到第一國際的瑞士和義大利分部的贊同，以及法國人程度不那麼強烈的響應。最終，他們決定在巴枯寧的領導下組成一個機構，稱為「民主聯盟」(Democratic Alliance)，從屬於第一國際，但有其自己成員組成的國內組織，以抵禦集權化，支持聯盟自治。這是一種異端，即使是一個比馬克思更能容忍的人也無法忽視它。第一國際並不想僅僅成爲激進組織的鬆散的機構間一個進行互相聯繫的協會，而是一個統一的政黨，其一切中心歸納成追求實現一個單一的目標。馬克思堅信和巴枯寧——或者實在是和任何俄國人——有聯繫，都必定以嚴重背叛工人階級而告終，這個觀點是他在四十年代的俄國貴族激進分子一段短暫而愉快的調情以及隨之而來的幻滅後得出的。至於巴枯寧，一方面他以足夠的真誠承認他佩服馬克思的個人才華，另一方面，他也從不隱瞞對馬克思的個人反感，從不隱瞞對馬克思體現在理論和革命政黨實際組織中的信奉極權的方法有很深的厭惡。

「我們，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聲稱道，「是一切形式的國家和國家組織的敵人……」

我們認為，一切國家的法則，一切政府，因它們本身的性質而置於人民大眾之外，必將竭力使人民服從和人民完全無關的習俗與目的。因此我們宣告我們是……所有這類國家組織的敵人，我們相信人民祇有以完全脫離組織的自治手段從下面組織起來，不受任何先導者的監督，他們纔能幸福和自由，並將創造自己的生活。

「我們相信權力會腐蝕行使權力的人，也同樣會腐蝕被迫服從權力的人，在權力的腐蝕性影響下，一些人成爲貪婪和野心勃勃的獨裁者，按自己的利益或他們的階級的利益利用社會，同時其他人則成爲可憐的奴隸。知識分子，實證主義者，教條主義者，一切把科學置於生活之前的人……都爲國家的觀念和國家的權威辯護，把這看作社會的唯一可能出路——這完全合乎邏輯，因爲他們是從一個錯誤的前提出發的，即思想先於生活、祇有抽象的理論能夠形成社會實踐的起點……他們得出了不可避免的結論：鑒於這類理論知識目前祇爲極少數人擁有，所以這些人必須處於控制社會生活之地位，不僅鼓舞而且指導一切大眾運動；一旦革命過去了，就必須立即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組織，並非是大眾組織的自由聯合……根據人民的需求和直觀行動，而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權力，集中在少數知識分子手中，似乎他們確實表達了大眾的意願……這種革命的專政和現代國家的區別，僅僅在於它們的一個外部標誌。實際上，兩者都是以人民的名義——以多數人的愚蠢和極少數人的超級智慧的名義——由少數人對多數人實行獨裁，因此兩者都一樣是反革命的，圖謀使少數統治者獲得政治和經濟特權，……奴役大眾，摧毀現存秩序僅僅爲了在它廢墟上建立他們自己的嚴酷專政。」

巴枯寧對馬克思和拉薩爾的攻擊不能不引起注意，而且確實引起很大注意，因爲這些攻擊混

雜了反猶太主義，爲此，他的朋友赫爾岑不止一次指責過他。然而，當赫爾岑在一八六九年懇求他離開第一國際時，他迸發出獨特的寬宏大量，寫道他無法加入和這樣一個人對立的陣營。「這個人以毫無疑問遠勝於我們所有人的見識、精力和無私已經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了二十五年。」

馬克思不喜歡巴枯寧，這並沒有使他看不到有必要出於權宜之計去承認某些地區性的獨立措施。因此他成功地挫敗了創建國際工會的計劃，因爲他相信這是不成熟的，立刻會導致產生和現存的按國家組織的工會的裂縫，而對第一國際的重要支持正是來自這些工會，至少在英國是這樣的。然而，即使他作了這一讓步，也不是因爲他熱愛此類聯邦主義之故，祇是爲了不要危及已經建立起來的組織——沒有它，他就無法創建一個其存在使工人意識到站在他們的要求背後的機構。這和一八四八年時不同，因爲不僅僅是各處的同情者打算提供道義上的支持，或者至多偶爾有些實質性貢獻——而是站在他們背後的是紀律嚴明的戰鬥力量，保證將反對，以及必要時威脅和逼迫他們自己的政府，除非政府公平對待他們在所有地方的兄弟們。

在馬克思看來，爲了創造理論上和實踐上這種主動團結的長期可能性，一個具有無可爭辯的權威中央機構，一種負責制訂戰略戰術的總參謀部，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巴枯寧試圖鬆散第一國際的組織結構，鼓勵地方分部的不同意見，馬克思認爲這似乎是故意要毀掉這種可能性。如果巴枯寧成功了，就將意味着失去已經贏得的東西，回復到烏托邦主義，令新的清醒的觀點消失殆盡，令他們意識不到工人的唯一力量在於團結，意識不到一八四八年把他們送入敵人之手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投入的是分散的起義，零星的帶感情色彩的暴力行動，而不是一次仔細商定的革命，這種革命應選擇在歷史的一個恰如其份的時刻組織開始，從一個共同的中心，向着一個共同



的目標，由這樣一些人指導，他們精確研究了形勢和敵我雙方的力量。巴枯寧主義導致浪費革命的能量，導致陳舊的浪漫、壯麗而無用的英雄主義，充滿了英雄聖人的殉難烈士，但祇是太容易被更爲現實主義的敵人所粉碎，隨之而來的必定是一個消沉和幻滅的時期，使運動後退多年。馬克思沒有低估巴枯寧的革命活力和攪亂人們想像力的能力；正是出於這一原因，他把巴枯寧看作危險的破壞力量，在哪兒都會引起混亂。如果允許巴枯寧和其追隨者侵入工人事業的捍衛者行列，這事業就會處於危險的境地。因此，經過一些年的雜亂論爭後，馬克思決定發起一次公開的攻擊，並以把巴枯寧和他的追隨者開除出第一國際而告終。

# 第十章

---

## 「紅色恐怖博士」

我們之所以有今天，都應該歸功於他，沒有他，我們至今還會在黑暗中徘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八八三年

---



《資本論》第一卷終於在一八六七年出版了。這部著作的出現是國際社會主義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是他本人一生中的里程碑。其全部工作的構思，是一部全面的關於現代社會經濟組織規律和形態的專著，力圖按照生產、交換和分配確實進行的情形描述它們的過程，力圖把它們目前的狀態解釋為由階級鬥爭運動構成的發展中的一個特定階級，以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通過建立階級歷史的固有規律「發現現代社會運動的經濟規律」。其結果<sup>①</sup>使該著作成為經濟理論、歷史、社會學和宣傳有獨創性的混合物，和任何公認的類別不相符合。馬克思當然把它看作基本上是一部經濟學的專著。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早期的經濟學家在比較經濟規律和物理、化學規律時，誤解了經濟規律的本質，假定支配經濟的規律是不會改變的，儘管社會條件或許會改變；因此，他們的體系要麼適應想像中的世界，由理想化的經濟人所組成，其模式取自於作者自己的同時代人，因而通常由經過選擇的特徵所構成，這些特徵僅僅在十八、十九世紀纔是突出顯著的；要麼描述了這樣的社會，即使它們確乎是真實的，也早就消失了。因此他認為自己的使命是創造一個概念和定義的新體系，它應該明確適用於當代世界，應該如此構築以反映不僅在和過去而且在和未來有關係的經濟生活中的變化的結構。在第一卷中，馬克思試圖立即系統地揭示經濟科學的某些基本原理，並且更具體地描述新工業體系的崛起是作為僱主和勞工間的新關係的一種結果，而此關係是由於在生產方法上的技術進步的作用而產生的。

<sup>①</sup> 特別是，如果把第一卷和作者逝世後出版的各卷聯繫起來看，後者先是由恩格斯、後來由考茨基根據馬克思的經濟學手稿以及其中的某些筆記形式材料整理出版的。

因此第一卷論述了生產過程，即一方面，機器和勞動的關係，以及另一方面，真正生產者，也就是工人和僱傭、指揮他們的人之間的關係。其餘幾卷在他死後由遺囑執行人出版，主要涉及對成品流通價值理論的影響，成品必須獲得流通纔能實現它的價值，那就是一個交換體系和它們所包含的金融機構，在和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中，它決定了價格，利率和利潤率。

貫穿他全部工作的總論點在《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早期經濟著作中已經勾勒出來了。②它依據三項基本假設：(a) 政治經濟學力圖解釋的，是誰得到了什麼物品或服務或地位以及為什麼；(b) 因此這是一門科學，其對象並非是無生命的東西——商品，而是人以及他們的活動，在支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律的意義上予以闡述，而不是在超越人類控制的虛假客觀規律的意義上，(如供需規律)，這些規律支配了自然的客體世界——客體的行為對人類的的生活可以說是外在的，人類把這個過程看作永恒的秩序的一部份，由於他們無法改變它，就必須在它面前屈服。這一錯覺或「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被他稱作「商品拜物教」(fetishism of commodities)：(c) 決定近代社會行為的因素是工業化；首當其衝者以最早、最充分表現的形式——英國工業革命——向研究的人提供了該過程的最佳例證，該過程在一定時候將在所有地方發生。馬克思追溯了近代無產階級的興起，把它和生產技術資料的一般發展聯繫起來。在生產資料逐步發展的過程中，當它們不再能夠由個人為自身用途創造時，當勞動分工產生時，某些個人(如聖西門所教導的那樣)由於占有優勢的能力、權力和進取心，單獨獲得了對此類工具與用具的掌握，從而發現自己

② 關於馬克思經濟學說的詳細內容，請參閱本書「參考閱讀書目」一節。

處於這樣一種地位，即通過威脅和利誘的相結合能夠僱用其他人的勞動力，或威脅不給他們生活必需品，或向他們提供比他們作為獨立生產者所能得到的更多的常規收入，而他們作為後者，以他們僅有的陳舊落後的工具，完全無希望獲得同樣的結果。把他們的勞動力出賣給其他人，其結果是自己亦成為經濟市場上的衆多商品，他們的勞動力得到一個明確的價格，它和其他商品完全一樣，是浮動的。

商品在市場經濟中，是包含了人的勞動的為社會所需求的東西。因此它是這樣一個概念，馬克思審慎地指出，它僅僅適用於社會發展的一個相對較晚近的階段，並不比任何其他經濟範疇更為持久永恆。商品的商業價值被斷定為——這是馬克思的論證結論——直接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構成的，也就是，平均一個生產者創造同類產品平均樣本所需的時間（這個觀點取自於李嘉圖 [Ricardo] 和古典經濟學家所持的差不多相同的學說）。一個勞動者一天的工作完全能生產出一件物品，其擁有的價值超過他的生活所需的最低限量商品的價值；因此他生產的東西在市場上的價值超過了他所消費的；確實，除非如此這般，否則他的主人就沒有任何經濟上的理由去僱用他。勞動力作為市場上的一種商品，獲得它本身要付出  $w$  的價格，它代表了所需的最低數額以保持他的健康，使他足以能有效地工作以及繁殖撫育後代；而他所生產的東西可以  $w$  價格售出， $w$  表示了增加社會總財富的幅度，而這部份也是進入他的僱主口袋的餘額。僱主作為生產和分配過程中的組織者與經理，亦投入了自己的工作，但即使扣除他們的相當可觀的報酬，社會收入仍有著明確的餘額，它以租金、投資利益、或商業利潤的形式，根據馬克思的說法，並不作為

為一個整體的社會所享有，而是僅僅為社會中被稱為資本家或資產階級的成員所享有，他因這樣一個事實和社會其他成員區別開來：祇有他們，以生產資料唯一所有者的資格，獲得此項不勞而獲的增額。

無論馬克思的價值概念是否被解釋成意味著一種平均標準，圍繞這一標準商品的實際價格上下浮動著；或者意味著價格傾向於靠攏它的一個理想限制線；或者意味著在某種非特指的意義上價格「應該」是這樣的；或者對構成和滿足社會上人的物質利益作出社會學解釋的一個因素，或者意味著某種較形上學的東西——一種難以識別的本質，由人類勞動的創造性而注入赤裸裸的東西中去，抑或如毫不留情的批評家所認為的那樣，意味著所有這些的大雜燴，再或者無論被稱為無差別人類勞動的統一體概念（根據該理論它構成了經濟價值），這種無差別勞動的不同表現形式，僅在數量方面就是可以進行比較的。無論上述這些是正確的或是不正確的——為馬克思對任何一個概念的運用進行辯護並非易事——但建立在這些之上的剝削理論，相對來說仍是不會改變的。這一理論對工人具有強大的號召力，他們中大部份並不理解馬克思關於交換價值和實際價格關係的總的論證的錯綜複雜之處。該理論的中心論點是祇有一個社會階級，也就是他們自己的階級，生產出來的財富超過了他們消費的，這份餘額被其他人占有了，僅僅因為這些人處於生產資料唯一所有者的戰略地位，這些生產資料是自然資源、機器、運輸工具、金融信貸等等，而沒有這些生產工具工人就無法創造，而對生產工具的控制，令那些人有能力讓類的其他部份挨餓，按他們的條件向他們投降。

在資本主義時代，政治的、社會的、宗教的和法律的機構制度，被表述為衆多道德和精神的

武器，用來按照僱主的利益組織世界。這些機構制度最終僱用一大幫意識形態理論家凌駕於商品生產者，即無產階級之上，他們是宣傳家，闡釋者，辯護士，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潤飾，為它建造文學的、藝術的豐碑，當然使在這個制度下得益的人增強了信心，感到樂觀，使它對犧牲品顯得似乎較完美好受的——以盧梭的話來說，「用花環掩蓋他們的鎖鏈」。但是，如果技術的發展，正如聖西門正確發現的那樣，在一個階段裡給了地主、工業家和金融家獨一無二的力量，那麼它那無法控制的前進也將同樣不可避免地摧毀他們。

傅立葉（以及他之後的蒲魯東）已經激烈攻擊過這樣一種變化過程，即大銀行家和工廠主通過他們擁有的優勢資源這一手段，把小業主和手工業者從經濟市場上排除出去，創造了大批心懷不滿、失去社會地位的人，他們自動地被迫加入無產階級行列。然而資本家在他所處的時代裡乃是一種歷史必要。他榨取剩餘價值，並積累起來，這對工業化是必不可少的，是歷史的進步力量。

「狂熱地俯伏在日益增長的價值面前，他無情地逼使人類為生產而生產」。他可能如此作時殘忍冷酷，純粹出於自私的動機；但在這一過程中，「他創造了足以形成更高級社會形態的基礎的那些物質條件，在這樣一個社會裡，每一個人充分的、自由的發展，成為首要的原則。」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稱頌了工業化的進步作用。「資產階級」，他寫道，「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係以及隨之而來的整個社會關係不斷的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在它統治不到一百年間，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各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服從人類支配，把化學和工業應用到農業中去（原文如此，查德譯文，似應為「把化學應用到工業和農業中」——譯注）。蒸氣輪航行，火車，電報，開墾一片片大陸，河川的通航，大量人口魔術般從地下出現——以前



哪一個時代甚至預言過如此巨大的社會力量潛伏在社會勞動裡呢？」但是資本家將在完成了他的作用後纔被取而代之。他將被自身作為積累者的本質特徵所消滅。各資本家之間的無情競爭，力圖從數量上增加剩餘價值，以及產生於降低生產成本和找到新市場的固有必要性，這些必定要導致相互競爭的公司越來越大的聯合，即不斷的合併過程，直到僅有最大、最有勢力的集團留存下來，所有其他企業被迫處於依賴或半依賴地位，在一個新的、集中了的工業等級制裡，大集團支配著集中了的生產和分配機構，這種情況在發展著，並將繼續發展，越來越快。集中化是合理化的一個直接產物：直接產生於生產和運輸中通過資源集中而提高了效益，產生於能夠進行有計劃協調的大壟斷托拉斯和聯合企業的形成之中。工人原來散布在眾多小企業中，並得到破產了的小業主和小生產者的後代源源不斷的補充，由於他們的主人忙於合併，在每一次這樣的過程中，他們自然聯合成一支單一的、越發膨脹的無產階級大軍。作為一個政治和經濟團體，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作用和能力，他們的力量也相應越來越大。在工廠制度庇護下發展起來的工會，已經表明在無產階級掌握下，是一個遠較任何以前存在過的團體更力量強大的武器。工業擴展的過程，並將越來越把社會組織成一個巨大的金字塔形態，很少的但愈益強大的資本家在其頂端，大量不滿的受剝削工人以及殖民奴隸形成了金字塔基礎。機器代替人的勞動越多，利潤率就必定下降得越低，因為「剩餘價值」率僅僅是由後者所決定的。在互相競爭的資本家之間，以及事實上由他們控制的國家之間發生的鬥爭，肯定將越來越激烈，執著於一個不受任何牽制的競爭體制，在這

一體制下，每一個人祇有超過和摧毀他的競爭對手纔能生存。③

在資本主義和不受抑制的私人企業這個架構內，這些過程是無法使之合理的，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所依賴的既得利益取決於競爭的自由，爲了使他們能夠生存下去，這種競爭即使不是在個別生產者之間進行，也將在聯合企業集團和壟斷之間進行。技術進步帶來的向程度越來越高的集體生產形式前進的無情趨勢，將和分配的個人形式發生更加猛烈的衝突，也就是和私人控制、私人財產發生衝突。馬克思是極少數預見到大企業將和其軍事上的同盟者一起摧毀自由放任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人之一。然而，馬克思並沒有考慮到國家控制或民主主義抵抗發展的結果，也沒有考慮到政治民族主義發展成一種力量，切斷或改變了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或者成爲不受控制的剝削的障礙，或者成爲保護逐漸貧困的那部分資產階級的堡壘，它將在極其認真地防止走上成爲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產階級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命運之路時作出反應，形成一個聯盟。換言之，馬克思既沒有預見到法西斯主義，也沒有預見到福利國家。

馬克思把社會階層分作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的軍事——封建貴族、工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

③ 如果情況真是這樣，爲何資本家不省掉機器，回到奴隸勞動上，從而增加剩餘價值呢？在恩格斯根據馬克思手稿編輯、作者去世後出版的《資本論》各卷中，論點仍然是機器確實不增加利潤，無論是相對的還是絕對的。

但就個別資本家而言，在短期裡機器是提高利潤的，因此競爭就迫使他採用機器。此外，它還有助於去除低效能的競爭者。利潤率持續下降，但分享利潤者愈益減少——爲這場殘酷戰爭中「最適應的」資本家所享有。讀者可以自己判斷這種情況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發生了。

無產階級，以及他稱之為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的處於社會邊緣的大批成份不定的人。就他的時代而言，這種分類是富有成果和獨創性的，但把它過於機械地應用到二十世紀時，對問題分析就太過簡單化了，即使僅僅是論述階級的獨立行為時，也要求有一種更完善工具，如論述處於未消亡狀態的小資產階級，論述越來越多拿工薪的中下層階級，以及更重要的是論述大量農業人口。他們被馬克思看作自然是反動的階級，由於日益貧困化被迫墮入無產階級層次，或作為被僱用者向他們的領導者工業資產階級提供服務。如果戰後的歐洲歷史，無論如何至少是西歐的歷史，要符合這一假設，就得作相當程度的歪曲。

馬克思預言，因經濟沒有計劃而引起的周期性危機以及不加控制的工業競爭，必然將越來越頻繁激烈。規模愈益巨大的戰爭將衝毀文明世界，直到最後黑格爾式的矛盾體系獲得一個暴力解決的方法，而該體系的持續運動正取決於其組成部份間越來越具危害性的衝突。愈益龐大的資本家掌權集團，將被已將自身如此有效地訓練成一支堅實守紀錄隊伍的工人所推翻。隨著最後一個有產階級的消失，將達到階級鬥爭的最終目標，以及連同消除克服經濟蕭條的最後一個障礙，消除社會衝突、人類的悲苦和墮落。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二章中有一著名的段落，馬克思宣稱，「當資本巨頭在數量上逐漸減少時，貧困，奴役，墮胎和剝削在總體上當然也相應增長了，然而，工人階級的作用同時也穩步增強了——一個隊伍愈益壯大的階級，以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那個機制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生產隨著這種機制和在這種機制之下繁榮發展了。生產工具集中化和勞動社會化達到這樣的程度，證明它們和資本主義方式是不相一致的。這產生了崩潰分裂。私人財產的喪鐘敲響了。剝奪

者被剝奪了」。國家，統治階級的權威賴以執行的工具，在失去它的作用後將消亡。他在一八四七至四八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以及在一八五〇年和一八五二年再次明確表示說國家不會很快就消亡，必須有一個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革命轉變時期。在這個轉變階段裡，國家的權威必須保留，以及確實還必須加強，但一旦工人成爲支配的階級時，就完全由工人控制了。確實，（用他晚年著作中的一個公式來說），在革命的第一階段，國家將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在這一階段裡，經濟短缺尚未克服，工人的報酬必須按其勞動量多寡而定。但是，一旦「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了這樣一個社會，「共同財富的源泉愈益豐富地源源而出」，到那時就達到了共產主義的目標。祇有到了那時，而不是在此之前，被過去時代的烏托邦主義者抹上過於單純、耽於幻想的色彩的大同世界纔會實現——在這樣一個世界裏，既沒有主人也沒有奴隸，既沒有富人也沒有窮人，世界的物質產品根據不受個人注意要求干擾的社會需求生產，其分配並不是平均的——此乃工人從自由主義思想家那兒殘缺不全地批發來的概念，連同他們的功利主義的公正概念，使之成爲一種算術上的平均——物質產品的分配是合理的，但不是平均的，因爲，鑒於人的能力和需求不是平均的，所以他的報酬，（如果要使它公正的話），按一八七五年發表的《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中後來的公式，就必須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類在終於從嚴酷的大自然控制中，以自身的適應和控制均很差別而也是壓制的機構制度中解放出來後，將使他們能夠完全實現一切潛力。歷史將不再是連續不斷的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的歷史。服從勞動分工的狀況將不再有了。黑格爾模糊勾勒過的真正自由將實現。真實意義上的人類歷史僅僅到了那時纔開始了。

《資本論》的問世終於代替了大量四分五裂、定義模糊、互相衝突的觀念，為國際社會主義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思想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宣揚的歷史、經濟和政治論點，它們互相依存出現在這部紀念碑式的巨帙中。它成為攻擊和捍衛的中心目標。自此以後一切相繼而來的社會主義形式，都按照它們對該著作中所取立場的態度給自身下定義，並按它們和該著作的相近程度被理解 and 歸類。經過一段短暫的沒沒無聞之後，它的聲譽開始增長，並達到異常的高峰。它獲得的象徵的重要性，是自信仰上帝的時代以來任何著作所未曾有過的。成千上萬人盲目地崇拜它亦或盲目地憎恨它，他們或者從未讀過一行，或者雖讀了卻並不理解它那有時晦澀難解的曲折行文。在它的名義下，革命產生了（並且還在產生），反革命全力關注過（並且還在關注）該書的查禁，把它作為敵人的最強有力、最陰險有害的武器。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已經被建立起來了，它承認該著作的原則，在那裡看到了其信念之不可更改的終結表達形式。該著作已經導致產生了一大批闡釋者和詭辯家，他們近一個世紀來的孜孜勞作，已經將它埋於堆積如山的評注論述之中，其影響已超過這部神聖經典本身。

在馬克思本人的一生中，它標誌著一個決定性的時刻。他旨在使它成為他對人文學科獲得解放的最大貢獻，為此犧牲了他一生中十五年時光和政治上很多抱負。花於此上的精力確實是巨大的。爲了它，他從公私兩方面忍受了貧困、疾病和迫害，確實極不痛快地爲了這些備受折磨，但他卻有專心致志的禁欲主義精神，其力量和嚴酷性令接觸過該著作的人既感慨、又驚駭。

他把自己的著作題獻給威廉·沃爾夫(Wilhelm Wolf)，一個西里西亞共產主義者，自一八四八年以來便是他的忠實追隨者，並於《資本論》出版前不久死於曼徹斯特。已出版的是計劃中全

部工作的第一部份，而其餘部份還是一大堆混亂的筆記、參考材料和草稿。他把書寄給他的老朋友弗賴利格拉特，後者祝賀他完成了一本有用的參考著作。他把書寄給費爾巴哈。費爾巴哈說他發現該書「富於最有意思的無可否認的事實，但同時在性質上又極其可怕。」盧格給予該書有見地的讚譽。在英國，對它至少有過一次評論，刊登在《星期六評論》上，古怪地論道，「該題目的描述賦予最枯燥的經濟問題以某種特殊的魅力。」在德國它引起了較廣泛的注意，馬克思的朋友李卜克內西和庫格曼(Kugelmann)，一位漢諾威的內科醫生，對馬克思懷有巨大的崇敬之情，他們倆為《資本論》作了熱情的宣傳。特別是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一個在聖彼得堡自學成才的德國鞋匠，他成為最熾烈的馬克思門徒，為在德國大眾中普及這本書作了大量工作。

自巴黎時期來，馬克思對科學的熱情就沒有減退過。<sup>④</sup>他信奉真正的學問，毫不動搖地把他的不情願的追隨者驅入不列顛博物館的閱覽室。李卜克內西在他的回憶錄中描述了這位「國際共產主義的初級學生」如何在其導師的親自監督下，一天一天順從地坐在閱覽室的書桌前。確實，沒有任社會的或政治的運動曾經如此強調過研究和學問。馬克思自己的閱覽範圍在某種程度上單從他著作中所列的參考書目中已經表現出來，它鑽研了古代的、中世紀的、近代的文學中極不引人注目的次要方面。其正文點綴著豐富腳注，冗長辛辣，毫不留情，令人想起吉朋(Gibbon)

<sup>④</sup>他對達爾文(Darwin)的成就有著深刻的印象，並給他寄送了《資本論》第一卷。但他提出把第二版題獻給達爾文這個故事（二十世紀中每個馬克思的傳記作家，包括現在的，都一再重複這個故事）卻似乎是不足為信的，其依據好像是達爾文致馬克思的女婿愛德華·阿維林的一封信被搞錯了。

利用這一武器的古典手法。這些腳注針對的對象大部份都是今天已被遺忘了的人，但間或他的矛頭也針對著名人物：麥考雷(Macaulay)，格萊斯頓(Gladstone)，以及當時的一兩個著名經濟學家受到猛烈的集中攻擊，這開創了公開譏罵技能上的一個新階段，創造了一個社會主義論戰寫作學派，它已經改變了政治論爭的一般特徵。引人注目的是，在這部著作裡幾乎沒有什麼讚譽之詞。最熱烈的頌詞被加在英國工廠中的督察員身上，他們無所畏懼地、不帶偏見地報告了親眼目睹的駭人聽聞的工作條件，以及工廠主對付法律所採取的手段，這些報告被稱為資產階級社會歷史的一個獨特的可敬現象。馬克思運用《藍皮書》和官方報告的典範，令社會研究的技能產生革命性變化。他聲稱他對現代工業主義條分縷析的控訴，大部份都建立在這些《藍皮書》和官方報告的基礎上。

恩格斯在他去世後編輯了《資本論》的第二、三卷。他發現手稿紊亂的程度，遠較他預期的為甚。第一卷出版那年在馬克思的一生中並不標誌著一個轉折點，而是一個中止點。在餘下的十六年裡，他的觀點幾乎沒有什麼改變。他增補、修訂和糾正，並寫小冊子和信件，但沒有出版任何新的東西。他不知疲倦地重申原有的立場，但語調較前緩和，可以辨別得出一絲以前從未有過的幾乎是自怨自憐的調子。他對爆發一場世界革命的近似可能性，乃至於最終不可避免性的信念消失了。他的預言落空得太多了。一八四二年，當西里西亞紡織工人罷工時，他充滿信心地預言將有一場偉大的起義，甚至激勵海涅就此寫出一首著名的詩章，並把該詩發表在他的巴黎刊物上。另外他在一八五一年、一八五七年和一八七二年都期待著爆發革命，但均未實現。他預言利潤率下降，工業和土地的所有權在私人手中集中，無產階級生活水準下降，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緊

密結合，這些預言總的來說都未得到證實，至少，在本世紀裡都未以他所預測的這些發展的形式得到證實。另一方面，他看出了很多其他人未看出的東西：經濟資源控制集中化和中央化；大企業生產方法和陳舊的分配方法之間愈益不適應，以及這一事實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工業化——以及科學對戰爭方法的影響；以及所有這些將引起的生活方式的急劇改變。他成爲最敏銳的政治觀察家之一。普魯士吞併阿爾薩斯——洛林後，他預言這將把法國推入俄國的懷抱，從而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他晚年時，他承認革命可能比他 and 恩格斯一度估計的要推遲到來，在某些國家裡，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國，當時那兒並無真正的軍隊和真正的官僚政治，革命並非不可避免，僅僅是「可能的」；也許根本不會真正發生，因爲共產主義或許可通過演變手段取得，「儘管」，他玄奧莫辯地補充道，「歷史另有所指。」他進入有意識的老年階段時還不足五十歲。英雄主義時期過去了。

《資本論》爲它的作者創造了新的聲譽，他以前的著作即使在德語國家裡都是沒沒無聞的，但他的新作卻被廣泛評論和討論，遠至俄國和西班牙。在接下來的十年裡，它被譯成法語、英語、俄語和意大利語。確實，巴枯寧本人殷勤地主動提出把它譯成俄語。但是這項工程即使真的開始過，也因卑劣的個人及財政醜聞而夭折了，這些醜聞對五年後第一國際領導權繼承問題要負部份責任。這個組織的名聲歸起歸因於一個主要事件，該事件早兩年改變了歐洲的歷史並且完全改變了迄至那時爲止工人階級運動發展的方向。

如果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有時候預言過後來並沒有發生的事件，那麼他們也不止一次沒有預見到後來確實發生過的事件。因此，馬克思否認克里米亞戰爭會發生，並在普奧戰爭中支持錯誤的一方。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對他們來說是完全沒有意料到的。多年來他們低估了普魯士的力量。



在他們看來，犬儒主義和蠻橫力量的真正聯盟乃是由法蘭西皇帝所代表的，俾斯麥是一個能幹的容克地主（Junker），服務於他的國王和他的階級，即使俾斯麥戰勝了奧地利，亦沒有令他們相信他的真正素質或目標。在某種程度上，馬克思或許確實受了俾斯麥的欺騙，俾斯麥關於戰爭的表白，被他看成是純粹防禦性的，因此他簽署了一項宣言，第一國際委員會在該項宣言一經修改使這一點明確無誤後便立即發表了——這一步驟是拉丁國家的很多社會主義者所不能原諒他的，並在以後堅持認為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總是明顯傾向的、在德國愛國主義激勵下採取的一個步驟。第一國際總的來說，特別是它的德國成員，在這場短暫的風波中表現得無可指摘。委員會在戰爭中期發表的宣言，警告德國工人不要支持俾斯麥大概會推行的吞併政策。宣言明確解釋道法國和德國無產階級的利益是一致的，僅僅受到共同敵人的威脅——兩國的資產階級，他們爲了自身的目的而發起了這場戰爭，爲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樣犧牲了德國和法國的工人階級的生命和財富。在適當時候，它將激起法國工人支持建立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共和國的組成。在戰爭激烈階段，沙文主義橫擋德國，甚至席捲了拉薩爾派的左翼人士，祇有馬克思主義者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Bebel）保持著清醒的頭腦。處於舉國上下的義憤中，他們在戰爭信任投票時投棄權票，在國會裡慷慨陳詞反對戰爭，特別是反對吞併阿爾薩斯——洛林。爲此，他們被指控叛國而入獄。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馬克思指出德國的戰敗會加強波拿巴主義，在今後多年裡削弱德國工人，這或許比德國戰勝更具災難性。由於重心從巴黎轉移到柏林，俾斯麥是在爲德國工人工作，儘管這並非他們的本意。因爲德國工人比法國工人組織得更良好，更有紀律，其結果就可以形成比法國人更強大的社會民主堡壘，同時波拿巴主義的失敗將使歐洲消除一場惡夢。

秋天，法軍敗於色當，法皇入獄，德軍兵圍巴黎城。普魯士國王曾經莊嚴地發誓戰爭是防禦性的，目標不是針對法國，而是拿破侖三世，此時改變了戰術，在他的臣民的狂熱投票支持下，要求法國割讓阿爾薩斯——洛林以及五十億法郎的戰爭賠款。至此，本來反對波拿巴主義、傾向德國的英國輿論勢頭，在不斷的關於普魯士在法國的暴行的報告影響下，完全轉向了。第一國際發表了第二個宣言，強烈抗議德國的吞併，譴責普魯士國王的王權野心，號召法國工人和一切保衛民主的戰士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如果國界線要以軍事利益來確定」，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寫道，「那麼提出的要求就不會有止境，因為每一條軍事界線必定是有缺陷的，也許可通過吞併更多的外國疆土得以改善。它們決不可能公平地、最終地被確定下來，因為它們始終必須被征服者或被征服者加以改善，其結果在它們中便埋下了新的戰爭種子。歷史估量它的功過得失，並不按照從法國征服了多少土地的範圍，而是按照十九世紀後半葉恢復推行侵略政策的罪惡程度。」這一次，投票反對戰爭的就不單單是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而且有拉薩爾派，他們為自己前些時的愛國主義而感羞恥。馬克思與高采烈地致信恩格斯，談第一國際的原則和政策首次在歐洲立法機構得到公開表達。第一國際已經成爲一支需予正式考慮的力量，在一切國家裡建立有著共同目標的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夢想，開始將要實現了。巴黎此時因飢餓而屈服、宣告投降。一個國民議會已選舉產生：梯也爾(Thiers)成爲新共和國總統，並任命了一個持保守觀點的臨時政府。三月，政府企圖解散巴黎國民警衛隊，這是一支公民自願組成的力量，對激進觀點持同情態度。它拒絕放棄武裝，宣佈自治，罷免臨時政府官員，選出人民的革命委員會作爲真正的法國政府。正規軍來到凡爾賽，包圍了這座反叛的城市。這是雙方即刻意識到的一場公開的階級戰爭的

首次戰役。

巴黎公社，如新政府自我描述的那樣，既不是由第一國際所創，也不是由它組成的。嚴格說來，它在理論上甚至不是社會主義的，除非任何大眾選舉出的委員會的專政本身就構成了一種社會主義現象。它由各種差異很大的人所構成，大部份是布朗基、蒲魯東和巴枯寧的追隨者，並混合了新雅各賓主義的煽動家，像費利克斯·皮亞特(Felix Pyat)，他們所知道的僅僅是他們在為法國、為人民、為革命而戰鬥，宣告一切獨裁者、牧師和普魯士人的死亡，工人、軍人、作家、畫家如庫爾貝(Courbet)，學者如地理學家埃利塞·雷格利(Elisee Reclus)和批評家瓦萊斯(Valles)，模稜兩可的政治家如羅什福爾(Rochefort)，持溫和自由觀點的外國流放者，波希米亞人和形形色色的冒險家，所有這些人都在這陣共同的革命浪潮中被猛力推向前去。它起於這樣一個時刻，當圍困和投降帶來道義上和物質上的痛苦之後，國家處於歇斯底里狀態之中；它亦起於這樣一個時刻，國家的革命曾發誓最後要消除波拿巴主義和奧爾良派反革命的最後殘餘，但革命卻為中產階級所拋棄，受到梯也爾和他的部長們的譴責，而且沒有把握農民是否會支持，在這樣一個時刻，革命似乎突然面臨它最害怕、最憤慨的所有那些將軍們、金融家們和牧師們都將重返的威脅。通過巨大的努力，人民首先擺脫了皇帝這個惡夢，隨後免除了遭圍困的折磨。當幽靈似乎再次迫向他們時，他們幾乎仍然還未清醒過來。出於恐懼他們反抗了。對復辟懷有恐懼這一共同感受，幾乎成了聯合巴黎公社社員的唯一粘合劑。他們對政治組織的觀點(超過一般對馬克思所珍愛的中央集權政府的憎恨)，在某種程度上是模糊不清的：他們宣佈舊有形式的國家被廢除了，號召人民拿起武器來統治國家。

此時，由於補給物品開始耗盡，以及被圍困者的條件愈益危急，恐怖發展了。開始剝奪公民權利，人們受到譴責，被處死，其中很多人是無辜的，幾乎沒有什麼人是理應被處死的。在被處死者中有巴黎大主教。他曾被押作人質，反對駐在凡爾賽的軍隊。歐洲其他地方注視著這些可怕的事件，越來越憤慨和厭惡。甚至對開明進步的輿論，對他們的可靠的老朋友如路易·勃朗(Louis Blanc)和馬志尼，巴黎公社社員似乎都是一群罪惡的瘋子，對人性的呼籲毫無反應，是一幫社會縱火犯，發誓要摧毀一切宗教和一切倫理道德；他們是這樣一些人被真實和想像中的邪惡弄得失去了理智，簡直不用對他們無法無天的行為負責。實際上整個歐洲新聞媒介，和反革命的與自由主義者都一樣，給予人們同樣的印象。這裡或那裡某份激進的刊物譴責得不如他種刊物那麼直率，膽怯地以情有可原的環境為借口。公社的暴行不久就遭到報復。勝利了的軍隊所需要的報應採取了大規模屠殺的形式；白色恐怖，正如在這類情況中所常見的那樣，遠遠超過了公社政權在殘忍行為時期所幹下的最惡劣的暴行，而公社的這種罪惡乃是它所要予以終止的。

第一國際動盪不定了。其大部份成員都反對蒲魯東主義者、布朗基分子和新雅各賓黨人，他們係形成了公社的大多數。第一國際反對鬆散聯盟的公社綱領，特別反對恐怖主義行為，此外，它還正式提出反對暴動的意見，聲稱「在目前的危機下，任何擾亂新政府的嘗試……都將是極其愚蠢的。」它的英國成員特別關注的是，在他們的大多數同胞看來，公社並不見得比一幫一般的謀殺者好到哪裡，他們不要以和它建立公開的聯繫令自己妥協。馬克思通過一次極具特色的行動解決了他們的疑惑。他以第一國際的名義發表了一篇演講，宣稱分析和批評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他簡潔而又生動地敘述了導致公社產生、興起和消亡的那些事件後，將公社稱頌為工人階級力量

和理想主義的歷史上第一次公開的挑戰性的表現形式——是工人階級在全世界的人們面前展開的一場反對壓迫者的激戰，是一次迫使它的所有假朋友、激進的資產階級分子、民主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露出他們真面目的行動，他們是革命準備全力以赴的最終目標的敵人。他走得比此還要遠。他承認以公社代替資產階級國家；作為社會結構的那個過渡形式，祇要通過這一過渡階段，工人就可以獲得他們最終的解放。國家被顯示為「資產階級秩序的文明和公正」的體現，它使議會制度合法化，這一度受到它的犧牲品挑戰的議會制「代表著赤裸裸的暴行和無法無天的報復。」因此國家必須予以徹底摧毀。就這一範圍，他再次，正如在一八五〇年和一八五二年一樣，收回了《共產黨宣言》學說，該學說斷定，為反對法國的烏托邦主義者和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者，革命的眼前目標不是摧毀而是掌握國家（「無產階級將……使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的掌握中」），利用國家去消滅敵人。

當他肯定了公社採取的很多措施時，他亦指責它還不夠無情和激進；同時他也不信奉公社的立即創造社會和經濟平等的目標。「權利決不能高於」，他在些年後寫道，「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此而被決定了的文化發展。」這些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間轉變的。

他的後來被題為《法蘭西內戰》的小冊子，最初並不意在作為一項歷史研究，它是一次戰術性行動，典型的魯莽和不妥協行動之一。馬克思有時候受到他自己的追隨者的責備，因為他使第一國際在大眾的心目中，和一幫破壞法律者和暗殺者聯繫起來，令該組織得了一個沒有必要的邪惡名聲。這類考慮絲毫不影響他。終其一生，他都堅定地、不屈不撓地信奉工人階級暴力革命。巴黎公社是工人們以他們的力量舉行的第一次自發的起義。一八四八年六月暴亂，按馬克思的觀

點乃是對工人的攻擊，而不是他們發起的攻擊。巴黎公社不是馬克思直接組成的。他實際上把它看成是一個政治上的大錯，他的政敵布朗基分子和蒲魯東主義者在公社中始終占著絕對優勢的地位，然而在他看來，公社的重要性仍然是巨大的，在此之前，曾經有過社會主義思想和行動的很多分散的支流，但是這一次起義，連同它在全世界產生的回響，以及它肯定要對一切地方的工人產生的巨大影響，使它成為新時代的發端事件。為公社而戰、為公社而死的人，是國際社會主義的第一批殉難者，他們的鮮血將成為新的無產階級信念的種子；無論公社社員有過什麼樣的悲劇性缺點和不足之處，它們在這些人所發揮的巨大歷史作用面前，在他們注定要在無產階級革命傳統中所占的地位面前，都算不了什麼。

通過站出來向公社社員致以公開的敬意，他獲得了意欲獲得的結果：幫助創造一個社會主義的英雄傳奇。當恩格斯被要求對「無產階級專政」下定義時，他把巴黎公社指為這一概念在當時的最近似實現。三十多年後，當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夭折期間爆發莫斯科起義時，列寧為它辯護，反對普列漢諾夫(Plekhanov)的批評，引用了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態度。列寧指出，對一場偉大的英勇的革命的記憶，無論該革命如何設計不良，它的眼前結果損害如何巨大，這種記憶所具有的感情上的和象徵性的價值，對革命運動來說是一筆極大的、更具永恒性的財產，遠非當時無益的實現革命所能比擬，此時最要緊的並不是寫出精當的歷史，甚至也不是汲取它的教訓，而是去製造革命。

這篇演講的發表令很多第一國際成員為難和震驚，並加速了它的解體。馬克思試圖搶先承擔罪責，公佈他的名字作為該文的唯一作者。正如人們現今普遍知道的那樣，「紅色恐怖博士」這個

名字一夜間成爲公衆憎恨的對象。匿名信開始寄來，他的生命安全數次受到威脅。他興高采烈地致信恩格斯：「過了像沼澤裡的青蛙一樣漫長而令人厭煩的二十年單調隔絕生活後，這對我正好處。政府的喉舌——《觀察家》甚至威脅要起訴我。讓他們試試看吧。我可不在乎這些烏合之衆。」喧嚷是沉寂下去了，但對第一國際造成的損害是長久的，它在警方以及一般公衆的心目中，和巴黎公社的暴行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了。英國工會領袖和第一國際的聯盟亦受到一次打擊，在他們看來，無論如何，這一聯盟完全是機會主義的，建立在促進特殊工會利益的作用的基礎上。這時，自由黨正強烈勸誘工會，答應在這些問題上給予支持。和平的、體面的獲得權力這一前景，令他們越發不想和聲名狼藉的革命密謀聯繫在一起。他們的唯一目標是提高生活水準，提高他們所代表的熟練工人的社會和政治地位。他們並不把自身看成一個政黨，如果他們贊成第一國際的綱領，那也部份是因爲綱領條文具有一定程度的靈活性，巧妙地避免使它的成員對公開的革命目標承擔義務，但是最主要的是承認他們對政治問題的模糊態度，這個事實極受英國政府欣賞。針對西班牙政府要求鎮壓第一國際的通知，英國外交大臣格蘭維爾勳爵(Lord Granville)親自答稱，在英國他們並沒有感到武裝暴動的威脅：第一國際的英國成員是和平的，僅僅涉足於勞工談判，政府沒有任何恐懼的理由，馬克思很不樂意地意識到這個真理。在他看來，甚至哈尼(Harney)和瓊斯(Jones)亦比他打交道的那些頑固的工會官員更可取些，後者如奧德格(Odger)，或克里默(Cremer)或阿普爾加思(Aplegarth)，他們不信任外國人，幾乎不關心發生在他們國家以外的事件，對思想觀念也沒有什麼興趣。

一八七〇年至七一年間，第一國際沒有舉行會議，一八七二年在倫敦召開了一次會議。大會

提出一項最重要的提案，即工人階級從此在政治鬥爭中不再依靠資產階級政黨的幫助，並組成自己的政黨，該提案是在經過激烈的辯論後，被英國代表團投票通過的。這一新政黨在馬克思的有生之年並未建立，但是，至少在思想觀念上已被確立了，而在這次會議上，工黨誕生了，這可能被看作馬克思對接納他的這個國家的國內歷史所作的一項最大的貢獻。也是在這次會議上，英國代表團堅持並且爭得了建立一個單獨的當地組織的權利，以取代以前那樣由總委員會代表他們的做法。這使馬克思很不高興，使他感到害怕，這是一個不信任的、幾乎是反叛的姿態。他立刻懷疑這是巴枯寧的詭計。前些時，法國的事件令巴枯寧處於自豪和陶醉的心境中，因為他感到這些事件毋庸置疑要歸之於他的個人影響。在巴黎公社事件中，巴黎的一個很大部份毀於大火中，這火對於他似乎是他本人生活的象徵，亦是他喜愛的那條悖論的一次輝煌實現：「毀滅的激情也是一種創造的激情」。

馬克思既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巴枯寧的行動和聲明的感情基礎：這位「沒有一部可蘭經的穆罕默德」所具有的影響，對運動來說是有一種威脅，因而必須將它摧毀。

「建立第一國際」，他在二一八七一年寫道，「是出於鬥爭需要，以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組織代替那些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派別……。社會主義宗派主義(Socialist sectarianism)和真正的工人階級運動是水火不相容的。祇有當工人階級還沒有成熟到擁有自己的獨立運動，各種派別纔有權利存在。一旦那種運動來臨了，宗派主義便成爲反動的了……第一國際的歷史是一場總委員會反對各種淺薄實驗和派別的不停頓的戰鬥。……將近一八六八年底時，巴枯寧加入了第一國際，他的目的在於創造一個限於第一國際範圍內的第一國際，使自己成爲它的領導人。就巴枯寧先生



而言，他的學說（從蒲魯東、聖西門等人的觀點中七拼八湊而成的荒謬絕倫的大雜燴）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次一等的貨色，僅僅成爲他獲得個人影響和權力的手段。但是，如果說巴枯寧作爲一個理論家一無是處，那麼巴枯寧作爲一個陰謀家，卻正達到該行當的頂峰。……至於他的政治非參與，（每一項工人階級本身反對統治階級並從外部施加壓力的運動）其實質原本是一種政治運動。……但是，當工人的組織並未如此高度發達，以至於可以經得起冒險和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力量作決定性搏擊時，它也必須通過不斷的宣傳鼓動，反對統治階級的罪惡和愚蠢，爲這最後的搏擊作好準備。不然它就成爲統治階級手中的玩物，像法國九月革命所表現出來的那樣，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如格萊斯頓統治下的英國近年來所獲得的成功所表現出來的那樣」。

在這段時期，巴枯寧已經開始了他的古怪生涯中最終的、最奇怪的階段。他被一個年輕的俄國恐怖主義者納契依夫(Nachayev)迷住了。他發現納契依夫的大膽莽撞和完全無所顧忌，有著不可抵抗的吸引力。納契依夫把恫嚇和訛詐信奉爲革命的基本方法，合理化它們的目的。他寫了一封匿名信給巴枯寧的《資本論》俄文譯本預定出版者的代理人，惡狠狠地威脅他不要再繼續把骯髒的賣文工作壓到天才人物身上，或者爲索討預付給巴枯寧的款項糾纏不休。又氣又怕的代理人把信寄給馬克思。由巴枯寧的組織「民主聯盟」導演這齣詭計的證據本身是否足以把他驅逐出第一國際是令人懷疑的，因爲他在大會上有著很多個人支持者，但是委員會爲調查這件醜聞發布的報告，以及戲劇性地散發納契依夫的信，使事情起了決定性變化。經過冗長和激烈爭吵的會議後，其間甚至蒲魯東主義者亦終於被說服，祇要巴枯寧在他們的行列裡，就無法保持黨的團結，巴枯寧和他的親密助手終於在投票中，被微弱多數逐出第一國際。

馬克思接下來提的建議亦如炸彈震動了大會的經驗不足的成員，那就是把第一國際的總委員會遷至美國。人人都意識到這就等於是第一國際的解體。美國不僅僅遠離歐洲的事務，而且在第一國際的事務中亦沒有什麼重要性。法國代表團聲稱那不如乾脆把它遷到月球上去吧。馬克思沒有就這項建議提出過任何清晰的理由，建議也由恩格斯正式撤消，但它的目的對每一個出席大會者都是一清二楚的。在他所領導的這個組織中，沒有至少是某些方面來的忠誠和絕無問題的服從，他是無法操作的。英國已經脫離了。他曾經想到把委員會遷至比利時，但那兒反馬克思主義分子也日益令人畏懼；在德國，政府要鎮壓，法國、瑞士和荷蘭也遠遠靠不住，意大利和西班牙肯定是巴枯寧分子的大本營。一旦面臨著一場艱苦的鬥爭，其最佳結果也將是一場代價極大的勝利，並就此長期毀掉無產階級團結的一切希望，馬克思既經肯定第一國際到底未落入巴枯寧分子的手中，便決定讓它平安地消逝。

批評馬克思的人聲稱，他判斷所有社會主義者召開的大會的功過得失，僅僅根據他本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這些大會。如此權衡當然是由他和恩格斯兩人所作的，並且是非常自覺地作出的。它從未顯示出任何跡象，表明他們理解了這種態度在他們的廣大追隨者中所激起的困惑不解的憤慨。馬克思親自出席了海牙大會，他的聲望如此顯赫，儘管遭到激烈反對，大會最終還是以微弱多數投票贊成第一國際實際上解散。後來召開的一些大會均是些無聊的模仿。一八七六年第一國際終於在美國費城宣告終止。十三年後共產國際確實又獲重組，但至那時——一個社會主義活動在一切國家急劇增加的時期——它的特點和以前的第一國際大不相同了。儘管它有著明確的革命目標，但有著更多的議會政治，更溫良可敬，更樂觀，性質上基本上是調和中庸的，多半承

認這樣一種信念，即在發自下層的恒久但和平的壓力下，資本主義社會逐漸演變至適度的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

# 第十一章

## 最後的歲月

我（對馬克思）談到當我年紀愈老時，便愈益  
容忍了。「是嗎，」他說，「是這樣嗎？」

——海德曼(H. M. Hyndman)《冒險生活錄》



和巴枯寧的決戰，在馬克思的一生中是最後一個公開的插曲。革命在一切地方似乎都沉寂下去了，儘管餘燼還在俄國和西班牙發着微弱的老芒。反革命再次占了上風，但形式確實比他青年時代那時候要溫和，準備向對手作一明確的讓步，但是似乎這麼作就發鞏固穩定了，以和平的手段奪得對政治和經濟的控制，似乎是工人解放的最佳希望。拉薩爾在德國的追隨者中，威望穩定地增長。李卜克內西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反對派，鑒於第一國際已經消亡，他傾向於和他們妥協以形成單一聯合的政黨。他被說服道由於他待在德國，因而可以比馬克思和恩格斯更好地把握住戰術性的應變事件，後者當時仍住在英國，聽不進任何妥協的建議。一八七五年，兩個黨終於在哥達(Gotha)召開了一次會議並結成聯盟，宣佈了一項由兩派領袖一起完成的共同綱領，並很自然地提請馬克思批准。他毫不含糊地表述了該綱領給他的印象。

一通言辭激烈的指責，即刻發給了在柏林的李卜克內西，恩格斯被指定寫出一篇相似的檄文。馬克思指控他的信徒在使用從拉薩爾和「真正社會主義者」那兒繼承而來的誤導的、曖昧模糊的術語中，迷失了方向，散佈了含糊其辭的自由主義詞句，這正是他花了半生心血予以揭露和打擊的。綱領本身在他看來似乎充滿了妥協折衷的精神——特別是接受和最壞的敵人國家社會主義長期共存——綱領似乎相信有可能通過和平鼓吹諸如「公正」的勞動報酬、取消繼承法之類瑣細目標達到社會正義。——治療此種或彼種弊病的蒲魯東式和聖西門式方子，意在維護國家和資本主義制度，而非加速它的崩潰。他以語氣憤怒的旁注形式，最後一次傳達了他本人關於社會主義政黨的戰鬥綱領應該是什麼樣的概念。忠實的李卜克內西接受了這些，正如他接受來自倫敦的一切東西，溫順乃至虔誠，但並不照辦。聯盟仍然存在而且繼續壯大。兩年後，李卜克內西受到恩格

斯的尖銳批評，他對李卜克內西的政治能力評價，甚至比馬克思對他的評價還要低。這一次，其原因在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刊物上出現了一個名叫尤金·杜林(Eugen Dühring)的文章以及支持杜林的文章。杜林是柏林大學教經濟學的一個激進講師，他激烈反對資本主義，但幾乎不持社會主義觀點，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影響越來越大。爲了反對他，恩格斯發表了他最長、最全面的著作，亦是和馬克思的最後一次合作。它包含了一種權威的歷史的唯物主義觀點，以直率的、強有力的、清晰的散文體予以闡述，這種文體是恩格斯駕輕就熟的。這部被稱作《反杜林論》(Anti-Dühring)的著作，是對非辯證法的、實證的唯物主義的一次攻擊，後者在科學家和記者中正越來越流行，它認爲一切自然現象都可以物體在空間的運動意義上予以闡釋。《反杜林論》反對這種觀點，推出了遠遠超出人類歷史範疇的辯證法的普遍作用的法則，涉及生物學、物理學和數學領域。恩格斯多才多藝，閱讀廣泛，靠着極大的勤奮已經獲得了這些學科的某些初步知識，但他就此所作的論述並不是光彩奪目的，特別是那些過於野心勃勃的嘗試，如發現黑格爾辯證法三位一體在數學規律中的作用，按照這種規律兩個負數的結果是正的。這些嘗試證明對以後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令他們爲難的根源，他們發現自己被強加了一個無法完成的捍衛一種古怪觀點的任務，這種觀點並非爲馬克思本人所堅持，至少沒有包含在他已出版的著作中。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生物學和數學是這樣的一些學科，像笛卡爾物理學一樣，在一場偉大的思想運動發展中，形成了一個泥古主義的、而非科學的有趣的特殊和孤立的領域。更重要的是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概念，當它忠實地展開馬克思對自由主義和唯心主義史學方法的攻擊時，它對該題目的闡述比較馬克思的大部份著作，特別是他的早期著作，都更機械，持更粗糙的決定論觀點。在這點上，恩

格斯或許因為他寫得如此清晰，從而為極大部份馬克思主義作家所仿效，以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為首，達半個多世紀。或許當馬克思在暮年時聲稱（他想到的是他的法國追隨者），無論他可能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首先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時他已經考慮到了此類通俗化。《反杜林論》中最具可讀性的章節後來作為小冊子重印，題為《社會主義·烏托邦和科學》（*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這是恩格斯的力作，對發源於德國唯心主義，法國政治理論和英國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作了多少有點達爾文式的敘述。它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所作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好評價，簡潔明瞭，帶有自傳性質，對俄國和德國的社會主義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對「哥達綱領」的批判，是馬克思最後一次激烈干預黨的事務。在他有生之年再沒有發生相似的危機。在接下來的歲月裡，他自由地投身於理論研究，並為恢復日益衰頹的健康狀況作出無望的努力。他從肯提希鎮（Kentish Town）遷至哈弗斯托克山（Haverstock Hill）後，又在那兒搬了一次家，離恩格斯不遠。恩格斯已經把自己的家族產業中的股份售於合夥人，在倫敦的聖約翰森林（St. John's Wood）的一幢寬敞大屋中安了家。在此一、二年前，他為馬克思安排了一項終身年金，數額儘管不大，但足以使他能平靜地繼續探索他的研究工作。他們幾乎每天見面，並一起完成和世界各地社會主義者的大量通信，並受到他們中很多人的尊敬和崇拜。此時馬克思毫無疑問成了國際社會主義在道義上和精神上的最高權威。拉薩爾和蒲魯東死於六十年代，巴枯寧是一八七六年。馬克思沒有對他的最後一位大敵的死去作任何公開評價，也許因為他刊在一家德國報紙上的苛刻的蒲魯東訃告，在法國社會主義者中引起一陣憤慨的浪潮，這次他想保持沉默較為穩當。他對活著的和死去的敵手的觀點並沒有改變，但在體力上已無法再去進行青壯年時代的積極鬥



爭。過度工作和貧困的生活終於消蝕了他的力量。他疲倦，常常病倒，開始為健康問題所困擾。他每年造訪英國的海濱，或德國的、波希米亞的礦泉療養地，通常由他的小女兒愛琳娜陪伴，在那裡他偶爾會見老朋友和追隨者，他們有時候帶來渴望晤見這位著名革命家的青年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

他難得談到自己或自己的生活，從不談論自己的血統。他是一個猶太人，這個事實是他或恩格斯從未直接提起的，在馬克思的著作裡最多也祇間接提到過兩次。他涉及個別猶太人時，特別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在某種程度上是刻毒的。他的血統顯然是一個個人的恥辱，他不能不在別人那兒指出這點。他否認注重民族或宗教有任何重要性，他強調無產階級的國際特徵，這些都以特別尖銳的調子出現。隨著年齡增長他愈益不耐煩，急躁不安，他仔細避開社交場合中令他厭煩或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在人際關係方面他越來越難相處。他和最老的朋友之一，詩人弗賴利格拉特，在其一八七〇年發表愛國頌詩後斷絕了關係。他故意侮辱他忠實的信徒庫格曼(Kugelmann)，一個德國醫生，馬克思會給他寫過一些極有意思的信，侮辱的原因是馬克思已經表明去卡爾斯巴不要人陪伴，而他仍堅持要一起去。另一方面，當和他打交道老練得體時，他的態度可以很友好，甚至通情達理，特別是對待年輕的革命者和激進的記者，他們人數越來越多，來到倫敦向兩位老人致敬。這類朝聖者在他的房子裡受到令人愉快的接待。通過他們，他和以前他沒有什麼聯繫的國家裡的追隨者建立了接觸，特別是俄國，那兒，一個生機勃勃、紀律良好的革命運動終於紮下了根。他的經濟學著作，特別是《資本論》在俄國獲得的成功超過了任何國家：審查機構——真夠諷刺——允許該書出版，理由是「儘管該書有顯著的社會主義傾向……它不是以流行的文體寫

成的……不大可能在一般公眾中擁有眾多讀者」。刊在俄國新聞媒介上的書評，比任何其他地方有更多的讚譽之詞，更有見識。這一事實令馬克思既吃驚又愉快，極大地改變了他蔑視「俄國鄉下佬」的態度，開始敬仰受他著作深厚薰陶的新一代嚴正無畏的革命者。

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歷史和任何國家的都不同，和實證主義、唯物主義的其他形式不同。馬克思主義在德國和法國基本上是一項無產階級運動，標誌著對十九世紀前半葉自由主義的唯心主義之無效性的一種強烈反感，表達出收縮了的現實主義情緒。在俄國，無產階級按西方標準仍然是弱小的、不重要的，不僅馬克思主義的鼓吹者，而且大部份轉奉馬克思主義為信仰者，都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對他們來說，馬克思主義本身亦成爲一種浪漫主義，一種姍姍來遲的民主熱情的形式。它在民粹主義運動的頂峰時期得到發展，該運動鼓吹有必要使自己和人民打成一片，認識他們的物質需求，以便了解他們，教育他們，提高他們的思想水準和社會層次，從而它同等地反對反動的西方政黨，以其神秘的信仰，信奉獨裁，一方面是東正教和斯拉夫精神，另一方面是諸如屠格涅夫(Turgenev)或赫爾岑的溫和的農民自由主義或傾向西方的社會主義。

這時期，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富家子弟，特別顯著的是那些「懺悔的」青年貴族和大地主，爲社會罪惡所苦惱，拋棄了他們的前途和地位，以便深入研究農民和工人的生活條件，以他們的父執輩當年追隨巴枯寧或十二月黨人的同樣高貴的熱情，生活在農民和工人中間。歷史的和政治的唯物主義——強調具體的、實際的、作爲社會和個人生活之基礎的經濟現實，在制度機構和個人行爲對大眾的物質福利的關係以及對物質福利影響的意義上，批判制度機構和個人行爲，憎恨和蔑視爲藝術而藝術或爲生活而生活，孤處於象牙之塔，對世界的苦難不聞不問——這些都以忘

乎所以的激情加以鼓吹。「一雙靴子是某種比莎士比亞的所有戲劇更重要的東西」，一位著名的激進唯物主義者說道，這表達了一種普遍的情緒。馬克思主義在這些人中產生了擺脫懷疑和混亂的自由感，它第一次以清楚的唯物的措詞，系統地揭示了社會發展的本質和規律。在斯拉夫的浪漫民族主義之後，在黑格爾唯心主義的玄奧壯觀之後，馬克思主義的直陳已見似乎是健全透徹的。這種總的作用很像馬克思本人四十年前閱讀費爾巴哈後產生的感覺，它導致產生了在其基礎上找到最終解答和行動的無限可能性這種同樣的感覺。俄國沒有經歷過一八四九年的恐怖，它的發展遠遠落後於西方，七十年和八十年代，在很多方面它所面臨的問題，和歐洲其他地方半個世紀前面臨的是相同的。俄國人閱讀《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雄辯的章節，其心情之振奮，和上一世紀人們閱讀盧梭的著作是一樣的。他們發現很多東西格外適用於他們自身的條件。在「農業中正如在製造業中一樣，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過渡意味著生產者的苦難；勞動工具成為制伏、剝削工人，使他們陷入窮困的手段；勞動過程的社會組合和組織發揮著粉碎工人的個人活力、自由和獨立的精巧方法的作用。」這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國來得真實，祇不過俄國，特別是農奴解放，極大擴展了勞動市場之後，這種方法並非是精巧的，而是簡單的。

令馬克思吃驚的是，他發現三十年來他在著作中和談話中都反對過的國家，卻給了他最無畏、最明智的信徒。他在倫敦的寓所歡迎他們，和他的著作的翻譯者達尼爾遜(Danielson)以及最能幹的俄國經濟學家之一西伯爾保持定期通信。馬克思的分析主要涉及工業社會。俄國是一個農業國。把根據一類條件設想的學說直接應用到另一類條件，這種嘗試肯定要導致理論上和實踐上的謬誤。在俄國的達尼爾遜，以及流亡國外的拉伏洛夫(Lavrov)和維拉·查蘇利契(Vera Zaslitch)給

他寫信，懇求他致力於研究俄國農民形成原始公社、共同擁有土地的特殊組織所呈現出來的問題，特別是就得自赫爾岑和巴枯寧，並為俄國激進分子廣泛接受的主張表明他的觀點，該主張堅持認為從原始公社直接過渡到發達共產主義是可能的，無需像西方那樣經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中介階段。馬克思以前把這種假設輕蔑地視作偽裝的激進主義，源自農民的感情用事的斯拉夫式理想化——結合了幼稚的信念，以為「可能從大膽的跳躍來欺騙辯證法可能避免演變的自然階段，或以法規條文把這些階段攪渾。」然而至此時，新一代俄國革命者的智慧、認真以及更重要的是他們狂熱的忠實的社會主義，使他產生足夠印象來重新考察這個問題。為此他開始學習俄語，六個月後他的俄語程度已使他足以閱讀社會學著作①和朋友們成功偷運到倫敦的政府報告。恩格斯帶著某種厭惡觀察這個新盟友：他對易北河以東的一切東西，都抱有不可救藥的反感。他懷疑馬克思投身於一項新的工作，目的在於自我掩蓋純粹由於體力疲弱而不願意完成《資本論》的寫作。馬克思充分鑽研了大量統計的和歷史的材料後，在理論學說上作了相當讓步。他承認②如果俄國革命竟然成為整個歐洲無產階級共同起義的信號，那麼直接建立在現存半封建公社土地所有制基礎上的俄國共產主義就是可以設想的，甚至是極可能的；但是，如果其鄰近國家的資本主義繼續發展，這就不會發生，因為這將不可避免地迫使俄國沿著已經為西方更先進國家所經過的道路盡力

① 例如車爾尼雪夫斯基 (Chernyshevsky) 和伏烈洛夫斯基 (Fierovskiy) 的著作，對前者他是很欽佩的。

② 在普列漢諾夫的一封未發表的信裡，他顯然認為這是對民粹主義的一個危險的讓步。它祇是在十月革命過了幾年以後纔問諸於世。

保護自己的經濟。

然而，向倫敦流亡者致敬的並不僅僅是俄國人。新的聯合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年輕的領導人倍爾 (Bebel)、伯恩斯坦 (Bernstein)、考茨基，造訪馬克思，就一切重要的問題向他討教。他的長女和次女嫁給法國社會主義者，使他和拉丁國家保持了聯繫。法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于勒·蓋德 (Jules Guesde) 把他的黨的綱領提交給馬克思，使該綱領有了重大的修改。馬克思主義開始取代理意大利和瑞士的巴枯寧無政府主義。從美國傳來了令人鼓舞的報告。最好的消息來自德國，儘管那兒有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法，社會主義者的票數仍在驚人地增長。仍然置身於此股浪潮之外，對他的教誨無動於衷的唯一重要的歐洲國家，就是他所居住稱為第二故鄉的英國。「在英國」，他寫道，「持續的繁榮挫敗了工人的士氣……在這最資產階級的土地上，最終目標似乎是和資產階級一起建立資產階級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英國工人的革命力量逐漸消失了……他們擺脫資產階級的傳染將是長期的……他們完全缺乏過去憲章派的氣概。」他沒有任何親密的英國朋友。他認識歐內斯特·瓊斯 (Ernest Jones)，他和很多勞工領袖一起開展工作，激進分子拜訪他，如貝爾福特·巴克斯 (Belfort Bax)、克朗普頓 (Crompton)、約翰斯通 (Johnstone)、和雷·蘭開斯特 (Ray Lankster)，他甚至接受作為統治階級一員的杜夫爵士 (Sir Duff)——一個獨立觀點的議員——的邀請去他的俱樂部，接受他的朋友、出版家蒙特費奧 (Montefiore) 的邀請。但是此類晤見觸及的是他最表面的生活。在他晚年的最後歲月裡，他確曾有一小段時期為社會民主聯盟創始人海德曼 (Hyndman) 所籠絡。後者為在英國普及馬克思主義作了大量工作。海德曼是一個虛懷若谷，隨和開朗的人，就氣質而言是一個真正的激進分子，一位趣味盎然、能打動聽眾的演說家，亦是

一位有關政治經濟問題的話題的活躍的作家。作爲一個輕鬆的業餘人士，他很樂意會晤有才華的人，和他們交談。其旨趣是有點不加區別的，因而當時他拋棄了馬志尼便轉而和馬克思交友。在他的回憶錄裡他這樣描繪馬克思，「我看到馬克思，第一印象他是一個強有力、不修邊幅、桀驁不馴的老人，隨時準備、更不用說熱衷，參與衝突，相當疑心會遭到別人的攻擊；然而歡迎我們卻是真誠親切的……當他以極度的憤慨談起自由黨的政策，特別是關於愛爾蘭的政策，這位年老的鬥士皺起眉毛，寬大有力的鼻子和臉部因激動而明顯的抽動，激烈的譴責之詞噴湧而出，既顯示出他熾熱的氣質，也顯示出他多麼出色地掌握了我們的語言。被憤怒所深深激起的舉止和言詞，以及他評論當時的經濟事件時所表現的態度，這兩者之間的強烈反差是引人注目。他無需作任何明顯的努力，便從預言者和暴怒的譴責者角色換成冷靜的哲學家角色，我感到或許很長時間裡，在這位導師面前我一直是個學生。」

海德曼的誠摯、他的天真、他的宜人舉止和令人不存疑心的態度，以及首先是他全心全意，不加鑒別地崇拜馬克思，以典型的愚蠢稱其爲「十九世紀的亞里斯多德」，這一切使馬克思在幾個月裡，抱著顯著的友誼和縱容態度對待他。圍繞著海德曼的書《所有人的英國》(England for all)，不可避免的決裂發生了。該書敘述了馬克思主義在英國，即使不是非常精確的也是極具可讀性的。該書沒有指名道姓向馬克思表示感謝，海德曼笨拙地試圖解釋爲「英國人不喜歡受外國人的教誨，而你的名字在這兒如此令人討厭……」這就夠了。馬克思言辭激烈地指責剽竊。拉薩爾爲此種攻擊而受的痛苦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此外，他亦絲毫不想和海德曼自己的混亂思想聯繫在一起。他立刻中止了關係，隨之亦中止了他和英國社會主義的最後保留下來的聯繫。

他的生活方式幾乎是一成不變的，七點起身，喝上幾杯黑咖啡，然後退入書房，在那兒他閱讀和寫作直到午後兩點。草草吃完午餐便再次工作直到晚餐，這是他和家人一起享用的。之後在晚上，他沿漢普斯坦德荒地(Hampstead Heath)作一次散步，或者逕回書房，在那兒工作到凌晨二或三點。他的女婿保爾·拉法格(Paul Lafargue)關於這個房間留下一段描述：

「房間位於二樓，面向公園的寬大窗戶給它帶來明亮的光線，壁爐在窗的對面，兩側是書架，其最上層堆著報紙和手稿直達天花板。在窗的一側立著兩張桌子，也同樣混堆著紙張、報紙和書籍。房間中央是一張樸素的小書桌和一把溫莎靠椅。在靠椅和一排書架之間有一個皮沙發，馬克思偶爾在沙發上躺臥休息。壁爐架上散置著書、雪茄、火柴盒、煙草罐、文鎮和相片——他的女兒、妻子、恩格斯、威廉·沃爾夫……他決不允許任何人整理他的書報紙張，……但他能夠取到任何他要的書和手稿。談話時，他常常會暫停一下，以便指出某書的有關段落或找到一份參考資料……他對把他的書整理得井井有條是不屑一顧的。四開本、八開本的書籍和小冊子，就它們的尺寸和形狀而言放置得亂七八糟。他對書籍的裝幀形式、印刷紙張之精美不表敬意。他常常折書角、隨便劃線，作眉批。他並不真心在書上作注釋，但是當作者走得太遠時，他忍不住會寫上一個問題或驚嘆號。每年他都重讀筆記本和劃過線的段落以恢復自己的記憶……這是有力的、精確的：他曾按照黑格爾記憶音調不熟的詩句的計劃訓練出來的。」

他把星期天奉獻給他的孩子們，在他們長大成家後，又奉獻給孫兒們。家庭所有成員都有綽號。女兒們分別叫奎奎、夸夸和圖西；妻子是穆姆，他自己則是摩爾或老尼克，因他膚色黝黑，相貌凶惡。他和家庭的關係——甚至和難纏的愛琳娜——一直是敦厚慈愛的。俄國社會學家科瓦

列夫斯基(Kovalovsky)在馬克思晚年時常拜訪他，對他的溫文爾雅有愉快的驚奇感。「馬克思通常被描繪成」，他在多年後寫道，「一個陰鬱自負的人，斷然反對一切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文化。實際上他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教養有素的盎格魯—日耳曼紳士，他和海涅的密切關係，在他身上發展成一種令人振奮的諷刺氣質。他是一個充分享有生活歡樂的人，這要歸之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他的個人地位是極其舒服的。」這段短文描述了作為愉快和藹的一家之主的馬克思，即使並不完全令人信服，也傳達出和在蘇荷的早期生活形成的鮮明對照。他的最大快樂是閱讀和散步。他喜愛詩歌，大段背誦但丁、艾斯契勒斯(Aeschylus)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他無限崇拜莎士比亞，家庭教育均圍繞著莎士比亞：大聲朗讀他的作品，表演以及經常進行討論。馬克思無論幹什麼都講究方法。抵達英國後，他發現自己英語不夠好，便決定提高英語，他列出莎士比亞的語句措詞；隨後便背誦。同樣，學習俄語後，他閱讀果戈里(Gogol)和普希金(Pushkin)的作品，小心地劃出他不懂的詞。對德國文學他有可靠的鑒賞力，這是他年輕時就獲得的，並通過一再閱讀他最喜愛的作品而得到發展。為了調劑胃口，他也閱讀大仲馬(elder Dumas)或司格特(Scott)，或當時的法國輕鬆小說；他極大地崇拜巴爾扎克(Balzac)，他認為在小說中提供了對那個時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的最敏銳的分析。他聲稱小說中的很多人物直到創造他們的作家死去後，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才完全成熟起來。他曾打算寫一部關於作為社會分析家的巴爾扎克的著作，但從未著手作過（考慮到他唯一存世的文學批評的質量，那篇關於歐仁·蘇的文章的質量，這種損失好像也無需悲痛）。他對文學的口味，就其酷愛閱讀而言，總的來說也未見得有什麼出色之處，是很普遍的。沒有什麼東西表明他喜愛繪畫或音樂，一切都被對書的熱情擠走了。



他總是大量閱讀，但在他暮年時，他的閱讀胃口擴展到了這種程度，以至於干擾了他的創造性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裡，他開始要掌握完全是新的語言，因此他企圖學習土耳其語，表面目的是研究那個國家的農業狀況。情況或許是作為一個老厄克特分子（厄克特爵士 [Sir Urquhart] 一六一一—一六六〇年，英國翻譯家，持強烈保王黨觀點，曾參加查理二世軍隊，晚年無所事事，逃往歐洲大陸——譯注），馬克思寄希望於土耳其農民，期望他們成為近東的一股破壞性的民主化力量。當他愈益嗜學成癖時，恩格斯最擔憂的事情證實了。他寫得越來越少，不再花任何精力整理大堆紊亂的手稿筆記，正是基於它們，恩格斯編成了《資本論》的第二第三卷，以及考茨基編成了第四卷補充研究，其中有大量內容絕不次於第一卷，而成爲經典著作的僅僅是第一卷。

他的體力急劇衰落。一八八一年，燕妮·馬克思在經受了病痛的長期折磨後死於癌症。「摩爾也和她一起去了」，恩格斯對馬克思最鍾愛的女兒愛琳娜說。馬克思多活了兩年，其間仍和義大利人、西班牙人和俄國人有著廣泛的通信往來，但他的精力耗盡了。一八八二年，在過了一個酷寒的冬天後，醫生送他到阿爾及爾以恢復健康。一路旅行抵達目的地時他患了嚴重的胸膜炎。他在北非待了一個月，那兒異常寒冷和潮濕，到返回歐洲時他已疾病纏身，筋疲力竭。數星期中他在法國的里維埃拉逐鎮漫遊，徒勞地尋求陽光。隨後他去了巴黎，在那兒和大女兒燕妮·龍格待了一段時光。回到倫敦後不久，傳來了她猝死的消息。他再也沒有從這次打擊中完全恢復過來。隨後一年，他身患疾病，並發展成肺部膿腫，於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坐在書房的靠椅裡，在睡眠中死去。他被安葬在海格特（Highgate）公墓裡，躺在他妻子的身旁。出席葬禮者不多，有家庭成員，一些私人朋友，以及從幾個地方來的工人代表。恩格斯致悼詞，莊嚴而令人感動，談到他的

成就和品格：

「他的畢生使命是以此種或彼種方式為推翻資本主義社會而貢獻，……為當代無產階級解放而貢獻，是他首先使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求，意識到他們可以贏得自由的條件，鬥爭是他的本質。他以幾乎沒有什麼人可以和他比較的激情和堅韌，卓有成效地進行鬥爭，……因而成為他的時代遭到最大憎恨、受到最多誹謗的人。……他去世了，但從西伯利亞的礦井到加利福尼亞的海邊，在歐洲和美洲的所有地方，他受到成千上萬革命的工人夥伴的愛戴，崇敬和哀悼……他的名字和功業綿延長久，流芳百世。」

他的逝世在公眾中沒有引起很大注意。《泰晤士報》倒是刊載了一則簡短的、不準確的訃告，但這是一則來自該報駐巴黎記者的通訊，他報導了從法國社會主義報刊上讀到的消息，儘管馬克思死於倫敦。他去世後，當他教誨的革命影響越來越顯著時，他的名聲便穩固地增長了。作為個人而引起公眾或傳記作家的注意，馬克思遠不如和他同時代的更敏感、更浪漫的人物。確實，卡萊爾、穆勒、赫爾岑是更具悲劇性的人物，備受馬克思既沒經歷過也不理解的精神與道德衝突的折磨，遠較深刻地受到他們這代人的精神騷動的影響。他們留下了對此的痛苦而又詳盡的敘述，其出色的寫作和生動鮮明，在馬克思或恩格斯無論是公開出版或未發表的作品中都是找不到的。馬克思和他的時代裡那個卑鄙自私、勢利狹窄的社會作鬥爭，在他看來，這個社會似乎使人際關係庸俗化、卑微化，並帶來了同樣深刻的仇恨。但他的頭腦是由更強壯、更粗野的結構所組成的；他不是敏感的，他充滿自信、意志堅強：令他不快樂的原因是外在的——貧困、病痛以及敵人的勝利。他的內在生活似乎並不複雜，是安全自在的。他根據單純的黑白分明來看這個世界；任何

人，不和他站在一起，就是反對他。他知道自己站在哪一邊，他的一生便是爲此在戰鬥，他知道這一邊最終肯定將取得勝利。像他的朋友裡那些較溫和的靈魂生活中發生的信仰危機——諸如赫斯或海涅那樣的人的自我反省——諸如此類，在他那兒是得不到同情的。他也許把它們看成資產階級墮落竟有著如此多的徵兆，以病態地關注個人情感的狀況的形式出現。或者還要惡劣，以爲了某種私下的或藝術的目的利用社會動盪的形式出現——輕浮無聊，不負責任的自我放縱。正當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戰役展開在他的面前時，這些行爲理應受到譴責。這種對個人情感的決不妥協的堅定性，以及幾乎如宗教信仰徒般狂熱堅持自我犧牲原則，在每一處地方都既爲他的後繼者所承繼，也爲他的敵人所仿效。這在每一個領域裡，把他的真正接班人和追隨者，與真正敵人和寬容的自由主義，區別了開來。

在他之前已有人鼓吹過階級鬥爭，但正是他構築了一個計劃，並成功地付諸實踐，旨在爭取達成一個階段的政治組織，僅僅爲其作爲一個階級的利益而鬥爭——如此他便轉變了政黨和政治鬥爭的全部性質。然而，在他自己看來，以及在他的同時代人看來，他更重要的是作爲一個經濟學家出現的。他的經濟學說賴以建立的前提，他對這些前提所作的發展，作爲衆多觀點之一種，相繼成爲討論的題目，被有些人因他種觀點之取代而放棄，亦被另一些人所復興或爲之辯護，然而極難說它們在任何時候曾經占據過經濟理論界的中心地位。他的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和演變的學說，對理論和實踐有著鉅大、持久的影響，非近代提出的任何思想體系所可比擬，但他沒有在任何地方詳盡揭示過這種學說。這一理論斷言，有關任何現象，要問的最重要問題，是關於該現象所涉及的和經濟結構的關係，也就是，社會結構中的經濟力量關係，現象乃是它的一種表現。該

理論已經創造了批評和研究的新手段，它的發展和運用，改變了我們時代的社會科學的性質和方向。一切有賴於社會觀察而工作的人都必定受到影響。不僅是所有國家裡互相衝突的階級、集團、運動和它們的領袖，而且是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批評家和創造性的藝術家，祇要他們試圖分析變化中的社會生活性質，都把他們的思想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歸之於卡爾·馬克思的工作。自馬克思主義完成以來，將近一個世紀已經過去了，在此期間，它得到的讚譽和指責，均超出了理當範圍。將它的主要原理誇大和過於簡單地應用，這已經程度不輕地模糊了它的意義：很多無知過失（不以更嚴厲的詞稱它們了），既有理論上的也有實踐方面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犯下的。然而無論如何，它的影響過去是，並將繼續是革命性的。

馬克思主義始於對這樣一個命題的駁斥，即思想觀念明確地決定了歷史的過程，然而它本身影響人類事務的程度已經削弱了它的理論力量。因為，在改變迄至那時以來關於個人和環境的關係以及人和人的關係的占統治地位的觀點時，它已經明顯地改變了這種關係本身，因此在今天正持久改變著人們的行動和思維方式的諸多精神力量中，它仍然是最強有力的。



# 附錄

---

參考閱讀書目

——特雷爾·卡弗

中英譯名對照

---



這份書目主要是為講英語的學生匯編的，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集，其他著作集，單行本，傳記和回憶錄，及評論著作。在這些部份裡列出的所有著作，除注明外，均是一九七〇年至七七年間在英國或美國出版的。凡列出兩家出版者的，前為英國出版商，後為美國的；列出一家出版者的，如非英國出版商，我亦予以注明。出版日期均為最近版本或重印本。我的目的是提供一份最新著作的指南，而不是匯編一份作品的傳統目錄，後者中有很多必定是已經過時了。

我為較高級的學生附加了一部份學術著作、文獻目錄和學術刊物的編目。（為中譯本讀者查閱方便起見，書目中著作名稱、作者姓名、出版者和出版地點均保留原文——譯者注）

## 主要著作集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Collected Works*》的出版工作始於一九七五年，是由Lawrence & Wishart and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會同Progress Publishers of Moscow一起進行的。已經問世的七卷包括一八三五年至一八四八年間出版和未出版過的著作、信件、手稿材料和傳記方面的文獻的英語譯本。全部編成後大約將有五十卷，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時已出版的所有作品，相當一部份他們遺留的手稿」，以及「迄至全集問世時發現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書信」。（第一卷十九至二十頁）。每一卷末尾均有注釋，以及姓名，引用和提及的作品、涉及的題目索引。這種注解和索引是極有價值的，非常便於使用。



《Marx Library》(始於一九七三年，由Allen/Penguin聯合《New Left Review》以及Random House/Vintage聯合《Monthly Review》出版)提供了馬克思著作的一個很有意思的選本，儘管它的排列與其說是嚴格按年代順序不如說是按主題的。馬克思著名的《經濟和哲學手稿(一八四四年)》出現在《Marx Library》的《Early Writings》卷，連同一八四三至四四年間的各種著作和書信。一八四五的論文《費爾巴哈論》和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序言》使這套選本更趨完美。寫於一八五七至五八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馬克思巨著的初稿，首次完整的英語譯本以《Grundrisse》為題出版於一九七三年，現和《Marx Library》的《資本論》第一卷新譯文一致了。後者包括了一章手稿的英譯文《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出版者並允諾出版《資本論》第二章第三卷的新譯本。

《Marx Library》包括三卷政治著作，均譯成英語或根據馬克思自己的英語文本而成。《The Revolution of 1848》包括《共產黨宣言》以及馬克斯和恩格斯一八四七至一八五〇年間的演說和文章。《Surveys from Exile》包括馬克思的《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法蘭西階級鬥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及關於英國內外政治和美國內戰的文章。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他針對巴枯寧寫的《大綱》，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以及一八六四至七〇年間的書信文件都收在《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這一卷裡。

《Marx Library》各卷中由Lucio Colletti, David Fernbach, Earnest Mandel和Martin Nicolaus所作的導言是很有意思的。

## 選本和單行本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and New York, 1977) 是一部全面的作品選集，由David McLellan編輯。一卷本《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由Lawrence & Wishart and International 一九七五年出版，仍是一種有用的基本選本，儘管內容經過訂正的新譯本大部份取代了這些選本。在這本集子裡，有些英語譯文現在有著歷史的意義，因為它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交的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中，起了很大的影響。

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巴黎手稿〉詳細討論了異化概念，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就引起相當的注意。Martin Milligan的英語譯文刊於《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 of 1844》(Lawrence & Wishart, International修訂本一九七〇年)·T.B.Bottomore的譯文刊於《Early writings》(McGraw-Hill, New York, 一九六三年)·David McLellan的刊於《Early Texts》(Blackwell, Barnes & Noble, 一九七一年)·Loyd D. Easton和Kurt H. Guddat的刊於《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Anchor / Doubleday, Garden City, New York, 一九六七年)。

馬克思所有著作中最難理解的恐怕是他的一八四三年手稿，以《*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為題由Joseph O'Malley編輯，(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1972年)。《*The Holy Family*》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新黑格爾主義哲學家發起的諷刺性攻擊，(首版於一八四五年)，一九七五年由Progress, Moscow第二次修訂出版。《*The German Ideology*》，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八四五至四六年的手稿，其英語版完整紮實(Progress, Moscow, 1972年)，但是它和第一部份被重新組合並出版，題為《*Feuerbach: Opposition of the Materialist and Idealist Outlooks*》。(Lawrence & Wishart, 1972年)。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攻擊，《*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以法語寫成，首版於一八四七年)其英語版由Progress, Moscow 1976年出版。

出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The Communist Manifesto*》的有Monthly Review, New York 1968年, Penguin, Harmondsworth and Baltimore 1969年, 附有Taylor所作的介紹。由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第一位學術編輯David Ryazanov所編的經典版本，一九三六年以英語出版，並由Russell/Atheneum, New York 1963年再版。另一種有影響的版本由Harold Laski所編，並由Seabury, New York 1975年再版，附有T. Bottomore所作的介紹。D. Struik的《*The Birth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International, New York 1971年)包括一八四七至四八年間的補充文獻，以及基本文本。馬克思的文章《*Wage-Labour and Capital*》是在那些革命的歲月裡為講德語的工人寫的，隨後由恩格斯編輯，以英語本出版(Progress, Moscow 1970年)。

在同一系列筆記本裡，馬克思於一八五七年以粗稿形式寫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被馬克思稱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總介紹」，包括了對方法的很有意思的評論（馬克思自己的方法和政治經濟學家的方法），以及對美學和藝術史的討論。該文本出現在下列幾種著作裡：David Horowitz主編的《Marx and Modern Economics》（MacGibbon & Kee，一九六八年）；C.J. Arthur作序並主編的《The German Ideology》（Lawrence & Wishart，一九七六年）；International，一九七〇年）；S.W. Ryazanskaya翻譯成英語的馬克思的一八五九年已出版著作《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Lawrence & Wishart, International，一九七一年）；David McLellan主編的《Marx's Grundrisse》（第二版，Paladin，一九七三年）；Harper Torchbooks，一九七二年）；Terrell Carver翻譯的卡爾·馬克思的《Texts on Method》（Blackwell, Barnes & Noble，一九七五年），它包括對該文本所作的評論。E.J. Hobsbawm主編的《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Lawrence & Wishart，一九六四年）；International，一九六五年）包含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主要部份，其中有馬克思自己所運用的對歷史所作的唯物主義闡釋。

馬克思的傑作《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各卷的寫作秩序，不同於已版各卷的數字順序，情況如下：預計的第四卷由卡爾·考茨基從一八六一至六三年的手稿中重新整理而成，以三個部份出版，題為《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Lawrence & Wishart，一九六四、一九六九、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由恩格斯根據（大部份）寫於一八六四和一八六五年的手稿編輯而成，有Lawrence & Wishart一九七二年版和International一九六七年版。第一卷是緊接上述手稿寫成的，可見到三種德語版和一種馬克思親自翻譯的法語本。Samuel Moore和Edward Aveling（馬克思的女婿）翻譯的英語

本依據德語第三版，有Allen & Unwin的一九七一年版。附有恩格斯所作的附錄和編輯方面的改變的德語第四版是Lawrence & Wishart一九七四年和International一九六七年的英語本的藍本，這一英語本亦被收入前面提到過的《Marx Library》。《資本論》的第二卷最後寫成，由恩格斯根據馬克思一八六七至七九年的手稿重新整理而成，英語本有Lawrence & Wishart的一九七一年版和International的一九六七年版。馬克思的演講《Value, Price and Profit》是為講英語的工人於一八六七年寫成的，由他的女兒Eleanor Marx Aveling編輯並於一八九八年出版，一九六九年由International重版。

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出了幾種巴黎公社一百週年紀念版本，它們是：·《On the Paris Commune》(Lawrence & Wishart, 一九七一年)·Hal Draper編輯的《Writings of Marx and Engels on the Paris Commune》(Monthly Review, New York, 一九七一年)·Christopher Hitchens編輯的《The Paris Commune 1871》(Sidgwick & Jackson, 一九七一年)。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所作的最後的批評著作是《Notes on Adolph Wagner》(一八七九至八〇年)，它被包括在上面提到過的《Texts on Method》以及《Value: Studies by Karl Marx》(New Park 一九七六年)。馬克思寫於一八八〇至八一年的《Ethnological Notebooks》是由Lawrence Krader編輯的(Humanities, New York, 一九七一年)。

政治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學生對馬克思的某些短篇著作和著作選錄有著特殊的興趣。近年來這方面最有用的集子是：·《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主編T. B. Bottomore和Maximilien Rubel (Penguin, 一九七〇年·McGraw-Hill 一九六四年)··《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主編 Lewis Feuer (Fontana, Peter Smith, 一九六九年)。  
《*Karl Marx on Society and Social Change*》，主編 Neil Smels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ondon & Chicago, 一九七四年)。  
《*Karl Marx on Economy, Class and Social Revolution*》，主編 Z.A. Jordan, (Nelson, 一九七二年)。  
Scribner, 一九七五年)。  
《*The Economics of Marx*》，主編 Robert Freedman (Penguin, 一九七六年)。  
《*The Marx-Engles Reader*》，主編 Robert C. Tucker (Norton, New York, 一九七一年)。  
《*The Essential Writings*》，主編 F.L. Benden (Peter Smith, Magnolia, Massachusetts, 一九七三年)。  
《*Marx in his own Words*》，主編 Ean St Fischer 和 Franz Marek, (Penguin, 一九七三年)。  
在美國出版時題為《*The Essential Marx*》，Herder & Herder, New York, 一九七〇年)。  
《*Selected Essays*》，主編 Henry Stenning (編文彙刊, Plainview, New York, 一九六八年)。

《*The Karl Marx Library*》，主編 Saul K. Padover, 自一九七二年開始由 McGraw-Hill, New York 出版，其中包含論文和按主題排列的摘錄，各卷題目至目前為止分別如下：  
On Revolution, On America and the Civil War, O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Censorship, On Religion: Christianity, Judaism, and Jews, 以及 On Education, Women and Children。

其他按主題收入的馬克思文集包括：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主編 Shlomo Avineri (Anchor/Doubleday, Garden City, New York, 一九六九年)。  
《*On Colonialism*》(International, New York, 一九七一年)。  
《*On Ireland: Ireland and the Irish Question*》

- (Lawrence & Wishart, 一九六八年) · 《The First Indian War of Independence》(Progress, Moscow, 一九六八年) · 《The Eastern Question》, 主編Edward Aveling和Eleanor Marx Aveling; (Frank Cass, 一九七〇年·A.M. Kelley, 一九七四年) · 《Revolution in Spain》(Greenwood, Westport, Connecticut, 一九七五年) · 《Articals on Britain》(Lawrence & Wishart, 一九七一年) · 《The Russian Menace to Europe》, 主編P.W. Blackstore 和 B.F. Hoselitz, (Free Press, Glencoe, Illinois, 一九五二年) · 《The Civil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New York, 一九六一年) · 《On the Population Bomb》, 主編R.L. Meek, (第二版, Ramparts, Berkeley, California, 一九七一年, 以前出版時題為 On Malthus) · 《The Woman Question》(International, New York, 一九七〇年) · 《Women and Communism》(Greenwood, Westport, Connecticut, 一九七三年) ·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Lawrence & Wishart, International, 一九七二年) · 《On Religion》(Lawrence & Wiscart, 一九七二年) · 《On Literature and Art》, 主編Lee Baxandall和Stefan Morawski (Telos, St. Louis, 一九七四年) ·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ternational, New York, 一九七五年)。
- 馬克思的新聞寫作, 有幾種有趣的集子 · 《The Revolution of 1848-49: Articals from th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Lawrence & Wishart, International, 一九七三年) · 《The 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 主編Lester Hutchinson, (Lawrence & Wishart, International, 一九六九年) · 《The Cologne Communist Trial》, 主編Rodney Livingstone, (Lawrence & Wishart, 一九七〇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他們之間以及和第三者的)最有用的是《Selected Correspondence》(第三版, Progress, Moscow, 一九七五年)·馬克思的《Letters to Dr. Kugelmann》, 原於一九三四以英語再版, 一九七三年由Greenwood, Westport, Connecticut重版。《Letters to Americans》由International, New York於一九六九年出版。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都有英語譯本。馬克思明確加以首肯的兩部早期著作是一八四四年《政治經濟學批判綱要》以英語出版, 作為Struik翻譯的前面提到的馬克思《一八四四年手稿》的附錄, 並被收入《Engels: Selected Writings》, 主編W.O. Henderson, (Penguin, Harmondsworth and Baltimore, 一九六七年)·恩格斯的第一部著作出版於一八四五年, 以英語出版時題為《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主編W.O. Henderson和W.H. Chaloner (Blackwell, 一九七一年·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九六八年)·Panther在一九六九年和Lawrence & Wishart在一九七三年出過其他版本。〈德意志農民戰爭〉和〈德意志·革命和反革命〉(以前被歸入馬克思的作品) 被收入《The German Revolutions》, 主編Leonard Kriege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Chicago, 一九六八年)。

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作出最實際貢獻的兩部著作寫於一八七六至八六年間, 《Anti-Dühring》(副題通常為「尤金·杜林先生的科學革命」, 是對原題的翻譯), 由Progress, Moscow於一九六九年出版; 以及恩格斯去世後編輯完成的《Dialectics of Nature》·翻譯Clemens Dutt(1972年)。《反杜林論》中的三章構成了《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這部著作, 以及《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首版於一八八四年), 一八八六年的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被收在上面提到過的《Selected Works》。《The Role of Force in History: A Study of Bismarck's Policy of Blood and Iron》(部份內容引自《反杜林論》)，主編Ernst Wangermann，出版Lawrence & Wishart and International，一九六八年。

## 傳記和回憶錄

最全面的馬克思傳記是David McLellan的《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Paladin，一九七六年·Harper & Row，一九七四年)。Maximilien Rubel和Margaret Manale寫了資料豐富的《Marx Without Myth: A Chronological Study of his Life and Work》(Blackwell, Harper & Row，一九七五年)·Boris Nicolaevsky和Otto Maenchen-Helfen的《Karl Marx: Man and Fighter》(修訂本，Penguin，一九七六年)描寫馬克思的政治活動特別出色，同樣的還有Franz Mehring的《Karl Marx》(倫敦，一九五一年·New York，一九三五年·絕版)。Werner Blumenberg的《Karl Marx》(New Left，一九七一年)是一本篇幅不大但很有用的傳記。David Riazanov的《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已由Monthly Review重版(London和New York 一九七四年)·Achille Loria的《Karl Marx》的英語譯本已由Gordon, New York重版，(一九七六年)。

Wilhelm Liebknecht的《Karl Marx: Biographical Memoirs》已經重版 (Journeyman, 一九七五年)。·在《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中可以找到他們的朋友的追憶 (Progress, Moscow)。·《When Karl Marx Died》, 主編Philip S. Foner, (International, New York, 一九七三年), 集同時代人頌詞之大成。

W.O. Henderson的兩卷本《Friedrich Engels》(Frank Cass, 一九六七年) 是最新的恩格斯傳記。Gustav Mayer的《Friedrich Engels: A Biography》是一部英語節略本, (H. Fertig, New York, 一九六九年)。

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是數種傳記的主人公, 其中有Yvonne Kapp的《Eleanor Marx》第一卷。·《Family Life 1855-83》(Lawrence & Wishart, 一九七一年)。·International, 一九七三年), 第一卷。·《The Crowded Years 1884-98》(Lawrence & Wishart, 一九七六年)。·C. Tsuzuki的比較簡略的《The Life of Eleanor Marx 1855-98: A Socialist Trage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一九六七年)。

## 評論研究

關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 有著大量著作, 其中有很多之所以有意思, 與其說是著作的題目, 不如說揭示了有關著作者的內容。自本世紀五十年代末以來, 關於馬克思的論爭範圍已經改變了。·

新的文本、譯文以及批評性的重新估價，表明很多著名作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者）所討論的馬克思，是一個和其原來面貌完全不同的形象。要列一張包括很多已絕版的關於馬克思的著作清單，參閱前面提到的 David McLellan 最新的文獻目錄。

關於早期的馬克思，最豐富的評注者是 David McLellan，他的《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Macmillan, Praeger, 一九六九年)和《Marx Before Marxism》(Macmillan, Harper & Row, 一九七〇年)是標準著作。關於馬克思最有用的教科書是 McLellan 的《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An Introduction》(Macmillan, 一九七一年·Harper & Row, 一九七四年)，因為它把經過選擇的內容和傳記、評論、和文獻目錄結合起來了。McLellan 的《Marx》收入《Modern Masters》叢書 (Fontana, Viking, 一九七五年)，簡略描述了馬克思的生活、思想和聲譽。

現代研究馬克思的開拓性工作是 Shlomo Avineri 的《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一九七〇年)。Michael Evans 的《Karl Marx》(Allen & Unw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一九七五年)介紹了馬克思的生活和著作，並有批評性評論。

Richard N. Hunt 在《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第一卷《Marxism and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818-1850》中研究了馬克思的政治觀點和他的政治活動之間的關係。(Macmillan 一九七五年·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一九七四年)。其他研究還有·Hal Draper·《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第 1 部《State and Bureaucracy》(Monthly Review, London and New York, 一九七〇年)·John Sanderso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Longmans 1969年) · Henry Collins 和 Chimen Abramsky · 《*Karl Marx and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新版, Macmillan, 1975年) · Oscar J. Hammer: 《*The Red 48er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Scribner, New York 1969年) · 以及 Shlomo Avineri 主編的論文集 《*Marx's Socialism*》(Lieber-Atherton, New York, 1973年)。

Alfred Schmidt 對馬克思思想所作的哲學研究令人大感興趣,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由 Ben Fowkes 翻譯成英語 (New Left, 1971年 · Humanities, 1971年) · István Mészáro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Merlin, 1970年 · Harper & Row, 1971年) · 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第11版,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和 New York, 1977年) · John Maguire: 《*Marx's Paris Writings: An Analysis*》, 附有 David McLellan 所作的介紹, (Gill & Macmillan, 1972年 · Barnes & Noble, 1973年) · John Plamenatz · 《*Karl Marx's Philosophy of Man*》(Clarendon Press, 1975年) · 以及 Adolfo Sanchez Vazquez: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Merlin, Humanities, 1977年)。

三種經典研究是 · G.V. Plekhanov: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Lawrence & Wishart, International, 1969年) · George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翻譯 Rodney Livingstone (Merlin, M.I.T. Press, 1971年) ·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8年)。

其他哲學研究包括 · Ernest Mandel 和 George Novack: 《*The Marxist Theory of Aliena-*

*tion*》(第二版·Pathfinder, New York·一九七三年)·Richard Schacht:《*Alienation*》(Allen & Unwin, 一九七一年·Doubleday, 一九七〇年)·Sebastiano Timpanaro:《*On Materialism*》(New Left, 一九七五年)·Agnes Heller:《*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Allison & Busby, 一九七六年)·James J. O'Rourke:《*The Problems of Freedom in Marxist Thought*》(D. Reidel, Dordrecht and Boston, 一九七四年)·Graeme Duncan:《*Marx and Mil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與 New York, 一九七三年)·Dick Howard:《*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an Dialectic*》(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Carbondale, Illinois, 一九七一年)·Lucio Colletti:《*From Rousseau to Lenin: Studies in Ideology and Society*》(New Left, 一九七二年)·Sidney Hook:《*Revolution, Reform and Social Justice*》(Blackwell, 一九七七年)·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一九七五年)·William Leon McBride:《*The Philosophy of Marx*》(Hutchinson, 一九七七年)·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Left, 一九七二年)·A.R. Manser:《*The End of Philosophy: Marx and Wittgenstein*》(Southampton University, 一九七三年)·Arend Theoder van Leeuwen:《*Critique of Heaven*》(Lutterworth, 一九七二年)·和《*Critique of Earth*》(Lutterworth, Scribner, 一九七五年)·由「國際社會科學委員會」出版的論文集《*Marx and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Thought*》(Humanities, New York, 一九七〇年)·目前已絕版,但仍引起人們興趣的有·Auguste Cornu:《*The Origins of Marxian Thought*》(Springfield, Illinois, 一九五七年)·Eugene Kamenka:《*The Ethical Foundation of Marxism*》(第二版·London和Boston, 一九七二年)。

在討論馬克思的著作和馬克斯主義傳統之間的關係的評論家中，以前非常著名的是 George Lichheim。他的《*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第二版，Routledge & Kegan Paul, 一九六八年·Praeger, 一九六五年) 仍然是很有價值的。他的一些論文收入《*From Marx to Hegel*》(Orbach & Chambers, 一九七一年·Seabury, 一九七四年)。其他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較有意義的研究有··《*Revisionism*》，主編 Leo Labedz (論文集引重刊，Plainview·New York·一九七四年)··《*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主編 Nicholas Lobkowitz·(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一九七〇年) 廳··Irving Fetscher 的《*Marx and Marxism*》(Herder & Herder, New York, 一九七一年)··Mihailo Markovitch 的《*The Contemporary Marx*》(Spokesman, 一九七四年)··Umberto Melotti 的《*Marx and the Third World*》(Macmillan, 一九七七年)··Perry Anderson 的《*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New Left, 一九七六年)··Leszek Kolakowski 的《*Marxism and Beyond*》(London·一九六九年)，很不幸，該書已經絕版。

《*Karl Marx*》是 T.B. Bottomore 主編的一部論文集，(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一九七三年)，討論馬克思著作的社會學方面，同樣的還有 Alan Swingewood 的《*Marx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Macmillan, Wiley, 一九七五年)··以及 Anthony Giddens 的《*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一九七三年)。

馬克思對人類學和人類學的貢獻在 Emmanuel Terray 的《*Marxism and 'Primitive' Societies*》中得到討論，(Monthly Review, London and New York·一九七二年)··V.G. Kiernan 的《*Marxism*

and Imperialism》討論了馬克思對帝國主義的研究。(Edward Arnold, 一九七四年)·David Mitrany的《Marx Against the Peasant》討論了馬克思對農民的看法。(London and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一九五一年, 絕版)。

S.S. Praver的《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考查了馬克思對文學材料的運用。(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一九七六年)·Terry Eagleton的《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處理這個題目比較簡單 (Methuen, 一九七六年)。

Ben Fine的《Marx's Capital》簡明清晰地介紹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Macmillan, 一九七五年)·有用的介紹性著作有·Andrew Gamble和Paul Walton的《From Alienation to Surplus Value》(Sheed & Ward, 一九七一年)·Howard和J.E. King的《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Longman, 一九七五年)·其他近年來研究馬克思經濟思想的包括·Maurice Dobb的《Marx as an Economist》(Lawrence & Wishart, 一九七五年)·Ronald L. Meek的《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第1版, Monthly Review, New York, 一九七五年)·Paul Mattick的《Marx and Keynes》(Merlin, 一九七一年)·P. Sargent·一九六九年)·Murray Wolfson的《Karl Marx》(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一九七一年)·Paul C. Roberts和Matthew A. Stephenson的《Marx's Theory of Exchange, Alienation and Crisis》(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一九七三年)·Michio Morishima的《Marx's Econom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nd New York, 一九七三年)·Pat Sloan的《Marx and the Orthodox Economist》(Blackwell, Rowman & Littlefield, 一九七三年)·Suzanne de

Brunhoff的《*Marr and Money*》(Uzizen, New York, 一九七六年)；以及Paul Walton和Stuart Hall主編的《*Situating Marx*》(Chaucer, 一九七二年)。

Ernest Mandel在住下列著作中對馬克思的經濟學作了詳細闡述：《*Marxist Economic Theory*》(Merlin, Monthly Review, 一九七二年)；《*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Theory*》(第二版, Pathfinder, New York, 一九七三年)；《*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Monthly Review, New York, 一九七一年)；《*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hought of Karl Marx*》(New Left, 一九七一年)；《*Late Capitalism*》(New Left, 一九七六年)。

關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一部經典批評著作近年來已經重版，即Eugen von Böhm-Bawerk的《*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這一版包括Rudolf Hilferding的答覆，以及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關於價值轉化為價格的文章。(A.M. Kelley, Clifton, New Jersey, 一九七三年)。

Louis Althusser的著作以其自身的影響已經成為研究的對象，反映出在他的思考中，無論是更好或更壞，已經把馬克思拋在後面了。他的論文由Ben Brewster翻譯，收入下列著作中：《*For Marx*》(Allen Lane, Random House, 一九七〇年)；《*Reading Capital*》(New Left, 一九七〇年)；《*Politics and History: Montesquieu, Rousseau, Hegel and Marx*》(New Left, 一九七二年)。Alex Callinicos的《*Althusser's Marxism*》是最近的一部批評著作。(Pluto, Urinen, 一九七六年)。

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區別進行全面研究的著作有Norman Levine的《*The Tragic Decep-*



*tion: Marx contra Engles*) (Clío, Oxford and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1975年)。David McLellan 1977年出版《Engels》，收入《Modern Masters》叢書(Fontana, Viking)。Steven Marcus的《Engels, Manchester and the Working Class》是對恩格斯的傑作的研究。(Weidenfield & Nicolson, 1974年·Vintage, 1975年)。

## 學術版本、文獻目錄和學術刊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以原文(主要是德文、法文和英文)編輯全集出版的首次嘗試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半途夭折了。該套著作題為《Gesamtausgabe》，主編D. Rjazanov和V. Adoratskij (Frankfurt, Berlin, Moscow和Leningrad, 1917年至1935年)。該版本通常被稱作《MEGA》，一共出版了十三卷，1970年由Detlev Auvermann, Glashütten im Taunus重版。

一個頗為可觀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材料，首次出版時題為《Marx-Engels-Archiv》，主編D. Rjazanov (Frankfurt, 1915年至1927年)，俄語本題為《Архив К. Маркса, Ф. Engels'a》五卷本，1924至1930年在Moscow和Leningrad出版，1969年由Kraus of Nendeln, Liechtenstein重版。Rjazanov在蘇聯的一個集中營裡死去後，該系列從一九三二年起繼續出版。較短的摘錄發表在其它期刊上，並由Rjazanov編輯，即《Letopisi Marksizma》(Moscow和Leningrad, 十三期，1926至1930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德語版始於一九五六年，現已出齊，儘管它起的作用不同於《MEGA》的編輯所設想的。這套全集題為《Werke》(Dieltz, [East] Berlin)，通常被稱為《MEW》，手稿材料僅包括一部份，省略了很多文本上的變異，並把法語和英語著作譯成了德語。共有按序排列的三十九卷，兩卷補充本，兩卷索引。Gertrud Hertel匯編了一份包含馬克思和恩格斯各種版本著作的索引清單，題為《Inhaltsvergleichsregister der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n》(Dieltz, East Berlin, 一九五七年)。

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作的權威版本(原文連同文本的各種變異)大約達一百卷，近年亦開始出版，附有緒言，題為《Gesamtausgabe: Editions-grundsätze und Probestücke》(Dieltz, East Berlin, 一九七二年)。這一《MEGA》新系列將分成四個部份，第一部份或稱《Abteilung》收入著作文章，但不收《資本論》和有關手稿。這些第一部份未收者成了第二部份。第三部份包含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的以及涉及第三者的所有書信。第四部份收入兩位作者保留的筆記，編輯匯集的年表，以及對文本變異所作的注解，並編製一份全面的索引。據認為全集全都完成出版將在二〇〇〇年左右。以下各卷是Dieltz Verlag在一九七五至七六年出版的：《Abteilung》I，第一卷，包括馬克思至一八四三年三月的著作；《Abteilung》II，第二卷第一分卷，馬克思在一八五七至五八年的經濟學手稿；《Abteilung》III，第三卷，收入至一八四六年四月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

馬克思著作的標準文獻目錄提要見 Maximilien Rubel 的《Bibliographie des oeuvres de Karl Marx avec en appendice un repertoire des oeuvres de Friedrich Engels》(Rivière, Paris, 一九

五六年），連同一份增補附錄（一九六〇年）。對 Rubel 的馬克思著作之選擇所作的介紹和注釋被譯成法語，題為《*Bibliographie*》，有著同樣高的標準。現已有兩卷：《*Karl Marx: Oeuvres: Economie*》(Gallimard, Paris, 一九六三、一九六八年)。關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有兩種專業文獻提要或許是有用的：J. Lachs 的《*Marxist Philosophy: A Bibliographical Guide*》(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一九六七年)；以及文獻著作的一本俄語指南：L. A. Levin, 《*K. Marks, F. Engels, V. I. Lenin, Ukazatel' bibliogra-ficheskikh rabot 1961-72*》，一九七二年在莫斯科出版。阿姆斯特丹(荷蘭)的「社會史國際研究院」出版了一部《*Inventar des Marx-Engels-Nachlasses*》；倫敦的「馬克思紀念圖書館」一九七一年開始出版它的目錄。

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馬克思生活年表以後重版了，它是《*Karl Marx: Chronik seines Lebens in Einzeldaten*》(Makol, Frankfurt, A. M. Kelley, Clifton, New Jersey, 一九七一年)。  
Maximilien Rubel 匯編的另一部年表以德語出版，題為《*Marx-Chronik: Daten zu Leben und Werk*》(Hanser, Munich, 一九六八年)。Bruno Kaiser 主編的著作調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書的命運，該著作題為《*Ex Libris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Schicksal undverzeichnis einer Bibliothek*》(Dietz East Berlin, 一九六七年)。

以下是一批學術刊物，發表有關馬克思的文章，出版專輯，它們是：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Bulletin of the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Critique, Economy and Society*, *Encounter*,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deology and Consciousness*, *Inqui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Politic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German Critique, New Left Review, New Literary History, New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Political Studies,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Praxi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Review of Politics, Socialist Register,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Studies on the Left, Telos, Theoretical Practice; 英文文藝季··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Érudices de Marxologi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Le Mouvement social,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Revue socialiste; 以德文的有·· Arbeit und Wirtschaft, Archiv der Sozialgeschichte, Archiv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Kyklos, Marxismusstudien.*

## 中英譯名對照

- Aeschylus 埃斯契羅斯  
 Albert 阿爾伯  
 Alembert 阿朗貝爾  
 Alsace-Lorraine 阿爾薩斯—洛林  
 Anti-Dühring 《反杜林論》  
 Annekt 安內克  
 Annenkov 安尼科夫  
 Applegarth 阿普爾加思  
 Arago 阿喇戈  
 Aristotle 亞里斯多德  
 Arnim 阿尼姆  
 Austro-Prussian War 普奧戰爭  
 Babeur (Babeuf) 巴貝夫  
 Bach 巴赫  
 Bacon 培根  
 Bakunin 巴枯寧  
 Balzac 巴爾扎克  
 Barbès 巴貝斯  
 Bauer 鮑威爾  
 Babel 倍倍爾  
 Beesly 比斯利  
 Beethoven 貝多芬  
 Belgium 比利時  
 Bentham 邊沁  
 Berlioz 柏遼茲  
 Bernstein 伯恩斯坦  
 Bismarck 俾斯麥  
 Blanc 勃朗  
 Blanqui 布朗基  
 Blue Books 藍皮書  
 Börne 伯恩  
 Bray 布雷  
 British Museum 不列顛博物館  
 Buonarroti 博納羅蒂  
 Buchner 比希納  
 Butler 巴特勒  
 Byron 拜倫  
 Cabet 卡貝  
 Carlyle 卡萊爾  
 Carr 卡爾  
 Cervantes 塞萬提斯  
 Charles X 查理十世  
 Chartism 憲章運動(主義)  
 Chateaubriand 夏多勃里昂  
 Chernyshevsky 車爾尼雪夫斯基  
 China 中國  
 Christian socialism 基督教社會主義  
 Civil War in France 《法蘭西內戰》

Class struggle 階級鬥爭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法蘭西階級鬥爭》  
Cobbett 科貝特  
Commune 巴黎公社  
Communism 共產主義  
Communist League 共產主義者同盟  
Communist Manifesto 《共產黨宣言》  
Comte 孔德  
Condillac 孔狄亞克  
Condorcet 孔多塞  
Considerant 孔西德朗  
Constant 康斯坦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經濟學批判》  
Cremer 克里默  
Courbet 庫爾貝  
Crémieux 克雷米厄  
Crimean War 克里米亞戰爭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哥達綱領批判》  
Cr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  
Crompton 克朗普頓  
Dana 戴納  
Danielson 達尼爾遜  
Dante 但丁

Darwin 達爾文  
Das Kapital 《資本論》  
Daumier 多米耶  
Decembrists 十二月黨人  
Delacroix 德拉克魯瓦  
Democratic Alliance 民主聯盟  
Democritus 德謨克里特  
Demuth 德莫斯  
Descartes 笛卡爾  
Deutsche Brüsseley Zeitung 《德意志布魯塞爾報》  
Dézamy 德扎米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德法年鑑》  
dialectic 辯證法  
Diderot 狄德羅  
Dietzgen 狄慈根  
Disraeli 迪斯累利  
Duff 杜夫  
Dühring 杜林  
Dumas 仲馬  
Eccarius 埃卡柳斯  
Economist 《經濟學家》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經濟學與哲學手稿》  
Edgar 艾德加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Eleanor 愛琳娜  
 Encyclopedists 百科全書派  
 Engels 恩格斯  
 Epicurns 伊壁鳩魯  
 Fascism 法西斯主義  
 Feuerbach 費爾巴哈  
 Fichte 費希特  
 Flerovsky 伏烈洛夫斯基  
 Flocon 弗拉孔  
 Fourier 傅立葉  
 France 法國  
 Franco-Prussian War 普法戰爭  
 Franziska 弗朗西絲卡  
 Frederick the Great 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III 腓特烈三世  
 Frederick IV 腓特烈四世  
 Freiligrath 弗賴利格拉特  
 Galileo 伽利略  
 Gans 甘斯  
 Garibaldi 加里波第  
 Gautier 戈捷  
 German Ideology 《德意志意識形態》  
 Germany 德意志(德國)  
 Gibbon 吉朋  
 Gladstone 格萊斯頓  
 Goethe 歌德  
 Gogol 果戈里

Gotha Programme 《哥達綱領》  
 Gottschalk 哥特沙克  
 Gramsci 格蘭西  
 Granville 格蘭維爾  
 Greeley 格里利  
 Grün 格律恩  
 Grundrisse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Guesde 蓋德  
 Guido 奎多  
 Guizot 基佐  
 Harney 哈尼  
 Harrison 哈里遜  
 Hegel 黑格爾  
 Heine 海涅  
 Heinrich 海因利希  
 Helvétius 愛爾維修  
 Henrietta 亨麗塔  
 Herder 赫爾德  
 Herv Vogt 《福格特先生》  
 Herwegh 赫爾韋格  
 Herzen 赫爾岑  
 Hess 赫斯  
 historical materialism 歷史唯物論  
 Hodgskin 霍奇斯金  
 Holbach 霍爾巴赫  
 Hölderlin 荷爾德林  
 Holland 荷蘭  
 Holy Family 《神聖家族》

Homer 荷馬  
Hugo 雨果  
Hume 休謨  
Hungary 匈牙利  
Hyndman 海德曼  
India 印度  
International First 第一國際  
Ireland 愛爾蘭  
Italy 意大利  
Jenny 燕妮  
Jews 猶太人  
Johnstone 約翰斯通  
Jones 瓊斯  
July Revolution 七月革命  
Kant 康德  
Kautsky 考茨基  
Kepler 開普勒  
Köppen 科本  
Kossuth 科蘇斯  
Kovalevsky 科瓦列夫斯基  
Kugelman 庫格曼  
Labour Party 工黨  
Labour Theory of value 勞動  
價值理論  
Lafargue 拉法格  
Lamartine 拉馬丁  
Lamennais 拉梅耐  
LaMettrie 拉美特里  
Lankester 蘭開斯特  
Lassalle 拉薩爾

Lavrov 拉伏洛夫  
League of the Just 正義者同盟  
League of Peace and Freedom  
和平與自由聯盟  
Ledru-Rollin 賴德律—格蘭  
Leibniz 萊布尼茨  
Lenin 列寧  
Leroux 列魯  
Lessing 萊辛  
Levi 列維  
Liebknecht 李卜克內西  
Linguet 林魁特  
Liszt 李斯特  
Locke 洛克  
Louis-Philippe 路易·菲力浦  
Lucraft 盧克拉夫特  
Lukács 盧卡奇  
Luther, Martin 馬丁·路德  
Mably 馬伯利  
Macaulay 麥考雷  
Machiavelli 馬基雅弗里  
Materialism 唯物主義  
Marat 馬拉  
Marrast 馬拉斯特  
Marx 馬克思  
Mazzini 馬志尼  
Mehring 梅林  
Metternich 梅特涅  
Mexico 墨西哥  
Miguet 米涅



Mill 穆勒  
 Milton 彌爾頓  
 Moll 摩爾  
 Montefiore 蒙特費奧  
 Morelly 莫雷利  
 Morris 莫里斯  
 Musset 繆塞  
 Napoleon 拿破侖  
 Nechaev 納契夫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新萊茵報》  
 Newton 牛頓  
 Nicholas I 尼古拉一世  
 Nietzsche 尼采  
 Observer 《觀察家》  
 Odger 粵德加  
 On the Jewish Question 《猶太問題論》  
 Owen 歐文  
 Palmerston 帕麥斯頓  
 Parvus 巴伏斯  
 Pasteur 巴斯德  
 Paul 保羅  
 Pecqueur 裴柯爾  
 People's Paper 《人民報》  
 Peterloo 彼得盧  
 philosophical radicalism 哲學激進主義  
 Plekhanov 普列漢諾夫  
 Poland 波蘭

Poussin 普桑  
 Poverty of Philosophy《哲學的貧困》  
 Proletariat 無產階級  
 Proudhon 蒲魯東  
 Pushkin 普希金  
 Pyat 庇特  
 Quesnay 魁內  
 Rationalism 理性主義  
 Reclus 雷格利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Germany 《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Rheinische Zeitung 《萊茵報》  
 Ricardo 李嘉圖  
 Rochefort 羅什福爾  
 Rodbertus 羅德貝爾圖斯  
 Rousseau 盧梭  
 Ruge 盧格  
 Russell 羅素  
 Russia 俄國  
 Saint-Simon 聖西門  
 Sand 桑  
 Saturday Review 《星期六評論》  
 Savigny 薩維尼  
 Say 賽伊  
 Schapper 沙佩爾  
 Schelling 謝林  
 Schiller 席勒

Schlegel 施萊格爾  
Schleswig-Holstein 石勒蘇益格  
—荷爾斯泰因  
Schopenhauer 叔本華  
Scotland 蘇格蘭  
Scott 司各特  
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 Century 《十八世  
紀秘密外交史》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  
Shelley 雪萊  
Sieber 西伯  
Sismondi 西斯蒙第  
Smith, Adam 亞當·斯密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社會民主聯盟  
Socialism : Utopian and Scien-  
tific 《社會主義：烏托邦和科學》  
Socrates 蘇格拉底  
Spain 西班牙  
Spencer 斯賓塞  
Spinoza 斯賓諾莎  
Stein 施泰因  
Stendal 司湯達  
Stirrer 施蒂納  
Story of Life of Lord Palmer-  
ston 《帕麥斯頓爵士傳》  
Strauss 施特勞斯  
Sue 蘇  
Sutherland 蘇瑟蘭

Switzerland 瑞士  
Taine 泰納  
Theseson Feuerbach 《費爾巴  
哈論》  
Thierry 梯葉里  
Thompson 湯普遜  
Times 《泰晤士報》  
Tocqueville 托克維爾  
Tolpuddle 托爾普德  
Trade Unionism 工聯主義  
Tribune 《論壇報》  
Trotsky 托洛茨基  
True Socialists 真正社會主義  
者  
Turgenev 屠格涅夫  
United States 美國  
Urquhart 厄克特  
Vallès 瓦萊斯  
Vico 維科  
Vogt 福格特  
Voltaire 伏爾泰  
Wagner 瓦格納  
Weitling 威特林  
Westphalen 威斯特法倫  
Willich 維利希  
Wolff 沃爾夫  
Young Hegelians 青年黑格爾  
派  
Zasulich 查蘇利契